

法國洛里哀著
傅東華譯

比較文學史

商務印書館發行

北京圖書館藏

圖書集成
三

819
753
2

法國洛里哀著
傅東華譯

比
較
文
學
史

商務印書館發行



3 1774 3433 3

譯序

「比較文學史」這個名詞，驟然看時，很容易解做「比較的文學史」，其實應該解做「比較文學的歷史」，而所謂「比較文學」(comparative literature)的義蘊，也不僅如詞面。

一八八六年，英國的波斯奈脫教授(Prof. H. M. Posnett)始用這名詞名他的著作。他揭發他這著作的宗旨是在指出「社會進化上某種稍為固定的原則，藉以綜合文學上興衰進退的事實。」

稍後，加利福尼亞大學教授蓋雷(O. M. Gayley)發起「比較文學研究會」(a society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其宣言有云：

「因為缺乏系統的努力，關於文學的型類運動，主題等等之比較的研究，迄今未有適當的進行。倘叫各個人單獨去努力，那未即使要從各國文學中去搜集為說明一種文學類型的特質所必需的材料，殆亦不可能。如今大家合力的時候到了。在這推議中的「比較文學」或「文學進化」研究會」裏，各個會員須就他所特別熟悉的「一種文學類型式文學運動去作專門的研究……」(見The Dial, 一八九四年八月號。)

由這兩個看來，可見所謂「比較文學」就是由系統的——或統合的——方法見出的文學；這與後來摩爾頓(R. G. Moulton)所謂「世界文學」(world literature)名雖不同，實際則一。自有這種系統的統合的

方法，文學史的性質顯然經過一種基本的變化，或者竟說這種方法，就是近代文學史的基礎也無不可。同在這方法未被應用於文學史之先，（一）文學史只能是國別的，而統合全世界的文學的歷史及說明世界文學主潮相互影響的歷史無從做起；（二）文學史只能是傳記的，批判的，而文學現象的前因後果無從說明。故比較文學的概念之構成和應用，不能不說是近代文學研究上——特別是文學史研究上——的一大進步。

近代文學研究所以能有這樣的大進步，我們溯本追源，不能不歸功於一般實證主義的——特別是進化論的——思想家。這些思想家曾經證明社會上一切現象——文學也在內——都決不是單獨的存在，而必有一種相互依存的關係。唯其有這個依存關係的原則的發見，文學史家纔得放棄從前那種流水賬式的作法，而曉得從許多散漫的材料裏去理出一個頭緒來。這些思想家當中，有一個雖然不曾直接說到文學而卻對於文學研究發生極大影響的，就是達爾文；試想那個近代的文學理論者能發覺他的進化觀念呢？其次對於文學曾經直接宣述意見而亦發生很大影響的，當推孔德（Comte）、阿克爾（Ackerle）和斯賓塞爾（H. Spencer）三個人。他們的體系雖不完全相同，卻都指示我們以文學和環境（自然的及社會的）間的密切關係。同時及以後的文學批評家和文學史家受了他們的影響，或竟把他們的體系毫無變動地應用起來，如波斯奈脫教授之應用斯賓塞爾，或者把他們的體系略略修改一下，作為自己的體系，而也實地應用起來，如泰晉（Taine）之作英國文學史，布翰退爾（Brunetière）之作文學史上類型的進化（L'évolution des genres dans l'histoire de la

Littérature) 拉那叔 (Lietoumen) 之作各人種的文學進化 (L'Évolution littéraire dans les divers races humaines) 總之這一流的——或寧說近代的——文學史家的傾向，是不外試用一種一般的概念來統攝一切紛亂的現象。那末我們應該曉得這部比較文學史的作者洛里哀 (Loliane) 也是代表這種傾向的，因為他自己曾有這樣的明白宣言——

『文學史的職務是在尋溯種種知識運動的潮流，說明種種潮流的影響，並譯述種種努力的形勢，備作彼此比較的單位或資料而已。』

但是比較文學史所以能與泰音的英國文學史差不多享有同等的地位，則並非單靠它能代表這種傾向。因為能依順這種正當的傾向與否，固然是估量近代文學史的一個重要標準，但除這個標準之外，仍舊還須顧到「一般歷史」的標準。所謂一般歷史的標準，簡括言之，就是不以觀察的事實遷就某種現成的前提的原則，卻從觀察的事實裏而隨時去發見原則。許多歷史家所以失敗，就因忽視這個標準的緣故，即如波斯奈脫教授的比較文學，也因把斯賓塞爾的學說固執得太厲害，先人的見解太深，事實的觀察太淺，以致不免犯着牽強附會——或至少是粗率——的通病。所以蓋雷和司各脫 (E. N. Scott) 在他們合著的文學批評的方法與材料 (Methods and Materials of Literary Criticism) 裏批評他道——

『我們對於波斯奈脫的方法無論認為它的價值如何，總須把希臘和拉丁的文學讀了，藉以證實或推翻他

在「部舊制度之殘試存」一章中所得的結論，或把英國作家的作品讀了，藉以補充他說明「國民文學的性質」那種粗率的梗概。」（頁二五〇）

這話的意思，無非說文學史家的結論，必須與文學史的史實相符，而要判定一個文學史家的信用如何，也不外拿實在的史實與他的結論去相對一法。而事實上，這樣的不相符，乃是近代急進的文學史家最容易犯的一種毛病。原來紀述和說明的差別。本是割開文學史上舊的方法和新的方法的差別；舊的方法單有紀述而無說明，已不復能應足近代人事事要求理解的心理。新的方法，則省除了紀述而加上說明，但是省略紀述並不就是省略觀察，特不過不單把直接觀察的結果紀錄下來，卻把由觀察而得的見解紀錄下來；無觀察，說明是無從產生的。急進的文學史家爲求速效起見，往往自己先憑空構成一個體系，或先從別人採用一種學說，便要使一切現象都受它的範圍。若果這種體系或學說是健全的，又若應用時非常審慎，不肯扭曲事實或抹殺事實以遷就學說，卻是確曾對於事實的全部都加細密的觀察，而發見它們與所假定的學說絕無抵觸的，那也未嘗不可獲得滿意的結果。但若那體系或學說的本身已不健全，而應用時又因範圍廣大而不得不粗率，那末就沒有不失敗的。這樣的失敗，就連這派文學史家的老祖師泰音，自己也還不免。泰音之用「種族」、「環境」和「時代」三種因素來說明文學，似乎是顛撲不破的，但是晚近的文學論者已有人否認它們是基本的因素了。見（伊科羅茲的唯物史觀的文學論第一部第二章。）他如布翰遜，於泰音的三種因素之外再加上「個性」一因素，卻也沒有更多的成功。我

們並不是反對這種因素的採用，（因為如不採用這個，系統的說明便不可能，）也不是主張採用什麼較基本的因素以代替第二義的因素，（如馬克思主義的文學論者主張以經濟的因素代替其他一切被認為非基本的因素，）不我們所反對的，是未曾對事實全部作細密觀察之前，便預先拿定幾個因素，來說明它們的那種辦法。上面已經說過，說明是基於觀察上的，那末用以說明的因素果能說明所觀察的事實的全部而無抵觸，那便算是有效。至於所觀察的事實範圍擴大了，原有的因素已不復能說明它了，那也不能消取這些因素在原有範圍以內的效力。所以泰晉舉出的三項，若果能說明他所處理範圍——英國文學——以內的事實，且確是由觀察這些事實而得的結果，那末在那範圍以內是完全有效的。後來人若不把他自己所處理範圍以內的事實——譬如中國文學或其他文學——先作一種實地的通盤觀察，卻便把泰晉的三個因素，或布翰遜爾的四個因素，乃至勃克爾的河流文化說，馬克思的經濟史觀，囿囿地粗率地應用上去，那就是絕大的錯誤。

而且，文學史家所處理的範圍愈廣，他的流於粗率的機會必愈多，那也是不待說的，故文學史家的第一任務，在於度量自己的能力和時間容他所得處理的範圍能有多少；大若果他的能力和時間只容他對於某一民族某一時代的作家和作品細加觀察，那末他最好不要冒昧嘗試世界的全部文學。因為文學史畢竟與其他的歷史不同，未經實地觀察的史料總是有危險的。

由上述幾層，我們對於洛里哀此作的功罪已略略可論。他能從最古時代直到現在的世界上一每一角落的

文學織屑無遺地用不過繁重的篇幅統統都收攬起來，使成一種很自然的有機組織。這樣的魄力是我們不能不佩服的。我們讀過全書之後，雖然不能便獲得關於世界文學的充分知識，卻可獲得一種整個的印象，一幅明瞭的地圖，至少對於世界上比較著名的作品總都能指出它在這地圖上的經緯度數來，這又是其他同性質的著作難可比擬的。特別在他最後一篇結論裏，我們覺得他的眼光非常廣遠，見地非常公允，態度非常大方，斷不是那種效忠於某一特定流派或特定主義的文學史家或文學理論家強勉學得來的。又他用以說明文學現象的因素雖然大體上是泰西的，卻是並不顯出梗概的形跡。這也是他的一個優點。

但是許多人讀了這書之後，總都要有一種印象，就是要覺得它好像不是一部文學史，卻是一部文化史。這是確乎難免的。我們推求它所以要給人這種印象的原因，實在就他所處理的範圍太大。因為像他這樣包羅廣泛的文學史，對於所列舉的文學作品當然不能逐一都曾加以觀察，故對於這些作品的本身的批評當然不得不從略，同時關於這些作品的背景的敘述，則不得不增多。又所包羅的範圍既廣，倘若作者的眼光不側重在各民族文學的文化背景上，也實在無法可以將它們統一起來。故做這樣偉大的工作，確乎需要非常偉大的魄力；本書作者的魄力原也不能不算大，但終不免犯着顧此失彼的毛病。讀者試將他和勃蘭提斯（Brandes）去比較一下。勃蘭提斯以他那樣的博學卓識，卻也只敢在十九世紀歐洲文學主潮裏處理半個世紀的文學，而且還只以英、法、德三國為限，所以成績畢竟好得多。

譯書的人本不應該批評原書的好壞，但因論文學史的方法不覺信筆及之，這是破了譯序的通例的，要請讀者原諒。

本書的譯稿曾承唐肇黃先生替我校看一過，應在這裏表示謝意。又本書的英、日譯本都是周啓明先生借給我的，因輟轉托人校看的緣故，竟將兩譯本完全失落了，現在兩譯本都已絕板無法可以償還，只得在此表示萬分的歉意。

傅東華，一九三〇年七月十五日，於上海。

比較文學史

目錄

第一章

歷史以前——人類思想最初的痕跡——古世界開幕時的埃及——多數文化的萌芽出現於加爾底亞的塵埃中——並存於幼發拉底及底格里斯兩河岸諸民族人種的文明——遠在小亞細亞以外的地方——中國的居民——中部亞美利加的高原——吠陀經時代的印度

第二章

印度思想最古的證據——亞細亞與歐羅巴的比較——「桑斯克列脫」語文學中宗教詩和抒情詩的發達——吠陀經——有歷史的時代——雅利安人種的大遷徙——歐羅巴——希臘人的奠基

第三章

希臘人未至以前的希臘——關於希臘文明發軔之神話傳說——希臘之歌人時代——荷馬時代——伊利亞特和行吟詩人

第四章..... 二六

希臘以外——希臘對於周圍諸國之忽視——印度，波斯，猶太，伊特魯立亞等國之遞為智識中心——希臘思想與『蠻夷論』——希臘文學之盛衰——希臘文學之喪失地位——柏加馬斯與亞歷山大里亞——訖西元前五四〇年頃

第五章..... 四二

希臘拉丁文化混和之先——各民族合併之始——古初之拉丁詩——普匿克文明之殘蹟——錫勒時代——奧古斯都時代——拉丁文明的全事業——拉丁文學的偉大與衰落——哲學之復興

第六章..... 六〇

拉丁文學的白銀時代——圖拉真的態度——羅馬威權達於極頂的時代——圖拉真朝世界的概況——羅馬國勢之驟衰——希臘羅馬文學之末季——東方都會之亞歷山大里亞——亞歷山大里亞之哲學家——亞歷山大里亞思想與基督教思想之並行的及對抗的發達——異教改變後之最高努力——朱理安帝——第四世紀

第七章..... 七九

文藝衰落的趨勢表面上似乎停頓——蠻族侵入促成文藝衰落——第時文藝的殘痕——第五世紀

至第八世紀間歐洲諸民族道德社會之狀況——日耳曼人與斯干的那維亞人之傳說與民歌——
噠之起源——古代思想之殘蹟——東羅馬帝國文學事業之實際休止

第八第

九〇

查理曼之復興事業——向文化努力——查理曼阿爾泰刺巴努斯毛勒斯——九世紀末葉和十世紀
初期的擾亂——封建世界——歐洲重入蒙昧的狀態

第九第

九七

歐洲文化銷沉與亞洲學術隆盛之對照——并極東亦遠勝歐洲——十世紀時之中國日本東埔察與
波斯——八世紀以降之阿刺伯學術——阿刺伯文明一瞥——阿刺伯書籍之傳入西方

第十第

一〇六

歐洲各國及其國語之胎成——信條努力之倡導——平民詩與國民詩擺脫信條之最初奮鬪——讀
美英雄事業之詩歌勃興——由英雄史詩潛變冒險小說與騎士小說——圖案說系——其起源——
圖案故事對於歐洲新興文學之審美觀念及一般狀況發生異常的影響

第十一第

一一六

十三世紀之概觀——各國文學創始期之狀況大體一致——法英德與南歐諸民族文學藝術之同時

發展——法國南北部之遊方詩人——盎格羅薩克森之歌人——德國之戀歌詩人——民間詩歌擔
脫宗教努力與封建淫威之支配

第十一章

一一九

新時代之難產——十四世紀之嚴重狀態——各民族與各種思想之劇變——宗教改革之先驅——
威克里夫——約翰·胡司——布拉格之哲羅姆——文學界無方針之運動為政治社會之事實所掩
而歸然無光——東羅馬帝國之亡——結果使希臘文學由君士坦丁堡移至意大利——西班牙阿刺
伯文明之傾覆——法蘭西思想之比較的乾枯——文化之引炬傳入意大利人之手——文藝復興之
曙光

第十二章

一四二

社會不安的景象到處有之——意大利藝術與文學之驚人的開展——古學之復活——歷史上兩大
事實文學復興與宗教改革——兩者的連鎖——兩者並行的進步——路德伊拉斯莫斯與梅蘭克吞
——宗教改革在文學上之反響的反響

第十四章

一五四

激烈之黨爭與教義衝突——日內瓦之喀爾文——約翰·諾克斯與蘇格蘭之長老會——社會的及

宗教的復古運動——易格內細阿·羅耀拉——德林特會議——歐洲及歐洲以外諸民族雖困厄於叢惡之下而精神的活動異常顯著——兩個異域文明毀滅之一瞥祕魯與墨西哥——四方多難不足以阻文學之進步諾索與阿利德斯托托代之意大利其例一莎士比亞時代之英國其例二塞凡提斯代之西班牙其例三喀摩萊時代之葡萄牙其例四土耳其則正當文學之黃金時代——法蘭西文學復盛

第十五章.....一八〇

大古典時代之曙光——社會擾亂的狀況猶昔——意大利西班牙文學之奴隸的模倣——文學目的之不定——『纖巧作風』與『誇飾作風』——瑪利諸作派與衰吾刺作派——優良的好尚與常識之反動——十七世紀英法兩國之最高潮——清教徒時代以後之社會狀況——王政復興時代傾向放逸之反動滑稽作派之暴發——意大利文化之狀況——西班牙荷蘭與德國——三十年戰爭以後——道德的大劫——法德得勢時代——歐洲民族大多數傾向模倣

第十六章.....二〇九

哲學時代的實際開始不甚分明——文學的獨立性此時漸已顯露——法蘭西的百科全書家——羅耳特耳盧梭狄德羅——歐洲各民族（尤其是英法兩國）的思想交換——法國提歐洲文學最高權直達一七八九年頃

第十七章

智識運動釀成法國的社會革命——十年的擾亂——同時的英國和德國——德國對於智識上的事業超軼全歐——德國思想之驚人的發達——詩人與哲學家——智識界大活動時代以後之怠倦不振時代——維持之煩惱「世界的苦悶」即「世紀病」

一一二四

第十八章

浪漫運動之開始其影響遍及於全歐——各種思想之擴充範圍——學問之改組——純想像方面之修養——純料哲學——浪漫派的詩——浪漫主義在法英意大利西班牙俄羅斯波蘭斯干的那維亞等處的變相

一三六

第十九章

浪漫主義已使一切想像和幻想的泉源枯竭——傾向現實的反動——當時社會政治生活及道德的狀況——法蘭西第二帝國——文學之寫實主義——寫實主義在歐洲之各種形式——法國之自然主義——其他各國之模倣自然主義——新派之興

二六一

第二十章

文學上之大分派——法國及他處之新却脫主義——新基督教與神秘的諷嘲詩——象徵派——

二八〇

般文學之世界的性質——世界性在法英美西班牙意大利之最近的表现——文化之新中心——二
十世紀之曙光

目錄

七

比較文學史

第一章

歷史以前——人類思想最初的痕跡——古世界興衰時的燦及——多級文化的萌芽出現於加爾底亞的懸塔中——亞存於幼發拉底及底格里斯兩河岸的腓尼基人種的文明——遠在小亞細亞以外的地方——中國的居民——中部亞美利加的高原——史前時代的印度

世界文明日進，各種學問均為顯著的發達，到了現在，我們對於上古的事情，已能用科學的方法，構成學說去解釋他的了。

當十八世紀初葉，畢謝 (G. B. S. S. S.) 創立比較建築學，從此人類學上的種種發見，給予考古學以極大的補助。但是關於語言文字的考古學，即所謂比較言語學，比較文學，卻還沒有人着手創造。

近代的科學已能靠着地底掘發的東西去追尋人類最古的痕跡。牠已能指示我們，當距今不可以年代計算的時候，嘗有一種生物和我們相似，常和貓屬的巨獸爲羣，在巖岩邊上奔走，樹林裏面飄流，地底深洞裏住宿，彼此交換意見，祇靠着一種粗厲的呼聲和不明瞭的單音語，餓時便彼此傾軋以爭食，卻又都憑着本能，曉得努力求脫他們的天生的獸性，曉得利用火石，曉得錘磨石頭，雕刻獸骨，耗費極大的功夫去做出了一柄粗糙的斧，並且因爲他們已經發明了一種極重要的元素——火——所以在進化的途程上已經是跨了一大步。簡言之，這種情形便是人類進化的序幕，後來更經若干世紀的遲緩的進步，這纔達到人類歷史將開幕時的狀況，所謂銅器時代和第一鐵器時代，便是那時的進步的最高點了。

然而科學對於人類智識活動的真起點，卻還不能像這樣確然的認定。政治史對於亞力山大 (Alexander) 以前的印度人 (the Hindoo)，賽阿克薩里 (Yaxares) 以前的米太人 (the Medes) 和丹內阿斯 (Darius) 以前的希臘人 (Greeks)，都絕對不曉得他們是怎樣的狀況，人類智識的歷史也正如此；牠對於人類發表思想的最初形式，即使追溯到牠們的根源，也仍舊尋不出一些蹤影。

科學雖然在世界的案卷堆中做過如許的搜討，如許的探索，而對於做世界諸大種族的鼻祖的那幾個特優部落的原始核心，卻依然不能斷然的確定。我們對於原始時代，祇能用想像的功夫去探索牠，如今要尋究語言和思想的根源，就彷彿在黑夜裏扞索，你想探出什麼蹤跡的了。當初人類所以隱約表示戀愛，表示提高生活的希冀，

表示苦痛，表示對超自然之神秘的敬畏，那第一聲的歌唱和第一聲的哀號，我們將永遠沒有曉得的希望。

當塞姆 (Semite) 和印度歐羅巴 (Indo-European) 諸民族還未出現於歷史的舞臺的時候，人類既已有了相當的文明，其關於道德問題及人生實用的問題，必嘗學得當時一段極長的經驗，這是毫無疑義的。然而在我們的模糊影響的推測裏面，這種智識也屬不可捉摸的了。我們只曉得距今不知幾何年數——據歷史家最審慎的研究，以為約莫在紀元前六十七世紀至四十七世紀之間——嘗有一個時候，人類開始從事團結，漸漸脫離無意識生活的蒙昧時代。大約自從那時起，世界便為現在依然瓜分着牠的三大種族所佔據，而在分給白種人的地面上——歐洲，非洲北岸，小亞細亞，及中部亞細亞——便有兩種進步的運動相繼而起，其一以大西洋沿岸為起點，其間最特色的事蹟，即意卑里亞人 (the Iberians) 之入歐洲和柏柏人 (the Berbers) 之入非洲；其他則出現於東方，以屢次移民的結果而播散實業和信仰的種子〔參考 *André Lefèvre, Evolution Historique*〕。一般學者都相信這兩種反向的運動之緊密相互的接觸，曾在希臘和意大利最古的傳說上留有痕跡。

實際上，當古世界開幕的時候，惟有埃及和加爾底亞 (Chaldea) 兩國豁然特出，譬猶兩顆孤寂的行星運行於宇宙黑夜的中天。其餘民族都可說是於我們無關緊要；牠們都已像影一般的過去，絕無痕跡的了。據一般學者的臆測，似乎都不能更從這兩個民族溯而上之，因為我們斷定這兩個民族的存在，是根據着絕對的事實的，至所謂歷史以前的亞細亞嘗有條耳民族 (Turaniens) 及考亦脫民族 (Kouschites) 一類的假說，其所根據的事實

完全是另外一種性質的。

第一節

我們試閉着眼，先想一想原始部落所種植的那些幽暗的森林，然後便想到埃及神祕的宮殿和東方壯偉的文明；這一種巨大的變化，不免要使我们大吃一驚。

當埃及王托司米茲第三 (Thothmes III) 或拉美斯第一 (Rameses I) (即舊約出埃及記中所說的那個埃及王之父) 的宮中，那班詩人還沒有用『太陽之子』(Son of the Sun)、『安蒙之子』(Son of Ammon)、『兩王冠之主』(Lords of Two Diadems) 等等稱號在那裏歌頌他們主人的功業的時候，埃及早已有了藝術家和著作家。埃及自從建設孟斐斯 (Memphis) 的時代，即自第三、四、五等王朝以降，象形文字的文籍便已很多。我們在這些文籍裏，可以從當時民間的迷信和祭師的神祕的紀述當中，看出純粹的哲學思想，而當時人民的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的狀況，也可從這些文籍裏得着極詳細的紀載。

相傳當埃及第六王朝的初期，有一個達官臨終的時候，這囑要把他生平最得意的一個銜頭——『書庫司』——刻在墳墓上。據此，可見那時已有書籍；可見那時的書籍分量已多至可以成庫；又可見那時的書籍已頗重視，甚至要用一個高等內廷官吏專司其事了。

此等書籍都完全亡失，已是無法可挽救，但其中一定有幾種是極古的。也許有幾種還是建設孟斐斯的米尼斯 (Memis) 王朝以前的東西。那時有一種名叫死者之書 (Book of the Dead) (原註，後世從木乃伊身上已經發現了許多本數，都用埃及古紙寫的) 是當時一種奇異的典禮，譯者按當時人死皆以此書一部份葬，人人都以為牠是神聖的；有頌揚古帝王言行的史詩；有實驗科學和玄秘科學的著述；並有小說，故事，和戀愛詩，性質和後代的作品頗有類似的。地方 (原註，現在學者所以得窺見埃及戀愛詩的一斑，多賴三種埃及古詩集，書為西元前十三世紀頃底比斯 (Thebes) 時代所編，內含極豐富之戀愛詩之片段。又埃及的古墓碑上亦曾發見類似的抒情作品。此等作品和後來亞拉伯人所搜集的作品所含的主要觀念，不同的地方很少；至其詩之形式和作法，則著名之埃及學者麥斯波羅 (M. Maspero) 之說以為和意大利之「斯多奈利」體 (Stornelli) 頗似。) 而尤多者為宗教的著述。埃及的聖典比中國人的「經」，婆羅門教徒 (Brahmans) 的吠陀 (Vedas) 及帕栖人 (Parsees) 的增達味斯塔 (Zend-Avesta) 都還古得多。

第二節

當埃及的東北部 (此處之原始種族屬小亞細亞的白種人) 包圍在地中海，黑海，高加索山脈，裏海，及亞洲南部諸海中間的廣漠地面，各民族間嘗起一度的大混雜。有的固定在他們的祖宗所住的地方，其他則大部分由

亞洲北部的大草原遷來，來就較舒適的氣候。他們於是公佔了加爾地亞的廣漠地面。這些流動的部落，間或有已具備民族的形式。就中如阿卡德人 (Akkada)——此為晚近新發見的一個民族，牠的語言和宗教思想，是我們所曉得的各系統中那一個都歸不進去的——及蘇麥利安人 (Sumers or Sumerians)，都已顯着甚高的進化程度。當他們遷到幼發拉底河 (Euphrates) 下流的時候，他們已經有一種著述（一般學者以為他們的文字就是簡單的象形文字），有一種立法的原则和頗已進化的宗教。他們實業上的優越，也非常時其他任何民族所能及。他們已經曉得建城市，築要塞，鑄銅，或竟鑄鐵；曉得造戰車，織羊毛，雕像，並作浮文雕刻。現今學者曾有一件大奇蹟，便是居然把當時一件浮文雕刻品解釋出來了，這是沙賽克 (M. de Susec) 的有價值的發見，現在保存在法國的盧甫耳故宮 (The Louvre) 中；沙賽克不但把那上面刻的一個酋長的面貌——是當時一個地方酋長名叫古提亞 (Guten)——考檢出來，並連那上面的文字也能解釋。這種文字的年紀已經有了四五千年，是當初吾珥 (Ur) 和色普拉 (Sipula) 的居民交換意見用的，也是他們記載歷史用的。

約自西元前四千五百年起，（有些學者以為還要早些）阿卡德和蘇麥利亞兩民族便居住幼發拉底及底格里斯兩河匯流之處，在同時之其他民族中顯然別樹一幟；後乃迫於塞姆族的侵略和征服，至西元前二千年而完全消滅。他們的形貌和語言，都和他們周圍那些鷹鼻茸鬚的種族——底格里斯流域的哥西安族 (Cossians)，雪西安族 (Ossians)，考亦脫族，幼發拉底流域的阿拉米亞族 (Aramians)——不同，和沙漠中的諸遊牧民族

也不同。他們曾留給後來代與的諸民族——亞西利亞人 (Assyrians)、腓尼基人 (Phoenicians)、猶太人 (Jews)——以豐富之成文的傳說。而最後起的猶太人受其影響尤多。向來我們對於聖經中的辭句和詞藻，都當牠們是聖經中所特有的東西，又因牠們是希伯來人得諸神感的文字，且因其作風有在一句中用異詞疊述同意的特色，故我們對牠向具一種肅然起敬的態度，及至晚近碑銘學者的研究，纔曉得此種作風純然起源於阿卡德人，並非猶太人所始創。又相傳爲大衛 (David) 所作的詩篇 (Psalms) 裏，我們可以看出古時阿卡德種族所用的符咒，並可聽得他們的祈禱的回音。

第三節

當時另外有一個民族與阿卡德民族並存，可是他們的起源、氣質、才性，都和阿卡德民族不同。他們所用的言語是塞姆語族的一支。他們早就定居於底格里斯、幼發拉底和波斯灣流域。後來成爲加爾底亞居民中最佔優勢的分子，凡加爾底亞居民的宗教、儀式、典禮，都由這個民族傳授而來，至其傳授的時代，則雖加爾底亞最初的君主，也都無從稽考牠。他們那種宗教含有許多禁厭符籙之術和神祕的讚歌；我們要知道牠的性質，則當時有一種叫做惡鬼錄 (Book of Evil Spirits) 的，現在還保存其片段，可供近代科學的研究。

當提刺 (Ternly) 的兒子〔原註亞伯拉罕 (Abraham) 和他的父親提刺都生於加爾底亞的吾珥——今

之摩奇爾 (Moghair) —— 後由吾珥遜至迦南 (Canaan) 誕生前約三千年的時候，加爾底亞便已有楔形文字鐫刻的書版。這些書版傳到現在，使近世科學得追溯七千年來巴比倫 (Babylon) 王的傳統，並可證明那一部分世界的文明當紀元前五千年頃便已為高度的發達。現在存在的書版為一九〇〇年紐約神學學校校長霍夫門 (H. A. Hoffmann) 所發見，臘丹牧師 (Rev. Hugo Radan) 解釋文義。

然而這些散佈於幼發拉底及底格里斯兩河沿岸的諸人種和民族，雖則各有各的存在，卻常被此混雜同化。經過一段時間之後，他們便都忘記了當初移民的事情，以為他們向來住在加爾底亞，再也不想不到是他們的祖宗手裏從別處遷居來的。於是他們便造出一種神秘的歷史，並將牠編成書本教人。當時一般最以學問著名或最富想像力的祭司，則紀述世界創造的靈異事蹟；（自從英國學者司密斯 (George Smith) 發見了尼尼微 (Nineveh) 阿蘇班尼巴 (Assurbaniba) 圖書館裏的亞西利亞書版，見上面刻着極詳盡的世界創造史，近代一般學者便都以巴比倫神話和聖經中的創世記的比較研究，為學術上重要事業。）歷說世界第一個家族怎樣的繁衍，後來人類腐敗犯罪的時候，怎樣的忘恩負義；全能的巴力 (Baal, the All-powerful) 怎樣的動怒，怎樣的起誓要將他自己創造的東西毀滅了；洪水怎樣的氾濫，表示信約的虹怎樣的出現，言語怎樣的混雜，以至加爾底亞 經諸神和巨人治理之後怎樣的建設牠的第一個朝代。

加爾底亞歷朝的王帝當中，有一個叫做沙基那 (Sardan) 的，是好幾代以沙基那取名的王帝的第一個，

他是一個東征西伐的王帝，使國家的文化日進昌明，自己的威權日增強盛，常常建設城市，而使塞姆種族的勢力遍及於加爾底亞。他還有一樁得意的功業，便是保障學術。他嘗在烏魯克 (Uruk) 地方——古人謂之奧卡斯 (Orchus)，聖經上謂之奧雷克 (Orch) 近世謂之華爾卡 (Warka) ——搜羅書籍造成一個重要的圖書館。烏魯克因此有『書城』(City of Books) 之稱。當時一般熱心人士，因他的鼓勵，大家都從四處去搜羅包含祭司的傳說的古書，其他則或忙着從事翻譯，或用塞姆文字為古書加註釋，或更自著關於宗教、天文學、文法、立法的新書以補湊藏書之數——這實在是一種驚人的事業，因為那時書籍的來源既屬有限，保存的工具又不完備，所以這種事業決非容易辦的。其後約一千五百年，有一個亞西利亞王，命令將這些巴比倫尼亞的古籍一度整理，並將牠們謄錄在燒料的書版上，至今還有一部分斷片留存，為英國博物院中極珍貴的陳列品（參考 G. Smith, History of Babylonia (1877) ; Tiele, De vrucht der assyriologie door de vergelykende Geschiedenis der Goldstenen, (1877) ; 及 Rawlinson, Oppert, J. Halévy, Hommel, Norris, Guyard, Loisy, Roisner, Koldewey 等人的作品）又新近在退爾發弗 (Telsel 在南部巴比倫尼亞) 的故址，即聖經上的伊拉沙 (Ellasar) 的地方，發見了一種碑頭（發見者為英國博物院掌管埃及和亞西利亞古物的白基博士 (Dr. Wallis Budge)）亦極可珍貴，上面刻有一種私人的通信，可證當初巴比倫尼亞實握東方世界智識上的牛耳。

此外則小亞細亞地方也散佈着許多文化的發源地。當初小亞細亞為世界所有種族雜處的地方，牠的傳說和信仰異常混雜。許多年數之後，經查美斯 (Madaeus) 及更後的亞伯拉罕的指引，希伯來的流動部落定居於此，便據為他們的祖國。

底格里斯河之東，與賽姆諸民族（亞西利亞，條耳，考亦脫等）毗連的地方，嘗有一個強有力的帝國，名曰以欄 (Lam)。當其盛時，柯斯溪斯 (Khoussas) 河雙流匯集之處，大城林立，而其都會蘇薩 (Susa) 尤巍然崛起，睥睨一切。約在西元前二千三百年頃，以欄王庫圖卡昆替斯 (Kathour-Kakuntis) 侵略幼發拉底流域的平原，自烏魯克至巴比倫一帶的城市盡為佔領，凱旋時並將加爾底亞的神像帶歸，裝在蘇薩的廟宇裏。據此可見以欄的文明乃是獨立發展的一支，並不是加爾底亞文明的分派，也並不會受着塞姆種人文明的影響。

又約但河 (the Jordan) 沿岸，以希伯倫 (Hebron) 為中心的地方，嘗有一種神秘的種族，名曰契替斯 (Kittis)。大約是由高加索諸種族分派出來的。他們的實業也已很發達，並且已有一種象形文字的文學；不過他們的象形文字和埃及的不同，到現在還不會有人能設解釋牠。自從他們定居於約但河沿岸，便常常與埃及人，亞西利亞人和烏拉底 (Urad) 的諸王發生衝突；後來有一個酋長名叫契底薩 (Kithsas) 的，竟把史臣帶到戰場上去記他的勇武的功業。

以上所述，便是東方文明當諸民族（即埃及，腓尼基，弗里家，亞西利亞等民族）未混雜，波斯民族未統一以

前分別發軔的概況。

離開這些民族很遠且向來和他們不相往來的地方，則有中國和恆河（the Ganges）沿岸的居民，以不齊的程度各各在那裏進化；此外美洲中部高原的居民也許在這時候正在那裏替阿栽克人（Aztec）和圭啓佛人（Quichua）預備一種半開化的文明的遺產。

方埃及和加爾地亞兩處的民族在三角洲的尖頭和波斯灣的極端發軔古世界的智識生活的時候，中國人的始祖，散佈於黃河及揚子江沿岸的諸部落，也在遠東地面獨立地從事於同樣的發軔事業。

當摩西（Moses）誕生前的兩千年，那尼羅河和幼發拉底河沿岸居民所演的活劇，在中國也便開演起來了。中國的文字創造極早；當牠的所謂「黎民」剛離開崑崙山上的搖籃，驅逐了苗族，佔據了中原的時候，蒼頡便創造文字。

當中國人最初到中原的時候，他們還都未脫粗獷野蠻的狀況；還像澳大利亞土人和布希門人（Bohmen），以樹根和昆蟲爲食，許久纔知火食。其後中國人乃從事耕種，組織規律的社會，而養成秩序的生活的習慣；這種習慣漸至成爲中國的民族性，歷無數世紀而絕少變化；卽在今日，還仍舊做中國民族的特徵。

中國人當歷史剛開幕的時候，確是富有一種法則的創造的心理，具有一種偉大的智力，凡有所需要，自己無不能立時供應。

中國人嘗創造藝術，文學，及商業；但當他們進步至某種程度的時候，他們覺得已是止境，已足夠應付後代人的需求，更無再改革，發展，進步的必要。於是他們便把既往的制度目為神聖，不許有所更新；即至今日，中國人還依然甘心替燦爛的『既往』做奴隸。

中國人的簡冊和書籍，淵源極古；當其他雖已開化的民族，都還不得不專憑記憶力以保存他們的法律和傳說的時候，中國便已有了極豐富的文學。

然而東方文明最絢爛最廣大的窟宅卻還得推印度——古代的印度，牠的歷史開始於德拉維提安人（Dravidians）之入據。

第二章

印度思想史的蘊藏——亞細亞和歐羅巴的比較——桑斯克列脫語文學中宗教詩和抒情詩的發展——吠陀經——
有歷史的時代——雅利安人種的大遷徙——歐羅巴——希臘人的發祥

近代某著作家有句話說：「如今人不問是誰，若是追溯起科學、宗教、和藝術的淵源來，決不復以雅典或耶路撒冷爲止境，必定還要上追埃及或印度。」我們雖則不能確定印度古代的歷史究竟起於何時，但是我們可以說，自從雅利安人種的文明發軔以至現代，至少也已有三千年無間斷發達的歷史。當雅利安人種未侵入印度之前，先有一種從阿爾泰山附近出來的強盛的民族叫做德拉維提安人（the Dravidians）稱雄於印度斯坦半島（the Peninsula of Hindostan）的南部，以實業和語言文字的優越超快隣近的民族。這個民族所用的語言當未受桑斯克列脫語（Sanskrit 卽梵語）的影響時，本是一種很和諧的言語，向來叫做印度的意大利語，卽雅魯古語（Talugu）。這種語言不適於發表觀念和情操，卻最適描寫極精細的實物的印象。如今印度南部賣索爾（Mysore）及卡魯浦德海岸（Coromandel coast）等處德拉維提安人的苗裔當中，還有用這種語言著作的極

豐富的歌曲，故事，和諺語。據這樣看來，亞洲的兩個極端（東邊是印度，西邊是加爾底亞）曾產出相似的思想制度和。論其來歷則彼此向來無絲毫的關係，故我們要想解釋牠們所以相似的道理，簡直是無從說起；只能說人類的性情本來大同小異故爾有這種的相似罷了。

再若把東方文明和西方文明進步的先後比較起來說，則當歐洲寒冷的區域還未到石器時代建造石室的時候，埃及和亞洲的居民卻已發見有用的或貴重的金屬，且已受用着文明的產物所賜給物質生活的種種好處。但是另一方面固有些處於幸運狀況底下的優秀種族猛進於文明的狀態，而同時也有許多彼此相隔甚遠老死不相往來的民族，久久不脫野蠻的狀況，竟有及至現代還依然不知有藝術，不知有文字的。

第一節

尋常人都說，「自然」是詩與底最初的無盡藏的泉源，這句話若是正確，那末印度地方那些自然產生的詩，也必定是環境所造成的產物了。

因為印度地方的景象，是何等的可驚可愕，何等的雄壯！思想簡單的人接觸了，那得不感受很深的印象？在印度，無論什麼東西都具有一種猛烈，富裕，濃厚的氣象；有好的，有惡的，有生長的津液，有毀滅的威權，有美觀的，有奇醜的，有異常繁盛的植物，有可怖的暴風狂雨，有美麗的河流，有凶險的瀑布，有灼熱的沙漠，有烟瘴的澤田，有廣

渾單調的平原，有起伏突兀的山脈，有光耀眩人的地平線，有陰沉暗澹的颶風，有一切主生和主死的元素，故所以當那雅利安人伏在地上，尋着凶險的暴風，彷彿什麼凶神噓氣似的掠過，傾覆舟船，震撼大地，毀圮房屋，摧傷禾稼，掀拔林木的時候，他們所感得的應是何等神祕的驚怖！當他們仰首望着皎潔的天空，或注目在長春的微笑所燭照的肥沃的平畝上的時候，又那得由他們不油然而發生宗教的情感。

在這種種族和宗教的搖盪裏，「自然」常用牠的威權欺壓羸弱而赤手的人類。人類受這種威權的支配，因而對於「自然」發生敬畏心。從這些天然勢力的理想化的進程裏，產生了雅利安人的詩。又在那沐浴於古代晨光裏的山巔上，出現了象徵的作品和祈禱的文字。雅利安人無意識地將「情感」和「志願」授與種種自然現象，而自然現象報答着日日在他們身上感發起恐怖、驚異、感激、崇拜等等的心理。他們在星裏，光明裏，黑暗裏，以至雲、雷、風、雨裏，都見有一種活潑的精神的勢力。各種的自然力都被擬做人，都被附麗在一種非尋常的肉體上。於是他們便具有一種理想，這種理想漸漸的提高，以至於成爲他們的神，既有了神，於是便有頌神的讚歌。

當時雅利安人普通的語言是古代的一種「帕拉克里忒語」(Pāralakriti)；這是當時雅利安人通用的語言。但是一般學者和會受神感的優秀分子卻都不願用這種流俗的語言而善用一種較高尙的語言——即「桑斯克列脫語」——以寄寓他們的思想；他們以爲「桑斯克列脫語」乃是神聖的語言並且是合法的語言。在距今遠至不可追究的時代，當印度歷史還在烟霧朦朧的境界，相傳有三百多詩人把他們的神祕的著作集合起來，成

功一部宏博深奧的巨製，名叫吠陀經（Veda）。其中有一部分叫做利葛吠陀（Rig Veda），是雅利安人最古的思想言論的總匯，內中包含着無數的傳說和象徵，歷代相傳下來，最後纔把牠寫在棕梠葉上。如此不知不覺之間，那些遠古的詩人成就了一件無限價值，取之不盡的宏業；雖則拿藝術的眼光看來，並不見得很高妙，而據近代科學的研究，卻相信牠所包羅的東西實在宏富。我們從這裏面，可以看出印度全部宗教發達的萌芽，比較神話的鎮鑰，極宏富的文學的基礎，一切詩之共通的泉源——一言以蔽之，便是印度歐羅巴一支文明的大部分，都可以從吠陀經的詩篇裏尋見牠的萌芽。

自從吠陀經的時代以降，印度人所住的地方，只限於五河（Punjab）流域和喀布爾（Kabul）諸山的區域，除畜牧耕種外別無所知。那時他們只有一種純粹的宗教詩，大都是肅穆莊嚴的作品。而此種作品已足以歷足當時人的純樸愛和平的心理。

第二節

然而到後來人口和家族異常增加，人類的波浪漸漸澎漲，漸漸前進，漸漸洋溢，於是當初雅利安人所佔據的地面漸漸覺得不够用而思開拓新疆土。因要開拓新疆土，所以當初以畜牧耕種爲業的，便都一變而爲戰士。因爲當印度雅利安人闖入印度河（Indus）和恆河（Ganges）中間的肥沃區域以安插過剩人口的時候，他們必定遇

着士著的抵抗。既有抵抗便須有戰鬪；而這種戰鬪往往歷時很久，不易解決。

戰爭最能造英雄。而英雄最能感發詩興。古代印度既須常常和人家戰爭，故遂開放史詩的鮮花。當時詩人所記載的，不外是婆羅門 (Brahman) 宗教和思想戰勝的事蹟，否則便是記載當時人口過剩的諸種族因爭握宗教及政治的牛耳而戰的戰爭。因為當時的諸人種都受着人口過密的壓迫，常常要把大批的人口輸送到他們所征服的新地面上去。

至於雅利安人和伊蘭人的大移民，則並不等那時纔開始。他們早已繼續向西方進行，一直至於古代歐羅巴的極點。後來那地方經過許多種族的更替，最後乃為希臘羅馬族，克勒特族，條頓族，和斯拉夫族。

現在有許多學者曾經追溯出當初那兩大種族遷移的路線，並且考據出其中許多支派，或彼此聯結，或互相讎仇而終至於各不相識。

當初那兩大種族的遷流，譬如潮水，牠的一漲一落，要憑分明標出，是很不容易辦到的。然而一般歷史家卻相信，他們的路線雖則縱橫交錯，但也不難尋溯。他們以為東方雅利安族 (Oriental Aryans) 很早很早便向印度阿以東的區域進發，後來這一支便成印度民族；其在巴克特里亞 (Bactria)，阿富汗斯坦 (Afghanistan)，波斯，亞美尼亞 (Armenia)，米太 (Media) 等處的便是伊蘭民族 (Iranians)。其西方雅利安 (Western Aryans) 一系，則整頓着武裝從各方面入據歐洲。就中希利尼族 (Hellenes)，意大利族 (Italics) 兩支向多腦河下流

(Lower Danube) 並進至朱理安·阿爾普山 (Juliana Alps) 分路，前者沿班都斯山 (Pindus) 而進，後者沿亞平寧山 (Apennines) 而進，當希利尼族之北，居多腦河至萊茵河 (Rhine) 一帶地方的，是克勒特族 (Celts)；居喀爾巴阡山脈 (Carpathians) 和波羅的海 (Baltic Sea) 之間的是條頓族；更北，居裏海 (Caspian Sea) 和維斯杜拉河 (Vistula) 之間的是斯拉夫族；在斯拉夫族所居的邊境，偏於杜味納河 (Dvina) 一方面的，便是立陶宛族所住的地方。

凡以上所列舉的諸人種，莫不包含着近代各民族的元素，其大部分的進化的經過都異常暗昧且像甚是費力。但是就中有一個種族，卻似乎是上天選擇他來負一種特別使命的——就是希利尼民族。因為當雅利安種族西遷的時候，上天忽將他們引至希臘島的海岸，因此便將他們的文明，他們的語言，他們的神話和宗教都播種在那裏。

第三章

希臘人未至以前的希臘——關於希臘文明發軔之神話的傳說——希臘之歐人時代——荷馬時代——伊利亞特和行吟詩人

第一節

當希臘人——或寧說是耶佛那人 (Japheth) ——還在半野蠻的時代，他們便繼續一批批的從東部及北部出來。那時他們用的兵器只有長矛和銅刀，但是他們的語言和智識，卻比他們所將與周旋的諸民族都優越得多，因為那些民族是丹塑形的藝術 (Plastic Art) 都還全然不懂的。那時希臘人的思想和觀念都還非常幼稚，一塊雕琢過的石頭或一片鑄刻過的木片，便可使他們當做最高的神明看待。但是當他們經過小亞細亞及後來到希臘地面的時候，他們便和幾個文明程度比他們高得多的民族相接觸。

那幾個文明程度較高的民族便是弗里家人 (Phrygians)，呂底亞人 (Lydians)，及其他夙受亞西利亞 (Asia) 宗教

和藝術的影響的諸民族。此外還有那神祕的皮拉斯齋人 (Pelagians)，他們在東方佔據的地位和意卑里亞人 (Liberians) 在西方佔據的地位一般，不過比意卑里亞人 開化較後。意卑里亞人 是歐洲最早開化的民族。據斯特累波 (Strabo) 的意見，以為意卑里亞人——尤其是西班牙南部的忒耳杜爾人 (Turdi)——很喜歡美文且會有極古的史書，他們自稱為「六千年前的有韻詩」。皮拉斯齋人則柏拉圖 嘗說他們曾建築城市、宮殿和要塞，會造文字、刻書版，並曾有控制意卑里亞人 的榮譽，雅典人 則以嘗為皮拉斯齋帝國的中心自誇。

當希臘人自東徂西 的途中，從腓尼基人 (Phoenicians) 那里剽竊了字母，又從他們那里學會商業。後來慢慢的又從埃及人 學得哲學、醫藥、圖畫和建築。他們的雕像術的萌芽是從亞西利亞 得來的。亞西利亞 的雕像異常重笨，所以希臘人最初的雕像亦然。但是後來他們經過許多練習，遂至盡美的境域。據此看來，這個奇異的印度日耳曼種族，除少許的傳說外，是絕無遺產可以依傍的；他們但憑他們自己的努力以產出藝術作品，而所產出的，卻使後來的民族永遠可以自豪，也永遠可以欣賞。

這些游牧的部落既經過了色雷斯 和小亞細亞，他們便在歐洲東端 的一塊狹窄的小島上停駐了。此時他們已覺得農業的必要，所以他們便固定住在那裏。這塊半島的地面是很小的，四面有一圈山脈和陷澗很深的海岸圍住。內地礫瘠的平原，除少量的小麥和大麥外，別的簡直沒有什麼出產。淺山上則有橄欖樹，無花果樹，和蠟燭糾錯的藤蘿籠罩着，間或有一二大理石碣或銀礦可以發見。

在這個狹窄的地面，以這種單簡的富源，這個將以其藝術和思想統治全世界的種族，便漸漸的進化起來了。那裏的天然產物雖然不甚富裕，但是這個種族所播種在那裏的人文的種子，雖只寥寥無幾，而所收獲的卻從來不會有那般豐富。

他們有所謂全能的神 (the All-powerful)，有所謂大潘神 (the great Pan)，和許多人類化的男神和女神，以為都是宇宙精力流溢而成的。他們於是採掘石礪裏的大理石，把這些神按着理想的模型，雕成青年美麗的形象，莫不充滿着生氣和精力；又開採銀鑛中的銀子以報酬一般藝術家的傑作。因此，那時藝術家所建設的碑坊和石像可以供後代人永遠的模型。後來希利尼人又在地中海沿岸建設了許多很興旺的城市；又因他們天賦的才能語言應用得非常的優美，及至今日，還未曾有能勝似牠的。

第二節

希臘人也跟他們在恆河流域的祖宗一樣，是從宗教的感情裏最先得着詩的感興的。他們也跟歐洲其他的民族一般，早已忘記了自己當初和印度的關係，但是他們的想像力卻使人類共同的想法和人類原始的信仰得着極優美的形式。他們從東方拜星的符象和箴注裏——由印度族的多神論和克勒特族的巫術混雜而成——創造出許多神話，將一切東西都拿來擬人，使一切自然現象都具備軀體和靈魂。他們於是創出一種神譜，彷彿一

個理想的共和國似的，內中各個神道都有他的特別任務，又從牠的千頭萬緒當中可以看出一種井然不紊的條理。

他們最初的詩的題材，便是對於神的敬畏，對於太陽賜人的恩惠的感激，太陽來復時的歡欣和太陽消滅所引起的悲哀，以及靈魂對於超自然的本能的期望等等。

但是這種狀況還只是一種昏暗的半神話時代的狀況，那時離開成文的傳說還很遠很遠。換言之，那時還是所謂歌人 (minstrels)——如奧衍斯 (Orpheus)，來那斯 (Linus)，攸摩披特斯 (Eumolpidus)——的時代，便是詩人佔據教育家地位的祭師時代。當時那些歌人在人類中的使命就是要維持信仰使不斷絕，並在人類中提倡一種教訓。他們根據着自己的見解，將神的存在和品性，默示給一般思想簡單的人。他們宣布道德的法典，借着「福民克斯琴」(phormix) 和七絃琴以高闊揚國法的意思，有時過着舉行嚴重的典禮，他們就把自己編製的讚歌，神讚歌，和神祕的短歌誦唱起來。

此等歌人同時又都是詩人，據傳說，當時歌人有奧倫·攸摩帕斯 (Olen Eumolpus)，腓勒門 (Philemon)，來那斯，且米里斯 (Thamyris)，梅蘭帕斯 (Melampus)，判福斯 (Pamphos)，安雅溫 (Amphion)，奧伯斯，經樞阿斯 (Museus) 等。其中大多數都是從匹伊立亞 (Pisaria)，姑撒利 (Thessaly)，比奧細亞 (Boeotia) 和亞的加 (Attica) 等處來的。但因年代湮遠，已不復能細考。及後各地邦國崛起，其中互相仇視的往往彼此戰鬪，希臘人因

欲征服其他民族，故遂產生英雄，跟着他便產生歌詠英雄事業的詩歌。

那時有一種青年的好戰的熱情激起了希臘人的勇氣，亟想在威武的伊利亞翁 (Ilion) 的牆上試一試他們兵器的力量。於是詩人如色雷斯之旦米里斯 (Thamyris the Thracian) 如荷馬書中曾提及的費米亞斯 (Phemius) 及費愛與人提摩多克斯 (Demodocus the Phaeacian) 輩，都在他們的奇異的著作裏預示將來發明史詩的先兆。他們所歌誦的東西無不含有一種剛勇的精神，故奧宙斯的神話中的贊歌此時已不得不退避而滅跡。那時的詩人已都離開神廟而與尋常生活接觸。他們的歌已不復頌揚神道，已將堪擬神道的人類，英雄，和政治上的大事件包括入他們歌詠的範圍了。

希臘向來是分做許多小邦國絕無團結的。至此纔曉得通力合作的必要。從此希臘遂自覺牠自己的生命和運命，而希臘民族團結後的第一個果，便是伊利亞特 (Iliad)。

第三節

伊利亞特這部大史詩，是經過不知幾何年代的詩的素養纔得着的結果，牠的作者，尋常都以為是荷馬 (Homer)。然而這個三千年來做美術界司令的荷馬究竟是誰？他是那裏人？他是那一年的？他的生平有怎樣的事蹟？他這部傑作是怎樣做出來的？怎樣流傳給後人的？這一大串的問題，雖經許多的研究，雖經將他的著作加上

許多的註釋，經過許多的翻譯，卻仍舊不能得着一個精確的解答。事實上，則這所謂荷馬的創作對於三千年以來的文學確曾發生莫大的影響；自從伊士奇（Aeschylus）、索福克德（Sophocles）、幼里披底（Euripides）以至咪吉爾（Virgil）、塔索（Tasso）、拉辛（Racine）誰也都受着牠的感發。然而這個支流極廣的河道之源卻至今依然不會發見。

伊利亞特和奧德賽（Odyssey）這兩部傑作，究竟是一個人做的呢，還是像韋科（Vico）和傑爾夫（腓特烈）（Frederick Wolf）兩人所假定，以為是當初只不過有一種提綱，後經若干世紀的功夫纔成功的呢？總之關於這個所謂荷馬問題，不能解決的地方很多，我們所能斷定的，只有下列的幾點：其一，這幾種史詩確是人類想像力的最高貴的產物，是人類文明的最壯觀的紀念，是史詩的最原形的模範；其二，奧德賽比伊利亞特雄偉不如而精博過之，牠的文章具有一種樸素而委婉動人的作風，端的可稱理想的作品；其三，這兩部大史詩中，凡一切種類的美莫不具備。

這兩部史詩纔出世的時候便已惹人注意。牠們的好處馬上就有人認識，因此當時在愛奧尼亞（Ionia）地方風行得異常迅速。當時的行吟詩人（Rhapsodist）把這幾種史詩內的情節到處去誦唱，唱時恆用一種月琴和着。於是有的唱攸力栖茲（Tityas）怎樣的偷入自己的宮中，怎樣的對着皮涅羅皮（Penelope）的求婚人露出自己便是攸力栖茲，皮涅羅皮的丈夫，怎樣的將兵器扔在皮涅羅皮的脚旁表示要報仇雪恥的意思；有的唱帶奧

米第茲 (Diomedes) 戰勝的功業；有的唱阿溪里 (Achilles) 對赫克忒 (Hector) 震怒的情形；有的唱赫邱巴 (Hecuba) 和普賴安 (Priam) 所遭的種種災難。他們誦唱的時候，無數的聽衆莫不充滿着驚異的心理；加之他們的莊嚴的打扮和悲愴的語調，因而使聽的人大家都得着很深的印象，他們便也以此很覺自負，彷彿自己已有帝王一般的威權。

第四章

希臘以外——希臘對於周圍諸國之認識——印度，波斯，猶太，伊特魯立亞等國之遞為認識中心——希臘思想與
 「亞美利加」——希臘文學之盛衰——希臘文學之喪失地位——柏加馬斯與亞歷山大里亞——訖西元前五四〇年頃

第一節

上章已將希臘文明之起源略敘過了。但是當時的智識活動並不是完全限於希臘的。我們即使淡忘了遠東孔子誕生之地，那時政治和道德的科學都已發達，而且早已絕無依傍地產出很宏富的文學。內容幾乎已是包羅萬象——我們即使撇開牠說，那末印度，總不致也忘記了。印度自從極古的時代，便有六派各別的哲學，可供後世學者的研究；因這些哲學的逐漸發達，結果便造成一種異常宏富的文學。論抒情詩則有吠陀，論教訓的作品則有牟那筏卡司塔勒 (Munavastha)，即使牠後來不更成就兩大不朽的史詩，而既有這種膽富的古詩，也至少材料總已具備。所謂兩大不朽的史詩，一種是摩訶波羅陀 (Mahabharata)，一種是刺馬耶那 (Ramayana)。摩

詞波羅陀的作者人都以爲是味耶薩 (Yasa)，刺馬耶那則相傳爲伏薩基 (Valmiki) 所作。前者的風調非常雄壯，所詠爲古時恆河流域兩族互爭疆土的戰爭，後者以象徵的形式，對於祭司的神祕，宗教的建制，民族的傳說，錯綜歌詠之。

當初印度人這種詩的生活和戰爭的生活綿延約有一千年之久，一輩輩的詩人接踵而起，以製造這些對於人類和神的宏偉的史詩，這些梵語的金字塔，這些令近世人人傾倒的傑作。後人逐漸明白，牠們的非常重要，牠們的特色也逐漸顯明。今人恆將牠的零篇斷簡，如那拉和達瑪央底的故事 (Nala and Damayanti) 一類美麗的作品，分別研究，在德國尤有一班勇敢的詩人，如柯賽加登 (Kosgarten) 和爾茲曼 (Holmann) 和翻譯亞拉伯詩的腓特烈·俾刻特 (Friederick Rückel) 輩都會受着印度詩的極深的感發，且能模倣得很好。

第二節

以上已將印度古代的狀況粗略的說了，其次便要說到波斯。當初波斯人數百年來所吟誦的，只有一種讚詩，名叫耶斯那 (Yasna)。牠的內容是述善的勢力和惡的勢力的常常的戰鬥。善神名叫奧馬茲德 (Ormuzd)，惡神名叫阿利曼 (Ahriman)。又述阿利曼的遷善和善惡兩神最後的合一。據波斯教 (Mazdaism) 的野史，以爲距那時不知幾何年代之先，紮喇圖士特喇 (Zarathustra) 嘗破壞偶像崇拜而重興拜火教，又說最初拜火教是信

讓悉德 (D. Jheralid) 創的，又說黎喇圖士 特喇又嘗以法律教人。

波斯人 比印度人 缺乏想像力，又並無——且也無須有——什麼複雜的神話可憑藉，自然而然地得着一種極高的宗教思想，而他們的偉大的詩，亦足以反映一種很高的智慧。

第三節

再說以色列 (Israel) 的子孫希伯來人 (Hebrews)。那時他們的周圍，有亞拉伯人 (Arabs)，摩押人 (Moabites)，曼羅米亞人 (Ammonites) 和腓尼基人 (Phoenicians) 等流動部落圍繞着。當希臘 正在荷馬時代 文化發皇之際，他們則方着手創造他們的一神教。他們這種一神教，色彩很是駁雜，近世訓詁學家已發現出內中 埃及，亞西利亞，和波斯的分子。約在紀元前十世紀頭，摩西 或其他曾受神感的先知作創世記 (Genesis)。內有關於亞當 (Adam) 和夏娃 (Eve) 的一段寓言，與希臘人 關於伯羅米脩士 (Prometheus) 和判多喇 (Pandora) 的一段寓言遙相符合。這個做創世記 的人又在舊約前五書 (Pentateuch) 之首，記述耶和華 (Jehovah) 從無何有中創造宇宙時之語；這部創世記 便是聖書 的基礎。自聖書 出而希伯來民族 的思想全部表見，猶太文學的發展也在此集其大成了。約當希臘的史詩 漸使其民族的純粹神話史 變到實事史 的時候，以色列的歷史 也開始脫離暗昧的野史 的狀態了。

荷馬、摩西、和伏羲——這三個名字（若是牠們所代表的人，的確是真的，並非是虛擬的）差不多是同時代的。然而希臘人的心目中卻祇有一個荷馬，而他們這位詩祖又並不會教他們以關於人種差別的情形。後人在埃及王族的陵墓中，曾經發見極古的畫，上面畫着當時人所已發見的各色的人種。當時的人已經曉得人類因顏色形狀不同而別為許多種類，曉得把亞洲人和歐洲人拿來跟埃及人比較，以為埃及人是人類中最高等的種族。至於古代希臘的優秀子孫，他們的好奇心卻還沒有及到這一層。他們並不是不曉得有許多外國的民族，文化比自己的古得多，但是他們對於這種外國的文明，無論是物質上或精神上，究竟有怎樣的程度，何等的精神，都頗抱着一種不屑研究的意思。

他們看見當時波斯還保留着加爾底亞文明的遺緒，頗有些光榮的學術的遺產，但以為大體上都不免愚昧。他們也會把阿味斯塔加以精審的研究，但以為祇不過是一種祈禱文的集子，價值很微的。他們那些糾纏不清的神話絕對不露出自己的來歷。他們已經全然忘記了人類的同類相親，忘記了從來的傳統和事業，並忘記了自己的思想和思想習慣與其他雅利安種族相契合的地方。

荷馬也會對他們提到底比斯（Thebes），是托司米茲和拉美斯諸王的都會，然而絲毫引不起他們對於外

國的興味；也會在奧德賽裏把他們的首領門涅雷阿斯 (Menelaus) 和彼力極茲帶到埃及三角湖 (The Delta) 去，然而也無用；自從九世紀和八世紀以降，他們便把埃及及完全撒到腦後去了。他們自尊自大地以為希臘而外其餘的天下便都是附贅懸疣。他們對於一切不跟他們同佔一部分天地的，只有一句考語，叫做「蠻夷」 (Barbarians)。所以在他們的心目中，腓尼基人是「蠻夷」，卻不道腓尼基人在古代歷史上會做過多少偉大的事業；卻不道這些腓尼基人，便是希臘人自己也承認會從他們學字母，學寫字和哲學的；也便是會以商業，實業，藝術奠定歐洲文明的基礎的！

於是他們自己的祖宗雅利安人也是「蠻夷」了，又誰知他們是一切種族的開山鼻祖，並且是一切種族所賴以定其方向的！

其他如伊特喇斯坎人 (Etruscans) 也當在希臘人所謂「蠻夷」之列，其實他們入意大利的時候和希利尼種族入意大利的時候是一樣的（十世紀）。伊特喇斯坎人的語言和文學，雖都已湮滅無可稽考；但是他們當初必曾有一種極偉大的文明，如今地底的古墓裏和當時城市的殘址裏都有昭然的證據；而且他們的實業和宗教，盡是羅馬所資師法的。總之，希臘人的心目中，以為他們是無所需乎其他民族的。他們以為自己的思想和藝術，無論任何方面，都頗可以自足；及民主自由的新時代以降，國力益厚，民智益張，於是更覺受用不盡。所以希臘人在國內外的一切事業，只求得其本國人的企重，便算是最高的報酬。

希臘人這種獨立的精神既益發不可復遏，於是從前所有的帝王宮殿，無論大小，都被他們傾覆淨盡。換句話說，便是希臘從此是共和國了。從此曉得重視人民的精神了。歷史上也承認牠的民族是成熟的了。所謂「國民」所謂「自由人」等等的名稱，從此都出現於人類的歷史上了。

政治方面既有這樣的變化，文學方面自然也就跟着牠發生變化。於是史詩的精神漸漸薄弱。當初一般所謂「說系詩人」(epic poets)的作品，大都不復能存在，只剩下些零篇斷簡（如赫邱利之盾之類），留為紀念而已。從此希臘人對於古時的傳說雖不盡忘，然已漸漸脫離牠們的支配。

同時一般國民對於自由的價值的觀念日益深切。因和遠敵近隣的戰鬪而國家精神遂膨脹漲。詩人用笛叶詩，以宣洩這種國民精神的情操，從前的琴瑟廢而不用。此時詩人有卡林馬卡斯 (Callimachus)，忒提阿斯 (Tyrteus)，忒利得 (Terpander)，腓萊忒斯 (Phileas)，梭倫 (Solon)，密謨涅馬斯 (Mimnermus)，佛西利特 (Phocylides) 及雅典諸詩人。他們的挽歌體作品，大都具有一種尚武的，道德的，豪放的精神，而阿啓羅卡斯 (Archeolochus)，阿爾西阿斯 (Alcaeus)，施蒙尼迪 (Semonides)，薩福 (Sappho) 等大詩人的豐富的產物，盡能光大其先人的遺緒。

薩福的詩，都是受着極深厚的靈感出來的，內中含有極高尚，極規律，而又極濃烈的戀愛。讀她的詩，覺得牠的節奏如脈搏動，牠的句調如波盪漾，牠的聲波時起時伏，是一種有節制的熱情的發洩。提奧斯 (Teos) 的伊麟那

(Prinna) 是她的弟子，也是她的朋友，雖及不得她，卻也會顯耀於當時的詩界。未幾品得 (Pindar) 繼起為詩壇盟主，品格之高，詞鋒之利，均為希臘詩人冠。昔人享名之盛，荷馬而外，未有如品得者。他的名譽，在一般王公大人以至民衆的心目中，差不多都當他是神聖的。他享壽很長，而一生順利成功，未嘗稍受挫折。

同時又有一班哲學家 and 編年史家，如米利都 (Miletus) 的卡德馬斯 (Charmas)，赫蘭尼卡斯 (Hellanicus)，蘭普薩卡斯 (Lampisacens) 的梭倫 (Charon) 等，都致力於散文，因使散文也值得做發表思想的工具，牠的體裁最宜於發表精細的學術文和做長篇的紀事文。

其後雅典繼續愛與尼亞 (Ionia) 為希臘文化的中心。從此希臘的學術和榮譽便都集中於雅典。當時異邦賓客來雅典求學者不計其數，因使希臘文化的極美麗的花得流芳於世界。此後希臘的文化便入所謂柏里克里斯 (Pericles) 時代了。

希臘文人精力消磨最多的地方要算戲劇，而希臘戲劇最偉大的作者要算悲劇家的伊士奇 (Aeschylus)。伊士奇是個天才，可無待說，他富於一種崇高嚴肅的精神，即在古人中也覺得他最是蒼古。他嘗取古代神話和古英雄事蹟譜為神話歌，極能激動讀者。他的作品大都能使讀者發生一種宗教的恐怖心和高尚的愛國心。他的戲劇的題材有如史詩，恆參以一種莫可名狀的嫵媚和委婉。希臘的戲劇，在伊士奇之前，還祇不過是獻祭帶與奈薩斯 (Dionysus) 時伴着舞蹈的一種合唱曲。因伊士奇的影響，而希臘的戲劇只經過幾步的變遷便達到最高的

程度。

伊士奇的戲劇仍舊還留着一些史詩的痕跡。劇情的發展非常簡單，抒情的部分過於衍長，合唱的部分太偏重，風格欠圓渾——凡此種種，都還是古代粗樸的作品之遺風。因為他的戲劇雖是後世一切戲劇的淵源，但是離開原始的頌神歌究竟還未很遠，所以還未能盡脫頌神歌的作風。

索福客儂 (Sophocles) 則能以驚人的藝術手段描寫逼肖自然的對象；他所刻畫的人物無不各有顯明的人格，而揆諸實際的人生，無不適如分際。他的作品，在當時足以左右觀衆的情感，即歷時久遠而魔力仍不稍衰。他的位置適在伊士奇和幼里披底 (Euripides) 之間，伊士奇因他出世遂不復能獨步，而幼里披底的革新和努力，又是索福客儂所不能不注意的；他並不如伊士奇那樣喜於古代信仰的驚疑恐怖心理，卻是比了幼里披底，宗教的氣味較為濃厚。故悲劇經索福客儂之手而後道德方面臻於完美。他又開近世感情分析的作風，而尤致力於溫婉和憐憫的情緒之喚起。他劇中所寫的英雄和帝王，都極近人情，也都免不了和普通人類一般的弱點。他的詩的文字力求簡樸，不唱道禱的高調，也不流於俚俗，而能得乎中庸。他描寫神，往往當作人類一般描寫；描寫人類的迷信和弱點，也能發揮盡致——凡此種種，都足見索福客儂實是近世所謂「心理的戲劇」(psychological drama) 的一個勇敢的先驅。同時喜劇方面則有亞里斯多芬 (Aristophanes)。亞里斯多芬以他非常的才情，無論對於美的，醜的，壯觀的，瑣屑的，精美的，污濁的，沒有不能用做他喜劇的資料。同時的喜劇家還有克雷提 (Crates)，克勒泰

那斯 (Cratinus) 俄坡力斯 (Eupolis) 夫麟尼卡斯 (Phrynichus) 等，但能有完整的作品傳到現在的，祇亞里斯多芬一人而已。

第五節

此後便將入希臘文學的第三期了。希臘人的思想，無論那一方面都經嘗試，而凡經他們嘗試的東西，必都具備整齊，勻稱，規律，調和等等的元素。

當希羅多德 (Herodotus) 開始著書的時候，希臘的散文作者，都還不知聲律諧和與字句整齊的價值，此中祕密，直至力納阿斯 (Lyrius) 纔發現出來，後來到伯里克里斯和亞歷山力的時代，這種作風乃愈加發達。但是這個荷馬時代的史家 (希羅多德)，卻有他自己一種特別的動人的風格；就以他的文字——是從亞的加語 (Aithio) 和古代愛與尼亞語 (Ionian) 混合而成的——而論，也覺得有一種特別優美的風味；他的文章有一種自然的聲調，頗像詩歌一樣。他是一個極能動人的史家；他的紀事的方法雖很簡樸，而觀察非常精闢，持論亦非常公允而嚴謹，所以他一方面教人，一方面又能娛人。他的紀敘的態度千變萬化，使讀者決不致感着單調；他常常能引人入勝。他開闢後代史家的途徑，他是『歷史的鼻祖』。修昔的底斯 (Thucydides) 和色諾芬 (Xenophon) 繼希羅多德而興，示後世史家以不朽的模楷。前者具有刻畫人物的大本領，為文名貴，剛勁而雄壯，讀之幾如悲劇；後者則以

簡潔取勝；讀其書常感一種真樸素淨的風味。

希臘的婦女，以雅典而論，向受習慣和法律的束縛，不啻是一種家庭的奴隸，但也不乏很自由的婦女——尤其是那些不受雅典的習慣和法律所支配的——和男子一般有藝術的修養和思想的磨鍊。古代史書曾載畢達哥拉斯 (Pythagoras) 之女名蒂安娜 (Tianna) 爲能傳承她父親的家學。又如米洛斯 (Miles) 的阿斯佩細亞 (Aspasia)，因所嫁的是希臘最著名的人物，故嘗得參與亞拿薩哥拉 (Anaxagoras) 的哲學的討論，吟誦索福客儂和幼里披底的詩歌，以至論證菲狄亞斯 (Phidias) 的藝術作品。我們由她的例子，由她那種風雅的言論，可以證明女性的天才並不是和「司美的女神」完全隔膜的。

至於高等智識的境界，則有柏拉圖和亞里斯多德做牠的領袖。柏拉圖和亞里斯多德之先，一般詭辯學派對於哲學方力肆其攻擊，鄙薄，詆毀。他們覺得哲學的系統異常紛亂，覺得一切學說終不能一致，因便對於凡事——無論科學方面，倫理方面——都抱一種懷疑的態度。當時如薩摩斯的美利瑟斯 (Melissus of Samos)，埃理亞的芝諾 (Zeno of Elea)，阿布第刺的勃洛天哥拉 (Protagoras of Abdera)，利奧尼底的哥爾斯亞 (Gorgias of Leontii) 等，大家都否認人生，運動，以至無論什麼東西的存在，除論辨而外還有證明的可能。但是後來蘇格拉底 (Socrates) 出來了。他是希臘最明達最公正的一個學者；從他出來之後，哲學纔恢復牠的真正的尊嚴。他少年時曾經親炙亞拿薩哥拉那種崇高的精神的教訓。當亞拿薩哥拉站在遊廊底下手指着天上星辰講演一切天體無

不隸屬於一種最高智識之下的時候，青年的蘇格拉底已在那裏傾聽而沉思。從此他便悟到世界的真正本源並不是物質的，乃是智識的。從此他將他的一切哲學思想勒歸一種最高的原則，又立即將他所感想到的統統形諸言論。而所謂「善」的觀念遂被他確定為智識的主要目的了。

後來他的高足弟子柏拉圖和亞里斯多德，依理性的指示而得到無上崇高的概念。尤可異的，他們能發做到這一步，是完全憑藉自己的天才，別無依傍的。他們對於人類，自然，以至神的永久的暗示，無不能徹底了解。且當猶太基督教的一神論問題着實還未提出之先，他們已經有一種純粹形而上的神的觀念。他們對於智識和良心已能窺見深底。故後世稱他們為「世界之師」，確乎是當得起的。同時雄辯之士則有狄摩西尼（Demosthenes）。狄摩西尼堪稱厄斯啓泥（Aeschines）的勁敵；他的文章已達到雄辯文的最高程度。他嘗師事愛西阿斯（Isaens），阿爾息達馬（Alcidamas）和蘇格拉底；但是他那種憤激剛烈的特性，卻完全是由他自己發展出來的。

第六節

上節所列舉的許多文人和哲學家的時代，便是希臘文學史上的極盛時代。但是這個時代非常短促。微力阿斯（Valius）會說，這時代裏的人物，只有最早的一人和最晚的一人彼此見不着面，其餘差不多都是同輩的。大凡完美的境界，無論在什麼事情總都不能持久；而況那時希臘的人才已有那般盛況，所以盛極而衰，也自是理所必

至

以戲劇而論，由克刺泰那斯、亞理斯多芬和依坡力斯等人的所謂「舊喜劇」(Old Comedy)變而為所謂「中期喜劇」(Middle Comedy)，更由中期喜劇變而為麥喀得(Menandros)、腓利門(Philemon)和狄菲拉斯(Diphilos)等人的所謂「新喜劇」(New Comedy)，先後共有一百年光景，纔見確實衰落，在希臘文學中命脈總算最長的了。至於他種文學則驟衰痕跡都很顯著。

第七節

但是實際上，希臘的思想祇是移轉地方，並不是衰落；牠祇是將舊時的範圍打破；「深」的方面不如從前，「廣」的方面卻比從前加大。當初雅典和斯巴達為爭霸之故，不絕的發生衝突，至此則一致對外，不復自相爭鬪了。因為那時有一個半開化的君主國侵入希臘，牠和希臘祇有語言相同，一時伯羅奔尼撒半島(Peloponnesus)和亞加(Aetia)一樣受牠的壓迫。自從法利藍之狄麥多流(Demetrius of Phalerum)失敗後，希臘的精神便從雅典移到拍加馬斯(Pergamas)和亞歷山大里亞(Alexandria)。馬基頓的軍隊替希臘的思想征服東方，直至於印度的邊境。亞歷山大以後的歷任君主四方征伐，約經半世紀的功夫，卒至故城新邑悉歸其掌握。於是地中海沿岸的小亞細亞，以弗所(Ephesus)、拍加馬斯，雷奧狄納(Laodicea)、安提阿(Antioch)、該撒利亞(Caesarea)；

希拉波立(Hieropolis)等處，無不受着希臘文明的影響。而非洲的埃及也不啻是一個更豐富更廣闊的希臘。這便是希臘文學史上所謂亞歷山大時代極盛時的狀況。

亞歷山大時代的文學，論者貶之，實則不盡可貶。希臘人之先天的優秀，在亞歷山大時代的文學中誠然是枯竭了，但不得謂之完全消滅。

亞歷山大大帝死後，他所派駐非洲的守將在埃及發見了許多城市；這許多城市都歡迎文人，一時文人多往彼避難。當時之「托里米氏」(Tolomy)如所脫(Soter)，費勒特弗斯(Philadelphus)，依爾基弗斯(Euryergus)等，都歡迎詩人，創立圖書館，開設博物館，文化上頗著成績，雖不如希臘當時燦爛，但就其本地而論，已頗可觀了。

於是拍加馬斯和亞歷山大里亞兩處，遙遙相對，彼此競榮，而羅德斯(Rhodes)和塔蘇斯(Tarsus)兩學派也成對峙之勢，如是者歷有年所。托里米費勒特弗斯在都中所謂勃魯欽(Bruchim)地方和他自己的宮殿毗連建設第一個大圖書館。他不惜巨資，力求裝璜精美。他又釋放了許多外國的俘虜，津貼資斧，使他們到世界各處去搜羅珍貴的書籍。他又招致猶太學者六十二人，款之以王侯之禮，令譯希伯來文之摩西法律(Law of Moses)為希臘文，又成著名之七十家譯聖經(Septuagint Version)，以二個半月功竣，各有贈遺，異常優渥。

一面拍加馬斯王攸麥尼(Dimenes)也學費勒特弗斯建設一個博物館。他財力不如費勒特弗斯，且當時不

但珍貴的書籍極難搜羅，即僅求分量之富足也已不易，然而他那博物館的規模卻並不亞於埃及的圖書館。於是亞歷山大里亞人都起恐慌，生怕自己的圖書館將因此減色。托里米也起恐慌，遂禁止紙卷之輸出。彼麥尼乃發明羊皮紙，而拍加馬斯的圖書增加頗速，但其後拍加馬斯的圖書仍都運至亞歷山大里亞以充實那裏的許多塞勒比斯 (Serapia) 神廟。(原註：安多尼 (Antony) 取拍加馬斯彼麥尼的藏書獻於克利奧佩特刺 (Cleopatra)。當時勒魯欽的圖書館已在檳榔 (Cosas) 攻城時被焚燬，故亞歷山大里亞人得此頗足自慰。)

歷來埃及王所搜藏的書籍，都是用詩人和學者抄成的；當時那些學者，頗像許多烏魯魯養在一個烏魯魯一般。因有這些藏書，遂引起研究的新興味。物理學和數學因埃拉托色尼 (Eratosthenes) 的研究而確實有進步，故埃拉托色尼有柏拉圖第二之稱。文法和文字學也都有人作深微的研究。齊諾多忒士 (Zenodotus) 拜占庭的亞里斯多芬 (Aristophanes of Byzantium) 和他的弟子撒摩特喇 (Samothrae) 之亞里斯他克 (Aristarchus) 等，競相從事於古籍之校讀及語言方式之製定，又都竭力提倡文學。因有他們這種精細的功夫，我們對於古代的典籍總比較容易了解，這是我們所應該感激的。所以聖柏甫 (St. Jerome) 說，「我們現在所以能發了解荷馬，都虧得當初有個亞里斯他克。」

而且這個時代，也並不是一個專講考據專從事於乾燥的學術的時代，即論藝術的創作，也並非絕對不可解。我們即使撇開雷可弗倫 (Lyceum) 晦澀難解的作品和歐巴卡斯 (Epicurus) 用的無數的戲曲而言，也還

有卡林馬卡斯 (Callimachus) 的輓歌和提奧克立塔 (Theocritus) 的牧曲。卡林馬卡斯的詩，祇能合古人的脾胃，濃厚有餘，感興則不足；提奧克立塔的作品則迄今詩壇猶愛讀之。

牧曲是有了提奧克立塔纔存在的。從前人描寫自然的作品，無不帶有一種神話的色彩，及至提奧克立塔始一變其作風；提奧克立塔對於自然界，祇要見着牠的顏色和風景便能引起感清，而絕不寓神話的意味。當時羅斯的阿波羅尼阿斯 (Apolonius) 嘗集古代抒情的紀事的歌曲，但取詞采聲調好的，編成一部阿哥諾替卡 (Argonautica) 以紀阿哥遠遊隊 (Argonauts) 遠渡重洋的事蹟。提奧克立塔卻沒有這般偉大的志趣；他祇對於鄉村的景物，以一種極靈活的態度去研究牠，欣賞牠，思索牠。在他的詩的純粹的結晶裏，他能擬把天和海濱的狀態複寫出來，絕不必乞靈於海怪木精之類，以期聳人觀聽，因為他那時代的人，對於這一種的神話已經不相信，所以都擯斥不用了，他覺得大城市——當時的和我們現在的一樣——裏的塵囂頗不可耐，因而奔避了；只找那些怡情的綠樹，潺流的泉水和清風微拂的海濱去領略牠們的樂趣。他常常在叢樹的影中灌木的蔭下或滌滌溪水的岸邊，紀錄牧羊人的歌曲，因而得着許多無限優美無上珍貴的圖畫。阿密厄爾 (Amiel) 嘗說，在提奧克立塔的心目中，一片風景不但可以目觀而並可以神會；就此點而論，提奧克立塔實可為萬世的楷模，至今無出其右者。

此後出來的便是一批教訓的作家例如西里西亞的亞拉圖 (Auntus of Cilicia) 後世曾說他是味吉爾

(Virgil) 和奧維特 (Ovid) 的先驅，也真可不愧。

以上所述，便是希臘人喪失自由之前的最後的鳴聲。便是希臘未入羅馬人掌握時的最後一次的收穫。

第八節

希臘的英雄時代已經過去了，她的精美的創作的想像祇不時見牠發現了。但她既有這樣豐富的成績，已顯可以享用不盡；足以維持她那些著名的學派；足以使當初詭辯家和演說家的遺風不致銷歇；並足以使征服牠的主人公也不得不受他的既往的文明的支配。且因這兩個種族的混合，而世界的文化遂起了一種萬不及料的更新的精神。

我們要問：羅馬的精神和希臘的精神當未經這種強烈的接觸之先，是否絕對沒有攙混的痕跡？我們的答語是：有的；這兩種精神早就彼此溝通，彼此交換，不過形跡不很顯著罷了。當羅馬城建設後還不到一百年的時候，科林斯 (Corinth) 人得馬累塔斯 (Demetrius) 因不堪城內一個貴族的凌虐，遷居於塔克文尼 (Tarquinius) 在那裏建設了一個藝術家的殖民地，以描畫花瓶的藝術教授拉丁姆 (Latinus) 村野的居民，他在那裏生男育女，都使親近學問；後來他兒子大塔克文 (Tarquin the Elder) 便是羅馬的一個賢君。又當布魯特斯 (Brutus) 替他國家爭自由的時候，畢達哥拉斯正居意大利，在克洛托那 (Crotona) 地方以哲學，神學，政治學傳授弟子。而且

希臘人的思想被羅馬人吸收的早就不一而足，不過初時甚微，不可覺察，及歷時稍久始漸漸顯著。大凡一個民族和別個民族發生智識上的交涉，一部分由於事勢的常態的進展，一部分由於政治的關係。希臘人和羅馬人的關係也便如此，當初本是甚疏，及事勢逐漸進展，也便漸漸親密，到後來接觸愈密，關係愈深，於是乎希臘的國土便遭危險。當五五五年的時候，羅馬的世界征服者便裝作要從事一種高尚的企圖。他們自命為希臘的保護人，以防馬基頓王腓力（Philip）之野心的策略。於是羅馬的軍隊開到希臘了；初時對於希臘人還像是許他們自由的，未幾，便將他所保護的土地收沒為己有。紀元前一四六年，曼密阿斯（Mummius）的刀便將希臘的名詞從世界的國籍單上削了去。

當時希臘人雖不能以武力戰勝，但在另一境界，卻漸漸報復大讎；因為這個境界，決不是兵力可以征服，也不是人數可以壓倒的。所以被征服的希臘人便回過來去侵略拉丁的地面，而意大利全境不久便為希臘的藝術和其他一切的文化所統治了。

第五章

希臘拉丁文化混和之先——各民族合併之始——古初之拉丁詩——普羅克文明之殘餘——魏勒時代——奧古斯都時代——拉丁文明的空寂——拉丁文學的偉大與衰落——哲學之復興

第一節

差不多有五六百年的功夫，羅馬人的志趣祇向着「戰爭」和「征服」。羅馬人對於玄想，絕少嗜好；他們的審美意識也極不發達。他們之中，雖也曾產生詩人，但他們恆以鄙夷不屑的態度對之。他們也曾有能發闊動一時的演說家，常在公會裏激動聽衆，但這些演說家的聲浪，除在政治的範圍外，絕對不會引起回音。質言之，當希臘最後一批的演說家和哲學家還未散布在意大利各地方之先，羅馬人的演說和哲學從不會有值得注意的進步，也從不會有重要的演說家和哲學家出現。

當時希臘各地方才智之士，爲數猶可以千計，既見祖國不復可挽救，而以其被征服者的身分，又不復能與聞

政事，於是相率致力於文學，以爲最後託庇之所。

就中有一人便是麥加羅波里 (Megalopolis) 極有魄力的作家波里比阿 (Polybius)。他最先在意大利搜集材料，備他偉大的著作之用，計擬歸希臘後將書做成。此人論事必究其原因結果的關係，因使歷史具有一種政治的和合理的性質，這是向來不曾有過的。

這些希臘人的文章，未幾便成爲羅馬人的模楷，也便激起羅馬人和他們競爭，因爲羅馬人的才性雖則比他們粗疏，雖則因嚴極的愛國主義所趨使而專務政治和戰爭的實際，但還不致完全看不見智識生活的好處。祇不過數年之後，而雅典的使臣卡尼亞底 (Carnandes)，克立托雷阿斯 (Chiloanus)，提奧奇尼斯 (Theogenes) 等，便能以演說開動大衆。卡尼亞底的演說詞恆能揚達流利，一時青年子弟都寧願犧牲他們的娛樂和遊戲，爭先往聽。因此，不期然而然就把他們的哲學思想引起了。

當時如伽圖 (Cato) 那班人，對於這種異族思想之侵入，亟竭力反對，但其侵入自若，且伽圖自己對於希臘人的引誘雖竭力戒備，卻也不得不研究希臘語，而且終身以之。當時政府對於這種迎合新潮的分子雖曾有種種取締的辦法，卻也都無效；元老院以爲這種學問頗足以消磨國民的勇氣，竟於法律上製定專條以遏制其進步，卻也毫無用處。因爲這種潮流既已有了動機便一發不可復退了。

當時的人大都目藝術和科學爲職業，如若此風不退，則足以消躋軍士的精神。但事實上動機既萌，不久便成

風氣。當時羅馬顯達人士多喜採用希臘的人名，例如淮羅 (Pulio)、索爾斯 (Sophos)、亥帕利阿斯 (Hipparchos) 等都是。青年子弟多喜就學於希臘人的學校，嗜好既成，遂不復能去。歷來執政如賽尼阿斯 (Cannius)、斯特累波 (Stalbo) 和馬卡斯發利立阿斯麥舍拉 (Marcus Valerius Messala) 等，都會有命令禁止羅馬人與希臘人往還，然而著名如西比阿伊密利阿斯 (Scipio Aemilianus) 者，率與波立比阿 (Polibius)、帕泥細阿斯 (Panaetius) 等人為摯友，而雅典優美的神祇也卒奪取拉丁古代神祇的地位，致使羅馬的神廟沒一個不冷落蕭條。因為當時伊特刺斯坎語 (Etruscan)、薩賓語 (Sabine) 和意大利語 (Talic) 的文學，大都拙陋不成體裁，當然不能掩過希臘文學的優美和魔力。

第二節

拉丁文學的誕生雖很遲緩，但是牠的青年時代很健實，而且發育極速。從第一次普匿克戰爭 (First Punic War) 到第二次普匿克戰爭 告終的一段期間，拉丁文壇頗不乏高才的作者。例如利維雅安多尼古 (Livius Andronicus) 是羅馬人文學上用語的真正建設者；奈阿斯尼維阿 (Naevius) 是用抑揚體詩 (Gambic verse) 代粗劣的「薩脫寧」體詩 (Saturnine verse) 的第一人；琴塔斯英尼阿 (Quintus Ennius) 為文有極大魄力，時人稱為荷馬第二 (Alter Homerus)。他嘗歌頌迦太基 (Carthage) 的殘跡，而與西比阿 的戰功同享榮譽。

其後西塞祿 (Orazio) 和味吉爾對於英尼阿都稱道不置。他的作品一面受渥斯坎 (Oscan) 文學的影響，一面受希臘文學的影響而仍保存羅馬人特有的才性；所著喜劇和悲劇，大都模倣幼里坡底和麥喃得，也有選從兩人的作品翻譯的；又著紀年詩 (Annals) 十八卷，因博得史詩詩人之名；又著諷刺詩，而為琉息力阿斯 (Lucilius) 的先驅者。步英尼阿的後塵的，有悲劇詩人帕邱維阿斯 (Paenulus)，有民衆所愛寵的作家普羅塔斯 (Plautus)，有阿夫累尼阿 (Africanus)，號稱羅馬的麥喃得；有塞息力阿斯 (Cecilius)，為忒稜斯 (Terence) 的先驅者，及忒稜斯本人。從這個安得里亞 (Andria) 的作者（即忒稜斯）起，拉丁民族對於文藝，纔有一種很好的賞識力，向來他們對於阿替阿斯 (Attius) 和帕邱維阿斯的作品都大聲讚美，及見忒稜斯的文章後，纔覺兩人的作品實在粗劣，纔覺從前的舉動實在可恥。

如是，拉丁民族對於文學的嗜好，進步非常迅速。這種嗜好曾經征服羅馬政治向來厭惡和平的心理。但可惜當初著名的迦太基滅亡時，羅馬人的這種嗜好還沒有這般發達。假如當初征服迦太基的羅馬人程度比較高些，那末這個發強暴手段永遠毀滅的文明（迦太基的）決不致一點痕跡都沒有留給後世。這個民族（迦太基）雖則沒有一個波里比阿，且沒有一個阿皮阿納斯 (Appianus) 替她的種種事業做歷史，但若征服牠的民族（羅馬）文化程度比較高些，那末牠滅亡之後，決不致除國名墳墓，幾根殘破的柱子，一堆大理石和海濱砂土混和的殘餘外，別的什麼都沒有遺留。

亞非利加濱海之處，和意大利、高盧（Gaul）、西班牙遙對，有一個強盛的民族，是當時海上的強國。牠有一個艦隊，船舶之多，設備之善，都屬得未曾有。牠所處的地位異常優良，所以遂成西方世界的都會。當時和牠對抗的諸民族，大家都很嫉妬牠。牠和羅馬，言語，習慣，種族，根源，都不同。這個民族便是迦太基。迦太基很像腓尼基，而腓尼基很像猶太（Judean）。這民族具有一種商業的天才，她的風俗一方面見得充裕富足，一方面見得暴戾粗蠻，一方面又見得很是迷信。他們的迷信的象徵，便是對於摩洛（Moloch）和塔尼（Tannit）的崇拜；摩洛是貪婪之神，塔尼便猶之羅馬人的維那（Venus）。這種迷信之中，又含有一種極可怕的風俗，而難以對於神祕的神道之摹擬。總之，迦太基的文明是和其他民族完全異趣的；迦太基不啻是另外一個世界。假如當初這個民族的碑誌和刻文不曾毀滅得這樣乾淨，那末人類智識上可資比較的材料和歷史上可資參證的材料不知要豐富多少！假如這個民族的遺蹟有一點保存下來，那末東方思想的遺產又不知要豐富多少！然而世運卻並不如此。希臘文明對於羅馬人之智識的教育，既是獨力包辦，並沒有讓迦太基文明和牠分工。

希臘人對於羅馬人的智識教育漸漸推廣。希臘半島各部分的哲學家都被招請，或令其教育青年，或被一般預備參政的市民聘為顧問。許多著名的演說家競以能傳授希臘的藝術為榮譽；人人競相學步力息阿斯（Ly-sias）、亥拍賴第（Hypereides）和狄摩西尼。而雄辯界的牛耳遂由革拉蘇（Crassus）和安忒尼（Anthony）傳授給細緻的科塔（Cotta）和漂亮的和騰細阿斯（Flortensius）。和騰細阿斯的聲勢非常浩大，甚至當時第一流的

伶人因欲模倣他的姿勢和他的表現的風格，常常去聽他演說。同時諸塞服拉氏（*The Severan*）之於民律，已使藝於完美之域，而羅馬人中最有辯才的西塞祿亦已開始施展他的才情，在當時文壇成爲一個奇異的創新者。他的初年的作品即已富有膽氣且極漂亮；他曾在衆人慄慄危懼的緘默裏膽敢替一個被壓迫的人辯護，這人便是當時最著名的優伶洛細阿斯（*Roscina*）。那時聽衆肅然無聲，而這種緘默適足以使他的言語更生效力。西塞祿的生平適當羅馬史上最多事之日；他在當時是一個領袖人物，惟以性情脆弱不宜政治，故往往爲其盛名之累。

西塞祿生平最大的志願是想在純智識的境界裏佔得第一個位置。他的作品分量既多，種類又極複雜，且又多重要而純粹的作品，故實是拉丁文學中的「王者」。溫婉的情緒，細密的思慮，宗教的閎偉的莊嚴，以至傷感的情致——實言之，凡屬「人類的」東西，無不在西塞祿異常廣大的天性裏佔有一個位置。無論他從事政治或身在軍營，他那種嚮往智識的熱心，從來不會減少。次於西塞祿的爲薩拉（*Sallustia*）。他曾著懷舊錄二十八卷，又取亞里斯多德派哲學家阿波利根（*Apollonius*）著名的藏書歸羅馬，大有貢獻於文學的進步。薩拉對於當時一般諷刺家，獨立的作家，滑稽文作者，以至凡涉及「自由」一語之一切作者，雖莫不是深仇，但他於謹慎及和平的學問，卻又很肯獎勵。薩拉之後有盧古魯斯（*Lucretius*）。

盧古魯斯既征服密司立對提（*Mithridates*），凱旋之時，聲威赫奕。從此退休，因思消度餘生，莫善於致力於學問，乃親自指揮，建築大廈一所，用藏圖書，任人讀閱。館之四周繞以長徑，植樹成陰，一時希臘人士接踵而至，意在逃

「避城市的喧囂，而享討論學術之樂趣。在這些學術的討論裏，盧古魯斯復親自參與，並幫助他們辯論。在哲學方面，他常常流露出是傾向古代經院哲學一派的，同時他的朋友西塞祿則竭力提倡新派的哲學。如是，盧古魯斯既長於武功，復嫻於文事，相傳他一日計畫編一史書，卻決不定用希臘文好呢，還是用拉丁文好呢，用散文呢，還是用韻文呢，終至須抽籤以定之，真是趣事。

如上所述，當時羅馬人的智識生活似乎很是昌盛，似乎非當時的國家安靖和平，富庶，決沒有這般景象，殊不知這只是一種虛空的外觀，一種欺人的幻象。當時的羅馬人並非大家都祇從事於希臘藝術的模倣；他們還有種種別樣的企圖。他們之中，雖有一部分享特優權利的人，既以勇敢的行為贏得財產便可退休而享受學者生活的樂趣，但是羅馬人之大多數，不能人人有這種境遇；他們須得繼續做事，須得奮鬥着去爭奪財產，須得捲入激烈的黨爭的漩渦。當時謹慎如阿的克斯（Atticus）那樣的人是很難得的；他生在薩拉那種可怖的時代，便是但求生活，已覺十分困難，他卻能終其身尊榮安富，勢力勿衰，確是絕無僅有的。當時的青年如柯利阿斯（Coelius），扣利阿（Curio），多拉板拉（Dolabella）等人的生活，從小便腐敗，向來毫無思想，毫無主義，祇因有些微的功能，遂得維持他們的尊貴，他們便以野心的貴族的身分，恣情縱慾，無所不為，——如此的人格，怎能希望他們從事於純粹的文學和學術？故當撒登（Cicero）從事革命的時候，他便另有一種目的。當共和時代的末年，伊壁鳩魯（Epicurus）派的哲學輸入羅馬，主張凡事都以個人的利益為標準；此種學說於當時人思想和道德的墮落實在大有影

響。但是欲望的衝突和事情的壓迫卻比無論什麼言論無論什麼學說的勢力都大。當時羅馬的社會完全成爲一種無政府的狀態。從西塞祿執政到內亂發生的一段期間，羅馬不會有過一點鐘的寧靜。這段時期雖極短促，而其間變故之多，簡直是得未曾有；即如西塞祿一人。最初是喀提萊因（Catiline）的勁敵，稍後做克羅狄阿斯（Clo-dius）的犧牲，最後又是愷撒的百姓了。那時羅馬軍隊一面在征服世界，開拓疆土，一面則國門之內戰爭歷久不已，論其目的無非在自己征服自己。擁兵的將士，因替自己爭權，不惜壓迫民衆。於是乎羅馬因運數所驅，遂落於一個較有力較聰明的人的手裏——這就是愷撒了。

那時種種雜亂紛爭的現象以及共和政府覆滅時的種種騷動，在當時主要作家一部分的作品裏都留着很深的痕跡；例如薩勒斯特（Sallust），本是個對於凡事都求全責備的人，他的作品竭力主張德義和節制的必要，又如琉克理細阿（Lucianus），他的話確乎不是騙人的。他是一個因灰心而信奉伊壁鳩魯學說的人，他自擊羅馬共和政府彌留時的苦痛，又見當時政治上道德上種種紊亂的狀況而悟着天地間的真理，遂覺爲維持個人思想的獨立計，最好的逃避的所在，莫如自己無望無怖的靈魂的寧謐境界裏；他這種覺悟的結果，便是一部毫無忌諱的哲學詩，名叫物性詩（De Rerum Natura）。他的獨創的思想，他對於物話中一切神道及占術的懷疑，他的敵視一般娼妓的態度，都是大有助力於羅馬舊世界的推翻的。

那時所謂自由，祇是加西阿斯（Cicero）或布魯特斯（Brutus）一類人嘴裏的一句空話了。

道德的墮落，實際已成爲一種普遍的現象。腐敗的無政府的狀態愈趨愈下了。當初要想謀攫高位的人還須用金錢賄賂，至此遂專憑暴力了。這種狀況終於弄到天怒人怨。當初一般關心政治的人士，本都很願意在「公所」(Forum)裏民衆喧囂的聲中監察當軸者的舉動；至此這班人見夫議會裏無日不搗亂，選舉時的戰鬥簡直無異屠殺，而政治界的變故，又復翻雲覆雨無時或息，於是大家終於懨懨了，終於聽到政治便疾首蹙額了。他們於是漸漸悟到伊壁鴉魯教人勿墜入政治漩渦以求自全的論調，確乎是一種明智保身的至訓。他們於是開始去追求他們向所輕視的內心生活的美趣，遠遠了黨爭和風波，而從事於安寧而榮譽的事業，藉以自慰。其中最聰明最快樂的，便都趨身於文字事業，聊以解慰他們對於國事的憤慨。

於是乎與古斯都 (Augustus) 出來維持秩序和虐政了；他這一出現，可謂恰當其時。因他的出現而世界暫獲寧靖而文人舒展其才情比較容易。與古斯都對於人情具有一種非常的洞察力，益以做事有膽量，有手段，無狐疑不決之病，而殘忍刻薄不稍假借，因此他漸漸得着無上的權力。但他一到無人足畏的時候，即便改換行徑；我們祇看他極慷慨的施惠於人，使人忘卻他那種殘酷手段的可畏，使人但知感激無地，於是乎天下的眼目被他一手掩盡了。

第三節

政治上的爭鬧，如黨派各階級間因彼此爭雄而起的傾軋，以至因此釀成的無政府的狀態，至此都不復爲羅馬城騷擾的原因了。在「帝國」的名義之下，出現了一種「狄克推多制度」(dictatorship)，雖沒有政府的組織和原則，祇以行政的體制和法律的武器爲基礎，然頗足爲社會秩序和國基鞏固的保障。當時社會戰爭業已因缺乏援助而無形消滅；於是乎意大利和其他羅馬的領土，重又得轉一口氣了。因有這種和平的氣象，而羅馬廣漠的版圖內，東自提亞人 (the Parthians) 的邊界，北自日耳曼人 (the Germans) 的邊界，莫不普沾利益，使文明的事業蒸蒸日上，而科學和藝術也因這種普遍的和平而大得發展。

當時的哲學，已因伽圖和西塞祿的提倡，在社會上頗有重要的地位。及共和政府倒後，而哲學的位置愈加提高。同時政治界和道德界的景象也煥然一新；舊時的傳統觀念業已失其勢力，而新的秩序代興；新的思想流行於社會；當時無論何人，都像琉克理阿所說，向着人生的道上走了。當撒撒的權勢正炙手可熱的時候，埃披克提忒 (Epictetus) 以一窮苦無人知名的奴隸，向人宣說，這種偉大的功業無非虛空，這般煥赫的威勢，在智者的心目中，實在渺小得很。這猶之希臘當伯里克理斯的極盛時代，國中殷富光榮達於極點，卻有犬儒派的鼻祖安地善 (Antisthenes) 對於雅典所極自豪的燦爛景象嘲諷不遺餘力。

當時羅馬的哲學思想，不特足以吸引一般學者，並且影響及一般政治界的人物。奧古斯都曾著一書以提倡哲學。歷史家，詩人，律師，評論藝術的作家，也無不研究哲學。拉貝阿 (Labeo) 因研究哲學而獲得深徹的法律智識，

並因此而造成一個強固的人格。坡力與 (Pollio) 或泰塔斯李維 (Titus Livy) 一類人之需要哲學不待說了，便是維特魯維阿 (Vitruvius) 也一樣的需要哲學。還有些人，竟至終身從事於哲學的研究，簡直把哲學當作一種職業。他們或則教育弟子，將一種嚴格的有法則的教訓施諸一班優秀的子弟；或則以哲學磨鍊自己的行為和感情，以期實踐生活上的至善。當時如梭克都司 (Sextus) 和演說家帕匹立阿斯 費邊納斯 (Papirius Fabianus)，便是這一類的人。費邊納斯以其富於哲學的辯才，故嘗比之都耳達盧 (Demetrius)。辛尼加 (Seneca) 嘗說，「人家聽他 (費邊納斯) 的演說，恆必敬重德意，但有時聽衆為他的壯美的思想所炫，往往制不住大聲喝采。」

政治的演說，無論是有益的有害的，目的恆在征服一個未馴的聽衆，其成功恆在嘈雜騷動的聲裏，故社會既從繼續騷亂的狀態變作規律的和平的狀態，政治的辯才便不如哲學的辯才適用。因此羅馬當時的政治演說家，既已失其獨立的效用，遂亦失其光儀和勢力，而麥舍拉和坡力與之流，在當時已覺得無勢力，彷彿是陳謝的人物了。

至於詩，是需要一種閒暇時間纔產生出來的，必須在靜穩安閒的境地纔能達到很高的程度，故在當時頗有些燦爛的作品。

咏吉爾便是那時的人物。他使羅馬的詩壇得着豐富的收穫，他嘗歌詠村野的樂趣和田園的勞苦，他受感發於提奧克立塔，希西阿 (Hesiod)，及琉克里細阿諸人，得與古時荷馬同列詩人的名冊，而供給羅馬以不朽的史詩。

賀拉西也是那時的人。他在米納斯那斯(Meconas)栽培之下，使拉丁文學得有一種漂亮而靈慧的精神。自有賀拉西，而後所謂諷刺詩不復含有刻毒的性質，而後人人對於文學的趣味始以常識的訓練而不流於粗疎。他的全部作品裏都包含着哲學。他具有一種稀有的誠學性，又有一種完全的自由風。他最能適應人類變幻而矛盾的天性中的神感，故他在這一類的詩人中永遠可居第一席。

味吉爾的朋友哥尼流伽魯斯(Cornelius Gallus)是文學的保護者，他自己也富於一種熱情的想像。伽魯斯之後有替巴拉斯(Tibullus)，感覺力極強，伽魯斯和替巴拉斯並作輓歌，而頌揚女子閨房的美趣。普洛拍細阿(Propertius)是卡塔拉斯(Catullus)的承繼人，他嘗以熱烈的詩句——但他的感歎之中，往往雜以過量的神話——歌詠心情和感官的煩惱。奧維特的詩，比替巴拉斯更瀟灑，在道德方面不免過分放浪。至於散文，則以泰塔斯李維而臻完美。李維是一個偉大的編年史家，他的紀事，美趣洋溢，雖時或不受歷史批評家的指摘，但論其文章，確乎無暇可擊；他的風格雄偉不可方物，時或流於冗長，可譬乳液積成的河道，滔滔不竭。

第四節

拉封騰(La Fontaine)嘗說：「世間凡百建設，成功恆遲，延續恆暫；」文學也未嘗不如此。文學的成熟祇是片刻間的現象。這種成熟的片刻一過，便見文字漸漸的臃劣了，心思才力漸漸的減退了，道德方面也漸漸的腐敗了。

而況羅馬政治的狀況頗足以催促拉丁文學的退化呢。

羅馬當時的太平景象，表面上似乎很是鞏固，其實並不能持久；因為這種景象，究竟是勉強造成的，不過是一種牛軋底下的平衡。於是乎羅馬的幸運和一切光榮盛旺的勝利也都不能持久。

我們從著名文人的著作裏，可以尋溯拉丁偉大文明驟衰的經過和牠所以驟衰的原因。當時羅馬帝國總算由無政府的狀況中一躍而起了。但是奧古斯都以後的君主，恣行虐政，無所不用其極；財政的當事諄求無厭，各省區不勝其苦；同時一般社會的道德異常墮落；於是乎帝國之成立適足自促其覆亡。而與奧古斯都當初一手壓制下去的內亂，至此又重新爆發了。

內政既亂，當然無暇對外；於是凡是對外的戰爭無不以「休戰」了。文學因這種濫疾式的事態遂大受影響，患羊癩風症的加力荷拉（Calligula）帝，對於凡光榮的事情無不嫉妬，遂以一般貴族的煽動對詩人大肆其凌虐。克勞第烏斯（Claudius）帝，雖積學而優柔寡斷，日惟與宦官爲伍。及至尼祿（Nero）帝即位，始欲恢復拉丁文學的光榮，但他的動機是由於虛榮呢，還是由於愛好，卻不可知。當尼祿在位之日，真個是到處可聞弦歌之聲；當時詩人，處於皇恩煦育之下，莫不逞其華詞穉采以相競媚。但若與當初味吉爾壯偉的作品相比較，則高下之別相去不知凡幾。此中但有一人，抗聲而歌，迥不稍染。此人便是琉坎（Turan）。琉坎能一掃當時靡靡之風，無論思想詞章，莫不生機充沛。然卒以才高而招尼祿之忌。後爲其舅辛尼加（Seneca）之謀逆案牽涉致遭刑戮，時琉坎方二十七

歲。疏坎死後，拉丁詩壇就祇剩斯退細阿斯(Stasius)，息力阿易塔力卡(Silvia Italens)一班人了。斯退細阿斯嘗著雪爾維(Sylvae)一詩，工於鋪寫纖靡溫膩的情致，詞句極委婉劇熱，但仍流露矯揉造作之態，可為當時頹廢派文學的真正代表。

波盧塔克(Plutarch)嘗說，「織摩的詩歌祇能引出淫靡的音樂；『這話是確的。當時拉丁的詩壇既有這種頹廢的狀態，所以戲劇方面也不免一樣的頹廢。我們現在雖傳有辛尼加的悲劇，但是這些悲劇也許是不過一種合著的作品。我們從這些悲劇裏不時可以窺見一點希臘的作風，但論其詞調，卻很是牽強，臃腫，而笨澀。而且拉丁文學和戲劇的關係一天疎似一天。當時一般懶惰而粗獷的民衆祇喜看那種耗費本錢的戲。變把戲的事情從來沒有再比那時發達；智識的力量從來沒有再比那時薄弱。做馬戲的一早便開場，種種玩藝兒往往演至夜深纔息。還有一種可以鬧動一時的便是賽馬，這是那時一種主要的娛樂。至於戲劇的表演，全然不能號召人。無論悲劇喜劇都不能引人入勝。『滑稽戲』(Mimi)和『阿脫蘭戲』(Atellanae)所以還有人看，是因為牠們的措辭可以隨便調侃，這是牠們的特質如此，然而血搏的表演能發號召的力量卻大得多。把獅子和老虎鬪做一齣，叫野豬相鬪，人和人血搏，這都能鬧動當時的拉丁民衆。所以在這種校場的喧囂當中，所謂諧詞，所謂撰劇，當然都不成問題了。若論演說，則當時人只注重抑揚頓挫的聲調和虛空的文章，所以也已等於死廢；而詭辯之風遂佔全勝。所謂詭辯，大都不願思想，祇顯文詞，沒有推理，只有結論。」

同時脩辭學的學校將一時勤學英俊的青年盡行吸收，但是那時的脩辭學，範圍非常狹窄，所謂演說術已被他們看做一種互相吹毛求疵的辯論術，到後來還甚至專以文字上的詭巧爲能事了。惠斯葩西安帝 (Emperor Vespasian) 時脩辭學的教授已成爲國家的一種職務，那時專任其事的便是昆體良 (Quintilian)。小普林尼 (Pliny the Younger) 是昆體良最好的弟子，而惟其爲最好的弟子，所以也最能代表當時文學頹廢的狀況。

文法家的這種教訓，最足以消磨人的志氣，而他們的影響，卻是到處都感受着。那時「公所」已不復存在，「船首演壇」(Rostrum) 也已消滅，不復有請願的案子，也不復有爲人道奮鬥而能開動一時的訴訟案子，不復有機會可以施展辯才；也不復有大規模的演劇。人民祇有在公堂上無精打采地對少數裁判官說話的機會，所爭的也無非牆界溝渠的問題而已。所以並「演說家」這個名目也不復存在，有的祇是「辯護士」(patronus, causidicus) 了。

以哲學思想應用於科學，在當初希臘人如恩拍多克利 (Empedocles)、德謨謨利圖 (Democritus)、亞理斯多德、畢達哥拉斯等，都曾收過過驚人的效果，在當時羅馬，則絕對沒有這樣的人；老普林尼 (Pliny) 以其百科全書式的智識，嘗搜集故事，想像談，和迷信的傳說，以充其博物誌 (Natural History) 的材料，但他這種事業，在智識上與其謂爲進步，無寧謂爲退步。

以上所述的種種缺點和弱點，都是由當時國家和社會的狀況造成的。但雖有這種種的缺點，卻仍不能阻止

另外一派文學的發達。蓋文學史上並沒有忘記當時拍特洛尼阿（Petronius）對於紀事體詩的功勞。因為從前的紀事體詩，無非歌詠傳說中的神和英雄的事蹟；從拍特洛尼阿起，而後紀事體詩取材於羅馬人的日常生活。這確是紀事體詩的一種大進步。從此紀事體詩中大都含有哲理，此其創始者的功績，是無論如何不可掩沒的。

第五節

羅馬當這一段期間，可謂極不幸運。這種否運，誕生於加力荷拉時代，撫育於克勞第烏斯之朝，而成熟於尼祿之手。但這否運，並非無所取償，其所取償的便是斯多噶學說（Stoicism）的復活；而且那時的斯多噶學說，並不是克利安西（Cleanthes）和基斯波（Crispinus）那種支離破碎的斯多噶學說，並不必假借脩辭學的裝飾以自文其說；卻是一種能感人，能慰人，且能使人堅信的斯多噶學說。此種哲學，對於當時久受專制苦毒的社會最是切要，因為牠對於人類的性靈，雖不許牠有充分的行動自由，卻能給牠以一種堅忍的力量。凡是當時羅馬市民所尚未泯滅的觀念——如門閥觀念，政治的自由觀念，以及道德上，個人良心上的獨立尊嚴的觀念——莫不總匯於這一派的哲學中，其所提出的抗議，在理論方面，可於辛尼加見之，在實踐方面，則可於穆索尼阿斯·盧福斯（Muonius Rufus）·色雷西斯（Thraseas）及拉忒拉納斯（Lactantius）等見之。

辛尼加是這派哲學最顯著的一個代表。他生長於脩辭學和哲學的環境裏。年紀還極輕的時候，他便去聽帕

匹立阿斯·費邊納斯關於道德的演講。又嘗聽畢達哥拉達派哲學家梭替翁 (Sotion) 的演講而樂之。他是最先到斯多噶派哲學家阿達拉 (Attalus) 門下肄業的一個人，後來同學業成星散，他又以爲未足，繼續從阿達拉多年。因此學業大成，一時無出其右。他對於人類心理有深入的經驗，對於道德有了澈的見解，對於所宗信的學說有非常的熱忱，所以他在當時的社會能發生極大的影響。而且他生平飽嘗變故，道德上累經磨鍊，因此他所著的書，盡可爲實踐哲學的金鑑。

但以近世人的眼光看時，辛尼加頗已失其信用和威權。因爲我們讀他那種嚴正的著作，聽他演講人對於自己和別人的義務時，總不禁要想起那個做帝王師傅時的辛尼加，做阿格立派那 (Agrippina) 情人的辛尼加，和有志於左右羅馬帝國的辛尼加；我們看見他是一個野心家，所以他的道德家的人格不能明瞭；因爲他是一個政客，所以我們對於他的思想家的人格不能不懷疑。然而辛尼加竟能自欺欺人；一若他的情操完全誠摯；他不必實踐斯多噶哲學的規法，卻能發揚斯多噶哲學的光輝。凡是經他着手的東西，莫不立成絕構，於是乎辛尼加之爲思想家爲著作家，仍不失其偉大。和辛尼加同派且同時的，有奧拉斯·拍細阿斯·夫拉卡斯 (Aulus Persius Flaccus)。他的思想已入高遠的境域，與古斯都時代的作家，雖極名手，也沒有人能和他並肩。他的詩非常隱晦，譬如天上濃雲，時有數道電光輝映。但以二千年後的現代人看起來，卻可見他的面目皎然分明；可見他具有一副自尊自重的神情，映在羅馬帝國血染的歷史背景上。

第六章

拉丁文學的白銀時代——圖拉真的態度——羅馬威權淪於極頂的時代——圖拉真對世界的概況——羅馬國勢之隆衰——希臘羅馬文學之末季——東方都會之亞歷山大里昂——亞歷山大里昂之哲學家——亞歷山大里昂思想與基督教思想之並行的及對抗的發展——吳敦改變後之最高努力——朱理安帝——第四世紀

第一節

如上述，羅馬人之智的理想已經代替了希臘人之形式的理想，而斯多噶派已繼味吉爾派而興。我們從這時代的作品所表現出來的濃烈的感情，又可見羅馬文學與希臘文學愈趨愈遠。及後圖拉真帝 (Trajan) 即位，羅馬國勢巔盛，亦即此種精神最發展的時期。

圖拉真帝十四歲即為軍人，本非文士。但後來為虛榮心所驅，乃注意文學，極力獎勵。他自己並非能文，但我們看他那種賢明而果斷的政策又得見他具有卓識：他為帝時，對於文藝範圍以內之事，並不取猜忌的干涉態度，不

像後來的哈德良 (Hadrian) (原註：阿拉真曾任亞坡婁斗勒 (Apolodorus) 爲建築師；當時許多莊嚴的建築，都是亞坡婁斗勒的工程，後哈德良殺之。) 但他自己頗有賞鑑力，這可從他所辦的智識上專業和雕刻及建築方面見之；故圖拉真之朝，爲羅馬雕刻及建築的極盛時代。

圖拉真自己毛心良善，所以也肯與人以思想自由的權利；許人憑良心說話，任人批評及毀謗先朝的君主，覺得人民對於多主的責備便是對於明主最好的頌揚。因有這般的解放，文學上便大受影響。立時便有大批諷刺的洩憤的作品出現。

當時羅馬既從刑禁底下的緘默和噩夢醒覺過來，既脫了由專制壓迫成的麻痺症候，於是爲發洩胸中怨恨起見，乃檢舉歷代帝王之劣跡而宣布之。又以歷來史家，一則畏威，一則阿諛，事蹟多屬偽造，故遂從事於歷史的修正；自提比留 (Tiberius) 至杜密善 (Domitian) 八十五年來專制君王的罪案一一檢舉，使受輿論之公斷，其間無一幸免者。凡尼阿斯 (C. Fannius) 著尼祿之犧牲 (Victims of Nero)，歷舉尼祿生平的殘忍事蹟。斯韋托尼阿 (Suetonius) 以公正無私的態度痛罵提比留、加力荷拉及尼祿的失德敗行，稱尼祿爲「以血調泥而成的人類」。朱味那爾 (Juvenal) 對於杜密善積憤已久，至此也大得發洩。其後又有塔西陀 (Tacitus)，曾在歷史上留有不朽的痕跡。塔西陀的政治生涯，開始於惠斯德、西安之朝，至泰塔斯之朝，漸躋顯要，及杜密善卽位，遂爲節度使 (Prefecture)，故塔西陀於當時政治界文學界以及社會上重要的人物都很接近。他所以和這些人接近，目的只

在研究他們，描寫他們。他曾經目睹杜密善在位最後三年中種種可怕的慘劇。及杜密善死後，他就決意將這些巨擊的慘劇宣布於大眾，以期喚起良心上的覺悟。

我們要尋幾個新辭字眼來批評塔西陀，真也無從尋處。我們只能說他是歷史家的模範；他的思想，深刻而又精細；他的為人，正直而又熱情，至公而不流於淡漠，堅定而不流於過激。我們說他是哲學家也好，道德家也好，思想家也好。他的見解常清明而了澈，所以能分析事物的原因；他的行事常有膽量而無所顧忌，所以能揮動他的筆鋒以呵叱先世帝王的劣跡；他的精力常凝會而鎮定，所以凡所判斷常能中肯。他因有這種種德能，所以在歷史界造成一派，雖數千百年之後，人猶歎賞不置。這都因為他的思想，有如開闢新境，能發起人的研究興味。總之，他於人類思想的提高，功勞實在不小，決不是其他史家能及得到的。

從此哲學也和歷史及諷刺文一樣繼續的發展了；但牠在以前幾朝皇帝手裏是曾經吃過大虧的。提比留的寵臣塞哲那斯 (Sejanus)，因為畢達哥拉斯派哲學家阿達拉評論一般陰謀家朝露般的榮華為可鄙，便加以嚴酷的研詰。大儒派如狄麥多一流的人，都是歷來帝王所最猜忌的。這些人後來櫻惠恩 西安帝之怒，先殺赫維地烏斯 (Helvidius)，後殺泰塔斯，並下嚴酷的律令，獎勵告發者，以期一律肅清，庶可成全他的「人類愛戴者」的徽號。杜密善則甚至將所有的大儒派一律驅逐出羅馬境。當時的社會既見犯罪的可以尊榮，愚昧的可以富貴，也都覺得哲學是必要的。但當夫雷維安 (Fulvian) 諸王朝，因家族觀念之發達，道德上顯有進步，故同時哲學之

道德的觀念也頗推廣。且從辛尼加到埃披克提忒(Epictetus)的一段期間，思想上也顯有進步。埃披克提忒勝過辛尼加的地方，在他能把辛尼加的仁愛主義推廣做友愛主義。他自己是奴隸出身，所以他的著作有許多工人和奴隸去讀牠。同時帶溫·克立索斯吞(Dion Chrysostom)也認哲學爲一種福音；他於是便做地獄中的福音傳布者，而一般簡單的民衆去宣傳他的教訓。他足跡遍歷羅馬、雅典、羅德斯、埃及、亞細亞，無論對於異族的希臘人，都一樣傳布他的高尙的學說。

埃披克提忒、帶溫·克立索斯吞和波盧塔克(Plutarch)三人是尼祿和圖拉真兩朝的重要人物；他們同時用希臘語宣傳兩派哲學的原理；這三人勢力的合併，便是權力和哲學調和的顯著的象徵。就中波盧塔克對於斯多噶學派是一個好意的反對者，凡是斯多噶學說的矛盾的地方，他都替牠揭發而揚厲之；他的思想在古代哲學家中最和近代的思想相像的。

第二節

此時便是羅馬史上最重要的時代，也可說是羅馬政治史和道德史的莊嚴的休息時代。

此時羅馬的威權已經達於頂點。牠既傳承希臘的文明，便將這文明的利益分給四方歸順的諸民族，以貫徹牠的懷柔政策。於是乎羅馬版圖之內遂併非洲人、亞洲人、高盧人、日耳曼人而有之，而所謂羅馬帝國竟是一個縮

小的「宇宙」了。

羅馬以繼續努力的結果，已經囊括了東方和西方，使西班牙、不列顛、高盧、希臘、埃及、亞洲、敘利亞，莫不歸入牠的掌握；其對於塞姆種族中妨礙牠的事業的迦太基和猶太，則完全傾覆之。牠曾使許多混雜的民族——或由牠們自願，或用強迫手段——言語、法律、宗教盡歸統一。紀元後第一世紀中，地理學家斯特累波（Strabo）曾言當時的俾斯尼亞人（Bithynians）、密細亞人（Mysians）、弗呂家人（Phrygians）和呂底亞人（Lydians），已都完全忘記他們自己的語言；埃及的祭司已不復認識他們古代的刻文；高盧已經羅馬化，非洲也已經拉丁化。當時羅馬頗可相信自己已成爲世界的永久的市府，而爲一切民族渾一的中心。

這個時代真有世界史上獨一無二的盛況。後來一直延續到第二世紀，先還有圖拉真以萬有更新的氣象開其初葉，卻不料至此世紀末期馬卡斯·奧理略（Marcus Aurelius）一死，便爾一蹶不可復振了。若論文學，我們可說牠的古典時代在圖拉真手裏便已告終。後來尼爾華（Nerva）、馬卡斯·奧理略及諸安多紐氏（Antonines），雖經力求恢復道德思想之純高，雖欲激發人的想像能力，也終歸無效了。

馬卡斯·奧理略向以一種卓絕不凡的精神著名於世。但此時四方亂機已動，他和繼起的君主已無法可以平定；文學既已衰零，也無法可以振作；而帝國之士崩瓦解遂無可挽回了。總之，羅馬的國運既已造極登峯，此後便幾乎爲繼了。

羅馬人這種統一寰宇的迷夢所以不能不醒，其原因不一而足。在外則東方人，基督教徒，和一般蠻族，久有反抗之志，至此遂一旦爆發。在內則以種族之混雜，漸覺不能對付。於是乎羅馬帝國遂不能不瓦解，而先前高視闊步的龐然大國，至此遂變成世界競逐的目的物了。

第三節

當北方蠻族還未越過羅馬邊境的時候，羅馬受牠所征服的種族的影響已經不止一次。最先是希臘的影響，在羅馬的文化上最是分明。這種希臘的影響雖自覺很是優越，但後來竟為以亞歷山大里亞為中心的東方影響所代替。這種東方的影響雖也有一部分脫胎於希臘文明，但若追溯牠的根源，可以從埃及追溯到印度。亞歷山大里亞的地位介乎兩大海和兩大陸之間，為世界思想的中心點，也是世界交通的孔道。無論亞洲歐洲一切信仰和哲學差不多都是從這里培育出來的。哲學思想必經過亞歷山大里亞然後能加深能推廣。這種影響既波及羅馬，於是羅馬人雖欲維繫一切承受於希臘人的信仰便都不能夠了。當時羅馬人徬徨於懷疑主義之中，信仰已死，人心窳敗，不知所適從，於是乎自然而然的歸向哲學，而亞歷山大里亞的思想遂得乘機而入。

最初異教的聖賢，嘗隱隱約約有一個「最高存在者」的假說，嘗以此為他們的教訓的終極的歸宿。亞歷山大里亞學派便取此種觀念發揚光大之，造成豐富的學說，垂數百年而勢力勿衰。後來此種學說發達到極點的時

候，便成爲一種由東方的神祕思想和希臘哲學的最高觀念合成的學說。因爲這種學說是由東亞思想合成的，所以有一種「大同」的傾向，因其有此傾向，所以學術、歷史、道德便都打破古代學風的範圍，而取得基督教凡事都求一致的大同精神。

亞歷山大里亞的學說是代表舊世界的思想的。這種思想雖常常有消滅的危險，而迄未消滅。此其原因，由於亞歷山大里亞學說能將牠所有的精力都凝會在牠的最有力的要素——希臘思想——上去。

但是另外一種和牠對峙的勢力起來了；既起之後，便繼續增長，不可抵禦。這便是起源於巴力斯坦 (Palestine) 的道德革新教義。當羅馬開國後第八世紀的中葉，有號稱「先驅」 (the Forerunner) 的洗禮者約翰 (John the Baptist)，始對猶太人宣傳這種教義。後來拿撒拉 (Nazareth) 的耶穌 (Jesus)，自命爲女子和聖靈生的，又說自己是和平的征服者，是貧者和弱者的朋友，他對於這種教義，曾經親身做見證。大凡一種宗教的大運動起時，其先必有一番大擾亂，所以彼時也是如此。但是這種新宗教是自命喪送和平到世界上來的，而且也和別種宗教一樣，常給人以宏大高遠的希望。當時靈魂不死論，已如舊約的箴言 (Book of Wisdom) 所載，爲猶太教 (Judaism) 所採用。蓋彌賽亞教 (Messianism) 自丹希 (Daniel) 時代漸漸形成；凡有人問，「我們躬行道德究竟有何歸宿？」他便答道，下界的一切冤屈、苦痛，「天」會報償。但後來這種能傷悼的以諾書 (Book of Enoch) 漸漸失其勢力，而能給人無限希望的福音 (Gospel) 勢力漸大。因爲福音書裏許人永遠得居天國，告人在天國時，

主者，奴者，強者，弱者，富者，貧者，都一秉公平，齊等待遇，又使人瞻望前途，若有無窮幸福——試想這般遠大的希望，怎能不打動人心！因為那時人智識未開，還未能從理想上去造成一種合理的文明，所以這種神祕的默示，這種來世報償論都是最容易發生效力的。

如是，東方的兩大勢力——以亞歷山大里亞為代表，以猶太為代表——分任着支配羅馬帝國之精神

的進步。
猶太位於一大半島的中心，介乎紅海和波斯灣之間，一面是亞洲，一面是非洲，以腓尼基市府推羅（Tyre）和西頓（Sidon），經非利士（Philistia），撒馬利亞（Samaria）而通地中海，對於當時一切文明國無不可以接觸；由加爾底亞與印度文明接觸，由阿拉伯沙漠腓尼基與埃及及文明接觸，由地中海與歐洲文明接觸，由敘利亞與小亞細亞文明接觸——故猶太亦如亞歷山大里亞，處於極優勢的地位，使彌賽亞（Messiah）所產生的王國的思想得遠播而結果於殊方異域。

在這個時候以前，猶太與希臘·拉丁的世界，譬如兩個星球，受兩種反對的勢力而各自運行。如今正當世運轉振的關頭，兩星球互相接觸，從此相互間便發生深切的影響了。

最先以基督教思想傳播到羅馬來的就是猶太人。耶穌死後未幾，猶太人搜集他的講演，用阿勒美易克（Aramaic）文字紀錄下來，又將他一生的奇蹟也一一記錄。當時關於耶穌生平事蹟的記載，大都根據他諸弟子的

話，後來編爲福音體而以諸弟子之名篇，遂有馬太 (Matthew)，馬可 (Mark)，路加 (Luke)，約翰 (John) 等福音。他們所以將基督的思想和教義著之文字，其意無非欲使流傳於世界而已。

然而這些記載，初時並不能一致，因爲當時那些宣傳福音的人自己也不能確定，而且各人的意見都不一。當時那一班所謂使徒，似乎都不明白這個渴望已久的救世主祇純粹是一個精神的人格，所以聖經的傳說和默示錄的註釋也硬把他解釋做一種現實的救世主，說他是勝利的王，是猶太人最後的解放者。最初由耶穌的兄弟詹姆斯 (James) 監督的那個教堂的組織，是做照猶太教的會堂辦的，繼續詹姆斯 爲耶路撒冷 (Jerusalem) 監教的那些名字——西紐 (Simeon)，忒斯忒斯 (Thesus)，撒該 (Zacharias)，托拜阿斯 (Thomas)，約翰 (John)，利未 (Levi)，以法蓮 (Ephraim)，約瑟 (Joseph)，猶大 (Judah)——也明明令人想起以色列 (Israel) 的十二族。那時的儀式和信仰都很簡單，神學家的想像力還未曾想出無數的繁文縟節以紛亂原來的本旨。新教的象徵（卽儀式）祇有兩步：耶穌的認供和受洗成聖。但是這種簡單的儀式並不能永久未幾，因伊比翁尼脫派 (Ebionites) 和正教派 (the Orthodox) 的爭執，因固執舊教的猶太人 對於已改教的希伯來人 的壓迫，因各使徒在各國的勢力漸漸擴大而彼此發生衝突，遂致猶太宗基督教的專業完全停頓，而以東方波斯教 (Magism) 爲基礎的諾斯替宗基督教 (Gnostic Christianity) 代興。這種所謂諾斯替宗基督教，我們在亞歷山大里亞之淮羅 (Pto) 身上已經見其痕跡。淮羅於猶太 的一切傳說無不保持，同時又爲柏拉圖學派，斯多噶學派，逍遙學派，能把這許多背

馳的學說兼收並蓄，又能將他們和摩西的摩書及以色列的故事熔為一爐；他是當時東方正在活動的一種運動的代表，又是他本國的宗教的代表。但是我們追溯諾斯替宗基督教的創始者，尋常都說是第一世紀時的雲門·馬革斯（Simon Magus）和他的弟子麥喃得（Menander），哥林斯（Corinth）及多雪脩斯（Dositheus）；自此不能再溯而上之。這諾斯替宗基督教是後來許多較小的教派的根源，而敘利亞和埃及古初教堂中的許多爭執和許多無謂的辯論，也都是由牠引出來的。然而一神主義既經耶穌·基督曆示於先，又經聖保羅（St. Paul）宣傳於後，已從一塊地面推廣出來，終於傳播到世界的大半。聖保羅本是猶太的一個頑固人，一旦徹悟新教的道理，遂決心到異鄉傳道。當他在塞琉細亞（Saleucia）上船時，一心要想到各地方從事於征服靈魂的事業，從此沿海而下，到希臘登陸。遂由此歷腓立比（Philippi），安斐浦利斯（Amphipolis），帖撒羅尼加（Thessalonica），雅典，哥林斯（Corinth）等處，見希臘彫形藝術之美，並不為動，謂之為「偶像的」藝術，到處為人宣講現世與其一切快樂之不足貴，又說人間若與極樂園中的福境相比，真是一錢不值，又對卑賤貧窮，及一切苦厄人等，宣傳將來的天國。

那時這種教義的宣傳，確乎是恰好的時候。因為那時希臘思想根本已經動搖，所以不得不歸亡滅。因崇拜的客觀性而引起的懷疑，已經深入不幸而好根究的心靈裏。奧林帕斯（Olympus）的神位搖動了；巴克薩斯神（Laxos）神秘的聲音不久就要對世界宣布「大潘神帕經死了。」多神教的命數已在腐敗、懷疑、妖邪之

中漸漸告絕了。當時羅馬爲大批神道所侵入，已把古代希臘·拉丁的神話都淹沒了；這是迦圖的時代所不會有的情形。所以卡比多林 (Capitoline) 說，「馬卡斯·奧理略將許多異教充塞羅馬。」奧理略自己也是懷疑的，卻將這許多神道留給後人作祟。奧理略以後的君主，雖不如他想集羣教之大成，卻都繼續使羅馬人的信仰愈加紛亂。

同時思想的範圍裏，詩和學術，仍都未脫牠們那種倦怠的習氣。一般人的心理，正想變換變換，所以都傾向宗教。但是這種傾向，並不是新近纔有的，也並不是基督教成功的惟一原因。牠的起因是深深地種在政治和社會裏。和羅馬帝國國勢的衰落同時並進的，便是羅馬人心的墮敗；那時所謂愛國心，所謂公民觀念，所謂家族關係，以至所謂宗教，都因無正義的壓迫和殘忍的專制，差不多完全滅絕了。這一來，人人都絕了希望，所留剩的唯一自由，只有夢中的自由了。於是乎人人都覺倦怠煩厭，因而鄙視現世，因而現世對於人人不復有勾引的能力。人的惟一幸福只在超自然的模糊的夢境裏有了。

泰昔 (Thuc.) 說，正當此時，從東方吹來一陣神秘的醉人的風，從波斯，印度，埃及，敘利亞，這一陣騷動漸漸傳來，有如疫病。

關於奇聞異蹟的謠言，人人人口中都傳述了。說什麼猶太近來又出先知了；雪門·馬革斯和多雪情斯都有了；人人又都記起那個自命能起死回生的所謂異教基督的阿坡羅尼阿斯 (Apollonius) 了。

一般婦女對於東方的迷信尤是投機。因為她們的像想中，祇渴望着外觀上的神祕和燦耀，所以大家都認赫利亞的埃西神 (Isis) 為一種潔身贖罪的神道，為一種超度啓蒙的神道，並為自己濃烈的信仰心所藉以顯示的象徵。

基督教成立纔未幾，而宗派的分立便愈出愈多。往往便是極細微至於不可覺察的觀念和意義，也大家都無窮期的聚訟起來。於是便有所謂諾斯替宗、發楞廷尼安宗 (Valentinians)、奧淮宗 (Ophites)、以斯尼宗 (Esenes)、卡波克拉提宗 (Carpocratians) 等，各逞其詭幻不可思議的觀念雜揉在一起。迨三世紀中，希坡利忒 (Hippolytus) —— 即羅馬曆書上的聖希坡利忒 —— 列舉應該攻斥的異端已不下三十四種，也可見當時那些渺茫奇詭的學說不知有多少了。

加以羅馬當時，古代崇拜的遺蹟猶多存在，『自然崇拜，神祕思想，深遠的汎神教，聖經的本文，默示錄的隱音，哲學家的獨斷說，象徵的解釋，對於星象的幻想等等，雜揉縱錯，成爲一團混沌內中的元素，也有神的，也有人類的，有物質的，有精神的，有超自然的，有自然的，統統都烹在一個兼有光明和黑暗的爐裏。』(參看 Schultze, Geschichte der Unterangangs des Griechisch-römischen Heidentums; Gaston Bissier, Fin du paganisme, 2 vols.)

第四節

彌留中的多神教還出着死力攀附着學者的論證以求自存。但牠已不復能叫奧林帕斯的幻影復活；一般所謂「神托」已不復有聲息。「神已不復具人的形貌了。」希臘末季人疏細安 (Anaxagoras) 便是向來人論其人格思想以為都與渥耳特耳 (Voltaire) 相像的疏細安，早已將汎神論淹沒在一陣謔浪裏。但是那時世界的哲學還未很充分，所以還免不了有人嘗試從這種汎神論裏面去引出一段提清的教義。

那時亞歷山大里亞學派，因有志要將他們所追求的神和外在的世界聯絡在一起，所以便創出一種著名的「萬物發射說」(the theory of emanation)，他們這種學說，是以想像中所造的假說為根據的，而他們這種假說，又都專務外觀，不問合理與否。

同時一般詭辯學派，也造出種種的奇蹟；古時的爭執又在文字的戰爭裏復活了。雅典仍然想人稱牠做文學和藝術的都會；牠對牠自己昔日的名譽很是嫉妬，很想將歐洲和亞洲好學的青年都吸收去；而這些青年也都熱心想發見科學上和真理上的奇蹟，因又將囂然的辯論聲充滿了雅典。那時亞歷山大里亞學派的三部合體說 (Triad) 正和基督教的三位一體說 (Trinity) 相當，坡非立 (Porphyry) 和愛安布力卡斯 (Amblicus) 的所謂一神，也猶之基督教徒所謂普在的神，他們的神話的解釋，也無異於基督教之聖經的默示。

那時基督教的教堂和異教的神廟並立。這兩個將來成爲敵對的宗教的信徒，大家很熱心地忙着去聽同一的教訓。而最後一批既推廣而純練的柏拉圖學派，便和基督的弟子相會於阿加的米（Academy）的園中。他們熱心着保護推行基督的獨斷的教訓，及到後來，竟能靠着另一種帝皇的威權——君士坦丁（Constantine）的政策——以維持他們的教義。君士坦丁既已戰勝馬克森細阿（Maxentius）——不問他是否靠着「十字軍旗」（labarum）的幫助——便定基督教爲羅馬國教。

第五節

自此數年之後，巴錫耳（Basil）和那齊安會（Nazianzen）的格列高里（Gregory）——那時兩人因精通人世的學問且能以其學問供基督教利用，故在希臘已無往不受推崇——會羅馬末帝的兄弟朱理安（Julian）於雅典的學校中。那時朱理安的家族滿門慘遭屠殺，祇他和伽魯斯（Gallus）脫逃；他是一個王族中的哲學家，精緻的神學家，雖掛着基督教的招牌，卻滿心希望鼓吹他所心愛的希臘主義。當他正預備到尼哥米底亞（Nicomedia）去參謁殉教者的陵墓，或想在該撒利亞（Caesarea）的教堂對人民宣讀福音的時候，他已在計擬，不久便要將神廟中的火重新點着，將獻祭的香烟薰清空氣。希麥利阿斯（Himerios）或力貝尼阿斯（Libanius）的宏富的議論，在他耳朶裏直等於無聞；麥克心（Martin）的巫術的神通也不足以引起他的注意。坡菲立一派的哲

學，在他看來，似乎枯索無味而且繁瑣可厭。便是那加黎利人（the Galilean）的話（基督教）也不能使他滿意。因為加黎利人那種毫不可通融的道德論，不免使他煩悶。他看見那種道德論這般嚴肅，直使他的膽氣沮喪，思想滯凝。所以他大聲叫道，『我要一種頌歌，要一種讚頌人生，光明和幸福的頌歌。』

最後一批異教神廟的柱子，都在牠們的柱礎上搖動了；一種有布盧的破壞手段，已在阿富羅底（Atynodia），俄雅那（Oiana），和其他希臘的男神女神的美麗的像上施用了。他因此心中頗憤憤不平地想，『不久在大陽光裏的大理石要一塊都不留了。』

基督教的學說和這種經濟學家及希臘哲學家的神祕主義變形而重生的汎神論，古代的美和近世的象徵論，在朱理安心裏起了激烈的衝突。他的心徬徨於兩者之間，許久不能決定；取活動的生活呢，還是取靜思的生活，這樣躊躇了許久。最後，到他加上紫袍時，希臘思想遂佔優勝。

朱理安少年時代，一選被一件暗澹的出家人的大衣籠罩着，他的欲望硬被拘禁，他對於希臘藝術的熱情硬被壓制，彷彿提起希臘便是大逆不道的。及至他即位為世界的主人翁了，他於是要把從前的假面具完全揭去。他這種的報復，務求其做得徹底；他激於向來受基督教暗澹的思想的束縛，至此便借着哲學的名義，借着「自然」的名義，對於基督教大逞其報復的行爲。他希望在全國的市府裏都創辦學校，開設講座，以討論希臘的文學。他把所有的神廟重新光復，要使形式和感官的禮拜重復盛行；要想重新建設純美的宗教，並認此宗教為帝國的最

高法律。

當時有個作家說道，朱理安既即位之後，「便像怒獅一般，將基督教縛住他的那些繩子，掙斷。」他彼時對於基督教，全沒有持平容忍的態度，雖不致像從前對於異教的「慘用酷刑」，卻也已近乎「虐待」。他利用一種智識的和道德的壓制手段，排斥基督教徒不得干預公務，又禁止學校裏一律不得收納。

於是一般希臘和拉丁的教師都得罪無忌，而教會遂覺得自己指導人心的責任不能再放棄了。那時要想抵制這種狂飆，有一種強有力的組織的必要，這種組織必須能在這種事事都受摧殘而腐敗的時代裏立足得住，必須能抵抗當時的暴風狂雨而佔最後的勝利。當時的基督教會，便正是這種組織；因為那時基督教會的組織已經有些鞏固，保得住可以勝利。

教會因欲獲得這種勝利，遂乞靈於宗教儀式之外觀的炫耀。牠已經借重禮拜的勢力以維持牠的教義，已經酌採異教的儀注以文飾牠的教義的森嚴。牠的禮拜堂裏，也有偶像，也有古代獻祭的燭光和香煙了；也有諧和的人聲和音樂了；也有禮拜的莊嚴氣象，和種種訴於視覺和聽覺的東西可以引起純粹的觀念和象徵了。當時的教士也曾提起抗議。拉克坦斯（Lactantius）便說「偶像和宗教是兩個不能相容的名詞。」但是這種抗議大家都置之不理。而基督教的神人同體說依然在一股簡單人的心理上發生效力。

基督教的這種異教化，借偶像，儀式和禮拜為工具，使牠原來那種嚴肅的教條在人眼中格外可以明白，結果

便使一般「婦女」——這是牠使人皈依的一種特別工具——皈依的熱心格外增加。基督教的自始便和婦女們的易激動的心理相固結，自始便收服她們的靈魂，激起她們的感激。牠對於舊社會的法律、原則、風氣和狀態，都力求改善，因使婦女的身分擡高，使她們的勢力擴大。當初一般古典派作家的文章，大都對於婦女抱一種輕侮、譏罵、厭惡、譏諷的態度，常常攻擊她們，對於她們的道德表示不信任；基督教的第一舉動，便是將她們從這種不受信任的境地裏提拔起來。當初一般詩人、學者和哲學家，對於婦女，差不多異口同聲的說她們是劣等的人類，說她們天生是容易犯罪的，說她們不能有真正的感情，作惡是她們的拿手。至於教會裏的牧師，態度便完全相反；他們將聖母 (The Virgin) 作為一種理想的女性人格，而恢復了女性的尊嚴。他們承認婦女在精神再生的事業裏是有高尚而重要的使命的。從此婦女的人格不復為生活和自然的必要所限制；她們的人格便含有神聖的意味並且推廣了。

如是，宗教的觀念已經超越了一切；她漸漸的擴充起來而成為一種普通的萬能的勢力，此後不久，便將入禁慾主義、僧院生活，和潔操主義統治的時代了。

第六節

從文學的見地看起來，基督教的文學也是最富於熱情和活力的。當時除基督教的文學外，別的東西祇都是

些徒有聲調羌無故實的字句。那時雖有個嘗受宮廷異遇而操文壇大柄的脩辭學家及詩人奧索尼阿斯 (Ausonius) 和他的勁敵名震一時的克勞第烏斯·克羅狄亞那 (Claudius Claudianus)，嘗極力謀這將死的文學復活，卻已無可救藥了。我們試問，這將死的文學何以遂至不可救藥，豈不因所謂『藝術爲藝術而有』的信條，和專重形式的提倡不足爲文學生命充分的源泉麼？

那時詩已不復存在。但這所謂不復存在，並不是說完全死絕；因爲那時安布洛茲 (Ambrose) 和普魯登細阿 (Prudentius) 等人的宗教讚詩，都具有很獨創的真純的品性。那時事實上的詩，可於新舊兩派思想互相衝突的景況中見之。這兩派的思想，其一包含既往的一切勢力，其他藏着一個狂瀾洶湧的將來的可能性。這後之一派，嘗欲單槍匹馬去戰勝政治家的褊狹心理，戰勝學者的詭辯，戰勝辛馬克斯 (Symmachus) —— 是羅馬異教大演說家的最後一人 —— 一流人的愛國說，並欲戰勝民衆的冷漠態度。

教會方面自阿塔內細阿 (Athanasius) 到奧古斯丁 (Augustine) 的一段期間，其從事於改教事業，確是苦心孤詣。當時的政府日就凋零，政治社會，無不腐敗，獨教會超然於一般墮落現象之外，因有餘閒培育文學，使之發達。

教會中的演說家不絕和異教的辯護者奮鬥，實際上，卻正因有這些異教，而基督教士的熱心乃得常熾不熄。當時的教會雖散在各方，而各教士間函牘往來不絕，同相勉勵。當時名教士如安布洛茲 (Ambrose)，奧

古斯丁、克立索斯吞 (Crisostom)、息泥細阿斯 (Synesius) 之流，無不兼用書翰和論文，廣傳他們的教義。而且彼此之間，常有一種親密的友誼，因此團結益固。後來文學史家如微爾芒 (Villemain) 一流人，對於當時奧古斯丁、諾爾 (Nola) 之坡來那斯 (Paulinus)、薩爾匹細阿 (Sulpicius)、塞弗拉斯 (Severus)、特爾斐納斯 (Delphinus)、阿曼特斯 (Amandus) 等教士的行狀，嘗有非常細緻的紀述；說他們彼此之間常以清明的心地交換敬神的心得，談論當時時勢的變遷，便是休暇酬酢之際，也常以思想學業相勉勵——這樣的紀述，雖大部分以意爲主，卻都非常親切有味。

第七章

文藝衰落的趨勢表面上似乎停頓——蠻族侵入促成文藝衰落——當時文藝的殘痕——第五世紀至第八世紀間歐洲諸民族這種社會之狀況——日耳曼人與斯干的邪雜巫人之傳說與民歌——亞歷之起源——古代思想之發展——東羅馬帝國文學事業之實際休止

第一節

因古時教會對於文學的激勵，文藝上遂有一種普遍的復興氣象，同時古代學術的研究，也頗有所收穫。當時這種復興氣象最顯著的，要算高盧（Gaul）論文章的優美。當時高盧的屬省亞奎丹（Aquitaine），已可以和希臘及羅馬匹敵。當時論學校的發達，沒有一處及得亞奎丹的；論拉丁語應用的完美，也沒有一處及得亞奎丹的。文藝上江河日下的趨勢，至此似乎暫時停頓。一般人的思想和感情，都起了一種空前的萌芽作用，遂使各方面都有一種復興的氣象。

但是突然間，羅馬文明遇着一種可怕的巨災了；這種方興的新氣象，祇經一下打擊便都壓住了，凡事又都回復到原始的野蠻狀況了。

羅馬人既將帝國的版圖擴充到東至幼發拉底河，西北至來因河與大西洋，他們的征服綫方纔稍滿足；那時他們很是自負，以為他們的豐功偉烈必已聲滿寰區。殊不知當時亞洲有一塊廣漠的區域，對於他們的光榮事業，連聲息也沒有聽見一點；又不知當時北方流動的部落已經大隊的歷上前來——那時羅馬人對於這些部落的人數和居處，都還連影蹤也不曉得。

這些都落擴充地面的日子到了；西徐亞人 (Saxians)，日耳曼人，和匈奴 (Huns)，水湧似的出來了。

他們從幽暗的森林裏，和臨時的營張裏，衝到拉丁民族那些滿裝着世界財物的城市裏來了。他們本來祇有一點極雛形的文化，祇曉得一些維持生活的必要品，此時驟然有了這種機會，遂都張着饞吻來享用這樣奢侈的品物，這樣成堆的財富，這是何等豪橫的擄掠！那得不叫那些哥德人 (Goths)，勃良第人 (Burgundians) 和法蘭克人 (Franks) 眼熱！

羅馬國內向來將人民作奴隸看待，使人民七百年來對於自由和光榮的熱望終於不能滿足，因此牠已喪失攻擊的能力。牠那時因種種的腐敗，和道德上政治上一般的墮落，國力已經衰耗，再經不起邊疆屢經騷擾，所以當牠抵禦外患的時候，頗有些兒戰慄了。從牠那柔弱無力的手裏，把牠向來衛護着的文明之寶墮落了。

到風浪平靜之後，我們可以看出這東西兩帝國的覆亡，是亡得很乾淨的。那時日耳曼竟儼然以主人翁自命，把高盧、意大利和西班牙一齊掃蕩。於是外國人便與本地居民混雜，對於他們的風俗、信仰和習慣，都憑着武力硬逼着改從自己。羅馬的君長到處都被哥德人和日耳曼人的酋長代替；這些酋長又奪取了羅馬 *Prætors* 和 *Consuls* 的位置而為裁判官。

如是，西羅馬帝國傾覆了。西羅馬帝國一傾覆，東羅馬帝國的基礎也就跟着搖動，於是其塞立克 (*Genseric*) 手下的汪達爾人 (*Vandals*)，科斯洛厄茲 (*Cosroes*) 手下的波斯人，穆罕默德 (*Mahomet*) 手下的阿拉伯人 先後都來侵略了。

第二節

羅馬既亡，歐洲各種民族雜處，經過許多的紛亂，屢次的分合，而後日耳曼帝國統一之局，始得產生於查理曼 (*Charlemagne*) 大手腕之下。當蠻族侵入時，其勢有如洪水，一切藝術和制度，無不被牠掃蕩。事後雖不無少許殘留，卻只足供此次浩劫的證跡。然而這少許的殘留又何等可貴！惟其有此，而後古時的文物不致完全失墜。那時古代文化和基督教文化的餘燼便和蠻俗相混合，後來蠻俗經過兩種文化的壅澆，逐漸進化，遂大改舊觀，另成一種新文化。

有一個批評家嘗說，『文學史猶之政治史，中間是有空白的。』有了許多年豐收之後，便須有一段期間的荒歉。我們曾見文學已經有過好幾個時代的奇觀，從此我們便將入一段極長的荒歉期。在這段時期內，我們許久許久偶爾看見一二種作品。現在雖已不存，卻可斷定牠便是和前代最劣等的東西比較也還比不上的。然而人類的思想決不會完全睡覺。博學的坡力卡普·來薩 (Polykarp, Iysee) 將黑暗時代無人過問的拉丁文學，苦心研究之後，嘗說，『從沒一個世紀絕對沒有天才的詩的人。』而且他這句話還只是指那種人爲的詩說的，至於那種更深更秘密的泉源——民間抒情詩——他還沒有注意到。

那時那些瓜分羅馬帝國的民族，大多數都是帶着他們自己的傳說來的。就中如匈奴、阿雷奈人 (Alans)，汪達爾人，固然是絕無文化痕跡的蠻族，但是此外的民族，個個都誇耀他的過去的歷史上曾有個黃金時代，而且都有詩歌以頌揚牠的英雄事業。他們常用着戰爭時一樣熱烈的精神來宣述他們戰場上勇敢的事蹟。狂妄慶功的事蹟，和戰士期待極樂園的心理。

斯干的那維亞人 (Scandinavians) 所誇耀的，是他們的「北歐古字」(Runes) 的歌謠。那時的歌人 (Skalds)，人人受王侯的供養和戰士的讚美；他們常常用一種含着暗昧的象徵的紀事詩歌頌仁惠的佛雷耶 (Freya)，博學的伏勒 (Vola)，和威武的渥丁 (Odin)。他們又常常對平民講述古代的神話。那時這些神話頗已激起西徐亞人的想像；後來從十一世紀到十三世紀的一段期間便產出著名的呢噠 (Nidas)。這些呢噠的影

影是凡屬日耳曼種人的世界無處不受到的。一面薩克森人 (Saxons) 的「砂迦」(Saga) 便是因匪徒的影響產生的。砂迦的作風大都粗樸，當時只憑着口傳；後來英語的第一史詩貝武爾夫 (Beowulf) 和野史 谷德倫 (Gudrun) 便都從這里脫胎的。另一方面，則關於狄奧多理王 (King Theodorik) 的故事（即泥柏隆根歌 (Nibelungenlied)）一詩的基礎，頗會激發哥德人和勃良第人的勇氣。

還有那些久居西歐而被日耳曼人驅逐的克勒特人 (Celts)，大都是些富於愛國心而愛好自然的民族。當他們還未滅種的時候，他們嘗用一種悲痛的聲音以哀悼他們的國家的傾覆。

同時布勒塔尼 (Brittany)、威爾斯 (Wales)、蘇格蘭高原 (the Highlands of Scotland)、康瓦爾 (Cornwall) 和萌島 (Isle of Man) 等處的本地民族都已失其獨立，但他們仍舊保存原來的服裝和言語。當時的吟人 (Bards) 如塔里辛 (Talesin)、安紐林 (Aneurin)、利華基亨 (Llywarch Hen) 和無稽之彌爾丁 (Myrddin) 等，都可證明這些威爾斯種的民族是富於獨立的精神和想像力的。

又當巴特里克 (St. Patrick) 到愛爾蘭各民族中去宣傳福音的時候，雖見一般的狀況野蠻得可怕，卻會遇着詩人。而且這些詩人的詩都已曉得用韻。近代克勒特的學者曾經告訴我們說，這些愛爾蘭人或嘎爾族人的古詩是很有價值的；牠們雖則不能免掉古代獷狎之風和迷信，卻都流露出富於美趣的寫實的痕跡。

又當時居高盧的法蘭克人，也早就曉得做抒情詩和史詩。他們有一種遊行的歌者，很像盎格羅·薩克森人

(Anglo-Saxons) 的「士考普」(Scops)。他們到處遊行，表示他們的需求，稱讚他們的主人的樂施之德，並歌詠戰爭和遊獵之事。當他們跟着西哥德人 (Tingols) 和勃良第人侵入羅馬境地的時候，他們便將宏富的詩歌和他們的神聖的樞格夫里 (Saghrad) 傳授給高盧人。

此等詩歌，大都為平民之聲，由不知名的作家或非專門的詩人一點一點逐漸積成的。那時除此等詩歌外，祇有教堂裏還保存着一些舊文明稍已變化的遺物；也惟有教堂能供給世界以教師和福音宣傳者。那時道德和政治的狀況都不適於學術的發達。那時歐洲的智識事業，差不多完全罩在一陣黑暗裏。所以五世紀時有個史家說道，「在這種普遍的文學的沉默裏我祇能聽見我自己的筆尖劃紙的聲音。」然而這個岑寂的期間，卻會見希臘思想的最後一次努力。這個從事希臘思想最後一次努力的，便是呂西亞 (Lyca) 的蒲羅克魯 (Proclus)。蒲羅克魯生於四百五十年，是個大作家，大詩人，兼具荷馬的文才和柏拉圖的思想。他是一個誠篤的異教徒，奇蹟的製造者，常和司美之神有玄妙莫測的交際，並且是一個專精的藝術家。他對於他自己的理想常能誠摯；他有一種決心，要想調和柏拉圖的思想和東方的思想，調和神話的信仰和萬有神治論。總之，他是希臘哲學後期學派最著名的大師。但是他的名聲卻傳不到西北方民族的耳朵裏去，因為當時那些民族正注力於鞏固他們的國基，所以對於他這種精微的議論，大家都無暇顧及。

六世紀中世界的一般狀況，祇有宗教上的騷亂，政治上的混沌，和智識上的麻痺。那時亞歷山大里亞早已失

掉文化中樞的地位了。距那時二百餘年前，當羅馬愚昧而熱心的皇帝狄奧多西大帝 (Theodosius the Great) 時，亞歷山大里亞的世界無雙的大圖書館已遭頑固的大僧正提奧非羅 (Theophilus) 的大規，內中圖書已經散佚盡淨。這個頑固的大僧正和他那班狂妄的暴徒，對於喜帕卡斯、埃拉托色尼、提摩加拉斯 (Timocharus) 等人的名字，和他們的書籍都看得一錢不值，竟把亞歷山大里亞一座全世界第一的宗教建築塞累匹斯 (Serapia) 神廟完全毀壞了。後來他們將亞歷山大里亞附近卡諾帕斯 (Canopus) 城裏一座塞累匹斯神廟也完全搗毀；總之，那時凡足以廢足他們那種破壞的狂熱的東西沒有一樣能體幸免。又後來他的姪子息立爾 (Cyril) 也酷肖他的行為，會將當時著名的數學家海坡薩 (Hypatia) 供給暴徒做犧牲；那一年（即基督後四一四年）便是他的罪惡的永遠的紀念日，也是希臘文化普遭大劫的紀念日。但是他們所種下的這種惡因，卻仍舊派着他們自己收受牠的惡果。因為他們對於古代文明遺蹟這樣隨意搗毀，所落得的祇是替自己的智識加上一副嚴酷的桎梏。他們曾經宣言，凡是既往文明的遺蹟應該完全毀滅，以為這些東西祇能發生惡影響。於是因這種大搗毀而屯出來的空間，便都為那些古基督教士的學術所佔領。當時那些教士已經造出一種信條似的學說，以為一切合法的智識都應該從聖典中求之；因有這樣的信條，所以此後數百年中，他們竟能將什麼進步完全都阻塞。

那時東方的東羅馬帝國正遭莫大的奇禍。向來是羅馬人的非洲，卻繼續做各族紛爭的戰地。他們為着要一決雌雄，為着要壓足他們復讐的渴慾，因不惜借助於本地蠻族，於是那些世界上最美麗的國度，遂到處化成瓦礫。

及至查士丁尼 (Justinian) 手裏，纔把那些劫餘的殘局稍稍修補一下。他用着貝利撒留 (Belisarius) 和那錫斯 (Narses) 兩人的兵力，把非洲和意大利重新征服，又以爲當時一般哲學家，那說者猶太人，異教徒，以至教皇維吉力阿斯 (Pope Vigilius) 莫不是造亂之源，因竭力取締防範，一時頗見承平的氣象。那時的道德，無恥腐敗，達於極點。當時作紀年 (Annals) 和秘史 (Secret History) 的普洛科帕斯 (Procopius) 曾經給我們以許多證據。查士丁尼是個貪名的皇帝，後來也竟贏得一個大立法家的名譽。論他的功績，在能使六世紀時的法學脫離了三世紀時帕品尼安 (Papinian) 阿爾西安 (Ulpian) 及其他法學家的腐敗影響；能使當時的社會不爲異教和貴族的傳統所束縛；能在國家多事之秋振興實業。但他嘗藉口和異教有關係，把亞理斯多德派的哲學學校一律封閉，又嘗五度奪取羅馬城，卒至將羅馬元老院宣布裁廢。因此，羅馬古代的哲學和羅馬古代的威權，便連些微的紀念都不留了。查士丁尼卒後四年（卽五百六十九年），有一個人生於阿拉伯的麥加 (Mecca) 地方。此人吶喊一聲，而一般徒事空談的阿利阿宗 (Arians) 亞斯託利宗 (Nestorians) 彼替歧宗 (Eutychians) 「一神教宗」 (Monothelites) 「一性教宗」 (Monophysites) 遂羣相震駭。此人便是穆罕默德。穆罕默德的長刀一揮，而非亞兩洲和基督教的關係從此斬斷。

同時西歐也瀰漫着一般恐怖的空氣。其時意大利已是一片荒涼，祇在驚雲駭霧之中掙扎着性命。多腦河 (the Danube) 流域已經重復入於完全野蠻的狀態。那些瓜分羅馬帝國的新民族，態度又極猶豫不定。他們每前

進了一步，便又似乎後退，回復原來的黑暗境界。在這種波濤洶湧的時代，智識上道德上即使真有進步，我們也無從辨別，至於繼起的時代將成如何狀態，那更不能預料了。

遠在南方的阿拉伯人，羣起應響，擊斃德頓，領土逐漸開拓；自直布羅陀海峽（the Straits of Gibraltar）至恆河沿岸的地面盡入其掌握。西方的拉丁種人，遠勉力要想脫卸日耳曼人的箝制，然而他們的地面已一天縮小一天。在東方的拜占庭，則希臘思想已經乾涸得不成樣子；那時有的祇是些無聊的神學家，不絕的互相爭論，排斥結婚，提倡獨身生活，藉口着引渡人早些登天，其實無非要滅絕地上的人類。

這般的衰運是到處如此的，及至七世紀遂達於極點。當時祇有高盧地方幾個發達的學校還竭力撐持着。一個是波亞德（Poitiers）辦的，聖利奧得加（St. Leodegar）便是從這里出身的，還有著名詩人福條內塔斯（Fortunatus）也從這裏出身。還有一個是伊索愛耳（Issore）辦的，在奧芬涅（Anvergne），聖普利斯脫（St. Priest）嘗肄業於此，又從前五世紀時高盧的滑稽文人息多尼阿·阿坡力內立（Sidonius Apollinarius）和六世紀時替法蘭克人作史的都爾（Tours）人格列高里（Gregory）也都是這個學校的學生。最後還有克勒芒（Clermont）的學校。我們據波內（St. Bonnet）（當時人稱他為最優越的詭辯家）的傳記，可見六世紀時克勒芒的學校裏已有文典一科，那時所謂文典是包括文學和古代的掌故說的。此外還有幾個教會所辦的學校，雖無勢力，進步卻很遲緩。

至於那時的詩和一般學術上的遺物究竟是何狀態，我們已不易追考；我們只能說那時這些東西已經散失盡淨。也許當時的修道院裏曾經保存着一部分，俾亞歷山大里亞和拜占庭的掌故得以流傳至今。便是威爾斯人和愛爾蘭人的寺院裏，也許有所保存，因為我們曉得這些寺院裏嘗有一班思想家曾試將古代三種思想的泉源——聖經、荷馬，和克勒特人的傳說——融會一起。

那時惟有英國於古代文化的保存最稱完備。她是八世紀末葉歐洲最開明的國家。當時查理曼大帝抵制蠻族，侵略頗著奇功，而最先派遣愛格伯 (Egbert) 和高盧人比德 (Boite) 的弟子阿爾琴 (Alcuin) 去參贊他光榮的功業的，便是英國。

八世紀中，東方中國、印度，和阿拉伯人（那時阿拉伯人已入主西班牙）的文學正在發皇，而北美洲土著的文明（那時世界並無人知曉）也正蒸蒸日上，歐洲卻在一種極蒙昧的狀態中苟安度日。偶爾出現了一兩種內容稀薄的編年史，也大都乾燥無味。寺院中的作家，也用編年的體裁，做過幾部關於教務進行和其他事項的紀載。當時人的歷史觀念只不過如此。便是宗教的運動也毫無精神；偶爾出本把書，綴拾了幾種舊聞典故而已。間或有一二人做做詩或做做勸世的文章，大家便都目為異蹟了。文學當沒有完全絕跡之先，竟弄到這般地步。然而在這個全灰色的背景上，卻也映着幾個偉大的特出的人物。其一便是比德教長。他身在歐洲的北部而能反映東部和南部的文化。又其一便是愛洛伊 (Eloi)，是羅退耳第二 (Lothair II) 和達哥伯 (Dagobert) 等王朝的財政大臣，

安培(J. J. Ampère)嘗稱他爲『蠻族心目中的芬乃龍(Cenelon)』。還有以錫多(Bidore)是塞維爾(Beylie)的僧正，學問極博，嘗使阿利阿教的西哥德人改教；科倫巴(Columba)爲傳教士，神學家，詩人，並大不列顛第一精密的編年史家，阿達爾柏(Adalbert)時人稱爲賽基督；克方門(Clemen)爲大膽之合理教派，且爲新教之先驅者。此外便無別人了。

第八章

查理曼之復興事業——向文化努力——查理曼阿爾琴刺巴勞斯孟勃斯——九世紀末葉和十世紀初期的擾亂——封建世界——歐洲重入蒙昧的狀態

第一節

如上所述，法蘭西當查理曼未即位之先，文化程度不如薩克遜時代的英國，不如以錫多故鄉的西班牙，又不如意大利，因為意大利當六世紀時，曾經產生波伊悉阿斯（Boethius）和卡息奧多刺（Cassiodorus），他們是古代文化最後的代表，他們的著述，向都供人作古代文學的教科書，直迄文藝復興時代。那時的法蘭西，就文化而論，差不多已成歐洲最無希望的國家。

正在這個當兒，查理曼和阿爾琴出來改換局面了。他們一個是帝皇，一個是僧侶，代表社會上向來不能分離的世俗和教會的兩大勢力。查理曼是一個開明的君主，日耳曼人的征服者；他的天才，無論武功文事，那一般頹宜

——這樣的一個查理曼出來鼓吹真正的復興事業了。四方學者因他的邀請，大家聚集於法蘭西，彷彿要把世界的學術和文化都聚會於一點。他嘗下令搜集國民的歌謠，又嘗特委比薩之彼得（Peter of Pisa），教院吏之保羅（Paul the Diacon），和亞基列之克力門（Moment of Aquileia）三人專司民間教育。

這三人既受委托，便都用出真正的傳教精神很熱心地廣布教育的利益。他們常常奮鬪着將理智的光明灌入黑暗的人心裏。但也常常遇着一種固執不化的人，寧保守其愚昧無知的狀態；這種人便如魯特·非利厄（Loup de Terraces）所說，「爲着自負，所以鄙視文學，以爲是迷信人浪費光陰；對於這種人，便單提起學問這個名字，已可叫他們皇駭卻退。」查理曼的復興文化事業對於這種人確要算失敗，但牠在別的地方卻收實在的效果。書籍漸漸增多了。一般人重新又將精緻的神學上的問題提出討論了。宮廷裏的博學人士人人都想借這些鋒芒的討論露露頭角。查理曼自己喜用修辭學的辯論維持他的意見。於是西塞祿，馬克洛比阿（Macrobius），亞福利厄（Apuleius），柏拉圖，亞里斯多德等，都供給這位好辯的皇帝以材料和證據。關於「神國論」（Adopikionism）的爭辯，他會是一個重要的參加者；他又嘗專心研究「偶像破壞論」（Iconoclasm）的異說。這是基督教與猶太教分離之前的最後一種異說。當時這種偶像崇拜的問題關係極大，因爲一百二十餘年以來，這個問題常常是政府和教會間的爭端，並曾引起君士坦丁堡流血的大慘劇。東羅馬的國本因之動搖，西羅馬政治上的極大騷擾也是由牠惹出的。

阿爾琴是數學家、詩人、歷史家、論理學家、博學的政法家、嫻熟列聖的事蹟、長於治事才、又為政治家、言語學家。論其私人生活，則為禁慾主義者——質言之，阿爾琴是一種集大成的天才。他又諳熟古代的掌故。他的心思、精細而易於轉變，炫於古時異教之美，遂想使牠復活，但只許少數人欣賞，不許廣為傳布。他的同時人譽稱他為「自由藝術之神聖的倉庫」(Artium liberalium aecarium)。嚴格論起來，這位森格羅·薩克森的僧侶的著述，無論是論文、是註疏文、是列聖的傳記、是訓世之書，都並不見得什麼奇偉，也並不能證他有獨創的大才；但因他那種辦學和教人的方法，他對於查理曼提倡文化的事業，就當時的程度而論，確乎要算有非常的功績。西方之有公共教育，是他第一個提倡的。他後面有許多弟子，後來也都成為教育家。

就中最著名的一個便是刺巴努斯·毛勒斯(Rabanus Maurus)。他是著名的薩克森神學家，先受業於阿爾琴，後來在他自己的本鄉創辦了一種系統極完備的教育。脫里推蒙長老(Abba Trithem)嘗說他是德國提倡文化的第一人，而德國文字也因毛勒斯纔有優美的性質。和毛勒斯同時的，有隱居寺院中的愛爾蘭人約翰·司各脫斯(John Scotus)；那時他正在提倡新柏拉圖主義(Neoplatonism)和亞歷山大里亞學派的「汎神的理想主義」(Pantheistic idealism)，這便是古代學術和近代信仰的接榫。

那時的法蘭西，學校不像從前那般少了，已經每個市鎮裏都有學校了。單是紐斯的里亞(Reims)一個地方已經有好幾個學校，牠們所施的教育，大都能發生健全的影響，只可惜還帶着一些迷信上的錯誤。當時那些學

校要算都爾之聖馬丁 (St. Martin of Tours) 辦的一個爲最有名；他這學校所以發達，大部分得力於阿爾琴和一個服膺味吉爾的息格爾甫 (Sigfrid) 的指導。學生之多，簡直駭人聽聞；甚至英德兩國人也來學的。同時西班牙的學校和阿拉伯的大學也都有很多的學生。

於是人才漸漸得以發展，而查理曼的希望似乎將近實現了。文學的引炬已重新點起了。卻誰知事變之來，竟出人意料；那時忽然發生了一陣政治革命，而這些理性中所盼望得到的東西便又成爲畫餅。

因九世紀到十世間的一陣騷亂，查理曼這個大規模的帝國便根本搖動了。此時忽然崛起一個偉人，便是奧克馬 (Hincmar)。他那種敏活驚人的天才，一流露於對法蘭西教堂和羅馬教堂的奮鬥，再流露於對國王和教王的奮鬥，卒在他那個時代上留着一個不可磨滅的印子。然而這樣的進步，卻因國內騷亂而突然停頓。彼時查理曼帝國的版圖，已奄有西自加達魯尼亞 (Catalonia) 東至易北河 (the Elbe) 之地，不料繼業之君主自起爭端，因遂破壞統一。從此分崩瓦解，所剩祇只有一個大帝國的空名和小國間激烈爭鬪而已。當時兩民族不能再往下合作，遂將帝國分而有之。法蘭克人和德意志人各據一方。兩民族一經分裂，便非用干戈不復相見。政治上既有這樣的分崩，社會上自然也跟着擾亂。於是公戰私鬪，幾無寧日。當時人人都逞其無羈勒的野心，不絕奮鬪，所以純粹智識的事業自然沒有發展的機會了。

第二節

歐洲西部，凡是形勢可取的地方，都樹起封建諸侯的堡砦了。這些堡砦有兩種目的，一是保衛自己，一是壓制平民。我們看了這些堡砦，便可見得歐洲的封建制度，已漸漸從蠻族世界的殘墟裏露出面目來了。這種制度不自然其然而然的替後來世界的進步做了一種工具，且已在牠那種凶惡的外形之下，潛伏着近代社會組織的萌芽。封建制度既與各國的人民便須痛嘗暴政的滋味。那時的狀態，彷彿是大家互相打劫，戰鬪之事，無時或已；諸侯和他們的臣屬要鬪，教會和政府要鬪，而教會範圍裏，僧正和不安分的富僧又要鬪，教士和教王自己也要鬪。

所以那些日子，精神事業是絕對沒有進行的餘地的。說什麼道德的感化，怎能軟化那些騎兵鬪武的諸侯們的鐵石心腸？我們解剖他們的人生的成分，就是戰鬪，搶掠，勒索，拚性命的比武揚威，以及一切肉慾的廢足。便是一般教士，也莫不籠罩在沉沉的黑霧裏。他們不敢用「思想」，因為他們目前的急需，祇是死力的「幹」——試想一個沒有思想的時代，怎能怪牠文學的收成稀少呢？

那時僅有的作品，祇是些並非創作的聖經注疏（差不多完全是剽襲從前神父的成說而成的），宗教上的舊聞，片段的無精采的翻譯，以及聖澤芒的阿坡（Abbo of St. Germain）和鄂多（Odo）一流人的經講——這些經講都是一種拙劣而乖謬的拉丁文做的，內容祇是對於教會中的敗類和一般罪惡的咀咒。此外，史詩和抒情

詩也曾有人嘗試；有一部詩名叫禿者（The Bald），是烈克巴得（Frunald）的成功的作品，雖近雕琢而頗輕快，可稱傑作；還有給爾貝（Gerbert）頌揚波伊悉阿斯（Boethius）的諸詩也很可注意；其他作品大都「因稀見貴」罷了。當時拉丁諸民族處於天下騷然之際，除這三數作品而外，更無別的可以怡養心脾了。

我們剛纔提起的那個給爾貝，他是一個僧侶並且是大僧正，也便是後來的教皇西薇士德第二（Pope Sylvester II）。他那時代的灰色的背景上，祇見他一人昂然特立。他的人格是很奇特的，他是十世紀中最賢明最出色的人物，是學者，是政治家，是開明而有思想的教皇。同時代的人因不懂在這種蒙昧的時代，會出這樣才能的人物，便都說他是一個通魔術者，很是怕他。

第三節

世界蒙昧的程度重又加深了。然而古代的學術並未會完全忘記。給爾貝的藏書裏尚有西塞祿，登撒，普林尼，斯韋托尼阿，斯退細阿，斯，狄摩西尼，曼尼利阿，斯，克羅狄安，波伊悉阿斯等人之書；弗羅多爾德（Frodard）也嘗受李維，薩勒斯特，味吉爾，登撒，彼特洛匹阿（Enripis），厄利阿斯（Quins）等人的靈感。袁松（Renzon）對人講演詩律的時候，也嘗引荷馬，柏拉圖，亞里斯多德，泰倫斯，賀拉西，味吉爾，斯退細阿，及其他許多古代名人的話。但是書籍漸漸稀少了，漸由稀少而將至絕滅了；適諳純粹拉丁文的人很有限了。希臘語已無人研究，也無人懂了。

學術潮水似地退落了；所賸的祇有一種關於警衛的學問。

東羅馬帝國和歐洲西部，無論語言、制度，以至宗教的派別，都是隔膜的，所以牠和西歐諸民族祇有一種極淺的交誼，彼時不幸的東羅馬因宗教上的騷亂和國內黨派衝突的結果，已經分裂得不成樣子，那時距福細阿斯（Phocas）分教運動未遠，此後未幾，基督教便分裂為敵對的兩派，而馬基頓王朝（the Macedonian Dynasty）亦以此時取得東羅馬風雨飄搖的帝位；這兩件事都是歷史上異常重要的。

同時西歐的西班牙，因摩爾人（Moors）侵入的騷亂，無論古代和教會的學術都被摧殘殆盡，但也因摩爾人的侵入而輾進一種程度較高的文化和藝術。那時有個僧正管作「卡細達」（Kasida）（阿刺伯歌），這便是西班牙受阿刺伯文明影響的一個證據。彼時哥爾多華（Cordova）的阿爾發勒司（Alvarus）曾痛斥國人不應輕視基督教的學術而注意阿刺伯的學術，不應為回教徒文辭的優美所炫，而不顧自己的語言和宗教。然而大勢所趨，雖有這種抗議也是遏制不住的。

那時西歐諸民族所承受於古代的遺產，大半已被剝奪。然而他們要想追跡原來的路途，卻不能不向東方的學校走去；他們須得重新做小學生，將這因蠻族侵入而荒廢的教育在東方的學校裏從頭受過。因為那時都虧得有阿刺伯的文明，世界智識的泉脈纔不致完全枯竭，並且還有所增長而更新，所以這個再教歐洲人的榮譽，當然是該歸牠的。

第九章

歐洲文化銷流與亞洲學術盛衰之對照——并極東亦遡歐洲——十世紀時之中國日本東亞諸國之變遷——八世紀以降之阿剌伯學術——阿剌伯文明一瞥——阿剌伯書籍之傳入西方

第一節

十世紀時的歐洲，無論在西部諸國在東羅馬帝國，莫不禍患頻仍，有如出喪的行列，驚心悚目的景象，層出不已。因此歷史家都稱這個時代為歐洲的「鐵時代」。但在東方，這個「十世紀」卻正是智識專業極燦爛輝煌的時代；阿剌伯的文明不待說了，便是和亞刺伯離得極遠的地方也無不如此。

我們且先說中國，因為中國是我們人不能不時想到的地方；那時正當牠的唐代；詩壇因有李太白而得極燦爛的收穫。李太白是一個富於悲情的夢想者，是波斯人與瑪開儂（Omar Khayyam）與和菲茲（Hafez）的智識上的同類，並且是他們的先驅。他是玄宗皇帝朝中點綴昇平的主要人物，時人稱他為「謫仙」。其次便是杜

甫。他是中國的賀拉西；是青年，春日，森林，山嶽，酒之歡樂，詩之競技，以及遨遊，默想等等题目的天才的歌者。繼李太白和杜甫而起的便是他們的兩個勁敵，王維和駱賓王。「譯者按這裏所說有誤，殆是作者的疎忽。」後來到宋朝，文學便發達到極點。

從來文學上的比賽，沒有比中國當時再榮耀，學者的身分也沒有比中國當時再尊崇。這是世界一切文學中最有興味也最足惹人注意的一點。再沒有一種文學能像中國文學完全不受西方文學的影響而單獨發展；再沒有一種文學能像中國文學絕不露出和西方諸民族交換思想的痕跡。然而看牠種種的刻畫功夫，看牠對於日常生活的實際的觀察，也再沒有一種文學比牠更和我們自己的文學相似。

日本當時智識上的醒覺，也並不比中國不真實；實則她當前一世紀中已經有一段開明的時代，此時不過繼續前業更加上一種新光彩罷了。十世紀的日本宮廷，論語言之優美，論交際禮貌之講究，論物質生活之奢華，直可與我們歐洲最完美最華麗的宮廷相比。彼時日本皇帝總攬一國之大柄，四方宴然，因得與一般貴族，學者和藝術家垂拱而治。大凡國家承平，最足以獎勵智識的娛樂。彼時諸親王與國中文人間常隱有一種爭競，使階級和人才兩者恆得持平。凡是門第稍高的子弟，必以詩為其教育之主要部分，故往往朋儕雅集時，可聞鑿句麗辭脫口而出。

詩人之外，還有許多中國派的藝術家，畫家，和雕刻家，競相描寫種種東方獨得的天然景物。日本人的畫，當七世紀至九世紀的一段期間，本已異常發達。及十世紀中國畫風傳入，遂臻極盛。因為當時——即現在也如此——

日本人最善利用他們周圍的異族文明，而又能不失自己的特質。他們當時一面招請中國人輸入陶器，象牙細工，和木雕細工，一面從波斯人學習鐵器上鑲嵌金銀花紋的藝術。他們的成績竟能青出於藍；他們於中國波斯藝術上精巧堅固等優點，樣樣都能傳受，而顏色的美麗和意匠的活潑，又都勝過中國和波斯的藝術。

他們的文學，雖則誇飾且近乎造作，卻是純粹的。他們的文字，並不因中國語混入而受影響；他們的文人，雖有意矯飾，卻有一種伎倆，能使極平凡的思想化作極可愛的文辭。這便是日本人的黃金時代，便是著名的紫式部（Monnaaki Shikibu）嘗替牠寫照的那個時代，也便是歷時愈久而愈覺光華煥發的一個時代。

不幸這個時代很是短促。一從封建制度的暴政橫行，日本的藝術和文學遂衰熄至七百年之久。

我們即使遠至印度支那（Indo-China），也可以尋見燦爛文明的痕跡。印度支那當十世紀時，正當柬埔寨（Chambodia）王國奄有全島，國勢隆盛到極點的時代。那時柬埔寨在亞洲南部，久已是一個重要的國度。先是七世紀之前，佛經由錫蘭（Ceylon）輸入柬埔寨，致婆羅門教傾覆，那時從老撾（Tana）湄公河（the Mekong）上的百靈（Puan）到塔普謨兒（Thap-Muir），又從波農（Qui-Nhona）到桑里帕（Sam-Reap）一帶的地面，已有無數華麗的建築物；那時喀墨爾人（Khmers）嘗以此自誇。偉大而神聖的顏可爾（Angkor）的故墓，在人跡罕至的神祕森林中；她那壯麗森嚴的神廟以及高聳雲漢的牌坊，巨大的神像，如今都還有遺蹟，凡是遊歷到此的，無不歎為奇觀。柬埔寨的古碑，大都用巨大石塊雕琢，精緻有如黃金細工，在亞洲早已膾炙人口。所以中國人嘗有「喜

如「真臘」的一句話。

同時波斯道德上的發展也達於極度。那時波斯因伊蘭種人 (Iranians) 和回教徒及塞姆種人的混雜而產生一種新語言。而巴克特里亞王國 (Kingdom of Bactria) 的古代傳說，亦以此時經費爾多西 (Firdousi) 之手，而成爲一種宏大的史詩名沙喃噠 (Shah-Namā) (帝王之書)。費爾多西本是回教徒，屬於征服者的種族，但他既受了古代伊蘭思想的感發，遂歌頌之，垂六十年未嘗稍輟。以他的天才，以他的宏大的學術和想像，以他對於本地古史的深微智識，以他的宗教和語言，他確乎是個東方的荷馬。印度有摩訶波羅陀；希臘有伊利亞特；中古時代有泥柏隆根歌 (Nibelungenlied) 和羅蘭歌 (Chanson de Roland)；波斯有帝王之書——凡此，都是世界文學上最特出的紀念物。

第一節

我們取道波斯，又將回到我們的「出發點」了。所謂「出發點」便是上文所說爲中古文化源泉的阿剌伯文明。阿剌伯文明從八世紀起便已逐漸發達，只是我們沒有注意罷了。

亞刺伯終年得沐那和煦的日光，物質的要求容易壓足；居民身體上既已舒適，遂得耽事冥想，結果養成一種微妙的感受性。阿剌伯人對於明確勻稱的文詞有特別趣味。這種文詞，以之反映心靈和感覺的狀態，較日常生活

的語言爲適宜。阿剌伯人因有這兩種特質，所以對於詩有特別嗜好。當初雅利安和希伯來等遊牧民族的藝術，也無非是這種文詞和音樂合成的。當穆罕默德着實還未出世之先，阿剌伯人已有所謂「競名」之事，所謂「競名」意思就是說做「卡巴」(Kaba) (詩)。「卡巴」本是一個神廟的名字，地點在當初亞當 (Adam) (據創世記) 上說，他是第一個人類，所住的地方。當時阿剌伯人嘗在這個神廟底下競選詞華以博獎品。因爲當時阿剌伯也如古代希臘，凡有智識上的成就，都能得着褒獎的。但是直至五世紀末葉摩哈利 (Mohallil) 做第一部「卡細達」時，阿剌伯始有連續成篇的詩。阿剌伯的語言，從六世紀的初葉便已完全發達，因此阿剌伯文學一誕生便成熟；牠的黎明時代便是她的黃金時代。當時最偉大的詩，是安塔 (Antar) 的牟勒卡忒 (Mullakat)。在這部詩裏，無論自然的現象，人類的感情，各部落間的相愛相爭，以至駿馬上的放浪生活，莫不毫無忌憚地盡情刻畫。安塔以戰士而爲詩人，常於戰陣之暇，對他營中的兄弟歌詠他們的尚武精神和自己的戰績。當時他們做詩，並不受什麼信條的拘束。後來阿剌伯詩因感興的來源不同而分爲十類，此時還沒有這種分別，詩人都只憑着自己的情緒自由舒展。而且彼時這些不識不知的熱情民族，除詩而外，再沒有別的東西可學。及至穆罕默德出世，而後阿剌伯人的歷史上開一宗教革新的新時代，也便是牠的文學上的轉捩時代。穆罕默德以六三二年六月八日卒，那時可以說是阿剌伯宗教統一的完成期。從此可蘭經 (Koran) 成爲阿剌伯文字的古典的模楷，也便是後來許多詮釋註疏文字的無盡藏的淵源。

從「穆罕默德出亡」(the Hجرة)到阿拔斯王朝(the Abbasides)的一段期間，阿剌伯出了許多文法家、聖典箋註家、經講和祈禱文作家、及法學家。回教徒法律的各部分繼續補充，至此根基鞏固，成爲一切思想所依歸的不易的宏典。翁米亞王朝(the Omniade)中，詩壇很出了些佳作。從此便是阿拔斯王朝的開始了。阿拔斯王朝是阿剌伯史上最光榮的時代，便是拿沙桑王朝(the Samsunide)與牠比，也覺得有些失色。方西方諸國都在封建制度的高壓底下呻吟的時候，這邊巴格達地方的文物民風正是奇光煥發。從開創巴格達的阿爾曼蘇(Almansur)即位到摩塔瓦克(Mota-walke)被刺的一段期間(754—861)，阿剌伯的文明有一種獨一無二的隆盛氣象。所以能如是者，一由於當時智識上的自由放任，一由於當時風俗的優良。此時曾留下一部著作，值得我們研究，這書名叫金色的田疇(Golden Fields)，作者名穆薩烏提(Musk'ooda)，是個極善刻畫的史家。我們從這書裏，可以窺見當時人的生活是極富美趣的。當時人又最喜議論，因而關於藝術的學說異常發達。當時詩人高尚而酒脫的文章，附之以一種精美而微近矯飾的情致，和一種正確的觀念、精微的思想，因遂構成彼時阿剌伯社會一切娛樂的源泉。我們看見這些漂亮的詩人，就彷彿神遊於伯里克里斯和奧古斯都的時代。——雖則阿剌伯人的詩是和希臘及羅馬的詩根本不同的。

那時的君主對於詩人都極力衛護，就中如哈給阿剌細 (Harun el Rashid) 亞魯嗎蒙 (Al-Mamun)，阿爾哈根二世 (Al Hakem II) 等，就猶之後來意大利的利奧十世 (Leo X) 和法蘭西的路易十四 (Louis

一面，西班牙摩爾族的君主和一般部落的會長，對於他們所征服的地面的文化專業也提倡不遺餘力。他們把哥爾多巴做成麥加的勁敵；做成回教徒另一燦爛的新都。方巴格達和達馬士革（Damascus）兩地漸就衰落之時，哥爾多巴已成為世界文學的都會。哥爾多巴是他們的神聖的都市，是帝王學者和祭師所居的地方。四方學子都來就學於這裏的僧侶和醫生。藝術家用碧玉、雲斑石和大理石，在這裏造成一座建築上的奇觀——「摩爾王宮」（the Alhambra）。其他如多勒多（Toledo）、格拉那達（Granada）等處，也有許多壯麗的禮拜堂和碑坊。詩和藝術到處都在太平洋景象中繁榮滋長。

不到二百年功夫，那些狂妄的穆罕默德的徒弟，和那些描想為亞歷山大里亞圖書館的縱火者，都已完全改變了一種狀態。從七四一年到八四六年的一段期間，阿剌伯文明的進步異常迅速，而且巴格達的君權雖經瓦解，也仍舊繼續昌榮，直到一二五八年土耳其人侵入為止。當時醫學及天文學，在亞歷山大里亞、庫發（Cufa）、巴格達等處的大學中非常發達。敘利亞人、波斯人、科普脫人（Copt）和印度人的哲學的及科學的重要著作，都是這個時代編成阿剌伯文字的。這個時代的大哲學家、數學家、天文學家、古化學家，以一種神秘的、抽象的研究收得一種極顯明的成績；文法家、醫生、和歷史家，也人才輩出。此時人對於智識有一種熱烈的嗜好；對於學問無所不覓。那時東羅馬方面神學正在排斥科學，一般拉丁民族也正專靠求神問卜治人疾病，阿剌伯人卻已根據希臘人和亞

歷山大里亞人的學問將醫學的基礎造得很結實。當時他們的先生是聶斯託利教派 (The Nestorians) 和猶太人；在亞洲方面則受前者的影響，在非洲方面則受後者的影響。而兩派的共同點便是「神是惟一的」一種學說。彼時猶太人中出著名的醫士，已經非是一年；各國的王公大臣，甚至於教會中的重要人物，都要相請的。聶斯託利 (Nestorians) 的弟子則自始即專心於人體組織和疾病的研究。

聶斯託利教派 自中息立爾 (Cyril) 和埃及教派的陰謀（彼時此派在以弗所的議會中正得勢力），被小狄奧多西 (Theodosius the Younger) 逐出君士坦丁堡，後便創設了加爾底亞學校 (Chaldean School)，以得撒大學 (College of Edessa) 和其他好幾處學術的中心，他們又在亞洲辦了好幾個極大的圖書館，把亞理斯多德、老普林尼和其他希臘拉丁作家的著作譯成敘利亞文字。薩拉森人 (The Saracens) 曾從他們得着許多的好處，實則也就是全人類的好處。

世界文學史上最重要的事件，莫過於阿剌伯人將希臘的哲學書和關於其他學術的書籍從希臘文及敘利亞文翻譯做阿剌伯文的這種事業了。他們這種事業，都是十世紀末葉到十二世紀一段期間做成的；當時的君主對於這種事業都很提倡的。歐洲的文學界所以得見古代各種學問的名著，完全虧得當時有這番事業（但是這些名著的原本卻至文藝復興時代纔出現）。當時若不是阿剌伯人有這些百科全書式的著作和希臘人關於醫學及自然科學的著作的譯本，古代的這些思想，決不能保存到現在。如今幸得保存，此後將永遠不致再忘記了。只

可惜當時阿剌伯人這種未竟的文明，只如曇花一現，轉瞬便歸銷歇。但牠既已把光明暫放，便會替世界做過一椿偉業。此後便是另一新時代的開始了。這個新時代的文明，比較有力，也比較持久。因這新時代的開始，而阿剌伯的文明漸被葬送在頹瑣學派的運動裏。頹瑣學派是中古時代的特徵之一；牠雖有種種的缺點，而其中一個「專」字，已漸開近代的學風。

第十章

歐洲各國及其國語之形成——信傑努力之組織——平反詩與國民詩擺脫關係之最初階門——讚美英雄事業之詩歌勸興——由英雄史詩演變冒險小說與騎士小說——國樂說系——其起源——國樂故事對於歐洲類與文學之審美觀念及一般狀況發生異常的影響

第一節

到我們上文所說的時代為止，歐洲重要的諸民族和牠們的一切制度、思想，都進步得非常遲緩。後來竭盡氣力，纔算從羅馬人和蠻族的混沌世界裏露出一些秩序；此其進化，表面上似乎不可覺察，實底裏卻是有的。

舊世界當初所征服的版圖，祇見其一天一天的縮小。查理曼當初用蠻族的分子重建羅馬帝國時以其雄才大略勉強做成的統一之局，至此已四分五裂。他那龐大的帝國，什麼都不留了；所賸的只是些水火不相容的部落，只是些一團糟的雜亂人種，和無窮期的衝突紛爭。這些混雜而不能交融的分子，乍分乍合，終於不能統一，而今日

歐洲的諸民族，便各以其不同的氣質、特性和氣運，漸漸從此胎成了。這段紛爭雜亂的期間，自九世紀直迄十一世紀，是從舊局面轉到新局面的慘苦的過程，我們不能不將牠再注意一下。這其間所遺際的事蹟，一是羅馬帝國和查理曼王室之先後衰亡，一是封建制度未成立以前的一段無政府的狀態，一是教會當十一世紀以前所受的種種患難——凡此種種，都是從中古到近代漸漸進化的證據。

歷史上的事蹟對照起來看時，有的覺得很奇怪。當初查理曼對於薩克森人，曾利用武力強迫他們信從基督教；誰知祇是數年之後，這些被迫信基督教的薩克森人的子孫，輪到自己用武力做基督教的保護人了。

同時北方諸民族也漸漸顯露頭角；這些民族都是將來歐洲的大事業上要有份的。我們看匈牙利人、波蘭人、俄羅斯人、和斯干的那維亞人，在九、十、十一等世紀，已經參與歐洲的種種運動，這是中古史上極有趣味的一種現象。

英國當這段期間經過許多大變故：先是丹麥人和薩克森人起了一陣衝突，後來便是諾爾曼人（the Normans）侵入，把本地的居民掃滅的乾乾淨淨而為全島的霸王。這便是英國歷史的多事的開端。

彼時西班牙終於憑着武力從伊斯蘭（Islam）的子孫手裏把他們的獨立，他們的信仰，和他們的國土都贏了回來，同時在干戈擾攘之中在半島上建設起一個國家。

當這種「進化」正在對歐洲局面漸漸改觀的時候，思想方面便也不復像從前呆滯。藝術已漸露微弱的萌

芽，而精神生活也漸漸醒覺，不過仍受一種絕對的權力的牽制，甚至於還受牠支配；這種絕對的權力，便是當時支配一切智識和道德原則的神學了。那時人的思想差不多完全圍在宗教的學說裏，常被神學上一種一知半解的戒律所束縛，然而也不無活動的時刻，不過祇有一種原動力，便是「信仰」是了。然而思想的動機既開，自此便繼續不斷。在當時呢，一般人對於當初供人以無盡藏靈感的泉源的異教文學，差不多連影踪都不記得了。他們的思想，祇用以默索解釋，評論當時所流行的信仰，和從來人盲目的熱心宗教的先例；用以思索當時僧侶和一般諸侯的行動；思索來世的賞罰。如是，當時人的思想，滋養料少到極點，及至後來有一種自然的民間文學出現，始能應付思想的別種需要並壓足牠的別種希求。這種民間文學初出現的，並不具什麼有力的著作的形式，但至少具有一種啓迪陶化的性質。因其有這種性質，所以於當時支配人心的精神的權力，嘗分得其中的一部分。至於這種文學還未出現之先，教會和教王的威勢已經達到極度，牠們自以爲不復能動搖。基督教已從舊時文明的殘墟裏，重做起一番大規模的新事業，而這其間的中堅，便是祭師制度。

我們只看古代建築的殘墟裏露出一座神祕的羅馬式的建築，便可見當時的祭師制度，威權何等偉大，也可見當時祭師的教義怎樣的不容懷疑。我們不必讀他們的書，祇須看他們的禮拜堂上的石頭，便可見當時事事支配於祭師的痕跡。

總之，當時惟有宗教上的「信條」攬有無上的權力，不容比抗；當時人的良心，除這種信條外再不曉得有別

的制裁，也再不求別種的防範。在平安的日子呢，沒有戰禍，也不虞外族侵入蹂躪，基督教的信仰原可以如流水之暢行無阻，然而這是中古時代的信仰，時而殘暴，時而畏蕙，時而傲慢，時而卑鄙的。

我們且看當時那班被祭司制伏的人民是怎麼一種生活。其中一部分，隱居在深幽的寺院裏，終日只在由顏色紙窗透進的昏黯的光裏，冥思，默禱，煎熬，或甚至於昏憤，口中卻不離什麼神聖生活，什麼基督遵難；他們直是一種苦修行的僧侶生活，因抱着一種愛神的觀念，卻引起無窮的迷惑，無盡的挨磨。他們的心理常想飛揚高舉，卻又說不出高舉到什麼地方；他們的靈魂常被一種神祕的苦痛和快樂，或被一種抑鬱，煩惱，枯淡而不可慰解的悲情所迷亂。又因戒慾，所慮，妄念，做苦功夫，而常常心神緊張。他們終日關閉在自己的觀念所造成的牢不可破的牢獄裏，一心祇盼望着那個渺茫中的天國。他們看見人生的道途上滿佈着設餌的陷阱，看見犯罪的危險，墮落的機會，魔鬼的引誘，撒旦(Satan)和他的奸計都在那裏等着要毀滅他們。於是他們決計拉那些教外的俗人也來分嘗他們那些日間的危險和夜裏的驚惶。所以當時人勸人信教，是再熱心不過的。當時所謂引導靈魂的書籍，和一般為日常生活作指南的書籍，差不多什麼種類都有，配什麼人胃口的都有。此外一切純講教義的著作，法律的註解，列聖的傳記，舊聞的紀載，由異教哲學借用而蒙着基督教裝飾的格言集，一切寓言，一切所謂「金鑑」，一切闡發教義的著述——目的無非要拉人信教。無論在教的在俗的，大家都祇熱心於天上的報酬，而不管人間的享樂。物質方面，無論有生無生，祇看作人類靈魂和牠的美德或惡德的徵象。自然界一切外觀的表現，都被他們當作宗教

思想的題材。然而那些傳教的牧師，雖有這樣無窮竭的源泉可供思索，而論其實踐，卻未必都能高出他們所諄諄勸誨的凡庸。

第二節

當時這些無時或已的說教，雖足以供給人做公德和私德上的教訓，究竟不能絕對撲滅人類的好奇心，因為牠只能給人以教訓，不能給人以怡養性靈的資料。

於是乎國民詩最初的萌芽漸漸顯露了。一時歐洲各民族，大家都用出他們的幼稚的才心，來嘗試這種發表思想感情的新工具。至其發祥之地，則在「遊方詩人」(Trouvares, Troubadours; 前者屬北方，後者屬南方)所出產的國家。

方十字軍英雄正將歐洲局面弄得非常熱鬧的時候，歐洲文壇到處都受着靈感，而各國的文字也都立刻化成一種有生氣的符號，同時也便是騎士的驍勇精神和基督教徒的狂熱精神正勃發的時候。先是有許多的「俗曲」(Canzons)，此後便是一種粗朴的史詩出現了。當時的歌人，將這些史詩到處歌唱；我們如今對於那些歌人的名字已經無可稽考，但曉得那些史詩的格律很簡單，卻又有很整齊的聲韻。牠們的性質，大都描寫英雄事蹟，於當時封建的貴族制度底下一般生活和思想的狀態刻畫得非常忠實。法國「英雄史詩」(Chansons de geste)

的材質，最初出現於墨羅溫王朝 (Merovingians)，後經在查理曼，禿者查理士 (Charles the Bald)，和以後幾代王帝手裏繼續發達，至此已是牠的成熟時期。

我們從這些英雄史詩的第一系——那喀羅林系 (Carolingian cycle)——裏，可以看見牠表現的是一種壯烈的愛國心和一種好勇鬪狠的精神，所描寫的是軍隊的戰爭或單騎的決鬥，自然界的現象和超自然現象，卻絕對沒有滑稽和諷刺的意味。十一世紀末葉，出現一種叫羅蘭歌 (Song of Roland)，是許多英雄史詩的第一種。這是英雄史詩最古的例，同時也是最精製的例。這詩的中心人物是羅蘭，便像從前希臘時阿溪里 (Achilles) 一般的人物，相傳他是查理曼的姪子，但究竟有無其人，無從證實，因此他此後在歷史上佔據的地位不如他在野史上佔據的地位重要。凡是基督教的國家，文學上差不多無不有他的名字。我們對於真羅蘭的身世絕對無可考證，而他的名字卻能有如此的大魔力，真是一件不可思議的事。

如是，當一般學者，僧侶，教士正還用着他們那種陳舊的文體和乖謬的拉丁文發表他們的思想時，文學上已另有一種絕然異趣的體裁，擺脫了當時人所公認的文化中心，漸漸的在那裏建設。及十二世紀的前半，「英雄史」已成一種極普通的文體，在歐洲到處都風行。當時一般歌人，常常在堡砦的巨廳裏對着那些戰罷歸休的爵爺們，或對着稠人廣衆，彈起「羅塔」 (rotta，琴名) 或「吠阿」 (vioi，提琴)，唱着古時英雄威武的事蹟，或是羅蘭，或是奧方味 (Olivier)，或是愛墨利 (Aimeric)，或是納邦內 (Narbonne)，或是誇大的侯爵奧倫治的威廉

(William of Orange) 或是大皇帝 (即查理曼) 和他的武士。

這些史詩，雖則藝術上頗有缺點，風格上沒有個性，卻對當時的民衆能發生極大的影響。這些詩都充滿着一種騎士的精神；牠所描寫的人物，雖在我們看起來有時覺得舉動太蠻，不能完全和他們表同情，卻個個都寫得很活潑而真實的。牠能將民間的感情完全表達出來，別種文學裏絕對不能這樣；這都由於牠和牠當時的那種近乎野蠻的精神是完全協調的。

然而這些史詩絕少變化；最初史詩中所設的「境」，以後還是這個境，始終沒有改變。牠的人物的行動動機，只不過這幾樣，和古代希臘的史詩一般沒有變化。牠並沒有寫到森林中的生活，沒有寫到神秘的冒險事蹟，沒有寫到人和自然界親愛的關係，沒有寫到戀愛的雅事，也沒有寫到英雄因幻想的驅使而探險的事蹟。當圓案故事 (Tables of Round Table) 產生的時候，凡此種種，都是詩史所未嘗過問的。然而這些英雄史詩的效力卻可驚人；牠們雖則祇根據着一個種族（而且是一個小民族，和世界完全隔絕的）一個地方的傳說編成的故事，卻能傳布得非常迅速，而且祇頃刻功夫，已把全歐的詩歌改變了一個樣子。立時間，感情的表白上和對超自然的觀念上，都起了一種徹底的改革。

後來英雄史詩漸漸退化，便有種種描寫戀愛瑣事，宮闈競爭，以及種種奇情的冒險的史詩代之而興。於是史詩中的人物從查理士·馬泰 (Charles Martel)，丕平 (Pepin)，查理曼等人的粗獷的侶伴——例如嘉林

(Garin)，與倫治的威廉，與熱(Ogin)，羅蘭等——一變而為妖女生的神祕的先知麥林(Martin)，變為衰弱的湖上蘭西洛脫(Lancelot of the Lake)，變為不幸的透利斯探(Tristan)和淫慾的高芬(Gauvain)。原來史詩中那些烈性的女英雄如呂底亞(Lydia)，白浪希弗留(Blanchefleur)，基波克(Gaihouc)，奧拉白(Orable)等，在亞搭爾史詩系(Arthurian Cycle)裏，都不復存在，有的只是些溫柔的美人如易蘇爾特(Isolda)，基尼薇(Guinevere)，伊尼德(Enid)，和微薇安(Yvrien)等等了。就中透利斯探和易蘇爾特兩人物，尤足象徵當時的精神，如今他們已成為一種浪漫戀愛的模範了。這種新與文學，乃是一種奇異的混合物，由許多極端反對的元素構成的，內中有基督教的思想，也有東方的神祕思想，有日耳曼人的冒險事蹟，也有威爾斯人的傳說；至於國民詩的痕跡，則漸被淘汰，然而也經過數年功夫，這纔淘汰乾淨。從此便是亞搭爾史詩系佔勢力的時代了。這系的史詩傳布得極速，一時把歐洲人思想的態度完全改變；而喀羅林系於乎絕跡。亞搭爾系的題材只是「婦女」和「戀愛」，因而將古代史詩的系統完全推翻。牠把平常的陳腐的題目一律擯棄；古詩中所述的戰馬，刀劍，漢奸，薩拉森人等等，完全都撤在腦後。於是從前那種關於兩軍對壘和單騎角逐的長篇累牘的紀載遂一變而為變幻莫測的冒險故事。做詩的感興不似從前猛烈，詩中所描寫的人物也比從前切近人性。

因此而「戀愛的讚美」在文學上和社會上都取得一種重要的地位，而一般人的想像莫不受着牠的影響。於是法國南部的遊方詩人(Troubadours)遂專致力於抒情詩；人人情態沸熱，有如癡癡。一般婦女因他

們極力讚美自己，也都異常優待他們，他們於是自命王侯不易了。北部的遊方詩人（*trouvaire*）所歌詠的是騎士的比武，戀愛的歡娛，人生的快樂，和他們自己的戀人的美。

是時道德和宗教的觀念以及社會的風俗，都顯見得由粗獷而漸變淳馴。惟其後此風漸長，卒至成爲一種奇異的神祕主義。向來「女子」在社會上都被嚴禁在背後，不得出頭露面的，「男子」是絕對的君主，不容女子和他平等的。至此女子得着勢力了，也要說話了，也要做事了，牠的勢力到處都可以支配了。凡是有心要滋惡爲善的男子，至此莫不甘心屈從於女子的道德的勢力；莫不對她屈膝且學封建制度中臣對君以手合手的卑禮向她宣誓自己的忠誠。

從前女子向被看做一種劣等的人類，以爲是充滿着虛榮心和楊花水性的。當初那些粗獷的騎士嘗說，「罪惡最初到世界上來，是由「她」身上來的」又說，「人類所以受痛吃苦，也只由於「她」。當初騎士所以肯保護女子，只無非憑着對於弱者的憐憫心。如今卻大不相同了；女子差不多當做神聖了。尋常說禮拜聖母，其實是一切女子都包括在內的；她們的願望便是法律，她們的說話便是命令。當初喀羅林手下的諸侯，對於女子只見得因壓足肉感的情慾，以使人類絲延，至於比較高尚的戀愛方面，是他們所不懂的。如今亞塔爾史詩系裏的人物，人人都相信戀愛的觀念決沒有能說是過於純粹過於形而上的。他們這種戀愛觀念，便是克裏提茲（*Christian de Troyes*）所謂「微妙而神聖的東西」；意大利曾有這種觀念，普羅溫斯（*Provence*），英國和法蘭西北部也曾有

這種觀念。

因有這種從象徵中追求理想和崇拜物的習慣（例如女子是「神聖」的象徵，藝術遂要求一種高遠的目的，而藝術上對事物精微分析的趣味也因此養成。於是一般浪漫詩的作家的心裏，遂收入許多新鮮的情操，許多新鮮的智識習慣，都是向來未曾有過的，方在痿靡不振的詩，至此遂重新復活。

第三節

法蘭西以受這種新傾向的利益而勢力大增；因法蘭西的勢力增長，而其他各國也都間接受着利益。當時的法蘭西，實際已成爲歐洲的道德的標準。以牠的創作和詩的豐富而論，則有許多「英雄史詩」和其他英雄故事；論哲學，則有牠的煩瑣主義，最先起源於阿剌伯學派，後經愛爾蘭人斯科脫斯·伊烈基那（*Scottus Eriugena*）適用到基督教上來的；論建築，則有她的許多義德式（*Style*）的傑構；論政治，則有牠的地方自治的組織；在外，則有牠對於十字軍的熱心贊助。牠的歷史簡直就是西方人文的歷史。——這便是法蘭西當中古末葉所處的崇高地位。

第十一章

十三世紀之概觀——各國文學創始期之狀況大略一致——法英德與南歐諸民族文學藝術之同時發展——法國南北部之遊方詩人——盎格羅薩克遜之歌人——德國之戀歌詩人——民間詩歌演說宗教努力與封建羅曼威之支配

第一節

我們現在已說到十二世紀的初期了。彼時歐洲的大部分，都在一種「準備」的狀態，而各國的新興文學，也都從這種準備的狀態裏得着一種很顯著的共同的感興。

那時各國的國語都已漸有勢力並都已鞏固了。在盎格羅·薩克森民族呢，誠然還不曾擺脫諾爾曼人的羈軛。當英國被征服者威廉（William the Conqueror）的從人瓜分的時候，一切法令都用諾爾曼·法蘭西語（Norman French）。當時盎格羅·薩克森民族因那些伏匿在森林沼澤間的領袖的煽動，常常對諾爾曼政府起反動，常有爭自由的戰爭，也偶爾對他們的征服者佔得上風。同時一般隱居在寺院裏的教士和伏匿在鄉間田

舍棄的文人，也因捨不得自己的國粹，不時編些零碎的編年史和斷片的歌謠，使國語繼續存活。且當時一般有錢有勢的士著，對於本來的薩克森語雖然都已鄙棄，而一般平民卻仍舊用他們的薩克森語；他們對於諾爾曼的文化不肯屈服，正如當時對羅馬的文化不肯屈服一般。當時所謂「歌人」(Minstrel)，雖已跟着諾爾曼的征服者同時出現，而他們的作品卻祇無非法國北部遊方詩人的作品的反映和模倣。所以盎格羅·薩克森語的獨立文學，須等綽塞(Chaucer)出世纔有。至同時德國，則正當極燦爛的斯瓦比亞(Swabian)時代，中央高原德語(Middle High German)異常進步，足證當時文學的趨向，思想和文字，均在改變。意大利則正以多斯加納語(Tuscan)適用於純粹的文學作品。西班牙此時的文字仍極混雜，然已漸漸產生一種具有自然情致和高尚思想的文學，其他則丹麥的文籍亦以此時肇興。瑞典的文學則方在做作騎士的故事。斯拉夫民族(Slavs)則正沿用九世紀中息立爾(Cyril)和米索特斯(Methodus)所用的斯羅梵尼克(Slovanic)舊文體以做作拜占庭之宗教感興的文字，惜因蒙古人侵入，致使牠智識和社會發展的最初萌芽橫被摧折。

至於法國此時，正是牠的語言到處流行的時候；牠的聲名和權力，遠至敘利亞、亞美尼亞(Armenia)、居魯士(Cyrus)、君士坦丁堡、雅典、那不勒斯(Naples)、納瓦拉(Navarre)、匈牙利等處，無不廣被。我們有個極可靠的史家嘗說，當十三世紀時，我們從巴黎一直到耶路撒冷去，我們底脚步可以不必踏到法國的領土之外。

如是，各國的語言同時開始顯露牠們的永久的特色。聖經的翻譯和國家的公文書，始以近世語言寫作，因以

證明近世語的繼續進步。歷史也都用各國的國語。當初專供一般學者用的拉丁文編年史，原也有牠特別的一種風格，且具有一種古典拉丁文所未嘗有的優美，但至此卻改作一種為民衆而作的歷史了。法國最古的散文家諾弗理·微拉杜森 (Geoffroy de Villehardouin) 便是這種民衆史家的一個例；他的作品很有騎士小說的風調。

接着便出現了許多的「提要」(resumes) 和百科全書，可證中古時代的人已覺他們的各部分的學識有周密整理的必要。法國南部遊方詩人皮耳·考貝克 (Pierre de Corbeik) 作識庫 (The Treasury)，內容收羅各種學術的梗概。佛羅梭斯人布魯奈托·拉提泥 (Brunetto Latini) 取多密尼克派僧侶 (the Dominican) 波未之芬遜特 (Vincent of Beauvais) 的著作譯成北部法蘭西方言 (Langue d'oïl) 亦名為識庫。拉提泥是當時的演說家，詩人，政治家，歷史家，神學家，又是丹第的先生；芬遜特則向有「中古時代的普林尼」之稱。其他著名的人物，也多出其勞作的結果以各種體裁貢獻給世界。其一是大亞爾伯特 (Albert the Great)，曾介紹亞里斯多德的哲學和關於自然科學的著作給當時的歐洲，又其一是亞歷山大·奧爾茲 (Alexander Haes)，在學校時嘗有「不倒博士」的綽號；又其一是托馬斯·阿奎那 (Thomas Aquinas)，其論三段論法，論證法，和證辯術的諸著作，於亞里斯多德論辯學 (Dialectics) 裏所論的，大致悉具。此外，還有蘇薩 (Susa) 之亨利 (Henry)，奧汾涅 (Auvengne) 之威廉 (William) 和羅哲爾·培根 (Roger Bacon) 輩，也都有所貢獻於當時的思想界。

此時的法典也頗有人熱心研究，多所修正。同時教王之中，也頗有幾個很開明的，例如英諾森第三 (Innocent III)，格列高里第九 (Gregory IX)，和蓬尼非斯第八 (Boniface) 之流，驟然於政府的權利義務觀念，因亦將教律按當時社會的思想和需要完全修訂。他們自己編訂法律，自己執行，自己做裁判，開絕對法權的先例。此後各國用國語編訂的國法無不導源於此，而後世對於個人權利保障的觀念，也莫不以此為借鏡。故後世如德國腓特烈第二 (Frederick II) 手下所訂的德國第一部法律，即著名的所謂斯瓦比亞與薩克森 (Saxony) 之法律 (Mirrors)，如聖路易之法 (Etablissements)，如耶路撒冷公判例 (Assizes of Jerusalem) 之法文譯本，如皮耳·封騰 (Pierre de Fontaine) 或腓立·波曼諾阿 (Philippe de Beaumanoir) 所彙訂的法典等，考其引例，莫不留着古時羅馬教法典和封建時代的法典的證據。

同時和這些總知的學術或社會的學術並進的，還有實驗的科學，也已漸漸矯正從前的一般錯誤和種種近平迷信的見解。當時英國有羅哲爾·培根，憑着直覺將從前人以爲不可思議的境界開闢了不少，而從前人許多不能解決的問題也都得解決。曼皮列 (Montpelier) 和撒列諾 (Salerno) 兩人所辦的學校，向爲希臘和阿刺伯學術的承繼人，此時仍以醫學的實驗證證著名於世。最後因代數學，阿刺伯數字，及指南針之輸入，於人文的進步均有極大的補益。

因欲求高等智力的發展，而一般煩瑣學派遂異常努力，尤其對於神學。神學向不許人對於事物作分析的研

究，牠自己以為是絕對真理的保障，此時在知識範圍，仍操極大的權柄，便是當時的藝術和詩的作品，也都可以替神學權的性質作見證。當時的神學異常野心，牠要把人類活動的一切門類都包入牠所研究的範圍而受支配於牠所創的法律，因此牠對於無論什麼事情都不許牠逃脫自己的圈套。一二〇〇年左右，法國有許多教員和學生聚攏一處，所講論的完全受神學和論辯學的支配，這便是巴黎大學了。巴黎大學在彼時是歐洲其他一切大學的模範。當時屬修辭學範圍的，有講修辭法則的著作和演說詞，屬詩的範圍的有拉丁文的聖詩，史詩和奇情故事。詩的範圍裏又包括法國南北部遊方詩人的抒情作品，德國「戀歌詩人」(Minnesinger) 的作品，以及西班牙葡萄牙浪漫作家的作品。史學則有杜薇爾 (Dunville) 做牠的代表。然而這種史學上的光輝，也和其他一切學術的光輝一樣，一經「哲學」出來，便都減色了。哲學一出來，而書籍誌，地理學，數學，物理的科學，盡被收納在牠那壯麗能容的範圍裏了。

彼時有一個所謂「超絕世界和時代」的人物，便是托馬斯·阿奎那。他那駭博的思想，是凡欲研究神學的都須受着牠的影響。他可以代表寺院生活的精神，可以代表人心當未被神學主義阻遏之先必欲根究事物最終原因的趨勢。這位號稱「學界的安琪兒」的，對於當時世界所經過的事情和變化絕對不管，一心只注在純粹抽象的思想上，因以搆成他的哲學學說。他相信自己已將關於人類個性的原則建設在一個不拔的基礎上。後來他的弟子並且是形影相依的朋友，也緊緊步着他的後塵，這便是人人都稱他為波那溫圖拉 (Bonaventura) 的，

褒那溫圖拉意思是「天使的博士」，他的真名是佐凡尼·提·飛騰沙（Giovanni de Fidenza）。他的哲學，比托馬斯·阿奎那的哲學所含的教訓的意味較少；他在他所作的論言裏和聞發教義的教科書裏流露出一個被神聖的同情所感動的慈心。這師弟兩人之中，一個代表思想的光輝，一個代表性行的淳美。褒那溫圖拉的性靈全個沉浸在一種柔和的神祕主義裏；他凡事都歸之於神，因欲藉一種極端敬慕的行為勉力將自己的人格消納在神的「人格」裏。

因為當時的人，已經偶然瞥見一種希望，以為可以藉推理得着絕對的智識，並可以藉信仰以了解這種智識。然而托馬斯·阿奎那卻有一個大敵手，便是蘇格蘭人鄧司各脫斯（Duns Scotus）。他的思想，雄健跌宕，不亞於阿奎那，而又機警精細，絕無倫比。他在阿奎那這種純粹形而上的學說裏發見了牠的弱點。他自己的學說主張個人自由，為近代哲學重視意志的先聲。

第二節

至在較下級較穩當的社會裏，則詩仍舊保持牠的勢力。那時的詩，譬如閒靜的泉源，澄清的溪水，暢流而勢旺的瀑布，從無數地方天然流出。詩既有這樣豐富的來源，所以有許多體裁，向來人都當作只是古人用的，至此都復活了，例如頌歌，史詩，諷刺詩，輓詩，且甚至於戲劇，都有復活的趨勢。於是乎神啊，天啊，自然界啊，光榮啊，愛國啊，勇敢

啊——沒有一樣不被詩人取作題材，因為當時的詩人，雖還不會尋着一種形式來寄寓這些觀念，而這些觀念卻是他們久已反覆參透的。他們所表達的感情，有歡樂，有憂愁，有喜慶，有傷悼，有感興，有厭惡；而表達的態度異常坦率，異常渾朴而自然，故雖藝術上算是失敗，卻往往帶着一種極可愛的美趣，似乎具備天然物的特質一般。

在法國，南部的詩業已衰落，北部的詩吸收南部的餘芳，此時正發達得很是燦爛。

那時北部遊方詩人競作小品的歌曲，而以活潑明暢之風相尚。就中香賓（Champagne）的伯爵並納瓦拉王提披（Rihart）便是他們的模範。他的詩，聲調非常諧和；這種諧和的聲調，雖不能說是他所發明，他卻用得非常得法而純熟。宮闈的風波，平淡的志趣，任俠的行爲，都是他們的無盡藏的詩料。

方喀羅溫王朝（Carlovingian）和克勒特民族（Celtic）的騎士詩正以其千變萬化的態度風靡全歐的時候，別種體裁的歌曲也到處有之，大都發達已久，不假雕琢而有一種低迴反覆之詞句和流暢自然之節奏。法國有「鸚歌詩人」（Onglours），普羅溫斯有「遊方詩人」（Troubadours），英國有「歌人」，德國有「戀歌詩人」。戀歌詩人本以法國北部遊方詩人爲師法，卻常和他們競奪詩壇的錦標。

十三世紀末葉，英國歌人的詩出現。彼時那些諾爾曼的諸侯，已經算是英國人了；他們閉居無事，只想尋些消遣，聽些冒險的故事。他們對於騎士的掌故很是熟悉的，所以要人講些勇武的事蹟。於是一般樂人調起琴絃來應付他們的需要了。這些樂人的貨色，無非是法國故事的翻譯和仿作，大都反映法國人那種優秀、溫和、任俠的性格。

然而當時一般社會的生活，卻未必有這些優美的情趣。成羣結隊的盜匪，橫行全國，到處蹂躪。諸侯們也帶着兵騎奪手，到處殺傷勒索，無異盜匪。一般愛和平的樂人，卻使着慷慨激昂的聲調，對聖母和對自己的情人一般歌頌，間或對諸侯們說幾段寺院裏僧尼的生活，說他們怎樣平安不受騷擾，怎樣快活。此外，他們又歌頌「戀愛」和「婦人」。

德國當初有的，祇是關於野蠻戰爭的記載，至此乃有戀歌詩人的甜蜜歌曲。斯瓦比亞是這些戀歌詩人最初的出產地。他們的歌，都是從斯瓦比亞那些義德式的探樵的影子發出來的，所以有人說他們的歌是「鷹巢中的鴿子的嗟歎聲。」當時那些粗獷的諸侯，聽見這種歌曲，很是驚異，百聽不厭，頗想自己親嘗其中所發表的情致。這些歌曲所描寫的婦女，亦和亞塔爾史詩系所描寫的一樣；粗獷的公侯們聽見這些歌曲，突然感到婦女的一種美趣和情韻——這是他們向來不曾感着過的。於是他們心中很受着一種感動，他們的理想因而淳化；於是乎「戀愛」遂成爲這班鐵心腸的人的一種宗教的，豪俠的，至高的情操。當時如厄申巴哈·烏弗蘭 (Wolfram von Eschenbach) 斯特拉斯堡·高弗梨 (Godfrey of Strassburg) 奧胡·哈特曼 (Hartmann of Aue) 等，曾有許多關於任俠和德性的極美麗的詩歌，都於當時人思想和德性之淳化極有力量。不久而這戀愛觀念遂能左右人的心理。彼時一般騎士，因受這些詩歌的感興，覺得爲榮譽起見，對於美人不能不膜拜，或則用現成的詩歌讚美牠，若自己能詩，則須翻新花樣，特創新聲來讚美牠。於是乎當時的社會，幾乎是人人顛倒情場，不知有幾多徘徊的情書。

幾許嗚嗚的私語，至若情人離別，更不知掬幾許傷心之淚哩！

至於那班戀愛詩人自己，卻真個乖覺！他們滿口唏噓，離不了情愁悵恨，實底裏他們終日快樂，心中毫無牽掛；他們也未嘗無傷感之情，但足以引起他們的詩興便够了。他們的歌曲，如日之耀，如水之流，是沒有窮盡的；他們的娛樂便是詩；他們所以極愛讚美婦女，只是因為婦女能發不絕的感發他們，使他們做詩罷了。

這些戀歌詩人的詩，大都無多變化；因為他們的題目大家差不多都一樣，所以當初作者個人的名字完全亡失。而且論其間架，也差不多千篇一律。但又都有一種生趣和優美，即流傳至今，猶覺可愛。故波萊脫（Bosart）嘗說，他們這些詩裏，『花保存在着牠的芳香，泉水保存在着牠的清澈和牠的節奏，森林保存在着牠的神秘，女性的人物保存在着牠那種綽約若仙子般的優美。』一言以蔽之，這些詩中的柔和的美，是無論如何不會磨滅的。

第三節

當時到處地方，嗜愛純文學已成身分高貴的一種標誌。王公貴冑爭奪詩的桂冠，是當時一件再尋常不過的事情。在意卑里亞半島（Iberian Peninsula）上，最初為詩壇樹模範的便是國王亞拉岡之彼得（Peter of Aragon），是西班牙最早的詩人。學者亞璽斯（Alphonse the Scholar）是史家並哲學家，嘗創諧和的聲韻以頌聖母之德，又嘗用加里西亞（Galicja）文字，詠其父病得神靈治療事，詞意異常徘徊。當北方法德等國的詩人用

史詩激發民衆思想的時候，這位博學的王考（亞豐斯）正在塞維爾做他的 *Canções*（短歌）。在葡萄牙則鄧尼斯第一（*Denis I*）始以文字的音樂的優美示其人民。他便是葡萄牙文學的曙光。

意大利則正在做牠的準備事業，以等丹第和佩脫拉克的出世。彼時意大利的詩還在幼稚時代，力量比德法、西班牙等國的詩薄弱；但牠那史詩的河道一經開流，便滾滾而下，水勢異常暢旺。西西利（*Sicily*）是牠的搖籃，而阿極極之法蘭雪斯（*Francis of Assisi*）是牠的最初的代表之一。法蘭雪斯生平好浪遊，往往沿路對人歌唱，鎗魂的讚詩；他相信自己已經精神祕的戀愛而參與超自然的生活。在比薩及極亞那（*Genoa*），則藝術家正在用石頭為生動的雕刻，因使意大利的藝術開放無異自然之花——精緻，柔婉，而貞靜。在腓烈特二世（*Emperor Frederick II*），其諸子恩濟奧（*Enzio*），曼夫勒德（*Manfred*）兩王，及其大臣皮耳·梵宜斯（*Pierre des Vignes*）之周圍，則有大隊之詩人環繞。當時巴勒摩（*Palermo*）幾成歐洲之首都及商業之中心點，如是者歷有數年；後來霍亨斯陶萊王朝（*House of Hohenstaufen*）把西西利拉入帝國與教皇戰爭之漩渦，始漸衰落。此次戰爭對於意大利國家並無何等影響，但於後來歐洲民政權之解放不為無功。

此時歐洲諸國都已露出一種「文藝復興」的先兆，預備十六世紀大放光明，這大概由於外界的事勢，時代的狀況——實言之，便是環境——適宜的緣故。當時基督教既經過許多的艱險，似乎終於實現牠的政治的形式了；這是牠從蠻族侵入以來便已念念不忘的。因戰爭而各不相同的民族都被拉攏在一起，使他們得到不少的教

訓；及至如今的和平期間，各民族遂把他們從戰亂中得來的教訓結成菓子。此時那班受封爵的公侯們，除非和對頭戰鬪或參加十字軍去遠征，都在他們的堡壘裏過快活日子，狩獵宴會之餘，便叫些遊方詩人或歌人唱歌給他們聽。所以無論那一位爵爺的府第裏，只要機會來時，都可以變成一種詩的活動的小世界。

第四節

但我們若是假定十三世紀的末葉便是從前社會的黃金時代，那便又錯了。因為一方面，當時人並沒有脫卻封建制度底下所固有的暴戾習氣，另一方面則封建制度本身的基礎也已開始動搖。

彼時歐洲已為兩種權力所分配——教會和封建制度——其一以祭師制度和教王權為其礎石，又其一以騎士制度為其砥柱。這兩種權力會有一個機會彼此連絡，而這番連絡的結果便是「十字軍」這一篇大文章。十字軍初起時，教會和封建諸侯兩方面都憑着一片赤心辦事。二百年來，羅馬教皇對於這種義舉無不竭力維持，計其間歐洲以全力傾注東方者先後凡八次。然而他們的無厭的誅求，終於使朝野厭倦；而羅馬的威權非復不可抗拒了。於是意大利社會的革命未平，各教派內訌繼起，在在都足以證明教王權勢之衰落。而且當初那些供他們使役的諸侯爵主，雖則奮勇犧牲，而目前的報酬卻很微薄。他們為籌遣征的費用，甚至傾家蕩產，而且因久征在外，對於自己臣下的權力，也喪失殆盡。

當那些傳教士和騎士從聖地歸來的時候，都發本國的情形已經大變。會幾何時，而歐洲已經換了一個世界。語言不像從前了，人們的談論也都新鮮了；什麼個人的權利啊，什麼凡人生下地來便都有一種權利啊——種種向所未聞的論調都出來了。

因大學和都市制度興，而對於僧侶階級而言的所謂世俗或市民的思想遂亦隨起。從此社會上便有所謂教育家，有所謂詩人，而反抗專制的戰機亦動，初還祇是暗中運動，未幾便彰明昭著起來，力量亦漸覺雄厚了。於是乎無論道德上政治上，變動的徵候都很顯著。就學術而論，則前世紀的亞畢拉都（Abelard）和後來聖塔木之基雲（Thilianne de St. Arnou），已經將牠世俗化。大學裏的自由教育已給僧侶教育以一大打擊。藝術界的狀態也正和文學界的狀態一般。十二世紀以前，地方上的建築，道路，水井，向來都由僧侶辦的，至此工匠同行會終於將他們的特權奪了回來。當初國家的一切政務，教會莫不干涉，至此政教兩權分立，而一般輿論所主張的各管各事的辦法已得實現——即大學管教育，匠人管建築，國王和他的宰輔管治國。信仰雖然沒有完全消滅，然而一般中流社會的常識，已對宗教漸有不信任及批評的態度；他們覺得教會的壓制和封建的淫威一般的難受。我們只看當時人對於教會有一種普遍的諷刺的聲音，便可見他們的態度如何了。

而且從曼尼歧教（Manichean belief）引起反動之後，一般人對於宗教輕侮不信任的心理愈甚。同時階級的爭鬥也愈加激烈。教會中則宗派紛起，雖以正教之淫威也終於壓制不住。實言之，當時的信仰，已經冰冷了；當時

的教會，譬如水流已涸，雖以前數世紀深厚的根基，也不復能使牠暢旺了。於是遂有涸澤之再恩（Jean of Meung）和累涅德傳奇（Roman de Renart）之作者，對於教會，大逞其刻毒的文章，譏詛詬辱不遺餘力。

十四世紀的社會已無復從前淳厚誠摯之風，道德的標準日益低落，而褊狹的形式主義大昌，加以當時「教事裁判」（Inquisition）之隔無天日，「百年戰役」之道地干戈，於是思想人才終於絕滅。普羅溫斯文學自經十字軍攻亞爾比教派（Albigenses）事一蹶以來，至此將近百年，元氣未能恢復。我們回想牠流芳吐艷之日，萬不料轉眼榮華便歸銷歇，方其盛時，所謂 langue d'oc（南法方言），自威尼斯至佛亞（Foix），自波亞（Poitiers）及羅亞爾河（the Loire）沿岸直至卡斯提爾（Castile）的極邊，自發特（Vand）至馬賽（Marseille）及厄伊（Oix），無不普及。牠那種擊調歛然的文詞，無論英國、德國、波希米亞、匈牙利，到處都受影響。意大利和西班牙的詩——尤其是前者——都是由普羅溫斯的遊方詩人孕育出來的。如今此等成功，此等盛事，都已雲消雨散了。牠在土魯斯（Toulouse）圍攻（1213）的血泊裏已經絕命了；此後但留得一種極稀微的回音，直迄十四世紀，始終未能復活。

第十二章

新時代之雜處——十四世紀之嚴重狀態——各民族與各種思想之衝突——宗教改革之先驅——威克里夫——約翰·胡司——布拉格之哲羅姆——文學界經方針之運動為政治社會之事實所掩而黯然無光——東羅馬帝國之亡——結果使希臘文學由君士坦丁堡移至意大利——西班牙阿剌伯文明之傾覆——法國思想之比較前乾枯——文化之引相傳入意大利人之手——文藝復興之曙光

第一節

十四世紀是全歐洲發生劇變的時代，凡百罪惡，似乎一齊奔放，對於人類欲求一逞。法國僧侶刺烏爾·葛雷伯 (Raoul Grehor) 所記載的十一世紀初期的種種災禍，東方史家所敘述的巴錫耳第二 (Basel II) (即號稱「布加利亞人的屠殺者」) 時代的種種恐怖的事情，凶險的疫癘，以至一切莫可名狀的戰爭，一切無政府的狀態，一切顛沛流離的情景——拿來和十四世紀的恐怖相比，卻都不免要減色。

彼時全歐洲都著了火了。霍亨斯陶朝代的封建帝國和教皇政治，都因無窮期的戰鬪而精疲力竭。教派日有分裂的現象，致使人類的良心和信仰心都弄成癡癡。亞威農（Avignon）和羅馬兩地的教皇，無日不從事於不名譽的戰鬪，實則兩方面的人格都極不堪，同樣的卑鄙，貪婪，公行賄賂。這些教皇和僧教皇（Anti-pope）選了一個不對，推翻了更選，卻愈選愈不堪，而彼此之間不絕的相咀呪，相詆毀。各個王國都机陞不安，各個民族都呻吟於失望之下。意大利的內亂是常川有的；羅馬簡直巷戰了；熱那亞和威尼斯則彼此比賽報復的狠毒。那不勒斯和米蘭的黨爭，激烈到極度；西班牙的基督教徒還沒有把摩爾人逐盡，卻很想將他們痛快的殺戮一番。那時西班牙各邦無不在一種殘酷的狠毒底下過日子；卡斯提爾和亞拉岡正在較量誰的國王暴虐得利害；那時卡斯提爾的王是唐主彼得（Peter the Cruel），亞拉岡的王是多禮彼得（Peter the Cereimonious），而勞查理士（Charles the Bad）正為納瓦拉王，簡直和囚犯無異。法蘭德人和荷蘭人的地面也正血流遍野，而波希米亞和匈牙利兩處則斯拉夫人和忒科曼族（Turcomans）的戰鬪方酣。北方則俄羅斯人正和韃靼人與瑞典人死戰；南方則希臘人，蒙古人，土耳其人方在周旋；小亞細亞則巴查則特（Bajazet）之兵方如旋風捲地的侵入。他帶着烏雲似的土耳其部隊，所過之處，城郭為墟，地方糜爛。直下尼哥波里斯，殲滅羅馬教的聯軍，意在搗毀聖彼得的神器。彼時西方的基督教幾被殄滅。忽蒙古之征服者帖木兒（Tamurlaine）（嘗在巴格達的遺墟裏聚九萬骷髏成一尖塔）從亞洲大草原中發程趕至，一戰而殲巴查則特之衆。彼時歐洲人瞠目結舌，眼看兩人鬪，有如兩股水龍空中搏擊，

潑下一陣血雨，使歐洲遍地皆赤。

殺人臺，炮烙柱，和其他人類惡毒思想的標誌，以及天災的痕跡，到處都可以看見。試想歐洲處於這種時代，智識上還有什麼進步可說？

法國文明當這可怖的十四世紀開始時，確乎還不一點光明。那時牠的社會雖則墮落，雖也禍患頻仍，致都市和鄉野的居民都不堪其苦，而在一般高級的社會，卻還保存着一點皮相的文明。我們只看當時史家約翰·夫奧沙特(John Froissart)的遺著，於當時封建制度的繁華氣象，便得着一種印象。彼時瓦羅亞(Volois)的宮廷，依然還是繁華的中心點，慶宴比武之事，仍舊常常有的。但是一般國民，一般詩人和藝術家，方在世界歷史上最黑暗時代的苦痛之中，叫他們對於這些繁華的事情怎麼提得起與致？

且以美貌腓立(Philip le Bel)的粗暴，以瓦羅亞的輕薄，以一般貴族的無責任心，以中流社會的萎靡不振，以一般社會習氣的蠻橫，都是不利於藝術復活的。法國當十二十三兩世紀中，在藝術界和文學界都曾取得先進的地位，如今這種地位將要讓給別個民族了。斯特拉斯堡(Strasbourg)和科倫(Cologne)已成為法蘭克人所創的作風——即 opus francigenum——的傳習所。從此亞威農的畫家大家都承認他為世界畫家的領袖。在佛羅勒斯與羅馬，一般托鉢僧致富之後，遂竭力提倡藝術。意大利雖有許多黨派教派的紛爭，使牠常常處於一種痛苦的境地，而藝術卻很狂進。

第二節

丹第的神曲 (Divine Comedy) 便是此時出現的意大利是希臘和羅馬的哲嗣，但當牠對於古典的藝術和趣味還沒有表示愛好之先，牠曾有一段浪漫主義的時代，神曲便是這種浪漫時代的代表作品。意大利的國語文學，幸遇着三個天才的作者始得成立；其一丹第，他的著作是意大利國語文學的壯偉的先河；又其一佩脫拉克，他可謂法南遊方詩人作風的最後代表，也是最完成的代表，他使抒情詩復活，使抒情詩重得感興；又其一薄迦邱，他是小說家之最富古典氣息者，他開創散文中娟雅自在的作風，他那種婉啣，明麗，而柔曲的文筆，是無論何種體裁何種思想都適宜的。他三人的創作，都捨當時所通行的變體拉丁語不用，而能得古典範作之淳明處；他們於佩脫拉克和荷馬的文章都拳拳服膺。佩脫拉克，里恩濟 (Rienzi)，薄迦邱三人，對於古書的搜羅都很熱心；因有他三人的成功，而意大利人始使法德等國埋沒在所謂「牢獄」裏的古本得以重見天日。就中尤以佩脫拉克為最熱心；他每遇到珍貴的古本，往往親自抄錄，以遺贈友人，或叫他的弟子大家抄寫，廣為傳布。他對於這件事，恆用古人對於神的那種宗教的熱忱來做。我們讀他生平的行狀，可知他每每遇着一個寺院，心中輒怦怦跳動，希望在裏面可以發見些珍貴的遺稿，或有時他心中暗想：「我這久尋不獲的東西，許竟在這裏得着了！」這是何等的熱心啊！因此當時一般社會也莫不為這種浪漫的熱心所感發。同時希臘學者帕溪米里斯 (Pachymeres) 奈薩福刺斯

(Nicephorus) 伯蘭奴第斯 (Manuel) 坎塔邱濟那 (Cantacuzenus) 克立索羅刺 (Chrysolorus) 輩，因不堪本國的壓迫，避地來茲，帶來許多學術的萌芽，後來結花之日，便是下一世紀所謂文藝復興時代了。

同時歐洲其他民族，也都各自有進步，但比了意大利，卻都望塵莫及。

在英國則有緯塞，方為後起許多國民作家做光榮的先導；但他如孤標獨立，四方絕無響應。他那種暢快自在的作風，得一種真正的創作天才以資附麗，便愈覺詞華賸富，且他雖立意要吸收外國文學的精華，結果卻是一種新穎而獨創的作品。因緯塞這一提倡，英國文壇正預備步其後塵以一試其國民創作天才的程度。卻不料突然間內亂暴發，又因宗教改革的醞釀而舉國騷然，於是文壇這一點方露的萌芽，又復被邊塞而不得舒展。從此英國有所謂羅拉特黨 (Lollards) 運動，有瓦特·台勒耳 (Wat Tyler) 和約克·揆德 (Jack Cade) 等人之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的未成熟的嘗試，有約克 (York) 和蘭加斯德 (Lancaster) 兩王統的不解的紛爭，於是英國人沒有功夫採擷詩壇的花了。我們須得一直等到十六世紀的後半，纔可見得智識界真正有點復活的氣象。

西班牙文學史上極燦爛的時代不久就要到了，但此時還祇流露出一點影子。那時西班牙至少也有一個特出的人物了，這人便是「希脫」(Hita) 的高僧名喚朱安·盧以茲 (Juan Ruiz)，他是西班牙的拉布勒 (Labrador)。他所作的許多詩，首句都以「父」，「子」，「聖靈」等名字開始，各詩都彼此關聯銜接。內中雖有物語，成語，歌辭，對愛神的讚詞，對聖母的讚語，表示戀愛的文章，猥褻的紀述，以及種種瑣屑的描寫，而結穴處往往用幾句

詞人的說話。然在這種龐然雜陳的辭句裏，卻又流露出一種極奇異的極富幻想的天才，是西班牙所從來不會有的。

德國此時，也如波希米亞和匈牙利，正呻吟在內亂的煎熬之下。但牠卻很產出一批詩人；這些詩人風度之間，大都帶有一種諷刺的意味，在當時封建制度的淫威之下，很足以代表一般人不滿和怨恨的心理。這些詩人的調子正和當時鐵砧上的鎚聲相應答。

當時的韓斯·薩克斯 (Hans Sachs) 是戀歌詩人的最後一人；他是琴連堡 (Nuremberg) 一個貧苦而樂天的工人，後來哥德嘗認爲自己學詩的業師之一，至今德國人還沒有忘記他。

第三節

法國當十四十五兩世紀中，雖嘗有一次極大的危機，而道德上和社會上，卻不無進步。彼時羅馬對於智識上的解放，雖百般阻難，無所不用其極，而法國以注意論證方法之結果，從前的迷信頗已破除。當時有兩種學問最得勢力，一是醫學，一是國法學。一般相信凡智識都由神啓的神學家，初時對於這兩種學問都以仇敵看待；因爲法學想用科學的論證代替形而上學，而醫學則對於自然現象反對向所不敢非議的神祕的說明而信賴實地論證與實地經驗。中古時代宗教的大綜合主義到此一變而爲哲學的分析主義；自哲學的分析主義興，而宗教的綜合主

義遂絕。

這兩世紀中，法國以美貌腓立之朝而世俗化，以瓦羅亞之朝而世俗的智識復活，以亞田·馬賽 (Etienne Marcel) 之倡率而一種明達而愛國的中流社會興，以準阿克 (Jean of Arc) 的榜樣而愛國的理想產生，以查理斯第五即位而親政有爲的政府成立，而尤其重要的，是當時許多非常的發見，後來世界的面目因有此而煥然一新。

同時意大利，英、德等國於方在醞釀的種種神學上的爭執和宗教上的騷動中，產生了一種新觀念——即「平民觀念」(democratic idea)。因有這種平民觀念，所以十四世紀的一切文學——即是極小品的文學——中，都流露出「一種反抗的「報復精神」」。這種精神差不多到處可以看見；在法國則見於北部遊方詩人的諷刺詩；在德國則見於滑稽野史替爾·威勞斯皮革 (Tyll Ulenspiegel)；在英國則見於老百姓皮爾斯的夢境 (Visions of Piers the Ploughman)——又名勞丁彼得 (Peter the Laborer)——敘述彼得從窩爾塞斯德 (Worcester) 山上下瞰一般僧侶和貴族，畢見真相，並加以一種嚴酷的批評；在意大利則見於種種模倣法國著作的作品。而且當時的文學，並不僅攻擊僧侶和貴族而止，即對於宗教上最高的權力——教皇自己——也明目張膽的攻擊。

英國人威克里夫 (Wyclif) 出現於一三六七年頃，當愛德華第三之朝。威克里夫生時正是英國人對羅馬方

面及一般教士極表示不滿的時代；彼時羅拉特黨人已起；下議院已有將教會財產一律沒收的提議。故新教主義雖須待至一百五十年後纔爆發，而新教的精神此時實已瀰漫全國。威克里夫使是那時的反抗精神的代表；他的反抗精神雖是因教會腐敗激出來的，但他不僅攻擊他們的腐敗，並連他們的教義的本身也提出抗議。這位宗教改革的先驅者（威克里夫）毫無顧忌的對人宣說，聖餐時的麵包，並非真是基督的物質的軀體，祇是一種象徵；又說羅馬的教堂不得有支配其他一切教堂的權利，羅馬教堂的教士也不得有支配其他一切教士的權利；又說犯罪的教堂按法應該剝奪牠的一切人世間的所有物；又說一本聖經已足夠為各個基督教徒的指引。他這種反對「基督變質說」（Transubstantiation）和教皇有至高權力的論調，大半脫胎於都爾之貝倫加（Bartholomaeus of Tours）的學說；以當時社會的一般趨勢，加以彼時聖經已譯成俗語，所以他的學說流傳甚易。不多幾時，英國人便有許多從科班爵士（Lord Cobham）（他曾經為他自己的思想犧牲）為羅拉特黨人的；其餘的則多為威克里夫的信徒。於是教堂、國王，和一般貴族，遂大舉其壓制手段；往往改革事業方萌動便遭撲滅，然而旋撲旋起，而殉道者的血遂時時流注。但究其結果，則英國不待亨利第八即位，其壓服寺院威焰的能力便早已成熟，不待平民主義的學說輸入，而毫無忌憚的約翰·波爾（John Ball）便早已對人宣傳「凡人皆平等」的學說。

十五世紀初葉，我們可以看出見還有其他兩種改革運動，差不多是同時並起的——其一是教會的當軸自己在會議中提出來的；又其一含有激烈熱情的性質，是約翰·胡司（John Huss）和他的信徒惹出來的。胡司可以福

音和古代基督教的名義，對當時教會的當軸明目張膽的反抗，因而惹出一場極大的亂子。當他被傳至君士坦丁堡教事公斷會（Council of Constantine）的時候，他仗着西旗門帝（Emperor Sigismund）的護照，心中毫不畏怯；但他一到君士坦丁堡，便被逮捕，且被投入牢裏。

一四一五年六月五日，他帶着一身沉重的鎖鏈，帶到公斷會判事面前受審。公斷會便宣言，凡對異端所與的一切信約都是不妨破壞的。遂對這個勇敢的使徒宣布三十條罪狀。逼他跪着恭聽宣判，判他的身體和著作一併焚炬。他於是跟隨布拉格之哲羅姆死在炮烙柱上，絕命的時候還唱誦讚美詩不絕。波希米亞聞信，大動公憤，立與開罪之師，從此舉國騷然，約有二十餘載。

第四節

大凡政治上和社會上的大事件，對於一種根基未定的文學的進步上必有極大的影響，此理明甚，可無待論。一四五三年時便發生了一件大事；因這事延續很久，遂割出一個舊時代的終期和一個新時代的開始。東羅馬帝國因穆罕默德第二的襲擊而滅亡，我們方纔已經說過。穆罕默德第二便是巴查則特和阿穆拉第（Constantin）的後繼者；他自從即位以來，便無日不計畫攻奪君士坦丁堡。他在拉丁民族的心目中，並不算一個野蠻的征服者，也不是一個盲從的回教信徒。他是一個博學而開明的人物，能說五國的語言，精於數學和軍事學，極愛

藝術，並極優待藝術家。以宗教而論，他是一個懷疑派，無論回教和基督教，他一般都當做一種公開的欺誑。他對於他的政治上的目的，具有一種堅定不搖的決心，他的最大志願，就是要奪取拜占庭的帝位。

彼時東方和西方，因常常發生關係，業已不復隔膜。拜占庭的皇帝因抵禦土耳其人的侵略常常求助於羅馬。兩方正欲彼此妥協聯盟，以期消除向來因教派造成的隔閡，忽君士坦丁堡方面已有回教徒兵臨城下的消息。尼哥拉第五向西方各邦的王侯和百姓大聲求救也是枉然。因彼時西方各國自己方在互相讐仇，國方因而單薄，且大家都方求自己進步之暇，對於拜占庭方面的呼籲便都當作無聞了。

一四五三年五月二十九日，君士坦丁堡城攻下。其中最先殉難的一個，便是羅馬末帝君士坦丁·佩路羅加斯 (Constantine Palaeologus)。

大批的百姓都在聖索斐亞 (San Soga) 的公堂中避難。一般僧侶，婦人，兒童，和祭司，都眼巴巴盼望着一天使從天降下，手中拿着一把無敵的刀，來抵禦蠻族的侵入。誰知兇狠橫暴的土耳其人早已湧進城來，連公堂裏也鑽進來了。百姓們所盼望的天使終於不出現，無論男女都被他們擄去為奴。同日，「招降司」登聖索斐亞最高的塔頂，宣布回教徒勝利。於是君士坦丁堡與安提阿，耶路撒冷，亞歷山大里亞，迦太基等城陷於同一的運命，而東方的希臘思想也跟牠一起覆亡。

東羅馬帝國曾經保存着羅馬法律，古代著作，及希臘和拉丁的傑作。

當東羅馬覆亡前未幾，牠曾經產出一些希臘語的文學。這些文學，原不配和古希臘文學比擬，但也頗得古希臘文學的遺澤。東羅馬既入土耳其人之手，驟然回復野蠻的狀態，人民不堪困苦。當初托庇於東羅馬的學者如邁克爾·道卡斯（Michael Doucas），約翰·拉斯卡立（John Lasaris），安德洛奈卡（Andronikos），毛蘇洛斯（Mosuros）等，至此都往意大利避難，既以珍貴的稿本帶入，並以其學問傳授意大利人。他們從此遂成世界之師，並為希臘語的歷史開一新紀元。自是不久，而希臘的文化又從意大利傳遍全歐了。

第五節

西班牙的小說和冒險故事中，都保存着牠的政治的和宗教的理想；彼時「教事裁判」的威儀正高，而這些驕傲的皮拉斯齋人（Pelagians）的後裔，卻仍固執他們的理想。但論牠一般文化的程度，卻比意大利低得多。例如格拉那達（這是摩爾人最後的守地）覆亡這一件事，就西班牙的國家觀念論呢，原是一件可喜的事，但其直接的結果，徒使藝術和文學遺曠古未有的浩劫。

當一四九二年天主教國的諸王佔領格拉那達的時候，竟於一日之內將阿刺伯書籍一百五十萬卷焚燬盡淨，自來宗教上的復讎，沒有這般激烈的。相傳當初奧麥（Omar）之將安魯（Amru）曾有大燒亞歷山大里亞圖書館之事，此次格拉那達的浩劫，也就丕亞於他了。後來十六世紀時，也有這麼一回野蠻的舉動；便是墨西哥的第

一任大僧正，將阿茲忒克人（Aztecs）無數的手抄古本堆在市場上統統付之一炬，使古代美洲文明的無價的遺蹟頃刻都成灰燼。

當初西班牙頗曾受阿剌伯文化的灌溉，無論是詩，是建築，是學術，都會受牠的影響。如今經此一炬，阿剌伯的文化就算完全絕跡了。西班牙人以一種狂暴不能容忍的精神，目摩爾人為深仇，恨不得將他們立時滅絕，因便忘卻當初所受的利益了。從此凡是阿剌伯文字的遺書，莫不滅裂銷毀，代牠的只有些寺院中的乾燥無味的編年史，而西班牙人猶自以為這種變化是極有益處的。所以當查理士第五的後嗣把那些安分守己的農民（都是摩爾人）驅逐出境時，自己以為是肅清國土，殊不知他們的成績，落得個田疇荒蕪而已。

法國此時的文壇，比較從前頗覺沈寂。其能使先世的思想 and 先世的成績稍有復活氣象的，但見數人而已。當時詩壇差不多盡是一班乾燥無味的修辭學家，祇有米蘭之瓦楞泰因（Valentine of Milan）之子奧爾良之親王查理士（Prince Charles of Orleans）頗能承先代的遺緒，要是沒有他，我們簡直要當封建時代的詩已經絕了。他一半是意大利產，情致比法國人濃厚，作風頗似香賓之提波。他的詩，並不寄什麼深摯的情懷，也不寓什麼偉大的思想；他但用迴環詩和短歌行的形式，能使人感着一種意外的趣味；他似乎曉得一種祕訣，能將他的天才的無常的美化成一種不朽的形式。

又當同世紀的初葉，阿郎·沙退（Alain Chartier）因受當時種種不幸景況的感動，發而為千古不朽的詩

歌。他的傑作是一部四部曲 (Quadrilogium)，在當日國家多事之秋，頗能以一種高尚的愛國思想激發國人的良心；沙退的名字所以能傳不朽，就全靠此作。

但後來還出了一個微隆 (Villon)，便是中古文壇的掃場人物了。論文字的簡捷，思想的新穎，風裁的跌宕，他在在已關近世的作風。同時哲學的歷史家聯立·科民 (Philip Commines) 於其所表示的思想感情，亦頗見顯明的進化痕跡。科民是做批評的歷史之第一人；他對於歷史上的政治問題，恆以政治家的眼光和哲學家的思想去研究牠。他能兼佛羅斐斯派之冷峻的推理態度和從前編年史家之宗教的熱忱而有之。他的文章，無論其風格，其思想，其文字，在在可以證明中古作風的末路。

上述的三數人物，便算是當時冷落文壇的空谷足音。此外還有一個不能不提的，便是考究滑稽劇帕脫郎 (Matho Pathelin) 的不署名的作者。他是摩里爾的先驅。但除此數人外，法蘭西的藝術狀況，但見牠一天渾沌似一天，牠對於古代信仰，也日流於狂妄褻瀆的態度，而道德上的墮落也愈益明顯。

羅馬的時代確乎是告終了；另外一個更蕭瑟更黯淡的時代繼起了。因社會上的禍患頻仍，思想終於不振了。不多幾時，法蘭西曾是智識上的霸主，如今這種霸主的資格已喪失了。彼時惟有意大利，差不多單槍匹馬地，正在文學的一條光明無比的道上出發，後來歐洲各國也無不努力向這條道上追來。

第十三章

社會不安的現象到處有之——意大利藝術與文學之驚人的開展——古學之復活——歷史上兩大事實文學復興與宗教改革——兩者的連綿——兩者並行的進步——路德·伊拉斯莫斯與梅蘭克吞——宗教改革在文學上之反響的反映

第一節

就一般的情形而論，十五世紀並不能算是一個幸運的時代，也不能算是一個歷史上代表的時代。當時一般人的道德的標準，雖不足以阻礙社會的進步，卻也不能激發社會的良心。權謀奸詐，公然贊許。所以法國的路易十一和英國的理查第三都以「不信不實，乃政治家之真力」一語為座右箴言。在意大利則哲羅姆·薩服那洛拉 (Jerome Savonarola) 日擊波給塞 (the Borgias) 一族之邪德敗行層出無已。自來好現象與惡現象同時並陳，再沒有當時意大利那樣明顯；自來藝術能在騷亂的社會繁榮滋長而絕不受其影響，也再不能找出第二個例

子。彼時意大利已陷入一種無政府的狀態。各邦的王侯內訌不已，異族的侵略接踵而來，致使國力單薄窮蹙，不堪言狀。政治上的軒然大波已經危及國家的命脈。然而藝術上極完美的作品，卻仍繼續產出，創作天才的力量和自由，並不因而減少。於是意大利遂引起大家的注意，成爲歐洲一切國家研究的對象，並激起一般民族的野心。牠能歷足文明世界百般的需要；牠能供給工程師、船長、政治家、銀行家、雄辯學的教授、畫家、建築家、雕刻家。自來哥德式的藝術，以意大利所模倣的爲最真似，因爲羅馬藝術的傳統，在意大利是向來保存着的。後來藝術上文藝復興時代的作風由意大利傳入法國；在法國根基鞏固之後，復漸漸流傳到英國和德國。

除了意大利，還有一個國家在阿爾卑斯山脈之外，也顯出同樣藝術運動的跡象，——便是法蘭德斯（Flanders）。彼時法蘭德斯有許多興旺的小共和國，實際上彼此都獨立的。這許多小共和國，便是許多藝術派別的中心點；各派藝術於此各展其所長，各培育其創作的力量。

自從有這種古學復活，歐洲人便得着一種真正的感興。人類對於「美」已經喪失的精神，在意大利地面上首先恢復。向來人都以爲「美」是死的了，至此纔曉得她不過是睡覺。那一天是一四八五年四月十八，正是春光豔陽時節，有幾個倫巴（Lombard）工人在羅馬開掘阿匹安官道（Appian Way），偶然發見一個白色大理石的古墓。將棺蓋揭開，裏面似乎躺着一個精怪；因爲他們在裏面看見一個顏色如生的處女。他們於是將芳香的藥草和古時魔術的儀式試驗起來，直至那女子似乎蘇醒，並且重開她那久閉的眼睛。她的雙頰紅如玫瑰，她的唇邊含

着笑靨。這件可愛的異蹟很是感觸人心。一時大衆廢集，人人驚異。將那處女攜在大理石的牀上，恭恭敬敬地送入「大廟」(Capitol)，舉城咸集，凝視着她那種沉默如仙的美，目光久久不移，因遂惹起教堂方面的注意。教堂方面深恐這睡覺的偶像的神龕裏將興起一種邪惡的新崇拜。教皇因命人半夜裏將她偷走，私下掩埋。但是大家已經看見過她的容顏，即使埋葬也徒然了，因為詩人會說，「她含着古代的美，世界只經見過她一面，便又從新開花了。」一從這個復活的美人流露了她的潛伏的丰韻，世界上便又人人入迷了。

「自然」的真相，自被頹頹主義和寺院的禁慾主義遮沒以來，已不知幾多年數；至此，她又從沉沉的障幕後面出現了。和他同時再現的，第一件是愛好「發明」的心理，第二件是藝術和詩的熱心，因而使人對「美」和「力」的崇拜重又融合。「自然」又是藝術上完成理想作風的工具，這種理想的作風，與意大利古代異教的文明關係最密。起源於意大利，後來順次征服法國、英國，甚至德國，一路上隨地變化，以期適合諸民族不同的特徵。意大利在一段很長的期間，多少保存着古學的專利。

如意大利漸至飽吸了古典的精神，於其風俗，於其詩，於其實際的事務，無不表見。牠又把這種精神灌輸給其他民族，而以無量數的思想和模倣會貢獻給世界，直至近代猶受其賜。彼時積學之士如馬西利歐·費內納 (Marsilio Ficino)、蘭多拉·皮科 (Pico della Mirandola)、利奧那多·白魯諾 (Leonardo Bruno)、D'Arezzo、邦波尼阿·利托 (Pomponius Lato) 及大主教本波 (Cardinal Bembo) 等，莫不努力恢復希臘

羅馬的學術。學者如伐拉 (Valia)、披革 (Pogge)、及腓力弗斯 (Philippus) 等，亦都爲人文學科宜力，可惜此輩辯論流於過激，不無爲盛名之玷。此外還有許多從若士坦丁 堡避難來的希臘文人，如達拉布松之佐治 (George of Tribizoni)、迦薩 (Gaza)、阿基洛保羅 (Argyropoulos) 等，都是此輩有力的後盾。祇不過數年功夫，威尼斯 和佛羅稜斯 兩地，已成爲詩人和文法家聚會的中心點；愛琴海羣島 和亞諾貝勒哥 (Archipelago) 等處的文士無不應集於此。同時各邦的王侯對於此等事業也競相提倡，就中最可注意的且最熱心的一個，便是美地奇·羅稜索 (Lorenzo Medici)。他在政務叢挫之暇，恆肆力於學，或則口吟拉丁語與意大利語之詩句，或則與一般人文學者討論詩與哲學之理，盡其生性，對於人文一科若有夙嗜者。其他開明之主，復有諸維斯昆提氏 (the Visconti)、諸斯福黎氏 (the Sforza)、諸蒙黎加氏 (the Gonzaga)、大都可與當初羅馬帝米爾那斯並稱。此外，非拉臘 (Ferrara) 有赫邱利·伊斯特 (Heracles d'Este) 亦猶佛羅稜斯 之美地奇·羅倫索；米蘭 有摩爾 人路多維哥 (Ludovico the Moor)，其後羅馬 有朱理亞第一 (Julius II) 就中伊斯特 公國的宮廷尙浪漫主義，頗有中古的遺風，故於史詩提倡尤力。波雅多 (Boiardo) 便是此派史詩作家的代表，後來阿利渥斯妥 (Ariosto) 的史詩便是學他的。

第二節

自從一四三六年發明印刷機，種種事業都得力不少。因而十五世紀末葉，歐洲人對於一切學問的研究都非常熱心。及十六世紀中，利奧第十、阿利渥斯安、馬基雅弗利（Machiavelli）和其他許多人才出世時，學術上根基業已很穩固，所以遂得大放光明。彼時意大利的精神，無論從那一方面看去，都可覺其為一種開物成務的精神，而又具有一種卓絕不羣的性質，以如此的民族，處於如此的時代，原可以獲得一種無上的光榮，只可惜被一陣黑雲將牠的美麗和光明降蔽了不少，致使後世人不能徹見其真相，而且當時一般貴族之道德上的墮落和政治上的權謀術數，也都足以損及牠的光榮。彼時意大利政治上的無信義，居然已成為一種學說，即所謂「馬基雅弗利主義」（Machiavellianism）；意大利因採用這種主義，致使歐洲其他各國的良心敗壞——這真是牠對於文化的貢獻上的一個可痛心的污點。

十六世紀中有兩件大史實為其時代的軸心——文藝復興與宗教改革。這兩件史實，是當時一切活動的原動力，也即是當時的時代表現。彼時的一切事業，沒有一件可以離得開這兩件事，彼時的一切努力都以這兩件事為歸宿。這兩件事並非是同一原因的結果，也並非互為因果；然而其間關聯的鎖鑰卻很容易認得出。牠們會有許多的接觸點；但牠們無論是攜手並進或分頭進行，往往取合作的態度，而彼此所得的結果也往往類似。當古代文學將羅馬及雅典的語言、政治、哲學、信仰，輸入一個以天主教及封建制度為基礎的社會的時候，同時種種主張自由討論、自由研究的思想亦起。宗教改革並非完全由這種思想產生，這是可無疑義的；牠的淵源遠在文藝復興之

先牠的根基已經很久。同樣，文藝復興的淵源也並不在十五六兩世紀；十三世紀中費阿爾之約欽（Joachim of Fiore）的永久的福音（*Evangelium*）和十四世紀中丹第的神曲，都已是牠的預兆。我們上文已經說過，宗教改革的精神並不等路德出來講道激發人心然後有的。這種改革的觀念，從前遇着好幾個機會曾經有人宣傳。十二世紀曾經有過改革家——便是那些竭力奮鬥而終被教會的權力箝制更被政府的當軸壓伏的布里西亞·阿諾（*Arnold Brescia*）的神祕主義裏，也經潛伏宗教改革的萌芽，路德不過將牠們發揮光大而已。十四世紀的反抗精神也會引起許多人的熱情；在英國則為威克里夫，在波希米亞則為約翰·胡司和布拉格之哲羅姆。十五世紀初葉，約翰·穆斯卡（*John Hus*）嘗以先後八戰而勝帝國之軍隊；彼時宗教改革幾乎已是用武力做成功了。總之，中古時代的許多異端提倡者，早已戰勝炮烙柱上的火燄和種種酷刑而使天主教寒心了。不過直至十六世紀，而後宗教的統一始告終止。

第三節

據這樣看來，可見宗教改革決不待文藝復興時代而後有的，不過牠會從文藝復興得着許多間接而有力的幫助，且因文藝復興而宗教改革的目的推廣，進行容易而加速。從此人類的心理漸漸進入一種新景況，希臘羅馬的精神漸漸侵入科學的範圍，而古代的異教思想遂與信仰雜混而發生衝突，卒至信仰的基礎被牠們剝蝕殆盡。

歐洲當文藝復興期，正是西歐因宗教大分裂所受創傷漸漸復元的時候。教會的當局，外則受猛烈的攻擊，又因內訌而實力單薄，至此地位愈覺危險。教皇至此，也纔見得他究竟不過是個人類；他已不復能遏塞尋常人的良心；而一般大學和中學，居然對他自由評論。當時學校中如巴士亞大學（University of Padua），原本是主無神論的，摩德拿（Modena）和威尼斯等處的學校也向來是異端實言之，當時意大利已入於全國無宗教的狀態。

在蒲爾奇（Pulci）的著作裏，我們可以看出見一種譏諷的不信教態度和一種放肆的內感質樂。他有一部滑稽詩，每章都冠以一段祈禱書中的句語，以示輕薄。

一般不耐受羈勒的人的心理，都正在等着這種新潮流的關門開放，好把煩瑣主義的教訓和約束一齊掃蕩。當初基督教會叫人疏遠「自然」並反背「自然」；古學則勸人熱心賞識「自然」，因為古學會使人「愛生」的心理復活，這種心理當初在理論上曾被一種嚴酷的教義窒塞。古學又介紹進個人主義。中古時代曾經被套在一副牢不可破的模型底下，無論何人都不敢對他人立異，至此而人人好勝的原則大行了。因這種個人主義行，而後人人對於自己的意見，自己的行動，信仰，以及對於自己在著作裏表現的東西，纔有一種責任心。如是，人類對於古學，大家都盡力歡迎，當牠是一個久所期待的解放者。

那些在反叛的途途上做先進的人們，大都係為愛好研究的態度所引進。既有這些先進，大家便爭先景從，於是人人對於自由思想和自由懷疑，遂與從前對於服從和信仰取同樣態度。於是無論何種思想，無論牠在習慣上

傳統上的根基怎樣深固，只要牠於良心有所不安，便都免不了要受修正。

第四節

十六世紀初期，有兩個大人物的名字最令人注目，一是伊拉斯莫斯 (Erasmus)，一是路德 (Luther)，前者是宗教改革的先驅，後者是宗教改革的預言者。居這兩大人物之間的，便是梅蘭克吞 (Melancthon)，他是波希米亞新教運動的領袖。伊拉斯莫斯則以其精力和著述，影響及於全世界。

奧旦 (Audin) 說：「十六世紀有一個偉人，將羅馬的教王和各國的帝王都當自己的朝臣看待。他和亨利第三，法蘭西斯第一，查理士第五，以及薩克森尼的馬克西米連 (Maximilian) 信札來往。德國的各城市都搭起牌坊歡迎他；名人中如托馬斯·謨耳 (Thomas More)，本波 (Bembo)，薩多雷托 (Sodole)，梅蘭克吞，胡騰，烏爾立喜 (Ulrich von Hutten)，及米理亞第二 (Julius II) 等，都對他傾心。寄給他的信紙須寫：「致文學界的王，」德國的明星，」或「學術界的太陽，」便不虞投錯，因為祇有伊拉斯莫斯配有這些稱號。」他留給我們的作品，雖大部分是後人摭拾傳聞集成的，但他當初感化歐洲的事蹟，他和路德的種種辯論，以及他在文學，哲學，倫理學及教育上所首倡的種種學說，都已與當時一般的歷史有拆不開的關係。

他雖和新教抱同樣的宗旨，卻嘗受新教徒的迫害；又因他持哲學的容忍態度，而他的折衷學說在當時程度

又太高，故無論新派和舊派，都用一種懷疑的眼光看他。伊拉斯莫斯終於貝爾(Bale)，在他的朋友印刷家弗羅耶(Trohan)的家裏。他一生驚劇而多風險，雖欲獲得一時的寧息，終於沒有遂願。他嘗在愚讀(Phononium Moriae)裏讀美自由，安息，愚昧三德，足見其涉歷世故已經很是深切。

伊拉斯莫斯之後派有一人配做他的文學的承繼人——便是腓立·梅蘭克吞(Philip Melancthon)，他和伊拉斯莫斯因具有一種容忍和妥協的精神，對於古學也具有同樣的熱心；而且他還曉得用一種形式上的優美和修飾以潤澤他的淵博的學問。

他在人類一切種類的智識裏，恢復了真正辯證法的價值。當時一般研究古學的，大都但自眩於古學的燦爛而不知怎樣利用牠使世人善沾其益，梅蘭克吞卻能利用古學的一部份使適合兒童的心理——這尤其是他的榮譽。總之梅蘭克吞以其教師的資格所及於人的影響是極偉大的。

梅蘭克吞初與路德協力，嘗於一五三〇年為路德草與格斯堡教綱(Act of the Confession of Augsburg)，意在平息新教內部的爭執。他憑着自己的德性，憑着一種容忍的精神，力求在一般紛擾之中維持着一點協調，而使路德底下的各派大家歸於一宗。彼時德國各城市教派紛立，有薩文黎派(Zwinglians)，再洗禮派(Anabaptists)，卡爾斯塔派(Carlstadtians)，伊立連派(Mylersians)，及嚴格之路德派(Tutheans)等，大家都自命為代上帝宣傳聖道，而實底則無非爭操宗教上的霸權。梅蘭克吞目擊這般紛擾無已的狀態，異常痛心，竭力運動和平，

祇可惜功未成而身先死了。

路德是德國思想的最顯著的代表。當路德出世時，德國的智識異常薄弱而又無獨立精神；彼時可爲智識的表現的，只有少數爲十四十五世紀戀歌詩人做應聲的作品。封建時代的餘威，使當時一般人民無論物質上道德上都仍處於一種奴隸的地位。缺乏個性，缺乏獨立的主張，思想上籠統而無系統——這都是當時作品的特徵，加以頹頹學派的作風勢力極大，無論對於什麼題目，總都出之以一種沉悶滯板的作態；凡此種種特徵，在當時一般意在供給人心做資糧的拉丁文的著作裏都可發見。也有少數僅見的作家，努力借用國語以爲教育民衆及民衆自用的工具。然而他們的目的，也祇無非勸襲些神學的著作而嘵嘵於那些乾燥無味的道德問題的討論而已。他們這些作品，極鮮流露純粹的哲學思想，也祇在極少的地方可見是由真正的感情所激發；牠們的教訓意味太濃，所以弄得索然無味。

人類之不自由，再比不上當時的德國；思想之受拘束，也再比不上當時的德國。這種情形，無論在高級社會和下級社會都是一樣的。我們據夫賴塔格 (Freytag) 的德國寫真 (German Pictorial) 所描寫，可見當時除封建的淫威和教堂的專制外，還有另外一種束縛，以其智識的及宗教的性質，則影響及於私人的生活，以其政治的及社會的性質，則影響及於國民的生活。當時人都認反對習慣上的意見是一種極大的危險；有人對於傳統的學說要表示不滿，便須被大衆目爲異端。當時人的腦和心，一般都已弄成麻木，甚至并智識的需要也已不覺得了。

突然間，路德在這種被箝制的沉默裏，宣布人類最高尚的特權——即個人的獨立權。他的動機雖祇在貫徹自己的宗教思想，卻無意中使全歐洲各種思想都鼓舞起來。

這種舉動，不特是對於羅馬方面的反抗，並且是對於全世界的挑戰。當初教皇利用民衆懷疑的心理，對人宣言，以當初耶穌基督的無量功德加以列聖的餘功，已有替靈魂贖罪的方法，無論死者生者，靈魂凡百罪惡，都得贖釋。又說此種贖罪恩典，雖經交付聖彼得及其繼承人代為布施，卻也可以移轉——即用金錢贖買。彼時馬丁·路德（Martin Luther）以一奧古斯丁派（Augustine Order）的僧侶，激於這種金錢贖罪的交易，首先將多密尼克派僧人忒策爾（Tetzl）的罪狀，盡情暴露。忒策爾是當時教事裁判所的判事，教皇派遣的公使，又是馬因斯（Mayence）僧正亞爾伯特（Albert）的代表；他是教皇特派到德國專管這種贖罪交易的。其次，路德進而排斥贖罪的原則，否認赦罪的權力，甚至并滌罪所的存在也加以否認。他又對於做功德，張聲讖悔，及懺悔贖罪等事的效力亦發生疑問。最後，他對於個人審判的權利也公然提出抗議。這些便是宗教改革的基本原則，也便是給人類思想自由以極大衝動的觀念。

當時德國城市各族斯勒本（Eisleben），埃塞那哈（Eisenach），耶爾福（Erfurt）及瓦姆斯（Worms）等，都是與德路忙碌的生平和他的勇敢的事業有密切關係的。他一方面對一般宗教不可非議性的衛護者如斯格泰脫（Scoler），卡澤坦（Cajetan），斯陶匹茲（Staupitz），汶塞斯羅斯（Wenceslas），林克（Link），密爾替茲

(Mihina)等猛烈奮鬥，一方面又與許多反對派——他自己營中的叛兵——如馬克·斯塔伯那 (Mark Starbner)、斯篤爾克 (Storck)、漢策 (Hanzak)、喀爾斯大得 (Karlsradt)及薩文黎 (Zwingle)屢次的抗爭。他甚至受着自己內心衝突的苦痛——不安的良心的反叛和懷疑的淆惑，魔鬼的障礙和迷信的恐怖。但他雖有這種種的魔障，卻終能完成他的工作。他終於目擊基督教社會的分裂，這種分裂，是在政治上宗教上永遠留着結果的。自從這位奧古斯丁的僧侶將利奧第十的諭旨，在威丁堡 (Wittenberg)的市場焚燬，全歐洲便成爲舊教和新教的兩大分野，而他本人便對羅馬公然脫離了。

後世有許多史家，曾將宗教改革的成績和牠對於後世歷史及思想的影響寫得有聲有色。因爲新教的發軔，不但惹起思想上非常的醞釀，並使德國向被法律壓制的偏僻社會亦鼓舞奮起。從此文學、藝術、科學，凡曾受改革家的影響的，便都具有一種合理的精神；至於那些始終未蒙宗教改革影響的國家，則文藝復興運動勝利，而文藝復興的結果也終於使牠回復到異教的狀態。

第十四章

激烈之黨爭與教義衝突——日內瓦之喀爾文——約翰·諾克斯與蘇格蘭之長老會——社會的及宗教的復故運動——
 馬格內斯阿·羅羅拉——德林特會黨——歐洲及歐洲以外諸民族難因陷於叢生之下而精神的活動異常顯著——兩個
 異域文明毀滅之一瞥秘魯與墨西哥——四方多難不足以阻文學之進步詩索與阿利德斯托時代之意大利其例莎士比
 亞時代之英國其例塞凡提時代之西班牙其例三喀摩英時代之蒲滿牙其例四土耳其則正當文學之黃金時代——注聞
 西文學復盛

第一節

前章所述之兩種運動——宗教改革和文藝復興——自然而然地使全世界的眼光同時都注到德國和意
 大利。當時一般富有冒險精神的人士，及一般熱心於發見事業。如當初哥倫布，比撒羅（Pizarro），佛斯哥特，伽馬
 （Vasco da Gama）及西班牙與葡萄牙其他勇敢的冒險家的，大家都駕起神聖的舟帆，前往征服新世界。其他則
 炫於自由思想的境界廣漠無邊，追隨改革家之後塵而從事於進取的，吹求的，嚴峻的事業。

此時全歐洲的文學上和宗教上，都顯然有個「古」和「今」的區界。而且宗教改革既與思想言論以一種

自由，遂使當時人對於物質的事業也發生同樣的研究興味。於是人類活動的各部分中，莫不含有一種研究的精神，而平民主義的思想也遂滲入一般人的心理。

然而這種向自由的路上，步步都遇着困難。歷史上不乏兩種反對現象並存的時期，十六世紀便是一個例，因為十六世紀一方面可以代表近世向上的精神及其勝利，他方面則又代表一個極專制極重權力集中的時代。

就德國而論，彼時正當農民戰爭（Peasants' War）之後，回復了一種橫暴的壓迫的封建制度。牠自從壓平了再受洗派的運動，物質上的權力大增，而使農奴的負擔與困苦加重。

宗教改革運動起時，一般有高尙思想的人士對牠顯示好意，貴族中人對牠也有真正的同情，且有好幾個政府對牠公然表示贊助，牠似乎已經不可抗拒，卻不知仍有極強的阻力。凡是有利害關係的地方，往往訴之於武力。彼時舊教更沒有其他重要的目的，祇在彌補當初的大錯，所謂大錯，是怪當初不該贊助一般人的新研究；這種新研究的起點便是古學，但牠如今已經成爲現在與將來的熱烈問題，所以舊教雖欲挽回也已經遲了。宗教上和社會上的復故運動，其爲「故舊」衛護的熱心並不減於新派進攻的熱心。舊教的心理深恐故舊的不能常保。基督教似乎立刻便要破裂的粉碎。德國，瑞典，挪威，尼德蘭，英國，或由貪心，或由自信心，或由於賄賂，先後都脫離了羅馬。此時日內瓦（Geneva）已成爲喀爾文（Calvin）的神學的領域；喀爾文對於這個領域管理得異常嚴厲。蘇格蘭以有一種剛愎的辯性，故爲宗教改革最利的地方，彼時約翰·諾克斯（John Knox）就舊教的遺墟中創「長

老會教」(Theatylorian System)，取平民的代表的制度，與喀爾文在日内瓦建設者性質相同。諾克斯是喀爾文最熱心的最富理性的弟子，曾組織著名的蘇格蘭教堂，即所謂 Kirk 的便是，這可以說是自由國家的自由教堂。

教皇看着附己者逐漸離散，遂爲自行防備起見把所有的勢力集中起來。又因想開闢勢力的新策源地，乃訴之於一般盲從自己的國家。

西班牙有「祭師的王國及神聖的民族」之稱，是當時幫助教皇最出力的；牠自從宗教改革運動起時，便取力衛正教的態度，意在杜絕這種運動的蔓延。

許多世紀以來，西班牙的思想完全受祭師權力的支配。一般僧侶都靠着教堂纔得應付他們的物質的需要。他們要報答此恩，祇有一種義務，便是勉力將宗教維護着。彼時凡作家，詩人，戲劇家，大都是教會中人。他們大家施展才情以提倡他們的 Autos (宗教劇)，傳布教義，記述列聖和殉教者的事蹟。此外各邦王侯也都秉自己信教的虔誠做百姓的倡率。如是，教堂，貴族，著作家，大家合力着替自己釘上一副鎖鏈。西班牙會有一個最偉大的皇帝，查理十第五，既享盡世俗的榮華，乃退居聖求斯脫 (St. Just) 修道院的的僧舍裏。他在此，甘受極嚴厲的訓練，甘願低首下心受長老的斥責，以爲必如此方可得着較高尚的光榮。後來又有個腓立第二，修行比僧侶還苦，并且還逼着宮中人也跟着自己脩這樣的苦行。他常常一面拿着素珠念着，一面對劊子手發命令。後來他命人把自己活

葬在厄斯邱利爾宮 (the Escorial) 的土窖裏——其實這個宮，與其說是宮，還不如說是墳墓。

據這樣看來，可見西班牙是最宜於替羅馬教堂及正教堂做護法的。牠對於這事也確乎很專心一意的幹，無異一種愛國的舉動。未幾，極有力量的所謂耶穌教派 (the Jesuits) 便從西班牙產出。此派的創始人名叫英尼哥特羅耀拉伊奧奈茲 (Inigo de Loyola y Oñez)，是個很精細的辯論家，很高尚的幻想家，聖母的神秘的騎士。他欲維持教堂絕對的權力，嘗有一句誓言，曰『戰至死。』

能像這位替教王護法的軍人那樣激發出這許多頌揚的及激烈的論著的人，歷史上是少有的。他具有一種強烈的熱忱，一種固執而有理路的心力，一種不可動搖的堅忍心，一種活潑而傾向於超自然的想像力，加以一種真正的虛心，使他對人能發生一種驚人的勢力。耶穌會的驚人的組織，是他首先計畫出來的。牠能以一個團體——雖到處都有支會，然都秉承一個頭領的意旨——的力量，左右全世界人的心理，無論精神方面物質方面同時都受他的支配，且社會上的光明牠竟可以任意與奪。此會在教育上及文化上都有影響，一方面又是一種危險的勢力，因牠能用一種祕密的方法在社會不絕煽動，使牠反叛向來承認的道德思想及世俗思想因而惹起政治上的擾亂。羅耀拉替這會製成一種著名的憲法，後來來內茲 (Lainez) 和阿圭維佛 (Aquaviva) 承他的本意修訂成爲完本。他的身後之名，也有厭惡的，也有崇拜的。但當他未死之先，他已經料及他這手創的會，將來必能發達，同時也必須受許多的攻擊，起許多的衝突，且有時須受異派的迫害，但他又料及牠愈經磨折基礎必愈鞏固。他

死後留下專門學校一百所，根基都很厚且都很發達，牠們的影響所及，約自巴西(Brazil)的森林直達波蘭的邊界。

第二節

基督教會及教皇政治歷史上的這段時期，可說是牠的一個極大危機，其情形頗像四世紀時的阿利教派，其關係之大，也不減於當時。彼時與教堂有密切關係的有三件重要的事情：其一即耶穌會之創立；其二為羅馬教專法庭之恢復，因致西班牙與意大利三新教徒不能立足；其三為德林特會議(Council of Trent)之召集。

這個著名的會議，經過數次召集，數次停會。會中重要的現象，一是當時許多最著名的人物和最重要的人物如查理士第五、保羅第三(Paul III)、麥第奇之喀德隣(Catherine of Medici)、腓立第二等之彼此衝突，一為新教代表與舊教代表會面，此會的本意，原在調解兩派的意見而期望和平，因為這是朝野都願意的。豈知結果反致舊教的教義愈加嚴謹，束縛愈加繁多，甚至還要求將教王的絕對權力加強，對於此，法德兩國的代表都提出抗議。我們據可靠的史家說，彼時會議中的意見，甚至主張把個人的自由完全犧牲於一種中央的權力之下。這便是所謂著名的德林特會議，因此會議的結果而文學上及宗教上政治上又都開一新紀元。拉丁的勢力成爲至高無上，從此文學受一種變化過的亞里斯多德主義的支配。所謂古典時代的精神和性質，此時已漸漸活動，當時雖以

旗幟未明致受詩人和思想家的攻擊，到後來卻終於全世界都採用。

第三節

大凡一種理想的實現，決不是驟然見得到的；必須經過不絕的騷亂衝突，然後，能取得一種確定的形式。十六世紀，就牠社會和政治的方面看起來，可算是歷史上極不幸運的時代。雖則外觀上頗似優美，思想上很可自由，卻都不過是遠處的海市蜃樓，幻化着黃金時代的模樣，實底裏罪惡繁賚卻是不一而足，因遂弄成了遍地瘡痍。人民與君主，黨派和教派，大家都無窮期的衝突齟齬。改革家和正教中的反改革派，大家都抱著一種破壞主義。雖則在一般文藝復興的氣象當中，卻令人有時自覺彷彿身處於極黑暗的破壞時代，舊教的教士從講壇上大聲宣布那些新近掘發的古代雕像傑作爲褻瀆神聖，並以當時政府當軸不將這些東西立刻銷燬爲信道不堅，因而異常震怒。在改革派方面呢，則態度之激烈尤甚於此；坦利克 (Zwikel) 的薩文黎 (Zwintli) 和他的黨羽，甚至搗毀脩道院中的顏色玻璃窗，打碎禮拜堂中的聖像，將金碧輝煌的祈禱書拋在火裏。當喀爾斯大得走進威丁堡凡聖禮拜堂 (All Saints' Church) 的時候，他口中高唱着申命記 (Deuteronomy) 中的詩句：『你不得把自己造成偶像。』於是那一座哥德式的建築就毀在一個野蠻的羣衆的手裏了。一般基督教的熱心門徒，藉口要爲基督教廓清異教的思想而大逞其搗毀的手段，論其殘暴凶惡，比之汪達爾人和土耳其其半日形旗下的信徒，有過之無不及。同時

戰爭的恐怖空氣又到處瀰漫。意大利諸共和國和匪兵，橫暴不減於莫斯科，兇狠的暴主軍隊所過，到處爲墟。其間各州，往往頃刻之間無緣無故的全境化爲白地。彼時信步所之，但有傾圮的墟城和血流的赤野。信目所視無非侵掠淫兇的痕跡而已。

而且這種情景，不但歐洲有之，便是新發現的美洲也已如此；因爲彼時美洲已經是大這一般征服者的蹂躪了。

第四節

彼時離開歐洲很遠的地方，有兩個極方的異教文明國正享着牠們的和平幸福——一個是墨西哥 (Mexico)，一個是祕魯 (Peru)。不幸斐喃得司·科德司 (Fernandez Cortez) 和比撒羅 (Pizarro) 的船隻先後開到了。因他們這一來，這兩個正在發達的國家，便如野火燎原，頃刻間已無完土。那時墨西哥和祕魯，彼此還未曾相識。對於這些新來之客，也都並不知他們的來歷，卻同時都罹大劫。墨西哥的居民是那腓種人 (The Nahuatlans)，或猶噉旦 (Yucatan) 的麻耶種人 (The Maya)，皆從祖宗手裏承襲極大的遺產和純粹的道德。他們的歷來的君主，大都具有文才，且對於藝術頗肯保護。其城市多殷實，有甚多燦爛的紀念碑坊，與鄉野的富饒相輝映。當科德司初見阿茲忒克人 (Aztecs) 的首都——卽名城騰諾亦提特蘭 (Tenochtitlan)——時，他將牠比作威尼斯，因爲那

裏有許多美麗的內河蜿蜒交錯，構成城內的街道，很像威尼斯的景況。各城都有很美麗的建築和壯麗的古蹟，又有許多刻文，載着古代民間的史詩；此外還有許多珍貴的圖書館和象形文字的重要著作。

祕魯彼時正在印加王族（Inca）治下，智識和社會發達的程度都已極高。他們的王宮在克斯科（Cuzco），詭牠的建築，要算藝術上一件驚人的作品。他們的建築家，技藝都很高，曾造出許多美麗的城市，絕妙的碑坊，和種種巨石砌成的建築物。彼時歐洲最自傲的民族——英國人——簡直還不曉得建築道路，祕魯卻已全國大道錯縱，交通異常便利。

兩地的文明正在這種程度的時候，西班牙人到了。他們看見這種美麗的世界，不由得饞吻大張，要想大肆其劫掠屠戮。他們假借一個慈悲和平的神的福音的名義，繼續屠殺劫掠了無數日子。卒至城市裏血流成河，人煙斷絕，祇不過數年功夫，墨西哥和祕魯兩個淵源遼遠有如巴比倫，尼尼微的文明，便被毀滅了。在全世界的心目中，西班牙人這種罪孽是萬無可贖的。

西班牙人在墨西哥和祕魯這種曠古未聞的暴舉，簡直是盜匪行爲，而他們卻誇大其詞，自命爲 Conquistadores（征服者）。在歐洲本地，則此種慘劇尤屢演不一演。

第五節

教事裁判已經像熱血一般的復活了，他的密使便是跟科德司和塔披亞（Tapia）的匪徒同赴墨西哥的那些可怕的僧侶。他們在墨西哥古代文明的遺蹟裏發見一種駭人的宗教，神名毀齊洛卜基脫利（Itziliopochtli），祭師獻神以「人」做犧牲。教事法庭的目的便在和這種神爭威。因此，牠便肆行虐殺，到處受其禍害。在意大利則爲汎神論者斯賓挪莎（Spinoza）之先驅的佑達諾白魯諾（Giordano Bruno）曾葬身於火籠。西班牙亦到處都受教事裁判的淫威。一般爲託爾克馬達（Torquemada）做繼人的，便都是教事裁判的護法，當初託爾克馬達嘗於一四八四年頒行教書（Injunctions），以爲教事裁判案的指南，如今他的一班後繼者便是替教書執行的人。他們對於職務真是熱心得很，居然能使摩爾人漸漸稀疎，異端終於絕跡。但是猶太人卻還未盡，他們還堅韌地存活着，供教事裁判的火焰做燃料，於是牠的聖火遂得常明不滅。

我們看十六世紀宗教戰爭和政治戰爭的紀載，可謂已極人間殘忍的能事，而且歐洲沒有一國得以倖免。德國彼時禍患頻仍，卻還祇是一種開端，及至十七世紀越發來得兇了。其他如英國，彼時文學上雖還可觀，而道德的進步趨緩，法律的嚴厲也極可怕，而且到處地方都見弱者受強者壓迫。

便是意大利，雖嘗威發歐洲的一切民族此時也已成爲兇殘野蠻的戰鬥之場。到處地方可以聽見刀兵相擊和嗚嗚叱咤的聲音，然而這些悲劇，卻有許多絢爛的藝術做牠們的背景。因爲有一種較高的權力已經預爲安排，叫這些悲劇的進行中間須得略爲阻隔。

縱使全地球都在撼搖，而思想的勃發卻依然不可阻遏，羅馬城的被攻，並不足以妨礙米開蘭基羅 (Michelangelo) 的工作。詩爾甫族 (Cruephs) 和基柏林族 (Ghibellines) 的不絕的紛爭，教王，諸侯，各國帝王間的戰亂和內訌，都不能妨礙藝術家產出他們的傑作。所以十六世紀雖是一個極亂的時代，卻很出許多偉大的人材：那洛提 (Ruanrovi) 與阿利提斯安，塞凡提與莎士比亞，路德與拉斐爾 (Raphael)，烏爾立喜·胡騰與伊拉斯莫斯，喀爾文與聖德利撒，馬基愛維利與勞批他 (Troschian)，蒙旦 (Montaigne) 與易格內細阿·羅耀拉，卡丹諾 (Cardano) 與哥白泥。這許多對數的人物，大家彼此都不相識，且除他們的著作屬同一時代的產物一點外，大家彼此再也沒有別的關係，然而他們大家同時使各部分的智識都別開生面，這是一種何等奇異的際會。

第六節

我們初看英國當莎士比亞時代的政治和道德的狀況，似乎是不應該有那種文化的現象的。那時牠的人口總計不滿五百萬，且因一般貴族的橫暴，教士的墮落，下流社會的怠惰，致一般國民顯有一種沉滯無振作的狀態。一方面，寺院中和一般貪饑的諸侯的堡壘中，都有壯麗的園林和碧綠的草地；他方面則鄉下小民的小屋攢聚，不堪窮陋。國中大部分都是濕地和荒地。無所謂工商業，飢饉之來，更沒有預防的方法。無論城市和鄉野的居民，若不是受疫癘之災，便須吃橫征暴斂之苦。而且無論高級和低級社會，一般的不知學問爲何物；貴族中大多數不懂得

顯書寫字。

然而英國文學的黃金時代卻也正是此時開始的，從外國輸入的藝術，因一部分人才的栽培，不久便使英國的教育程度提高，不復落他人之後。彼時由外國輸入的文學，所以洵化英國人那粗獷的習俗的，不僅是遊方詩人的騎士小說，便是法國的書籍也已漸漸輸入，且因其文字很普及，所以風行得很快。其次是意大利的作品，也漸漸輸入，漸有人模倣，不過最初祇有法文的譯本。中古時代，英國祇有神祕劇和道德劇以適應觀眾的粗劣的心理，此時以西班牙文學輸入，戲劇上大受影響，漸漸脫離中古的作風，而產生新體的戲劇，且因文藝復興運動的影響而好學的人士漸多。在中下社會，雖依然還不知藝術和學問的價值，然當時宮廷之中則智識的活動已經很是熱鬧。

彼時英國的文學，正當依利薩伯時代 (Elizabethan Period)，為這時代許多作家之巨擘的是愛德曼·斯賓塞 (Edmund Spenser)，他是當時一個新興的抒情詩派的領袖。他那種精緻的喻言體的創作，最合當時一般的好尚，因為當時宮廷中無日不用遊宴樂，正似過神話中的生活一般。論思想的力量，論想像的豐富，論文章音節的諧和，斯賓塞處處都不讓阿利渥斯妥和塔索 (Tasso)。斯賓塞之次便是腓立息特內 (Sir Philip Sidney)，他似乎兼異教文藝復興的精神和中古宗教的熱情而有之。他是一個勇敢磊落的騎士，具有豁達的氣魄和豪俠的性情，他是他的時代的光榮。他著作中流露出來的高尚的道德的態度和他一生行事的氣概正同。他是替莎士比亞做先聲的最傑出的作家之一。

然而這個時代的光輝和牠的精力大半都在戲劇方面，因為此時的戲劇正從生存的競爭裏解放出來，牠一經解放之後，進步很速，很驟，而且很遠，這種充滿着青春的氣勢和力量的戲劇，求其淵源，乃是許多不同的元素所合成的，內中有古代戲劇式的新騰踊，有拉丁的悲劇和喜劇，有意大利和西班牙的作品的元素。牠勃然而興，而發達，而風行，且顯出極濃厚的創作性，都是始料所不及的。

先前那些承襲中古作風的戲劇家如力力 (J. J.)，羅伯·格林 (Robert Green)，啓德 (Kitt)，佐治·皮爾 (George Peela) 輩，所作也都自由且富變化，都是替此時的戲劇預為地步的。前乎莎士比亞時代為詩壇領袖的是克利斯多福馬遜 (Christopher Marlowe)；馬遜之後便是莎士比亞了。我們一聽見莎士比亞的名字，便已得着一種壯偉的觀念。

他的初年作品託始於一五八七年。他雖取材於前人的作品，取材於歷史，於舊聞傳說，而他的完成的作品上，卻都印有一種強有力的創作性；他此期中的作品所描寫的大都是一種強烈的情緒和兇險的恐怖，正是當時社會所要求的；以後的作品，境界便較高，個性亦較明顯。他在悲劇裏和喜劇裏一般偉大一般真實——一般是一個深到的徹底的心靈檢查者，靈活精密的人格描寫者；恐怖的，美妙的，精緻的，詼諧的，壯美的，莫不是他的材料；他對於劇中人物，用一切的態度描寫牠，由種種的方面烘托牠，用種種的變化穿插牠，將牠的美德，失德，罪惡，以至憎惡，慈悲，歡樂，憂傷，喜笑，悲哀的情態，莫不一一表露。他的天才能發創造出一種可怖的黑暗，卻又用一種神聖的光

明去照耀她，將一切人類的性格，自上帝王，下至乞丐，自兒童以至老翁，將牠們彼此對照相形，使各個的真相畢露。十六世紀的英國戲劇家，因力求自己的作品能在同代人的心理上發生強有力的影響，結果卻落得自己反被當時那種熱烈的潮流所推移。一般有天才的詩人，因故意求過激，遂幾以氣性為惟一的嚮導。也幾乎專以此得力。於是絕望的戀愛，悲愁，罪惡，瘋狂，死，與夫諸如此類的悲劇的形象，都盤踞了他們的心胸，致使尋常的觀念不復有地位。他們或出於偶然，或被當時一種不可覺察的潮流所驅使，其靈微的意識極能反映當時的精神的空氣，這種空氣便是他們一切行動的境界，也便是他們所稟受以成其為他們的。自來文人表示悲情的機會，最好不過這個時代的了。所以彼時這些老百姓·皮爾斯和洛賓·呼得 (Robin Hood) 的子孫的文學都是由社會上的實況直接感發出來的。

他們這種文學，其勢有如狂風暴雨，可以更易道德的標準，可以革社會的命。我們於此，可以看見英國當牠歷史上這個極重要的時代的真相。彼時是英國歷史上最危急的一個關頭，是西班牙的無敵艦隊 (Armada) 將要來的時候，是依利薩伯的盛世，是因激烈的宗教衝突終至羅馬舊教傾覆的時候。此外則新世界之探險，也是此時的一樁要事，浪漫的探險英雄德賴克 (Drake)，卡芬狄士 (Cavendish)，刺里 (Raleigh) 等，都以此時建立燦爛的功勳的。自是英國戲劇繼續發達凡六十餘年，此期中的作品異常豐富，大都為當時生活的寫真，後世戲劇界雖極努力卻終未有如此之盛況。莎士比亞之後有朋準孫 (Ben Jonson)，而朋準孫未必能為莎士比亞的替手。但他

所描寫的人物能變化無窮，他的文章具有一種活潑優美的風調，又富於一種深切的悲情——這已足夠爲他的天才的證據，亦足見他不愧得「稀有的朋準孫」之號。朋準孫之後有波蒙得 (Beaumont) 與夫勒拆 (Fletcher)，有馬辛澤 (Massinger)，有福耳德 (Ford)，有韋白斯特 (Wolstenholme)，有託馬斯 (Thomas)，與詹姆士麥力 (James Shirley)。

這些都是十七世紀初葉在英國文壇活動的人物。彼時法國的極端唯美派作家正在提倡一種僞擬古主義，其中優秀分子，都因英國文壇爲黑暗，爲半開化狀態。

當莎士比亞的精神還繼續有勢力的時候，忽爾虛幻的清教徒主義爆發了。清教徒主義的譏罵態度和攻擊態度雖早已流露，但至此方一發而不可遏。彼時英國的戲劇尚在幼稚時代，竟已摻一般拘泥的清教徒之怒。此派的作家，一面做文章攻擊戲劇家，一面則運動當局，屢次要想廢止演劇。然而一般人對於他們這種呼聲都很淡漠，所以終於未發生效力。彼時英國無論什麼階級對於戲劇的興味都日見其濃厚，雖以一般戲劇家熱心創作，也已覺得有不能應付之勢。故當依利薩伯和詹姆士第一兩朝，雖經一般教士以戲劇爲可以擾亂自己的心緒，雖經加倍熱心的提出抗議，也都無效。此輩因而大怒，反抗運動愈加激烈，終至他們成功的日子到了。他們於是憑着宗教上改善的熱忱，難以爲自己謀自由的熱忱，卒使劇場，俗人，甚至連彼時正取激烈攻擊態度的戲劇本身，一齊掃蕩乾淨，其成效恰如舊教之宗教裁判制度在西班牙半島遏絕一切事業的發達一般。此舉之結果，使當時凡事都是

一種幽暗的景象，且以禁止演劇和其他一切遊戲的結果，使英國戲劇的驚人的進步完全停頓。我們據亞勒弗烈·美西也爾 (Alfred Mozires) 的意見，可見英國彼時的戲劇已在不滿一世紀的期間經歷過長期間發達所經過的一切變態。

在蘇格蘭則爲羅伯朋斯 (Robert Burns) 和高爾德·司各脫 (Walker Scott) 先驅的約翰·諾克斯 (John Knox) 已經毀了歌人的琴。從此蘇格蘭人的心理沉迷於神學的論究而對詩與小說抱厭惡態度者約有二百年。在英國則此後凡智識上的娛樂恆受人嚴重的監視。可爲文壇的空谷足音的但有數人，即約翰·傑佛茲 (John Jales)，契令·衛司 (Chiningsworth)，耶利米·泰羅 (Jeremy Taylor)，巴克斯·巴克斯 (Baxter)，班·班 (Bunyan) 等。當這段文壇黯淡的期間，在森塞·蕭殺的空氣裏稍稍能提起一點精神的，祇這幾人而已。彼時的英國人，可謂一點都無生趣；便是「笑」也在禁止之列的。

彼時英國全個國家都已沉溺在宗教和政治的辯論裏。當兵的也要談談教義；學生到課堂上課，往往半路上站住辯論憲法。清教徒在街上走路，眼睛一逕朝天，內裏卻充滿着一肚皮的惡毒。他們那種喪氣的臉，光光的頭，灰沉沉的衣服，都很合他們那種暴戾，不和通的脾氣。這是一種何等慘澹的時代啊！

但是無論何時，凡是不近人情的思想，都須惹起不可避免的反動。一個哈禮孫 (Harrison) 之後，必須有一個羅徹斯特 (Rochester)。所以英國這種清教徒禁慾主義的時代之後，接着便是智識上社會上並大放縱的王政復

真時代了。

第七節

從英國一跳便說到西班牙，從莎士比亞一跳便說到斐凡提，這段文章似乎有些不接氣，殊不知這兩個民族之間很有些接觸的地方，很有些相似之點。因為這兩個民族，同具一種冒險的精神，同具一種國民所以自傲的性質，文學上也同具種種很顯著的特質——凡此種種都是使牠們發生真正的關係的。

西班牙怎樣的追隨意大利從事文藝復興運動，牠的幼稚的國民怎樣的從小便享用着許多從古傳下來的奇異的故事，又怎樣的到美洲開闢新地，怎樣的參加一切探險的事業，牠那浪漫的事業又怎樣的因自己橫暴的行爲而蒙污點——凡此種種，我們上文都已說過了。

西班牙向來被籠罩在一種豪俠的，度信的，幻影的，神異的空氣裏，至此乃暫得脫離自古來所走的隱徑，脫離了超自然的奇詭的境界，而另覓思想的資糧。牠既穿厭了祖宗手裏留下來的那件大衣，便染上近代人的嗜好。從前的一般 Cid（英雄史詩）和 Romanco（浪漫小說），至此都滅跡，而一種飽涵着意大利肉感主義的精神的作派代興。意大利的 Rhapsodists（遊行歌人）周行半島上的各城市，或唱阿利渥斯安之詩，或諷塔索之句，其結果卒使西班牙民族的自大心理漸漸消泯。

因文藝復興的潮流湧入，使西班牙國民文學的河道澎湃。於是波斯坎 (Boscan) 與禾加·加悉拉斯科 (Garcilaso de la Vega) 之流，模倣佩脫拉克、阿利涅斯，和撒那匝 (Sanmazan) 的作風；其後雷得斯馬 (Ledesma) 與賽哥拉 (Gongora) 則以構思纖巧見勝。彼時詩歌簡直成爲西班牙尋常的語言，詩人已不復可屈指而數。這便是意卑里亞半島文學的黃金時代了。這時代中的主要人物有塞凡提與門多薩·赫爾塔多 (Hurtado de Mendoza) 有富翁·路易 (Louis de Leon) 與阿好馬達·德利撒 (Teresa d'Alhambada) 有蒙的美那 (Montemayor) 有大歷史家馬利亞納 (Mariana) 有一般描寫盜匪的小說 (Picaresque) 作家，有才思無盡藏之末加·洛帕 (Lopo de Vega) 等。末加的作品已漸渡入十七世紀的作風；末加之後便是加爾德倫 (Calderon) 的時代了。

當意大利正在高唱託瓜多·塔索 (Torquato Tasso) 的阿涅他 (Aminia) 和耶可波·撒那匝 (Jacopo Sanmazan) 的阿加狄亞 (Arcadia) 的時候，蒙的美那則正以其最著名的——卻不是最好的——浪漫牧詩 雅那鍾情 (Diana Enamorada) 餉西班牙人。他這書的成功是非常偉大的。未幾法國小說家便爭相模倣蒙的美那和卸脫·佩累斯 (Perez de Hita) 兩人的作風，而浪漫的牧歌遂盛行於法國，就中最著名的作家便是烏爾飛·阿諾拉 (Honoré d'Urfé) 即以莎士比亞的味羅那兩紳士 (Two Gentlemen of Verona) 而論，其實亦是牧歌的作風，不過把牠變作對話體罷了。

從十六世紀直至十七世紀初葉，西班牙人的文學，發揮豐富的想像力供給其他用拉丁變語的諸民族以無數新穎的文體和無數新鮮的題材。彼時西班牙文壇最前列的作家便是替那「拉曼察的騎士」(Knight of la Mancha) 做傳的塞凡提。他是古今來文學界的一個偉人，可是生平遭際很不幸；以他一生勞碌，以他的偉大的作品使全歐洲的讀者無不傾倒，以他對於社會上種種罪惡和弱點的戰勝。卻博不得一個衣食無憂的境地，並不獲身見其名之成立。他如今在西班牙文壇上佔有的至尊之座是再沒有人跟他爭的了。可是他的一生，曾為聰 幸運的軍人，曾為阿刺伯人和基督教徒的俘虜，曾在戰場弄成殘廢，曾為造化小兒以至「嫉妬」和「惡意」的玩弄品。但是他所遭的種種不幸和別人對他的種種無正義的待遇，都始終不能使他改變他那種溫良的氣質；他自己一生的事蹟，已經是和小說一般離奇的。他曾把他的全副感情和思想都灌注在他那部永久風行的傑作當規克蘇脫的經歷 (Adventures of Don Quixote) 上面。這不啻是一種愉快的哲理的史詩，是英雄思想和瑣碎事蹟的混合物，是社會上種種風俗、信仰、和愚昧的鏡子，是幻想和事實滑稽和隱痛的矛盾的膠合，是高尚的向上心理和尋常現實的事實兩兩相形的象徵。當初塞凡提做這書的直接目的是在破壞當時一般關於騎士的浪漫小說的勢力，實則彼時這種小說的勢力已經是過時的了；不過當從前腓立第二手裏，這種小說確曾過分的得勢，所以西班牙國會會要求國王加以禁止。但是塞凡提彼時做這部書，也並不算無的放矢，因為牠的成功已經出於作者的初意之外且已成爲世界傑作之一了。

彼時葡萄牙的文學也正在極盛時代，因彼時葡萄牙的道德思想已達極高的程度，所以文學也因其感發而臻極盛。葡萄牙當這百餘年以來，很值得做文明世界的表率。至此便是牠的光榮達到極度的時候了。牠在十五十六兩世紀中那種無比的光榮，後此便不復再見了。彼時牠所以能這樣，大都由於歷來君主的賢明所致，因那百餘年來的數代君主是歷史上絕無僅有的；他們所提倡的事業，並不僅注意自己一國的關係，實都為全人類謀利益。

牠的海軍能維持西印度和海上的霸權；牠的詩人和歷史家則替牠爭得一種更能持久的榮譽。牠的詩人中最不能不提的是伯那當·黎貝羅 (Bernardim Ribeiro)；他學問和想像力並富，因使他那種變化無窮的思想加倍可珍。他是葡萄牙牧詩的創作者，他那種理想的鄉村生活的描寫，曾經引起無數人的模倣。黎貝羅之外有古典派的沙·特·米蘭大 (Saa de Miranda)，他在當時各詩派的紛擾場中，最是一般浪漫派作家的勁敵；又有計爾·微森退 (Jil Vicente)，是葡萄牙的普羅塔斯，他那種粗樸的作派，已替差不多百年之後的未加·洛帕和加爾德倫作先驅；最後，超軼一切詩人之上的便是偉大的喀摩英了。

我們既提及喀摩英，便不得不將他評論一下。喀摩英的史詩，本質工具有一種壯美。他生平多變故，有如丹第、塔索及塞凡提；終其身與評議、逆境、負情、相苦、鬪。他一生的大部分耗費在遠遊中；他逝世之年，正是他所常讚美的祖國將受外人管領之日。他的對唱收歌 (Ecolonias) 可與迦悉拉索 (Carrilho) 爭榮，他的抒情詩 (Lyrical Poems) 可與佩脫拉克媲美。以他的偉大作品流細亞特斯 (Tusades) 而論，其思想之偉大、文章之工整、音律之

諧調，都是證他那「葡萄牙的味古爾」之徽號是沒有人跟他爭得的。

再說北方，則彼時的荷蘭已不肯讓南部諸民獨自出人頭地，牠在文藝復興的運動裏頗曾分得一大份的光榮；但是牠那神祕的，野蠻的薩邦、俄羅斯，卻仍是閉關而治，爲歐洲政治大潮流的局外人，依然未出基輔（Kiev）和諾弗哥羅（Novgorod）等史詩系的時代——卽野蠻衝動的時代。俄羅斯人雖也是基督教徒，但係亞洲的基督教徒，與歐洲基督教徒的拉丁民族和日耳曼民族之間若有鴻溝之判。然而波蘭對於西方的各種思想也爲完全的局外人。牠嘗自詡有偉大的詩人和傑出的散文作者。牠的議會裏常可聽見雄辯的聲音。牠當騎士制度濫觴的時代，國中凡百現象都頗樂觀。此後的克拉科大學（University of Cracow）也是和歐洲著名的大學並駕齊驅。這大學的教授大都是第一流的學者，最著的便是白魯齊阿之邁克爾（Mikhael of Brudzewo），著名的哥白尼便是他的學生之一，各種文學都有傑出的作者，例如尼古拉·奧奇（Nicholas Roj），科加諾烏斯基（Kochanowski），約翰·薩木奇斯基（John Zamojiski）及激烈的斯卡加（Skarga）等。其中最著名的是科加諾烏斯基。他有弔愛女的挽詩，異常動情，恆令讀者留着不可磨滅的印象；他的頌歌則可與品得媲美。他又作史詩，抒情詩，諷刺詩，諷嘲短詩，莫不文詞優美，聲律諧和，而又具有深摯的情致；因此之故，科加諾烏斯基遂有「波蘭詩王」之號。他門下弟子多不勝計，不幸這個古代斯拉夫文學的光榮的努力，不久遂因戰事和異族侵入而被阻遏。此後文壇的思想才氣便顯然不如從前了。

第八節

彼時居於歐洲其他一端的便是土耳其人。我們看上文關於他們的橫暴的破壞事業的種種紀載，必以為他們彼時還仍舊未脫野蠻狀態，其實他們因繼續努力的結果，已能利用新征服的民族的語言和思想，猶之利用新征服土地一般。彼時期他們的文學已非復薩剌人遊牧時代所唱的歌曲，已是真正的文學，而且已和顯帝蘇力曼 (Solyman the Magnificent) 時代軍事的政治的威力同造極高峯。

當初土耳其人雖也曾和希臘人接觸，卻並沒有得他們的益處，且也並不曉得希臘人智識上的程度在自己之上。這個向來認為世界文化的淵源的古民族，對於土耳其人絲毫不曾有所感發。但是他們對於波斯人和阿剌伯人的關係卻就不同了。阿剌伯王國亡後，牠的信仰、著者和一切習慣，在土耳其人身上都發生極深的影響，土耳其人因受這種教育，不久遂大變氣質，野性也漸漸除了，智識也漸漸開了。於是土耳其人遂與波斯和阿剌伯文學的傑作相接觸而盡吸收其精華，凡是自己的語言於詩、道德、哲學、科學有不敷用的地方便都取資於波斯和阿剌伯的文學。他們實際已和卡耶姆和菲茲 (Fiz) 薩第 (Sadi) 特查米 (Tami) 同飲一個泉源的水。於是乎君士坦丁 銀的詩人畫出了。

希臘有牠的伯里克理斯時代，羅馬有牠的奧古斯都時代，近世的意大利有牠的利奧第十時代，法蘭西有牠

的路易十四時代，英國有牠的依利薩伯時代，土耳其則以蘇力曼時代爲牠的黃金時代。這正是神祕的岳索力（Prizonli）和奔放的提力波蘭地（Daliburnade）（即稱土耳其之阿累提諾者）兩詩人並榮的時代。岳索力所歌詠的是薔薇和杜鵑的戀愛故事。岳索力之先曾有不朽的巴比（Baki）。批評家阿第（Ahdi）曾說：「巴比的詩是全世界愛悅的，應該把牠樹爲一切人的模楷。」巴比的詩兼美趣與深微而有之；土耳其人歎賞之餘，再尋不出別的字眼來讚美，便簡捷稱他爲「抒情詩的蘇爾旦」。土耳其人的這段時期確乎是絢爛已極，只可惜不久。這段時期過後，土耳其人的文壇遂不復見這般盛事。自從那時起一直差不多到近代，土耳其人對於外來的影響極力抗拒不肯容納。

我們如今且由這東隅的土耳其再回到歐洲本部；我們和法蘭西闊別了，如今又要論到牠了。

我們對於彼時法國，第一須注意牠對於文藝復興運動的熱心和牠參加這種運動時的狀況，並須注意牠對於古文藝並不是生吞活剝，卻能有所改變以適合自己的嗜好和自己的氣質。

十六世紀的法國，是許多驚人的改革的開始，只不過態度還未鮮明，取徑還未確定罷了。

彼時的法國國民頗是一種疲憊慘淡的景象，因他們歷經戰亂，儘管辛苦，所以都似急欲覓個繼人的樣子。路易十二和法蘭西斯第一雖以兵力壓服意大利，意大利卻轉使法蘭西斯第一大受其感發。於是法國對於文藝復興運動遂竭誠歡迎。當十六世紀的初葉，便已如春風薦至，生氣漸萌。往日的顛沛流離，至此但記憶中存之而已。繼

此便出現了許多偉大的作品，足證當時這種運動已經是到處成功。於是無論語言上，政治上，哲學上，遂都蒙着異教的色彩，而人生和社會也都完全改變態度。

詩壇一方面如克雷蒙·馬魯（Clément Marot），雖仍遠紹查理士·奧爾良（Charles d'Orléans）的作風，他方面則龍沙（Ronsard）和他的同派，都恃着臘羅馬的作品爲他們的感興的泉源。

龍沙是當時所謂「七人詩派」（the Pleiade）的領袖；此派中除龍沙外，有著作傳到現在的，還有巴伊夫（Bailly），都貝雷（du Bellay）和勒米·柏羅（Remy Belleau）等。法蘭西之有龍沙，猶之希臘之有荷馬，品得，阿那克里溫，故後世常稱龍沙爲法蘭西的阿那克里溫。龍沙的學問宏博而不甚精，因其有這種學問，反足以阻滯他的詩句的流暢，遏塞他那種豐富而常有生氣的想像力。他那種誇飾的文詞常常流露出不諧和的聲調。但他遇着情詞暢旺時，筆下便無俗物了。我們在他的作品上面，可以見着豐富的文詞，崇高的想像，如畫的意境，入神的描摹，以及精緻的思想。後人雖能模倣他，卻不能跟他一樣。

法國當文藝復興時代及七人詩派底下，產生了種種新音律，不久便從法國傳遍全歐。西班牙，意大利，和英國的詩人都採用牠們，就中英國詩人更把牠略加改變以成自己特有的詩律。

然同時又有一種努力，要想把詩的想像的美增高而以文字的工整爲其標準，結果致使龍沙所已成就的詩格重又墮落，卒至流於所謂佩脫拉克主義（Petrarchism）。又同時一般人好學的熱心大熾。據譚孫（Tamson）說，

「一般在路易十六末年出世的好學青年，大家都不耐於煩瑣學派的教育，因都變了一副態度，很熱心地去讀拉丁文的偉大作品，這都是中古時代人所不會深解且也不會賞識的。他們因讀這些久被教會圖書館封藏的書，纔得見識什麼琉克理克阿，什麼塔西陀，什麼昆體良；也纔曉得有宏大的哲學，有深微的心理學，有高尚的俗辭學。」彼時在意大利，所謂「人文學者」(Humanist) 一個名稱頗足以引起文壇的注意，並能博一般王公大人的眷寵。同時法國也有類似的情形；學者和文法家，詩人和藝術家，並得法蘭西斯第一其姊妹和馬加勒特(Margaret) 的優遇。一時所謂「人文主義」(Humanism) 趨於極端，一般希臘化和拉丁化的熱心家，自己不能有獨創的思想，祇籠統地輸入古代思想，致使危及國語之獨立與正確。但同時另有一部分作家，於古籍之訂正頗具功績，因使學問的範圍異常擴大。當時專攻據學和古代文字學的代表有步謝(Bude)，勒非甫耳特，太普累(Leleuvre d'Elaplas)，羅馬斯(Ramus)，朱理亞(Julius) 與約賽斯，卡里格(Joseph Scaliger)，穆勒(Murel)，多臘(Daurat) 與吐尼勃斯(Turnebus) 等；此等學問在社會上異常受人企重，又稱空前絕後之盛況。惟當時學者中最負盛名的要算拉布勒(Catalanis) 他是一個諷刺家，是超然於任何一派的學者，其著作兼具當時學術界的兩種特徵——即思想之雄健與學問之湛深。法國散文因拉布勒的影響而後有自由優美之致；拉布勒的散文具有一種未開的蓓蕾的美，這是人人都承認的。戲劇的作品——例如若得爾(Jodelle) 和羅伯·加內(Robert Garnier) 的悲劇——則以希臘羅馬的名著為唯一楷模，雖模倣者不無改頭換面之處，骨子間要不能外。若得爾

與羅伯加內兩家所以得名也無非因其能不失古作的規矩。龍沙對於若得爾嘗極力稱讚，一若他的作品已臻完美的境域且若已可與索福克、獵斯和米喃得媲美似的。在我們看起來，他這樣的恭維，似乎有些不可察解，不過我們在當時既找不出更完美更值得稱讚的作品，那麼也只得承認了。

第九節

法國當瓦羅亞 (Valois) 王朝的末代，文學上的繁興便又另覓泉源了。因為彼時又是法國的一個危機，國中權力無所統屬，宗教上有呼格諾派 (Huguenots) 之爭，擁兵之巨族如樹黨派，不絕的衝突。思想上因而他絕無定準，異教徒有時極受社會推崇，有時不免遭焚身的慘禍；自由思想家的勇敢，有時頗得人贊許，有時則又遭禁壓迫虐；表面上對於意大利的思想極力反對，實底則意大利詩人的戀愛和意大利道德的放縱都極受歡迎。再加以內亂頻仍，刀兵不息，宮廷間的駢奪淫快，神聖同盟席上的衝狙折樽，卒使文學具有一種慘澹殺伐的色彩。於是蒙呂克 (Montluc) 作憶舊錄 (Memoires)，貝阿之亨利 (Henry of Beaur) 嘗說牠是『軍人的聖經』，奧俾內克 (d'Aubigné) 作慘劇 (Tragicues)，滿紙皆冤忿之氣。

然而這種風波漸漸的終於平息了。舊時的精神又恢復了。文藝復興運動又得第二次豐富的收穫了。蒙旦 (Montaigne) 和他的朋友沙隆 (Charron) 及拉薄愛底 (La Boétie) 出現了。蒙旦一生，不欲墮入當時紛擾的

漩渦，也不受當時人心理的支配；他祇求過自己的生活。他把自己和自己的感情做他研究的題材。他的心靈力求瞭解自己，他因逐日將這個心靈所探索得的記錄下來。結果便成功他那部著名的論文集（*Essays*）。因他再用不着別的材料。他從此將永遠是一個可驚異的作家，具有一種活潑的，詩的思才，一種自然的風格，一種創意的想像力，和許多新穎的名詞，優美的辭句。他的作品是一種可驚異的感興的泉源，可以取之而不竭。

第十五章

大古典時代之曙光——社會騷亂的狀況續書——意大利西班牙文學之寂滅的模倣——文學目的之不定——『技巧作風』與『誇飾作風』——批判諸作派與表裏劇作法——優良的好尚與常識之反動——十七世紀英法兩國之學習德國——清教徒時代以後之社會狀況——王政復興時代傾向放逸之反動滑稽作派之暴發——意大利文化之狀況——西班牙荷國與德國——三十年戰爭以後——道德前大劫——法德得勝時代——歐洲民族大多效傾向模倣

第一節

維爾文斯和約 (The Peace of Vervins) 簽於一五九八年，法國與西班牙間自法蘭西斯第一以來歷久未決之戰爭至此終結。同年末，西班牙 虐主腓立第二 終。腓立第二是他那一時代最後的代表，正教教堂所以演成種種流血慘劇的那種不能容忍態度，至此也皆終止。從此歐洲人於較和平的時代，而各種事業均見進步。

多事的十六世紀中，教派的衝突異常激烈，故與喀爾文及狄奧多·貝茲 (Theodore de Bèze) 同國人之宗教的著作中，都為有這種紛爭的痕跡。及溫良的聖法蘭西斯·特薩爾 (St. Francis de Sales) 繼改革派粗獷的神

學家而出，各派調解的曙光始露。因彼時人心厭亂，故都樂得一時的安寧。譬如洪水既退，神聖的方舟重新出現了。彼時世界上虔信宗教的精神幾乎已經消滅。牠已經退藏在修道院的深處，宮廷之間確已不復可見了。聖法蘭西斯·特薩爾的宗旨便要將這種精神從新引入人世間。蒙旦則把向來為狹窄的學派所限制的道德問題和哲學問題鼓起一般人的興味。他又使時流的社會也有宗教生活的可能。他那種溫良的性情已經感化他周圍的人。從此法蘭西既已脫免神聖同盟的最後紛爭，又以政治宗教的和平而元氣恢復，故遂與前一時代初年的情景一般，得着安寧的發展和無阻的進步。彼時文壇，散文則有巴爾扎克·圭茲 (G. de Balzac) 開法國機巧華麗的作風，戲劇則有洛特魯 (Lottreux) 與柯奈耶 (Cornille) 先後輝映，抒情詩則有馬雷布 (M. Marbe) 和累內 (Ragnier) 繼為名家。凡此之流，盡屬此期智識大運動的先驅者，蒂路易十四 之世而運動成熟。

十六世紀中希臘拉丁文學及於法國的影響，曾有人將牠比作一種洶湧的潮流，帶來甚多的珍寶，卻也留着許多殘毀的痕跡。馬雷布 對於這種潮流帶來的珍寶並不俯拾；他祇從事於那些毀痕的繕補。他可以說是替這種潮流築造堤防的。這潮流正在狂奔怒躍而進之際，一遇着他這種堤防，便又重新流入河道。

老實說起來，這個新時代並不會——也不能——一躍便達到完美的境域，這種完美的境域，直至偉大的古典派纔算達到。新時代的文學仍舊還保留着前一期那種熱烈侈靡的特質。而且彼時一般作家對於意大利和西班牙的作品過於奴隸的模倣，因而將牠們那種浮薄的毛病也都學了過來。

模倣直是十七世紀初期的一種風氣，差不多是無論那國的文學都染着的。瑪利諾 (Marini) 以路易十八之朝至法國。他具有偉大的才情，卻流於過大，而且缺乏普通人的常識。他的作風，便是當時一般作風的例子。他那種以文字爲遊戲的作派，那種雕琢的辭句，那種纖巧侈靡的風調，其勢力有如傳染病，一時大家都染着了。他的詩並不在訴於人的情緒，卻在惹起人的驚異心理，他對於情操、理性，都漠然不顧，也不問所描寫的事情入情理不入情理，卻處處都流露「纖巧」(Conceits)。他最喜用靡麗的影像，最喜用意義絕不相似的字互作譬喻，最喜將絕不相干的觀念結合在一起；他這種作派，不久便成爲一種盛行的風氣。末加·洛帕嘗說以塔索比瑪利諾，實祇不過黎明和白日之比，這話並非過分。世人都目瑪利諾爲奇才，所以然者，一因他具有一種驚人的技巧，二因他富有無盡的資料。他在巴黎拜訪當地的貴人時，大家都竭誠歡迎他，彷彿也是「康狄的君主」(Prince of Conti)。他嘗作詩頌揚麥第來·馬利 (Marie de Medici) 的美麗，盡極纖巧，馬利因當他是世界上最道地的詩人，褒獎不置。他所到的地方，一般向來自命爲才士的，都消聲匿跡，正如燭火遇着日光一般。他是文壇的泰斗，作者的楷模，卻因他的聲譽蜚騰，致使歐洲文學受害不淺。

瑪利諾之外，則有西班牙的袁哥刺 (Gongora)，蒙塔爾文 (Montalvan)，葛勒西安 (Guecian)，雷得斯馬 (Ledesma) 輩，也都無字無句不含着虛僞矯作的意味。

袁哥刺·路易 (Luis de Gongora) 具有活潑的想像力和創作的天才，只可惜生不逢時，正遇着文壇極誇

矯飾的時代。彼時社會既都尚一種空虛無物的文章，這種制裁的力量異常偉大，使賽哥刺終於屈服。他的第一作品是一部詩集，體裁雖極簡單，清調卻極壯偉，文章也並未流於誇飾。但是這部詩集並不受社會注意。而他求名心切，因遂改弦易轍而採用「誇飾主義」(Oratorism)。他於這個新主義，一試便成功，馬上就把他的前輩索託美耶·路易(Louis de Sotomayor)壓倒。他於是創出一種新作風，其實差不多已創出一種新文字——內中充滿着新奇的字眼，晦澀的隱語，不相干的譬喻語，和極勉強的倒裝語。賽哥刺和他的子弟蒙塔爾文都以擅長這種文章致身通顯。於是這種奇詭，靡麗，色厚，聲濃的作派(所謂 *gallo culte*)，遂漸漸發達。彼時意大利詩人和西班牙詩人常有一種競爭，要看一句詩裏矛盾的字眼和意外的相形詞誰用得最多，而葡萄牙詩人亦力爭這 *gallo culte*。是他們特有的財產。這種作風的目的，祇在文章能動人，而牠所以貫徹這種目的的唯一途徑，祇在「多把意外的」和「驚人的」給人看。這派詩人已經忘記了他們的職務應該是訴於人的靈魂，卻以能惹起讀者的驚異便算是勝利。

於是歐洲各國差不多同時都受着這種惡劣作風的影響，而又都自以為極高雅的趨尚。

意大利有「纖巧作風」，英國有力力(*Lyly*)的「歌浮思風」(*Euphuism*)，西班牙有「誇飾主義」，德國有賀夫門斯瓦陶(*Hofmannswaldau*)和羅恩斯坦(*Lohenstein*)的「作態主義」(*Mannerism*)，法國有「朋黨派」(*Okeries*)的矯飾的作風——凡此種種，彷彿是大家結成一種攻守同盟，協力與「理性」和「自

然「對抗。即以向來取鄭重態度的英國，也要趕時髦歡迎『歐浮思』(Euphens)的出現。彼時英國的散文，還是阿斯卡(Ascham)和威爾遜(Wilson)留下來的那種滯重單調的作風，所以「歐浮思」遂得乘間而入，因為當文采過於枯燥的時候，忽有一種優雅、濃厚、諧和的作品出現，是最容易博人歡迎的。

刊行力文集的愛德華·布蘭德(Edward Blount)，在所作的序裏說：『我們的國家，因力而得有一種新文字。歐浮思和他的英國(Euphens and His England)一書，便是這種新文字的創始者；當時凡是上流社會的婦女盡是力的學生宮中的美人們若不能用「歐浮思」的文字，便和現在不能用法語一樣叫人看不起。』這種極端誇飾的文學，其唯一目的，便在把無論什麼事情都要說得文雅。同時法國「龍部耶館」(Hôtel de Rambouillet)所招待的一般所謂優秀詩人也有如此作派。即在私人往來的函牘，尋常都因彼此知己的關係用不着雕辭琢句的，此時卻也時行矯飾。一般所謂文雅的階級，因風氣所趨，便是極不相干的信札，也都要賣弄文詞，不肯苟且。所以彼時即書翰一體也脫不了一般，「歐浮思」作風。至若閨秀文詞，尤其是循規蹈矩，諧聲調律，絲毫不敢苟且，其結果往往有極可發噓的。彼時以文字遊戲為文人最高的藝術，漸至纖巧詞章，成為「司空見慣」流風所被，漫無紀極，於是乎「常識」終於不答應了，也照例是終於勝利了。

於是乎意大利的“penzieri”和西班牙的“autoritario”——便是首先提倡這種纖巧誇飾作風的——看看社會對於他們這種無病呻吟已不復注意，也就都不得不改弦易轍了。我們推原當初這種過分文雅的作派，

所以能得一時的風行，大都靠着社會上一種厭舊喜新的心理。而且以當時一般粗獷的風俗，得這種優雅的文風以相調劑，確也不無直接的影響。然而這種風氣，究竟祇行得一時，也和其他由庇里尼斯山派（*The Pyrenees*）以外傳來的風尚一樣，不久便歸衰歇。但當牠未衰之先，巴黎地方事模倣西班牙的那種風氣，卻會盛行得如狂熱一般。後來社會上漸漸曉得真美和浮華的區別了，也漸漸曉得從一種比較簡率的作風去追求比較確實的成功了。

於是乎簡率的作風遂成爲極普通的趨向。從此便養成一種莊重的學院式的風格——這便是十七世紀法蘭西文學的特徵了。

第二節

文學已經擺脫誇飾，矯作，和趨於極端的作風了。外國作派會暫時在國民文學上發生的種種影響，逐一的被擠斥了。文學的趨向和風格漸漸提清了，文學的理想標準也復歸於正。無論形式方面質料方面，都漸漸得着一種中庸的態度，古代作派與近代作派漸能相融，真理與詞藻不致崎嶇畸重——總之，凡第一流作品的種種特徵，至此都漸次出現了。

彼時值法國的 *Salons*（貴族婦女招待文士的館第）盛行，社會風俗頗受其影響。所以路易十四時代的

法國社會狀況，可以用兩句話總括之——習俗尚極端的斯文，文學懸極高的標準。

彼時法國社會崇尚情雅之風，可謂空前絕後，便是宮廷中的人物也莫不以一識阿旦尼斯 (Antonie) 〔龍部 耶侯爵夫人之別號〕為榮。貴族中人，無論男女，都聚集於麥第奇之喀德隣 (Catherine de Medicis) 龍部 耶侯爵夫人 (Marquise de Rambouillet) 及其女末里·特安吉尼 (Julie d'Angennes) 的館第。彼時名流如馬雷布 (Malerbe) 臘岡 (Racan) 薩焚宜夫人 (Mme. de Saligny) 拉法夷脫夫人 (Mme. de la Fayette) 拉發勒特主教 (Cardinal de la Valde) 部梭·勒部且 (Bussy-Rabutin) 斯屈對里女士 (Mlle. de Scudery) 塔爾芒·對里奧 (Tallemant des Réaux) 敘展爾·拉洛士佛科 (Voiture La Rochefoucauld) 柯奈耶 (Cornelle) 哥陀 (Godau) 及其他多人，都是這些文士館中的賓客。這班文人長日在館中聚會，遇有關於文字的問題，大家便都紛紛議論，又或遇岡攢維 (Gomberville) 拉加爾潑蘭奈 (La Calprenède) 斯屈對里等人——這些都是他們所心折的——有新小說出來，大家便都爭相評隨。所以當時這種文士館，是非常值得注意的，因為當時文士若想成名，必須要經過館中的贊許。我們上文已經說過，這種沉迷於文學而專事追求精神娛樂的團體，勢必至漸漸流於矯飾，然而彼時「常識」對於意大利和西班牙輸入的形式主義也已經是勝利的了。法國文壇的這種風氣，也會留下一點永久的結果，便是文字比前純粹。

法國當時除龍部 耶館的勢力外，還有一種勢力，便是法蘭西文藝院 (French Academy) 法蘭西文藝院為

新近由康臘脫 (Comart) 組織的，曾經國會承認，也曾由首相給與憑照認為國立機關。牠的活動雖與雷部耶館不同在一個範圍，卻與雷部耶館一般的有勢力。法國當時的文學和社會，因受這兩種機關的影響，遂漸漸可感得一種調勻和優美的風味。

法國文字當前一世紀中，顯呈一種變動不定的狀態。那時的文字，一方面雖覺新穎，有味，不單調，且不受拘束，他方面則總嫌其漫無規律，往往由作者任意意義。因此，北部與南部不同文，此省與彼省多歧義；希臘文，拉丁文，意大利文，西班牙文，任意借用，致使人人自爲政，雜亂不堪言狀。文字因這種組織上拼法上的變動不定，致使文法家也都縮手。但後來人終於覺得統一和規律的必要了。於是伏羲勒 (Vauquelin) 首先提倡文字改革。文藝院陸續製定許多規則，其中雖不幸多流於極端，卻使向來不能變化的語尾都取得確定的形式。同時語法也有規定了，用字也不復漫無規律了。當初巴爾札克的文字，嘗有一種調和而多變化的特色。如今坡特曼阿爾 (Port-Royal) 脩道院的作家，也能繼續他的遺風，且能矯除他那種誇大揚厲的毛病；他們理論上和實際上都已將從前的文字化簡了。從此不知不覺之間，作家所表示的觀念漸漸比從前明確，且而（因一種自然進化的結果）也比從前純粹了。

至於哲學，則仍未脫煩瑣學派的態度。所謂煩瑣學派的態度，便是對於個人的努力極力克制，而專致力於定程的研究。然而文藝復興運動已將柏拉圖的威權擡起來了。接着，煩瑣主義便受着一陣籠統的攻擊。一般攻擊煩瑣主義的，將牠的優點一概埋沒，卻又不會提出什麼較好的主義，以爲煩瑣主義的代替；因而一般人的思想都流

於一種機械的無目的的狀態。於是乎笛卡兒出來了。笛卡兒彷彿飛也似的衝破了一切定式和傳統的障礙，他的思想彷彿有魔力似的替人類向被囚禁的理性打開一條道路。他擺脫了一切成見，赤裸裸地開始他的革命運動。這種運動的成績，便是外界的威權漸漸消除，良知的價值漸被承認；換句話說，便是煩瑣主義的理想漸被近代的精神所代替。

而且笛卡兒的著作不用拉丁語而用國語，所以他在哲學上的功勞，與德國之路德和法國之喀爾文在神學上的功勞無異。故法蘭西國語所以能在各部分的思想都有牠的地位，也須讓笛卡兒居其大功。

泯黎 (Mairand) 說：『所謂雄辯，必須能使其他一切藝術，必不僅以文字的優美娛人，而必須以立說的力量與推理的光輝感動人。』如是，則雄辯便是法律，便是普通的需要，便是人心的理想。

我們於法國的十七世紀，越往前看，於當時偉大作家的作品（第二流的作品都甚拙劣）研究的越多，便越覺這個時代確是一個偉大的時代。我們於此，可以見識智識上至高的境域——即變化中有一致的境域。這個時代的成績，單從表面上似乎是絕對一致的，但若加以細密的研究，則覺其中人物實是異常複雜。只看當時如福羅 (Boulay) 拉封騰 (La Fontaine) 巴斯噶 (Pascal) 芬乃龍 (Fenelon) 波緒亞 (Bossuet) 貝爾 (Bayle) 拉辛 (Racine) 伽桑狄 (Gassendi) 拉布律耶耳 (La Bruyere) 部耳達盧 (Bourdalone) 及聖西門 (Saint-Simon) 這班人，不但有無數的大差小別，而並且有無數顯然的矛盾。就中聖西門是一個刻畫社會狀況的奇才；他有兩重的

特優權利，是十七世紀末葉最著名的文人，又是十八世紀最傑出的代表。

我們對於這一羣人，應該破些工夫詳為論列，對於他們的著作，應該破些工夫細為研究。我們曉得羅一身集合着許多平凡的品性，卻能使牠們交融無間，因得置身於文壇的前列；又曉得拉封極能模倣別人，而別人始終不能模倣他。我們又須注意摩利爾 (Molière) 是個無盡藏的天才，能把極深奧的思想用極暢快的文筆表達，而且自己雖滿腹憂傷，卻能以極完美的喜劇貢獻給世界；還有拉辛，他的才氣雖被悲劇之藝術的限制所束縛，卻能刻盡人類心靈中的一切情緒，而且他對於自己的美的觀念異常忠實，所以能用一種光輝的不朽的形式來表白他所發明的真理。更有拉布律耶耳那種卓越的技能，也是我們不能不賞識的；他能把當時社會的風習，用一種極細到的寫實的筆致盡情披露出來。至於芬乃龍，我們可以將他比做咪吉爾。他若波緒亞，則偉大之中可見纖細；他是一個哲學的理論家，是偉大的教徒，同時又是政治家，是王公鉅子的諂媚者。他的善於運用人類的語言，可為柏拉圖的勁敵，善於體貼悲哀的情緒，可為柯奈耶的勁敵，其同情心所及範圍之廣漠則有如聖西門；我們可把他和福耳特耳 (Voltaire) 並列，因他具有一種極大的天才，能發認證人生的實際，不過他所講求的實際和福耳特耳所講求的性質大不相同罷了。

我們上面所論的，其實連十七世紀法國文壇的皮相都還未說及。前人頗不乏關於這時代的詳細的論著，我們既不能跟牠競美，而且本書限於篇幅，也不能再從詳論列了。

彼時法國因外交政策和內政組織之健全，在歐洲政治上勢力頗大。而文學上和藝術上這種燦爛的成績，也都是以助長牠的勢力。

然而牠這種國力和智識上的輝光，並不能掩蓋當時社會上的困苦。歷史曾經告訴我們，彼時這種輝光是以許多罪惡和不幸運的事情做背景的。權力和信用之濫用，當國者之驕橫，狂臣之卑鄙，上級社會以多財而腐敗，下級社會則受極端之窮困，尤其是鄉間，『人民因缺乏麵包而至於吃草』——凡此種種，盡為當時的實況。又當奧格斯堡同盟 (the League of Augsburg) 的期間，法國軍隊曾吃盡種種的苦楚，西班牙王位繼承 the Spanish Succession) 之後，則又屢蒙恥辱，這也都逃不過歷史家的耳目的。此外如對於一大民族之普遍的蹂躪，如派遣騎兵強迫郎基多克 (Languelec) 自由民改歸天主教事，也已經在歷史上永久的紀載着。

因有這許多的事件，所以路易十四和他的朝代都是極重要的。路易十四幸得利用黎塞留 (Richelieu) 的政治天才和馬薩林 (Mazarin) 的才具，雖以患難之餘，亦能致國家於隆盛，而且他生逢法國民族天才蔚起的時候，遂使他們三人的名字和當時盛況若有一種拆不開的關係。實則他自己是個不學無術之徒，他生平未嘗開過書本。所以他的百姓久經壓迫，而終至於銷沈。職是之故，現今法國對於這個時代覺得可以紀念的只有一事，便是當時作家的優越，得到其他一切民族的公認，因而當時的法語成爲歐洲外交上的通用語言——惟此一事，實足爲其民族之光榮。

第三節

同時其他各國的文壇也不無活動。以英國而言，此時正是記敘詩人和抒情詩人的時代——即自德累吞 (Dryden) 至愛德曼·窩勒 (Edmund Waller) 與德來登 (Dryden) 的一段期間。

此期中詩人的感興源泉已與從前不同；當時人的思想完全受一種新精神的支配。這種新精神與文藝復興時代所以使英國作家流於佩脫拉克主義的那種精神不同。牠先是由雷羅介紹到法國，後遂渡英吉利海峽而盛行於英國。自從這種新精神發生以來，從前那種過大的作風遂受限制；從前那種象徵主義和印象主義也漸漸消滅。一般人的心理都從激動的狀態漸漸回復過來以就紀律的檢束。於是德來登便斷言詩的法律只有如斯卡力 (Scaliger) 和加索綯 (Cassiodorus) 兩人所說明的古典拉丁語的規則。

德來登的作品雖有種種缺點，卻頗能代表這個過渡時代的特徵。他生逢兩個時代的交界關頭，所以徘徊於新舊兩種思想之間，結果祇落得個兩俱無成。然而他的工作也並非徒然，他曾經首創批評的文章和良好的風格。他是一種流暢雄健，而且真正近代的作風的最初模範之一。

彼時密爾頓 (Milton) 的北美的理想主義，依然未衰，但他年事已高，猶在做他那莊嚴的共和政治的夢，驟見王政復興之成，不勝驚駭之至。他在一六六一年至一六六七年之間，成功了三大傑作〔失樂園 (Paradise Lost)、

樂園復得 (Paradise Regained) 和參探阿哥尼斯脫 (Samson Agonistes) 和他那近代第一壯偉詩人的名字共傳不朽。他因成功了這般宏大的著作，遂得與丹第及荷馬齊名，與聖經爭光，與猶太的大預言家抗席。他是一個百折不撓的政客，是一個壯美的詩人，雖在清教徒思想的壓抑之下，也能具備並且發表一種極大的愛美精神。他是一種極可法意的例外，可注證明人類的性靈雖在一切成見之中或一切環境的勢力底下也依然可以自由的。

這種自由的精神，我們可以由密爾頓的散文中見之，可以由約翰·愛略脫 (Sir John Elcho) 的雄辯的作品中見之，可以由熱心於烏託邦的詹姆士·哈林頓 (James Harrington) 的作品中見之，也可以由不幸的阿爾澤農·息特內 (Algernon Sidney) 的熱情的福音中見之。但此還不過是暴風狂雨中電光一閃而已。

共和政治的日子過去了。文學上可以聽見另外一種調子了。密爾頓的失樂園以一六六七年出現，已經是代表一種道義的憤慨聲和已被壓抑征服的清教徒主義的抗議聲了。撒田耳·蒲脫勒 (Samuel Butler) 著名的休狄布刺斯 (Hudibras) ——這是英國的當理克蘇脫——恰巧差不多是同年出版的。這書由一種反對的觀察點對於當時釀成革命的圓頭黨 (Roundheads) 和長老派極力謾罵譏諷。斯圖亞特氏 (the Stuarts) 重上冠宗留下的血濺的王位了。查理士第二既即位，便一變從前清教徒主義盛行時那種慘淡的氣象，凡事都趨向於快樂方面。這是何等急驟的變態！當時人都覺得突然間變做另外一個時代，另外一個天下了。風氣既變，文學也便跟

着牠變。彼時英國宮廷中的生活，處處都像法國。他們的嗜好，他們的娛樂，處處都令人想見巴黎，維爾賽和聖宅。芝在查理士第二手下，什麼跳舞會，什麼遠遊會，什麼喜慶宴會之事，都是無時或斷的。於是乎上行下效；一般社會上的男男女女，便也公然幹起他們的無恥勾當，正和當時小說和戲劇所描寫的情形一般不堪了。

這位寡廉喪恥的風流天子，爲欲接濟他的揮霍，致不惜典質王冠，賣卻自己的妹子，卻在他手下願會提拔過幾個詩人。其一是羅撒斯脫的子爵（Earl of Rochester）；他因爲精神斷喪得太過分，三十三歲就死了。還有一個是愛德曼·窩勒（Edmund Waller）；他是一個抱懷疑主義的不道德和政治上無節操的完全的代表。他對於尉拆力（Wycherley）那種粗劣的喜劇和無廉恥的行爲公然表示愛好。尉拆力也是當時多年得宮廷眷寵的一個文人，祇後來因行止太不檢束遂致陷入苦境。窩勒因負債之故致被監禁七年，但至詹姆士第二手裏，不但將他開釋，並還給他恩俸；我們於此，也可見王政復興時代的政治是如何腐敗的了。窩勒所編的戲劇，無論設境上說，白上，都流露出極大的不道德；他的人物祇是一大堆法國裝飾的英國人；他的作風雖是模倣摩利爾，卻模倣得極其拙劣。然而他的作品雖則異常譏諷，卻是當時風俗的極活現的紀載，極確鑿的寫真。

清教徒的嚴峻的制裁力解放之後，其第一個效果，便是演劇回復了牠的自由。演劇回復自由之初，便流於極端放蕩；同時一般文學和一般風氣也都流於放蕩。所以王政復興時代的英國人，實曾發生一種劇變；他們的父兄手裏，這都是嚴容肅貌，絲毫不肯苟且的；於是一般清教徒遂被社會所鄙，致使大家匿跡，不復敢在城市裏露面。一

時舉國人的下等情慾都如河水決坊的奔放出來；宮闈之間則窩淫伏於文雅，民間百姓則默欲橫行，肆無忌憚。一羣野蠻的無秩序的人民，爭先賞識德魯立巷 (Drury Lane) 裏產出的作品，因為這些作品都能酷肖的反映觀衆自己的狀態。以這樣一個莊矜持重雖經政治上屢次變亂而迄未搖動的民族，此時卻似大家都發了瘋了。無論那位「風流天子」，他朝中的貴人，以至槐特和爾宮 (White Hall) 中奢華的美人，無不具有一種追求宴樂的狂熱。試想這樣的一個社會，除開那種能真實反映他們自己那種淫佚態度的喜劇外，再還有什麼東西可以博他們的歡喜？

所以彼時無論怎樣遠僻的地方，一般城市的士紳，鄉曲的土老，以至軍人貴族，莫不帶着自己的妻子趕上倫敦去看那種淫蕩的戲文。他們也顧不了京城裏怎樣的不合衛生，流行病怎樣的厲害，大家都爭先恐後的在戲場門口挨擠着。

我們若要明白這個混亂的社會的好尚和他們的情慾，便須把廚拆力和他的後輩法夸耳 (Farguhar) 及凡布魯 (Vanbrugh) 或孔格雷夫 (Congreve) 的喜劇來研究一下。廚拆力有「英國之波馬社」(Beaumont and Flammock) 之稱；他將當時的情狀描寫得比半法蘭西產的哈密爾登 (Hamilton) 的圖畫還要精密；此外，還有皮普斯之日記 (Pepys' Diary) 一書，於當時的生活也寫得極細。

查理士第二和詹姆士第二兩朝，英國喜劇天才的蔚起，確乎是可驚人的。此外英國再也不會產出這麽許多

多才的戲劇家，也再不能吸引這麼多的觀衆到劇場裏去。

英國戲劇和社會生活的這種風氣延續頗久，纔漸漸衰退下去，及至威廉第三之朝，便似乎突然終止。彼時神學家耶利米·柯勒頁 (Jeremy Collier) 號召了一班失意的清教徒，自己爲首領，借着與論的名義對放佚的戲劇宣戰，并對孔格雷夫及德來登也不留情，而對尉拆力和他的勁敵托馬斯·杜爾飛 (Thomas d'Urfley) 攻擊尤力，時人對於這種反動頗示好意。柯勒頁因得利用這種心理施深一層的攻擊，甚至說彼時國家的禍患以及王政的衰落都應歸咎一般戲劇家的。社會上聽見他這種議論也都很相信他。他的一部小冊子 (A Short View of the Immorality and Profaneness of the English Stage, 1696-1699) 勢力極大，會替戲劇的道德樹立一種新標準，當初英國的人心因社會好尚和思想驟經劇變的結果，差不多已經喪失自制力，至此乃回復常態。於是喜劇便喪失了牠的生機。同時比較適合國民性情的文學漸漸發達推廣。於是不知不覺之間，小說頂替了戲劇的地位，並且蠶蝕進詩的地盤，因爲散文既在小說裏佔據了重要的地位，詩的勢力就漸漸衰落了。

我們可以看出彼時英國的散文確已按條理的發達了。彼時散文作家中頗不乏幾個富有獨創性的傑出人才，例如道德家的羅伯·柏吞 (Robert Burton) 便是其中的一個。本世紀初期的培根 (Bacon) 和後來的霍布斯 (Hobbes) 都用拉丁文做他們哲學的大著作；但是後起的哲學家都是用國語著書的。便是培根的論文集 (Essays) 也何嘗不是用極精美的英語做的呢？至於培根的作品及於後世的巨大的影響，那是無待贅述的了。只

可惜他因受野心的驅使，良心上蒙着障蔽，致使人品不獲如其天才偉大。若從智識的觀點看他，他確乎是一個極重要的人物——因他是個求智若渴的人物。他曾使哲學擺脫了煩瑣主義的公式而從事於事實的研究。他曾把人類的智識細細分類，即使不能算是「新方法」的創立者，而其證明歸納法的可能性的極大功勞也是萬不能掩的。

培根又管促成散體論文的文章發達，使成英國文學中的一種特色。從此約半世紀後，便有許多著作家，或以滑稽的議論，或以新穎的譬喻，或以流暢的風裁，或以明達的思想，或以剛決的論斷，各於散文擅其所長。而愛德遜（Addison）與理查·斯提爾（Richard Steele）兩人，則不久即以論文推廣到論辯的範圍。

至此，已將近女王安（Queen Anne）的朝代了。這是英國文學的古典時代，別有牠自己一種莊嚴優美的作風。自女王安恩以降，英國以國內政治之興隆，對外勢力之膨脹，及美術與文學之收成，遂得與最居前方的諸民族並列。

第四節

但是這個時代的意大利文化卻很覺得有些遜色。十七世紀的意大利，確乎是一個衰落的民族。牠的天才似乎因發展得太匆遽，太盛旺，所以暫時告乏了。我們看彼時的意大利，似乎走進一種很沉悶的空氣，絲毫沒有生意

可感發得出什麼傑作來。便以文字而論，也已改變了，不像從前那麼漂亮了。呻吟的聲調，誇飾的辭句，纖巧的字眼，以及毫不貼切的譬喻，到處都可以遇見。作家之中不是模倣專講形式主義的瓜里泥（Garrihi），便是師承上文說過的那位瑪利諾。然而也不乏幾個值得注意的人物。例如披阿布累刺（Chiabrera），基第（Guidi），費利加查（Filicaja）等人的抒情詩，都能超脫當時一般惡劣的作派。薩佛脫·羅撒（Salvator Rosa）與波卡利尼（Boccalini）的諷刺體，頗能流露作者的慧心；阿勒撒德羅·塔索尼（Alessandro Tassoni）的滑稽文，亦頗有名家的筆意，但是這幾個人才，便要算當時的孤例了；自餘作者雖實繁有徒，卻都庸庸碌碌，雖模倣法國文學而亦不能有其比較站得住腳的作品則大半為專著，例如哲學及科學，且多用拉丁文。此派作家最著名的計有伽利略（Galileo），喀西尼（Cassini）及托里拆利（Torricelli）。

西班牙政治，此時亦值衰落，但雖以當國者之麻木不仁，教士之非愛國舉動，社會之困窮，人民之斲喪元氣，其於文學，卻頗能維持先烈，未致如意大利之一落千丈。西班牙當十七十八兩世紀中，會產出許多關於戲曲與浪漫主義的作品。

向來人都說戲劇能確切的反映一般社會的狀況；我們要證明這句話的真實，當以此時西班牙的戲劇為最好的實例。戲劇是西班牙人向來愛好的。十七世紀中的戲劇已成為支配西班牙社會的主動力。就中宗教劇尤其能訴於觀衆的官感和心靈。彼時西班牙的民衆，智識還未甚開，凡事容易置信，所以會產出許多「靈異劇」，頗受

他們的歡迎。彼時人大都不喜學問，而喜荒誕不經的傳說，如匹勒三聖母（Marie-Dame del Pilar）和聖以錫多（San Isidoro）一類的戲劇都是他們最喜歡看的。當時的 Aulos（宗教短劇）演的大都是天上的事情，頗能供給他們以這類材料，這種宗教劇和法國的神祕劇性質很像，也有獻聖母用的，也有獻各城所供奉的先聖用的，和當時人的思想最是契合。這些戲劇對於異教徒，對於不信仰者，對於非正教的信徒，均取極嚴厲的態度，而對於犯罪者和作惡者則異常寬容。作此等戲劇的人，大部曾受過神學教育的訓練——大部分均係牧師和祭師所作——他們的宗旨恆在表揚教堂，殉道者，及信徒的功績。材料常極豐富。作法也曉得布局，但於人物之穿插，往往很疎漏。作者為迎合觀衆的心理，往往將「變幻」的場合增多，因為彼時的觀衆，表面上雖是篤信基督教，內裏卻都未脫異教的天性。

但也有些作家不限於作宗教劇。才具較高的作者，都曉得從實際人生中去尋求感情的祕密。他們所作的喜劇，設境很有變化，情節也很細密，且具有一種天然的意趣，容易引人發笑。

加爾德倫（Calderon）便是當時一個很重要的著名戲劇家。他的作品不期然而然的流露出東方作風的痕跡。他所包含的範圍極廣，有寫極風韻的戀愛私情的，也有寫極可怖的情緒的。他的喜劇，有一部分是精美的牧歌，具有一種輕快飄逸的性質；但其他戲劇則有一部分異常雄勁，其中的對話都很簡捷響亮，能給人以強烈的印象。他的心思很細密周到，所以他那種浪漫的形式之中恆帶有一種哲學的思想。他具有一種驚人的天才，曾受着

強有力的靈感，所以他能將西班牙人心中所常有而未發的觀念用一種新的藝術表達出來。他因有這種種的品性，所以他不僅是一時的人物，並且是將來的人物。

前乎加爾德倫的戲劇，如拿哈洛 (Naharro) 及芮達·洛帕 (Tope de Rueda) 的作品，類皆粗劣儂蹇。加爾德倫的事業便在替西班牙戲劇造成一種個性，加爾德倫之外，還有未加·洛帕 (Tope de Vega)，阿拉昆·約翰·露意茲 (John Ruiz de Alarcón)，摩利那·提耳索 (Tirso de Molina) 及卡斯特洛·給倫 (Gallien de Castro)，有的比他早幾年，有的和他同時，也都和加爾德倫從事於同樣事業，不過能力都比他稍差。摩利那·提耳索雖不讓阿拉昆，卻須居加爾德倫與未加·洛帕之後；他的作品直至他死後二百年才有人賞識。他的戲劇，作風很奇詭而不規律，但是生氣蓬勃，且富於諧趣，其中不流於粗俗癡重處都具有真正之喜劇的精神。而且他只當戲劇是一種娛目的東西和發揮他的詩的工具。未加·洛帕的戲劇觀念便比他廣闊。他力求戲劇對人生忠實，而且他行文極迅速，卻必求他的作品有一種真正的心理的基礎。在他那些不假思索的作品裏，很可以看見些極可愛的場子。他的詩比摩利那·提耳索宏富，而且偶有幾處宏大的思想是可以驚人的。

然而西班牙人的思想並不完全限於戲劇。牠在別種文學裏也流露着很大的才情，例如古典派作家索利斯·安多尼奧 (Antonio de Solis) 的文章，幾令人疑為馬利亞納 (Mariana) 之筆。他所做的歷史含有小說的美趣。彼時歷史家、百科全書家、政治論文家，和所謂「良心研究者」(Casuists) 一般多。厄斯科巴 (Escobar) 和他

的一派，是當時關於良心事件的精神的指導者；他們能用一種巧妙的方法使世俗的利害和宗教的教義不致相衝突，能用一種曲折巧辯，替罪惡的行爲辯護。同時因神學的詭辯主義發達，而 *Picaresque*（以盜賊無賴爲主人公之小說）的作者愈加放肆。

十六世紀中門多薩·赫爾塔多 (*Hurtado de Mendoza*) 及其同時人馬退阿·阿雷曼 (*Matco Aleman*) 曾創一種特殊的文學以描寫半島上一種時行的人物；前者作拉薩利洛·特託梅斯 (*Lazarillo de Tordes 1553*) 是一滑稽傑作，後者作姑斯曼特爾弗於歌之歷險 (*The Adventures of Guzman d'Alfarache, 1599*) 是一部極有趣味的小說，我們可以說是作者的自傳。這兩部小說便是 *Picaresque* 的起源，從此此體漸漸發達，成爲一種盛行的文體。這種小說極能反映當時的社會狀況——由冒險的精神，僧侶的偽善，和一切階級的情風造成的狀況。當初國中因富而多事，此時已差不多是餓鄉了。當初美洲新開闢時大家有擄掠品可以朋分，如今可沒有這樣舒服了。然而無論貴族中人和遊方的歌者，因都抱着野心所以早已不專工作。人民因欲不工作而生活，大家都信賴奸謀，詭詐，以及投機的事業。於是乎凡事都以運氣爲原則而以陰謀爲手段。於是乎高等與下等的冒險家，紳士，司法警察，浮浪子，學生，賣淫婦，僕役，竊賊，地棍，流氓，走江湖的，以及乞丐，無不靠着機智欺詐爲生活。當時一般 *Picaresque* 的作者所描寫的，便是這一類的紳士，因爲他們在大市鎮裏到處可以遇見的。當時作家爲雷翁·佩累斯 (*Peres de Leon*)，芬遜特·厄斯皮涅爾 (*Vincente Espinal*)，羅查斯 (*Rojas*)，給發刺 (*Guerran*)，

三多斯 (Santos) 及梭末多 (Quovedo) 等，都從這一類的紳士身上得着無盡藏的資料。但這一大批作家中，惟梭末多已為全世界人所賞識，也確乎有傑出於別人的地方。

梭末多有非常的學問，宏富的思想，而且多才多藝，所以是西班牙最大名人之一。他曾做公使及其他外交官，是與蘇拿公爵 (Duke of Ossuna) 的摯友，於當時重要的國事無一件不會參與，時而名動全國，時而遭人辱罵。但他的文學上的名譽早就成功。他雖則一生忙碌，卻能抽出功夫從事著述，所著有歷史，小說，關於道德的論著，及諷刺的詩，今已佚其大半。他的文章長於諷刺力為常識和理性辯護，以抵抗社會上的惡好而又含有一種活潑的諧趣，一種雅致的，鋒利的，峻刻的諷諷語氣——因此之故，我們可以當他是亞里斯多芬 (Auchanus)，拉布勒，斯尉夫特 (Swift) 及丹諾·笛福 (Daniel Defoe) 等大滑稽文家的繼人。

第五節

我們在這個歐洲文學的烏瞰圖裏，必不能將荷蘭遺忘了。因為荷蘭過去的歷史是很光榮的，十七世紀的荷蘭，也猶之英、法兩國，正是智識上異常膨脹的時代。彼時荷蘭共和國 (Dutch Republic) 道德政治均已發達到極點。

荷蘭雖是一個小民族，其分子雖大半不過是漁戶和商人，但他們以繼續努力的結果，對於自然界和人類的

競爭均獲勝利。他們終於奠定了自己的領土，防止海水的沖入，建築堤防，開濬湖沼。自然界既征服之後，乃進而驅逐外人的侵略者，恢復宗教和國家的獨立，而使海軍的聲名傳揚於全世界。於是蘇門答臘，爪哇，印度斯坦，錫蘭，紐西蘭，巴西，及白基阿那（Guiana）至好望角一帶的地面，便到處都可見橙子形的旗子飄揚了。在海上，則有凡特繪普（Van Tromp），彼脫漢姆（Piet-Hein），奧普黛姆（Opdam）等人的功業而聲威大震，在大陸，則雖路易十四和查理士第一的聯軍也居然敢對抗。在外交上則其大政治家揭特維特（Jan de Witt）之名竟與當時歐洲最自傲的君主並列。而且彼時的荷蘭還不僅是個強國。並且是個學者的窟宅和「自由」所託庇的地方。當羅馬舊教徒不見容於英國而相率到法國的時候，新教徒因路易十四及其謀臣不能容忍，大家都託庇於荷蘭，所以貝爾（Bayle）嘗說荷蘭是「避難者的大方舟」。同時阿姆斯特丹（Amsterdam）和鹿特丹（Rotterdam）兩處的印書機以甚多的著作供給於市場；若在宗教上，或政治上專制的國家，這種現象是決不能見到的。

十六世紀中，荷蘭因宗教改革的影響，會產生一大批辯論的文章，大都是拉丁文做的。同時因耶穌派所提倡的古典的教育，而神學家，文字學家，編譯家，與一般學者輩出，這又是荷蘭所極可自豪的。此外還有許多模倣賀拉西和味吉爾的拉丁詩人，與古學家互相輝映。其他則效法法蘭西人扎克圖（Jacques de Thou）用拉丁語作重要的史書。格老秀斯（Grotius），玻蘭（Bolland），戎松（Jansen）等則以法律的及神學的著作負盛名。斯賓挪莎以一隱居的貧士，創造他的著名的理想汎神論，而一般以才氣自負的文人則方競相模倣拉丁古文藝一露

其頭角。

所以彼時荷蘭，不僅是歐洲的「自由」的託庇所，並已因其社會狀況之優良而成爲拉丁精神的保護者了。彼時最能代表這種精神的，如格老秀斯，學問極博，爲近世國際義務說的創立者，他具有疏坎的高偉氣魄和辛尼加的識力；又如丹品·亥因樞烏 (Daniel Heinsius) 可以繼味吉爾崇閔的詩風；其子尼古拉·亥因樞烏 (Nicolaus Heinsius) 則有與維特的風格的美趣，白雷克希烏 (Bruechius) 則可上追普洛拍細阿。同時法蘭德斯於模倣拉丁古風亦異常努力，希望做荷蘭的勃敵。如威廉·柏靈 (William Beun) 的牧歌 (Idyllen) 頗極天真淳朴之美，可稱模倣作品。

然而荷蘭人並不因模倣拉丁文學致犧牲其國語。他們具有一種由真正的崇祖精神所涵養成的愛國心理，所以使國語常能保存且衛護着不使退化。至於彼時荷蘭主要的詩人則爲奉得爾 (Vondel)，卡次 (Cruys)，與和夫特 (Hoofth)。

奉得爾是一個卓絕的天才，就是到現在也仍舊要算荷蘭的主要詩人。他在密爾頓之先，已有一部傑作的悲劇名曰惡魔 (Taalien)，題旨和失樂園一樣，即所描寫的也同爲撒但的失敗和天堂與地獄的戰爭。柯奈耶·和夫特的詩才則不如史才偉大，因爲他那種雄健的筆力，嚴謹的態度，以及精覈可徵信的記載，都足證明他不愧爲荷蘭的塔西陀。然而三人之中聲名最普及的還是雅各·卡次。他的著作，都具有一種天真簡朴的作風。可爲誠實

和平生活的日用寶鑑，故有荷蘭第二聖經之稱。又泰得爾所編的國民戲劇 (*Gynnecht van Amstel*) 最初以一六三七年開演於阿姆斯特丹，至今還是年年要演，替作者做紀念。

第六節

我們若將視線移到德國，便看不見這般興隆的氣象了。彼時德國，因各種原因造成許多可慘的景象——從前世紀後半開始的內亂，已使國力漸漸薄弱了；此外還有因「三十年戰爭」造成的莫可名狀的困狀；組織帝國的各邦的無窮期的分裂，及各邦君主的屢次更替，終至釀成可慘的社會大革命。彼時帝國的當局但有虛名而無實力，無所謂國民生活也無所謂愛國心。各王國也分裂得支離破碎，但存許多水火一般的采邑。古代的制度和國力業已一無存留，所存留的祇有如黑智爾 (*Intel*) 所謂一種「有組織的無政府狀態」，在這種狀態底下，什麼思想，感情，感興，自然都被窒塞了。所以彼時的語言和文學，也和社會及政治狀況同樣的混亂。

無論什麼時代，無論什麼國家，都沒有經過這般層出無窮的禍患。便是當初德國受異族大蹂躪的時代，及大疫流行的時代，其所受的災難也沒有這般厲害。

德國本來有許多廣漠的開墾地，有許多工商業極發達的城市，有無數存着古代愛國遺風的村落——這都不過還是眼前的事情。而且各處的農奴制度也已漸有消滅的趨勢。誰知「這大風潮」（指三十年戰爭）一過之

後，所贖的祇是一片荒涼的混沌境界；寄生動物將人所播種的東西毀滅盡淨，而人又須與野獸去爭奪森林、田野和蔭庇的地方了』（Gustave Freytag, Picture of German History—The Thirty Years' War）當三十二年戰爭之終，德國喪失三分之一的人口和五分之四的財力。後來須經過兩世紀的功夫纔得恢復元氣。

宗教改革運動雖是很不完備且行動的範圍也很有限制，但曾使思想上奮鬥的能力加強。當十七世紀初期，因有印刷機的幫助，文學作品出產得極多，有所謂「覺書」（*Avivios*），「傳音書」（*Messenagers*）小冊子，誹謗文等等，但不幸講經的文章，論道的文章，以及無關緊要的聚訟文章出得太多了。此等作品的藝術的價值都是很小的，但其結果卻是一種真正的活動，又凡屬非宗教性質的作品，則都顯有一種傳布思想和智識的趨勢。因有這些著作，所以當時的人，個個都曉得自己的利害關係和一般社會的利害關係。各種小冊子流行得極速，因而引起一種向所不及料的心理激動。又因此而對於一個人或一件事，人人的良心都被喚起，這已頗有近代新聞紙的作用了。但在後來這種極大的患難和公共信用破產的當中，這種無私的利害觀念全都消滅了。戰爭已將人心磨練堅硬，不復能對他人發生同情，即對於自己的痛苦也已麻木了。於是人人對於他們所值得研究的東西都似抱一種仇視的態度。彼時正當教派的衝突異常激烈，神學家的無謂的爭辯層出不窮，但有一種所謂「持敬主義」（*Pietism*）的幻想在那里安慰人心，所以一切正真重要的問題反都完全沒有人理及。這種所謂「持敬主義」是雅各·斯賓塞（*Jacob Spence*）最先提倡的，但後來流於極端，致變成一種冷酷而虛妄的清教主義。

德國當牠歷史上這種慘淡的期間，人人的天才都被窒塞。而且這種幽暗的景象，差不多是普遍的。所以微爾馬（Vilmar）嘗說十七世紀是「悲慘的十七世紀」，又有人說牠是「法·德世紀」（Frano-german Century），是凡事都屈從外國權力的時代。結果產生了許多奇異的雜亂的模倣品，以古典作品的風味和「高盧精神」相混和，以盎格羅·薩克森性質和條頓性質相結合。

因外國軍隊的侵入，不但將他們的習慣傳染給德國人，並且影響及德國的言語，因此德語驟然間充滿着拉丁語，意大利語，西班牙語，而尤其是法語的字眼。詩人紐馬克（Nemank）曾有一句滑稽的問話道：『假如這些民族都要將他們借給德國人的字眼取回去，那末贖下來的德語還有多少呢？我想牠必定要像一隻拔光毛羽的鳥兒，精赤赤的不堪寓目了！』其實雖有這些外國元素的增入，而德語的內容反而貧瘠，並未加富。彼時稍有生氣的作品但有諷刺文，宗教的及論戰的著作，以及格林麥脫生（Grimmelshausen）的著名小說 Simplicissimus（老實人）——是門多薩和梭末多等人的 piqueresque 的極精巧的模倣。有大才具的人物如亞里斯多德以來學問最駁博的來布尼茲（Leibnitz）和格老秀斯的繼人溥分道富（Prebendorf），所著都關於政治及社會的大問題，但他們著書不用德語而用拉丁語及法語，因為要想使歐洲各國的學者都能懂得他們的想法和著作。以威斯特登里亞條約（Treaty of Westphalia）的結果，無數的小國產生或被承認。這些小國的宮廷於跳舞，意大利歌曲，小品詩，故事，悲劇，及客室裏演的喜劇，都很提倡。模倣法國的風俗，習慣，和語言，已成爲一種狂病；但

是下級社會的風俗，卻仍舊毫無文雅氣；而上流社會的進步遲緩，使德國遠落於俄羅斯人除外的其他一切民族之後。

第七節

彼時這種凡事模倣法國的傾向，不但德國有之，歐洲民族的大多數都有之，不過政治上的事情當然是在例外的。這種普遍模倣的傾向，都是由一種景慕的心理感發出來的；因為彼時路易十四的威嚴，他的宮廷的燦爛。以及他在位時所產出的許多文學的傑作，在在都足令人仰慕。尼美根條約 (Treaty of Nimwegen) 可以證明法國軍事上的聲威已達最高度——無以復加的極度。十七世紀的法國曾有無可倫比的豐收；凡是牠的早年成熟的進化上所必需的東西，都已具備。及既達極度之後，牠的光華便漸漸地很莊嚴地衰落了。當查理士第五的帝國淪於敗落的時候，路易十四的王朝和牠的勝敗的事跡，以及他的無常的幸運，不朽的作品，也都同樣迅速地變成歷史上的隙蹟了。

臨近的十七世紀，會遺留給繼起的時代以一種玄妙的神祕的能力，一種待實現的理想和待履行的使命，彼時人人心理上隱約已有一種願望，要想創造一個較好的社會制度而藉理性的力量使牠擺脫壓迫和成見。因為古代階級制度的規律的寬鬆，以一個權力之下而混有各種社會的狀況，以帝王握有無上的權力——這種種

事實，早已使人心心得着一種至高的感想，覺得人類的心和良心都是平等的，所以不平等，祇不過是偶然的差別。然而這種需要——或寧說是這種對於道德再生的隱約的願望，這種要求人類須與自然界受同樣公平法律待遇的暗示，表現得非常遲緩，及至後來所謂「百科全書家」(Encyclopaedists) 出現，纔得真正的表白。

第十六章

哲學時代的實際開始不甚分明——文學的獨立性此時尚已顯露——法國西的百科全書家——龐耳特耳、狄德羅——歐洲各民族（尤其是英法兩國）的思想交換——法國攝歐洲文學最高權重達一七八九年頃

第一節

十八世紀的開始，像是一個虛弱有病的兒童，很無振作的氣象；牠的初年的發育受着嚴重的障礙。這世紀一開幕，便遇着種種惱人的困境。過去的光華此時幻化得很大，因把「現時」掩蓋住了。路易十四之死，已把法蘭西帝國的幻像撤去，此後便是凡事流於過分的「攝政時代了」。大凡文學，總是反映時代狀況的，所以彼時一般人的胃口都經過一種顯著的變化；文字上亦失去從前工整優異的美質。

前期的作家都不曾有直接的承繼人。龐耳特耳（Voltaire）、孟德斯鳩（Montesquieu）、冉扎克·盧梭（Jean Jacques Rousseau）、狄德羅（Diderot）、蒲豐（Buffon）這班人，都還不會出名。文學上方纔過去的

華已經一些都無餘贖，所贖的祇是一個毫無精采的「正確」罷了；牠的最高的成就也祇無非是過去的遺產。彼時文人如冉·巴伯替斯盧梭（Jean Baptiste Rousseau），是個跨十七世紀和十八世紀的人物。羅羅會把他推薦於法蘭西文藝院裏為自己的繼人。其他如特阿萊索（D'Alembert），洛郎（Rollin），勒薩日（Le Sage），佛蘭託（Voltaire），聖西門等，也都像另外一個時代的遺民。和方興的時代似乎是隔膜的。內中要算聖西門為最傑出；在這種文學衰落的時代，惟他能夠發柯奈耶的雄健和特奧俾內的熱情而有之。

同時有一個新興的文派要想握文壇的牛耳。內中的封特涅爾（Fontenelle），才情充旺，惜所作恆缺乏自然；脫勒松（Turasson）與拉摩特（La Motte）也有些詩才，但他們提倡一種奇警悠渺的作風，而排斥偉大質朴的詩味。惟彼時此派但有一個很狹小的勢力範圍。

彼時惟有哲學，於警覺一般人的智識，最算成功。因為這時代黎明時的種種幻想久久未能實現許多強有力量的感情繼續的互相衝突；現實的事情不能和高尚的希望協調；現時直接的需要和將來的問題，常常發生衝突。及經哲學警覺之後，這時代方始曉得自己的運命。因為從前哲學雖未能擴張勢力，但已在培養自己的力量。十七世紀的人，雖則封鎖在教堂和王宮兩種範圍之內，低首於教會和古學兩種重權力之下，但已完全感覺理性和個人良心兩種不可漠視的要求。所以笛卡兒說：『我思故我在。』巴斯噶說：『一切人的尊嚴在於思想。』彼時高尚的理想家和精深的思想家便已把這兩句格言應用到心理學上去。及至十八世紀，以其時而譏諷時而熱烈的態度，遂

將十七世紀在個人身上發見的真理推廣到社會上去。十八世紀的思想家以爲理性、正義和真理，不應該單單在人的心靈具備之，並應在人和其同類的關係上表見之。十八世紀曾經樹立一種實踐的標準；曾經主張社會組織的改造。當笛耳達盧和拉布律耳的時代，道德的真理已經盡力的研究和考察，現在則社會真理的分析已成爲熱心思想家的目的。同時有一部分思想家甚至更進一步，要將道德問題和社會問題聯絡起來，遂致往往流於立異和詭辯一派。

此時一般熱心的理論家開始用動人的宣言式的文章替思想自由辯護。他們心中抱着三種信仰，而認之爲一切進步的源泉；其一，認定人是完善的，其二，認定人有不能分離的權利，其三，認定人對於正義有一種不可撲滅的意識。他們一方面提高個人的尊嚴，一方面努力着使人類超脫一種爲國家或民族的界限所束縛的褊狹的理想。他們要使世界認識一種全人類的理想，以別於民族的理想。這種人類觀念，在十八世紀文學中，先則盛行於法國，其後便歐洲一切文學中都有了。

這種文學開始取得一種向所未有的獨立性質，即以作者的人而論，亦漸漸見其具有獨立的性質。彼時作家和思想家，因得一種方輿的勢力——輿論——的援助，在道德上握有一種非常的威權。他們所構成的哲學的社會的思想，勢力足以橫掃全世界；他們對於貴族的會議有很大的勢力，而人民的希望也建樹在他們身上。

但當時有一個人——即笛耳特耳——以其海博的智識，取當時種種進取的懷疑的態度，而集其大成。他對

於足以引起知識的好奇心的一切題目，無不加以理想和討論，其間是非難出，而處理的態度亦不一而足。他是一羣改革家的領袖。他於一切思想逐一涉及，而他這種研究的精神（同時亦自然成爲一種否認的和破壞的精神）於物理學，形而上學，倫理學，名學，及歷史中無不灌注。

此時一班新興的哲學家，和十六七兩世紀替福耳特耳做先聲的一班學者態度不同。十六七世紀的學者，因爲反抗教會，所以將教會所認爲人類智識範圍以外的大問題解決了，因而對於神學上但有一種間接的影響，此時的新興哲學家則並這些被認爲信仰智識的基礎的原則也放膽的攻擊了。

第二節

在事實上，則從事於這些嚴重問題的人比較少數。這時代雖是一個智識的進步的時代，而道德的標準卻低。彼時的人，普通都免不了世俗的嗜慾，而且大都放浪形骸。小說，喜劇，情節輕快的故事，以及散體和韻體的小品文字，往往爲一般閒暇階級的消遣而作。女性的勢力在「文士館」中和交際場中，直可以壓倒一切，文人的榮寵和成功，都須以女性的意見爲輕重。結果使一般文人的思想都脫不了獻媚於女性。其中有一部分，但知逞其才華以文飾其言情的作品，例如馬里服（Marijux），於戀情之分析，稱爲當時無敵的能手。

馬里服所最愛好的題材便是研究女子和她的特質，他能用一種極細膩的文心和筆致，以描寫戀愛和蠱惑

的極細的層次，因此之故，他極得女性的傾心。同時阿卑·普累服 (Abbe Prevost) 文章雖不見得怎樣新穎，但能窺見此中的祕奧，因而他所作的小說，頗能動人，自成一種風致。還有較後輩的克累俾永 (Crébillon)，是所謂「不道德的小說家」的最早一人，他因有亂心 (Egarement) 一作，久為一般青年男女所傾倒。總之，當時言情的文學是人人喜愛的。時代的好尚既如此浮薄而放浪，所以彼時一般想像的文學極容易引出人的眼淚。然而不久，這種言情的作品遂一變而為理性的問題，世俗的娛樂一變而為利害的觀念，個人的研究一變而為社會的研究；這其間的過渡，也極其自然。於是即小說也含有哲學的意味，歷史更不待說了；終至哲學的氣味普及於一切文學作品。

於是福耳特耳和一般百科全書家出來解放那時人因縱慾而枯死的良心了；因為那時的人是沒有思想自由的。那時有無數的書籍都被政府的檢閱吏禁壓，若是由外國輸入的書籍，則在邊境上便被阻止禁壓。書信的祕密常常為國家起見而被侵犯。戲場上則有一種官吏專管取締的章程。就此等事實看起來，已很可以見得當時一切事情壓制得實在厲害。正在這種情形的時候，思想對於根深蒂固的弊害的反抗開始了。當時人如福耳特耳，狄德羅，冉·扎克·盧梭等人的勢力，擴張得異常迅速。

一個人及於他的時代的勢力之廣大，從來不會有像福耳特耳的。他所以能如此，一部分由於他的品性中的長處，一部分也由於他的短處。論他的長處，則為有伸縮性，有刺激性，有不倦的好奇心，有賅博的知識，有熱心，有抗

爭的態度，有若爲一種無上的威權所維護而能感化周圍人的健全的常識；短處則爲種種錯誤，但雖屬錯誤，卻都具有一種魔力。

沒有一個人能像狄德羅適合當時人的騷動的感情。他是一個學者和批評家，故事和小說作家，戲劇家，「萬能家」，是偉大的傑出的思想傳播者。他曾做大百科全書的編輯主任，曾創立一個學派，爲公認的文學領袖，爲大智識運動的大原動力。

福耳特耳和狄德羅是訴於人的心的。冉·扎克·盧梭則喚醒人的靈魂，所以結果比前兩人既深且廣；他的勢力所以一直能傳到現在而仍不滅，是因他能重新鼓舞人們對於自然的愛心。一個人的口才，無論好歹，要曉得牠能有多少力量，盧梭便是一個最顯的例。他曾使十八世紀後半的人沒有一個不吃驚，沒有一個不受他的魔力。他並且使我們現代人也愛慕他，不獨是爲他的長處，而並且爲他的短處。他曾引起法國文學的變化，會以正義和平等的觀念輸入習慣和法律。可惜他未能完全免除矯情的論調，而且我們讀他的書，便是一頁之內，有時要佩服他，有時要憐憫他，有時還要大不謂然；假如他能把幾層毛病都除去，那就尤其好了。

這三個大思想家和孟德斯鳩的解放主義，其源出自英國培根，牛頓，陸克等人的著作，一部分被他們所採取，先則流行於法國，未幾遂普及全歐。三人的思想，有時似乎分歧，而實支配於一種共同的動機之下，此時已到處都可聽見。牠們傳播得很速，打破一切障礙，並且有一種幾乎無限制的推廣力。因福耳特耳及孟德斯鳩的影響，而公

開研究，自由討論，和普通批評的原則遂侵入政治生活以至風俗及法律，且已成爲近代一切事務的必要現象。又因這種學說訴於人的精神方面，使感情和思想同時都受感動，故更加上一層魔力。盧梭一派的哲學家，便是德國所謂「啓蒙派」(Illuminati)，英美所謂「友愛派」(Philadelphians)，以及一般純理想派的哲學家，都以「唯智主義」即正義之哲學的解釋，而目之爲無上的主義。

彼時法國思想成爲時代的思想。當其在一七五〇至一七八九年之間，其思想勢力之大，爲中古時代以來所未嘗有。

第三節

彼時德國，法語異常得勢力，實不僅是一時的現象。從一七五〇年以後，法國人到柏林或波次但(Potsdam)遊歷的，簡直要當自己是在巴黎或維爾賽(Versailles)。腓特烈大帝雖則誇耀自己本國的威力，卻對於德國文學抱厭惡的心理。席勒爾(Schiller)嘗痛哭流涕的說：「我們已看見詩已被祖國最大的兒子——即腓烈特——所厭棄，牠已離開帝王的勢力，已不復得帝王的保護。」腓烈特所注意的，只有由巴黎運來的書。當柏林王家學會(Royal Society of Berlin)改組而摩拍屠伊(Maupertuis)被任爲會長的時候，腓烈特力主用笛卡兒的文字做記事錄；這是違背向例的，因爲按從前來布尼茲(Leibniz)所定的例，會中的記事錄是向來都用拉

丁文的腓烈特又在都城裏創辦一個徹底的法國學院。

彼時德國可以說是人人都讀新亞羅伊茲 (*Neuville Hulois*) 和愛彌爾 (*Emile*)。這兩部書中所包含的感情主義，頗曾養成德國全部上流社會的風氣，這是應該感謝盧梭的，且這兩書頗得德國一般女子的傾心。德國的浪漫主義便是深深灌注着這兩部書中的精神的。

在俄國，此時正當喀德隣二世 (*Catherine II*) 在位，她還未忘卻自己的淵源是德國，所以也逃不了和德國捲入同樣的潮流。牠所從事的事業是在將她少時所慣見的文化介紹入俄國。她徘徊於當時俄國文學兩種反對潮流之間；彼時的俄國文學，離開幼稚時代還不很遠，但已在競爭建設文化標準的特權。牠的兩種潮流，一是西方的元素，急急要容納外國的勢力，一是東方的或斯拉夫的元素，隱隱中都望自己的進化。喀德隣更替着祖護這一種和那一種，但對於德法兩國一般讚美自己的文人略有所偏倚。當她未曾慮及自由思想的蠶蝕將成爲一種恫嚇之先，她的態度一逕如此，因為她當國的時代可分爲兩期，後半期的態度和前半期的態度不同，這是普通都知道的。而且她在不致損及專制威權的範圍以內，常常和一般百科全書派書翰往來，稱許他們的高尚的獨立精神，又讚美福耳特耳智力的偉大。她對於狄德羅也頗表示寵異，常常獎勵聖彼得堡的詩人模倣法國作品，並且自己也實踐她的主張，萬幾之暇，恆必從事於智識上的娛樂，或則編喜劇，或則從事於教育的著述。一時朝廷命婦相率效風，競以致力學術相誇尚。就中有一個，便是達士科夫郡主 (*Princess Dashkoff*)，她是喀德隣的朋友，她會做敏

法國開設一個文士館，又曾做學會開會的主席。

但在聖彼得堡，此種對於法國的普遍模倣，因為缺乏人材，所以結果並不甚可觀；所出的產品大都根基薄弱，且完全缺乏創作性，以及魄力和生機。例如所謂「北方的塞密刺密斯 (Sennarins)」之宮廷詩人代爾嘉文 (Dierjavine)，作品中的抒情天才盡為華詞穉采所掩沒。又如蘇馬洛可夫 (Sumarokov)，抱着要做俄羅斯的拉辛的志趣，而所作卻連坎匹斯脫郎 (Campistron) 的程度也未必夠得上。他的作品大都為不相干的小品詩，神話中的瑣事，以及外國情歌的模倣。總之，這個時代是俄國文學正在作種種最初嘗試的時代。當時有一部分作家，曾試借外國文學的指引，在自己範圍以內有所創造，這誠然是不可掩的事實。但同時外國思想的遠處音波亦固不可阻止，例如蘇馬洛可夫的諷刺詩，便是含有外國思想的臭味的。

第四節

至於此時的英國，卻不完全受法蘭西文學勢力的支配，而自威廉·騰普爾 (William Temple) 撒母耳·約翰森 (Samuel Johnson) 丹福·笛福 (Daniel Defoe) 哥德斯密 (Goldsmith) 斯耐夫特 (Swift) 奧弗爾丁 (Fielding) 斯摩勒特 (Smollett) 奧斯騰 (Stearne) 等人的時代以至顏普 (Pope) 和普賴厄 (Prior) 的抒情詩時代一段期間，法國影響尤少波及。騰普爾以下八人都是當時英國第一流的散文家。就中有一部分能以

一種極高的技術與智識及判斷力相攙和，另一部分則能運用細緻的想像力以描寫實際生活，並能在奮發創造出種種不朽的人物。英國雖也模倣法國的作品，且承認能說法語是一種會受高等教育之招牌，又有許多法國詩的翻譯和模倣。英國的懷疑派，大多數都從皮耳·貝爾(Pierre Bayle)——龐耳特耳的先驅——的字典裏去搜集材料。然雖如此，而英法兩國的作家中間，若有一條鴻溝劃開，英國作家對於古代流傳的學術，祇不過受着牠一點皮毛上的影響。英國並不因稗販法國的東西致阻止他自己的個性的發達，而且英國對於法國哲學的發達，頗會供給他一些極有價值的幫助，這是英國確實可以自豪的。龐耳特耳曾經研究陸克，頗普，牛頓的著作以及波令，布魯克，叩林斯(Collins)，武爾斯吞(Woolston)，托蘭(Toland)，拆斯忒飛(Chesefield)，廷達(Tindal)及察白爾(Chablo)等人的自然神論的著作。狄德羅曾經翻譯沙甫慈白利(Shaftesbury)，又極服膺理查孫(Richardson)。他公然承認理查孫為自己的先導和良師。其他如戲劇家力羅(Lillo)，斯滕，穆爾，菲爾丁，愛迭孫等，他也都會毫無猶夷的認為自己的師導。所以我們可以說英國的趣向在彼時法國的藝術上和風氣上，確有一部分部分的勢力。更進一步，若把法國從龐耳特耳到現時的文學的經過情形研究一下，而於兩國智識交換的狀況特加注意，那末我們又可以說，英國的勢力在法國文學上是到處可以感着的。但是十八世紀中巴黎文學界之研究英國文學，與其說是將自己同化於人，無寧說是解放自己的能力。他們所以要研究英國文學，其動機在於想把英國的制度 and 英國人的自由移植到法國，這種動機，我們可以見牠一天比一天有力。所以由牛津或倫敦傳到法國

的思想，不久便經過一度的精製，擴充，和改變，重又渡過海峽傳回英國。例如孟德斯鳩，對於這些最初傳來時只具一種純理形式的思想，吹入一種新生命，使人於唯智的抽象觀念中常常可以感着一種道德的觀念。福耳特耳則取英國學派那種冷淡的懷疑態度重新改換一下，因而也得着生機。如此，這兩國的思想潮流，繼續的交換，接觸，彼此的推動，反動。英國之取鑒法國，模倣法國，從未有比此時更甚，法國之取鑒英國，模倣英國，也從未有比此時更甚。這兩大民族的關係，真是奇怪得很；牠們不絕的互相嫌厭而同時卻又不絕的互相學習。牠們彼此懷着敵愾，卻又關係異常深切；時而相吸引，時而相排斥，不絕的因交換或反動而發生相互的影響。

英國的文壇雖會產生一長串經受靈感的詩人，戲劇家，歷史家，哲學家，超絕的論文家，以及其他爲全歐洲所景仰的作家，但也如其他一切民族，終免不了法國思想潮流的侵入。所以偉大的愛德曼·柏克嘗說：『巴黎是歐羅巴的中心，是英國人的西塞祿。』

第五節

十八世紀中，歐洲一切國家都感受着法國的影響，或則出於自願，或則由於一種強迫。西班牙，葡萄牙，以及威尼士等國的人，都是以排外自命的，對於法國尤其嫉惡。然而他們對於巴黎的事物，雖極細微的，也都竭力模倣，所以格黎枚（Grime）嘗替巴黎取了一個綽號，叫做『歐洲的咖啡館。』瑞士人的文學的偉大期便是十八世紀，

當時他們對於法國哲學的勢力竭力抵抗，智識上和宗教上一致排斥。就中柏泥斯高地 (Bernese Oberland) 以學者和思想家的亞爾伯特·哈勒 (Albert Haller) 自豪，祖利克 (Zürich) 至今猶數裴斯塔洛齊 (Pestalozzi) 爲教育界的光明；沙夫豪登 (Schaffhausen) 則曾產出近代歷史家的鼻祖約翰·馮·米勒 (Johann von Müller)；德爾福士 則有波德麥 (Bodmer)，德爾最 (Sulzer)，拉發忒 (Lavater) 諸名人，但是日內瓦 曾替法國產生冉·扎克·盧梭，因供給法國文學以歐洲發展最奇偉的居間人。彼時的西班牙，從文學的觀點來看，地位很是低下，所以除學步美楞得·發對 (Melendez Valdes) 和斐喃得司·特·摩刺廷 (Fernandez de Moratin) 及隨順法蘭西的勢力外別無他法。

彼時意大利的諾王侯，大都係半法蘭西產，所以對於法國趣味的侵入並不抵抗。然而具有天才的作家不但不缺乏，而且很多，且各方面的人才都備。我們可列舉的，一個是帕里尼 (Parini)，他將社會的種種弱點用諷諷的態度描寫出來；一個是美利 (Mali)，我們看他那種優美的牧詩，令人想見當初的提奧克立塔；還有一個是瓦拉諾 (Varano)，學步丹第和模傲阿利涅斯安的福脫圭拉 (Fortegueria)，就戲劇的作品而論，彼時受社會歡迎者不僅止歌劇 (melodrama) 與樂劇 (opera) 兩種，如美塔斯·塔濟奧 (Metastasio)，嘗以諧和的詩博得「意大利的拉辛」的徽號，他曾將音樂和戲劇合爲一體，旨在娛樂觀衆的感官。又如卡羅·哥齊 (Carlo Gozzi) 是一富於創意的作家，嘗運其充旺的創造力使當時萎靡不振的喜劇重復有生氣，他的勁敵哥爾多尼 (Goldoni)

則是一神怪故事的創作者，著作很有勢力而且宏富。

但是上文已經說過，意大利也未嘗不感受法國的影響。所以然者，大概由於當時法國的影響在一般政治的作家如柏卡里亞 (Becaria) 和飛爾哲 (Filangieri) 等人的著作中已經是很顯著，因為這班作家大都是癡癡在當時流行的哲學裏的。還有一個原因是在當時感受法國影響最深的大都係一班教訓派的詩人，如柏替 (Petti)，贊披利 (Zampieri)，斯卜佛里尼 (Spolverini) 等，或係一班作阿那克里溫短歌體，對唱牧歌體，或田園詩體者，如查比 (Zappi)，科塔 (Cotta)，巴勒提 (Baratti)，方東泥 (Fantoni)，尤其是福魯貢泥 (Frugoni) 等。又彼時法國的康的亞克 (Condillac) 正為帕馬 (Parna) 王傳，所以法國的哲學，意大利到處流行，其實即無康的亞克到意大利，也已經是可以流行的了。只看柏卡里亞嘗說：『我凡事都得力於法國的著作。』又說：『達蘭貝耳，狄德羅，愛爾法脩，蒲豐，這班名人的名字，每一提及，無不令人心焉嚮往；他們的不朽的著作，是我所常讀之書；他們的思想言論，是我日間所研求，夜間所默會的對象。』

科西嘉的叛黨曾要求盧梭替他們編法典。波蘭則曾請求盧梭替牠草憲法。後來（一七八三年）美國國會也曾以同樣的榮譽給哲學的歷史家和理想家馬不里 (Mably)。

此時的荷蘭，法蘭德斯語業已退為一種方言，荷蘭語亦僅供翻譯之用，故文學界除模倣法國外別無他事。本地詩人所描寫者，無非土地和種族的特質，母國地理上顯著的特徵，以及歷史上的事蹟；他們似乎以為此等元素

最足以激動人的感情。所以他們的題材，不外那一片由瀉泥及沙土混成的所謂荷蘭的地面，不外那因巨大的工程，堤坊，及溝洫而成爲世界最肥饒的國家的一片土地；或則描寫海濱和大澤的景象，或則描寫那無數的縱橫交錯的內河的景象；最後，還有傳說——即關於古代戰爭及航海的記載——也是他們的題材之一。這些題材，在多數詩人，已經是借夠應用。至於一般挽歌詩人和田園詩人，大都並無高遠的題目，他們大都喜歡用一種平易的作風，以描寫祖國河流，湖沼，海濱的種種可喜可悲的景象。因此，這班詩人嘗有荷蘭的「海濱詩人」的徽號，也許將來有一日能與英國的「湖濱詩派」去比較，也未可知。此派詩人並無一種共同的注意點，就中如休伯特·蒲脫 (Hubert Poet)，直是一個農人，想像力極強，又如白拉米 (Bellamy)，是個愛國者，文章很雄勁，但社會上都不很重視他們，此外又有滑稽的郎根狄吉 (Langendijk) 及深情的諾母茲 (Noma)，是兩個不幸的詩人，曾淪落在貧民院裏的。其餘的作家差不多盡是模倣路易十四和路易十五兩朝的戲劇作品的。

丹麥當基利斯當第七 (Christian VII) 和腓烈特第六 (Frederick VI) 的時代，也依順當時一般的潮流，且顯示語言上和文學上新近的進步，其最得力的人物是那威人路易·和爾堡 (Ludvig Holberg)，便是人人稱爲北方的福耳特耳的。

瑞典此時也借助外國的勢力以擴張他的勢力範圍，牠此時出產的著名作者有如奧勞約斯·達林 (Olaus Dalling)，哲學家有如斯威敦堡 (Svandenborre)，學者有如林尼阿 (Linnæus)，詩人及戲劇家有如基倫堡

(Gyllenborg) 奧克森斯廷 (Oxenskiöld), 拆爾格棧 (Kallgren), 力得納 (Lidner), 及荷爾曼 (Hallmann) 等。牠對於彼時歐洲光明之源自然也是傾向的。牠對於法國風氣和思想的模倣，進步得極速，及查理十第七之死與浪漫派興起的一段期間，此種模倣乃達於極度。這所謂浪漫派，宗旨在提倡日耳曼民族的精神而反對法國的勢力，蓋以爲日耳曼的精神與北方民族的思想較爲適合，後來斯干的那維亞思想所以終於成爲獨立思想，便是此派替牠預爲地步的。

至於彼時法國的勢力所以能如此普及者，實並不能歸功於少數重要的作家。這完全是彼時各國人的心理大家協調的結果。巴黎不過曾將全歐洲未經表現的思想成爲結晶罷了。

第十七章

智識運動釀成法國的社會革命——十年的擾亂——同時的英國和德國——德國對於智識上的事業趨於全歐——德國思想之爲人的發達——詩人與哲學家——智識界大活動時代以後之怠惰不發時代——維持之類體——世界的苦悶——即「世紀病」

第一節

上文已經說過，十八世紀的主要精神，從許多點看起來，便是努力對十七世紀的哲學家取一種反對的態度。十七世紀的哲學家大都主張絕對君主的原則，祖護宗教的統一，並且在文學和藝術的範圍，大家似乎都是承認「自由」無異於「創造」的境界他們也要科以一種規則。所以新時代一經能伸張自己的勢力，即便提倡改革。新時代的精神是以思想代替信仰。無論何種學問都主張重實驗。於是法國遂有百科全書家的事業，德國遂有所謂「啓蒙派」的運動，這種運動的最可注意的代表便是薇蘭（Wand），他是德國的福耳特耳。他將哲學

扶植起來以代替信仰，其勢力直迄赫特爾（Hortel）的時代。

彼時德國人民，有許多方面，都依順英國思想的潮流，這種潮流大都以薩克、沙甫慈白利及威廉第三、安女王（Queen Anne）等朝的自由思想家的思想而傳入德國。在法國，此等思想因一般作家之峻刻挑撥的性情而流於過激。同時對於社會方面，此等思想卻含有破壞的性質。一切偉大的社會改革思想，如愛好正義，希望比較平均的財產分配，與夫哲學家的純理想的學說等，終至一一都被認為絕對的，武斷的保守主義。

於是人人都覺得一種非常的危機將到了，許在一夜裏面可以將多年的建築的基礎盡行打破。同時外國的大事件如美洲殖民地革命的傳聞，正足以促進這種危機的發展。因為這些事件正替他們指示途徑，供給他們以一種及時的方法，教他們用政治手段去醫治社會的病毒，並打破沉重的鎖鍊。

當大革命還未實現之前，人人心中已經常有這種觀念。因彼時波馬社（Beumarohais）、飛加洛（Figaro）等作家曾經出現，他們都是長於激動感情的危險藝術的。婦人方面因被惑於種種幻想也急切的歡迎革命，她們的意見以為革命可以替他們解放精神上 and 思想上的一切束縛。關於政治的學說已從深處的所在引出，公然在文士館中討論了。這些文士館，大都為第一流名人聚會的地方，凡所議論，常足以激動社會，加之彼時法國是一個感受性極強的民族，所以此等文人雅集的機關，往往是危險的發源地。於此，當時的種種政治學說常受激烈的攻擊，共和主義的勢力，或有意識的或無意識的但見其日漸擴張。人人對於帝制都抱一種深痛疾惡的態度，其表見

在外的則爲種種激烈的行爲，或種種獸性的暴動。最後則大風潮終於爆發了。及至風平浪靜之後，而舊時的制度，狀況，便一點都無餘贖。

大革命大擾亂的十年間，法國文學實爲衰落期，其間比較有精神的文學祇有演說一種，其時著名的演說家有彌拉波 (Mirabeau)、洛蒙 (Vergnion)、巴那佛 (Barnave)、卡黎雷斯 (Cazalis)、馬倫內 (Malone)、里 (Maury)、西耶士 (Sieyès) 等。此外則有幾個清高的詩人，如度賴 (Duclot)、馬利、約瑟、社內 (Marie-Joseph de Chenier)，而尤著者爲多才之安得烈、社內 (André de Chenier)。他是一股古典派詩人的勁敵，浪漫派詩人的先驅。此外的作家還有約瑟、梅斯特伯爵 (Comte Joseph de Maistre)、巴郎士 (Ballanche) 嘗稱他爲「往事的先知」，他的得名全在激烈的法蘭西論 (Considérations sur la France) 一書。拉克勒 (Lacretelle) 及洛地佛 (Roederer) 則並倡道德的改良；日內瓦的馬勒特、度邦 (Mallet-Dupan) 文章寄隨雄勁，顯爲一個學步塔西佗者。但是這幾個人的書，當時人讀的很少。當時的一般民衆大都單靠各種新聞紙做精神的導師，——其實這些新聞紙的文章都是很粗劣的——對於新聞紙上所載的殺人案及謀殺案，往往假借自由的名義替他辯護，新聞紙之外，則惟讀粗劣的作品，崇講意氣的戲曲，以及道德上頗可懷疑的小說。故當鼓吹革命的著作絕跡以後的一段期間，法國文學的出產可謂完全停頓。

第二節

我們如若要看此時強力的偉大的文學的情況，則當移我們的視線到英國或德國。

英國十八世紀末葉，政治上的騷亂很是厲害，所以當戰爭和國事的要求中，沒有餘暇可以安安靜靜的提倡文學。

這種時代的文學已差不多完全成爲政治的文學了。除開報紙上的論文和小冊子外，別種文學作品絕少出現；但是當時那些著名的所謂芬尼厄斯的書牘（Letters of Funnis）（原註：Letters of Funnis 自 1759 至 1772 年間陸續揭載於倫敦之 Public Advertiser 執筆者爲 Sackville, Burke, Hamilton, Littleton, Lloyd, Richard Oliver, Horne Toole, Cook, Boyd, 及其他。惟當時作者之名絕對守秘密，故社會上久久猜測不定。一般人的意見多信爲 Sir Phillip Francois 的手筆。）是何等奇偉的小冊子！作者的名字雖不署明，但必是世界上最可畏的辯論文作者。

至於想像的文學則頗不振；雖則也曾有許多天才的作家出現，例如薛立敦（Sheridan）以一大政治家和演說家，而爲當時英國喜劇作者的領袖，又如賀拉西·窩爾坡爾（Horace Walpole）才華並茂，我們也當替他保留一個特殊的地位，但以全體而論，想像的文學實極凋零。因彼時的英國，歷史與演說居最前列，詩沒有人重視；

但牠所失之於詩的理想，卻能取償於實際的活動。

吉本 (Gibbon) 和 羅伯特生 (Robertson) 繼休謨之後而顯出自己宏富的歷史智識。在哲學的範圍，英國人雖若尚講形而上學，但於道德，則最喜研究實際的問題，彼時此種人才有托馬斯·黎德 (Thomas Reid) 繼哈欽孫 (Hutcheson) 之後，為蘇格蘭學派的開創者。有亞丹·斯密 (Adam Smith) 為經濟學的真正鼻祖。有弗格森 (Ferguson) 布來司 (Price) 武拉斯谷 (Wollaston) 有耶利米·邊沁 (Jeremy Bentham)。他主張以功利主義計算一切法律和制度的價值，他的第一本書出現，彷彿一個炸彈拋在一個以特權及專利為基礎的社會裏。凡這些偉大的思想家，大家都繼續的對於確定人的義務的種種規律以及發明這些規律的心的能力發表議論。

一般演說家值當時人熱情極奔放的時候，因得在國會裏及演說臺上，利用演說的技能對於輿論發揮極大的勢力，其所討論的題目有「美國的獨立戰爭」，「法蘭西革命」之類，以及關於窩梭·哈斯丁 (Warren Hastings) 的經久不決的辯論等。

此時英國黨派爭執異常激烈；無論地位高的低的，人人都要求有干涉國事的權利，或則貢獻意見，或即親自出來執行。無論什麼時候，各黨對於政界升沉的人物，必都有同情的或敵意的表示。忽而把威廉·庇得 (William Pitt) 擡舉得天一般高，各地方發狂似的都用金錢報酬他，忽而對於格蘭外里 (Grainville) 同樣發狂似的讚

請他謾罵他，甚至於許多人在議會門口等他出來，大家跟着他叫嚷；又如彼德爵士（Lord Bute），則大家對於他表示極端的忿怒，竟連他的徽章也覺非常可恨，也被搶過來燒了。

上文說過了，彼時英國人的熱情是全無節制的。這個大概不單單由於本國的原因，外來的影響也頗有以推動之。一七八九年至一七九二年間盛行於法國的共和熱流傳到英國，且並滲入英國政治的中心。這是一個新世界的黎明期，是一個狂熱幻想的時代，「得能生存，便是幸福，青年便是天堂。」（威至威士的法蘭西革命中語。）關於英國的話，該說的還很多，但是我們應該注意德國了，因為這時的德國，以許多年大活動的結果，正操歐洲文學上的牛耳。

我們要想明白德國當十八世紀後半和十九世紀初年智識上發達的驚人成績，應該退後幾步去觀察。

德國的愛國思想——但屬略似神經過激的一種——當腓烈特大帝的時候便已喚起。其結果幾將帝國根本推翻，並使向來目為帝國主腦的奧地利亞也被擯棄。政治的膨脹促起智識的進步；腓烈特勝利的戰鼓聲警覺了德國的詩神。腓烈特本人對於本國的文學並無很大的見地，因為他的波次但和柏林等處的宮廷對於國內詩人並不十分獎勵，他的精神全都灌注在隔耳特耳的文章上。羅斯巴哈（Rosbach）成為德國抒情詩的泉源。國家的統一，因宗教改革及威斯特發里亞條約等分離作用，業已漸被破壞，至此欲在三四百邦國中尋得一個中心點而不可得。值普魯士以得賢主突然崛起，猶之黑暗中一道流星，因而惹起大家的注意。於是一切希望都集中在

他身上，這是一件完全意外的事情，因此而引起一種新精神。同時智識上普魯士的勢力亦顯，哈勒（Halle）或哈伯司達（Halberstadt）的學校，一躍而臻於主要的地位，未幾便取得普魯士學校的名稱。

一方面，波德麥和他的一派對於哥特瑟德及一般古典派的戰勝，實曾為世紀末葉的諸大作家預闢途徑。

腓烈特第二對於文學雖極冷淡（這種錯誤他後來也深自懊悔），而當時的克洛卜斯托克（Klopstock）於創新文學有極大勢力，得與哥德、席勒、赫特爾諸人同列為文學進步上最傑出的領袖人物。

一七四八年，克洛卜斯托克著名的彌賽亞（Messiah）出現。正當法國的勢力極盛於柏林，意大利的音樂和詩操全權於維也納的時候，克洛卜斯托克、溫克爾曼、勒新等提出一種藝術的新學說。這種學說的精神在於頌揚索福客儼和莎士比亞，換句話說，就是在於稱頌古代文學和十六世紀的英國文學，他們主張古代的範作應該直接研究，無須從路易十四時代的作品去間接研究。拉辛、柯奈耶及一般十七世紀的作家都受他們責備，以為是扭戾自然於因襲的大衣之下。諸如此類的觀念以及赫特爾的思想，曾經引起德國文壇上好幾起大事件，結果使德國文學獲得自由。向來關於純藝術的理論只能從藝術家自己的著作中尋之，自有溫爾克曼而後「美」的研究公開於大眾。同時勒新也提出藝術問題供世人之自由討論。赫特爾為一藝術批評家，哲學家，詩人，及文學家，他用理論，或用實例，將勒新的革新論一一施諸實行。他是康德和哈曼（Hannan）兩人的學說的，所以他遵守這兩位大師學得遺訓，注意於人類最初情態的歷史——即民族，自然，和詩的歷史——的研究。他對於詩是一切

民族的國語這種觀念最是服膺。他在初年的著作裏，曾將古代民族歌謠的歷史追溯到牠的根源，因而對於當時人的拙劣的模倣作品極力排斥，卽多才的克洛卜斯托克和薇蘭也在排斥之列。他曾列舉出人所值得研究的東西，第一是聖書裏面的詩，其次是各國的國家史詩和民間詩，以爲無論何國的民間詩，都可說是從那國的土地直接產生出來的，又可以代表那民族的內在生活，爲自然的一種真正反映。赫特爾無論以批評家的資格或作家的資格，雖不免也有一些不公允的地方，但是對於當時文學運動的影響非常偉大。哥德的柏力與根之革次（Gotter von Benchingen）一作，多半是由赫特爾的文學的福音和他對於莎士比亞崇拜的態度感發起來的。他不但曾激起德國文學上的努力，且因他的見解廣播於外國，所以他以爲研究一個民族的歷史須從詩、藝術、及語言入手的那種主張，是到處的智識中心點都承認的。溫克爾曼、勒新、赫特爾三人爲哥德和席勒開先路且與德國文學以哲學思想和純粹藝術兩重品性。彼時的法國，猶如意大利文藝復興最燦爛的時代，各方面都有一種萌芽的狀況，而彼時德國的詩從許多泉源一齊奔湧而出。

敏活而深密的德國人的心理，因一種可喜的巧合，同時又具有一種科學的理想才和批評才。故未幾便有黑智爾出現，對於他那種凡物都有相互關係的學說自信頗堅。他提出這種學說，以爲是一種真正的哲學，可以概括其他一切哲學，以至一切藝術，一切宗教，又以爲是一種宇宙之謎的答案。這種精細而概括一切的哲學與哥德的燦爛的感受性並行發達。當牠們的範圍漸漸擴大，全歐洲遂盡受其賜。

德國所經過的這些變化，是對於外面的事變完全獨立的。當德國爲拿破崙的刀兵聲所震，維也納和柏林都被征服的時候，威馬爾以一小邦的首都，因其爲天才詩人的產地，遂成智識生活和光明的真正的中心點。當各邦的王位都已動搖，阿倫特（Arndt）、刻涅（Körner）和奧爾道爾夫（Schenkendorf）輩，像古時的忒提阿斯（Tytaeus），用愛國歌鼓舞國人的勇氣的時候，哥德始終保持着他那種冷靜的態度，超然於民族的熱情和瘡疾式的愛國心之上。他翱翔於一種高遠清澁的境界，這種境界是民族間的敵愾所不能入的，於此以發揮他對於科學和藝術的最高尚的興趣。

赫特爾會爲人類及其運命樹立標準；席勒爾會以其戲劇的天才和深摯的情感提高人類的觀念；黑智爾則以其超絕的哲學更進一步研究；而哥德兼以詩人及「人」的資格，比以上三人的思想組織更爲複雜，故地位亦居三人之上。

德國雖處刀兵聲中，而文學哲學方面繼續進步，且當代的批評觀念都從此出。就此點而論，從彼時到現在，實並不會更有進步；彼時以來的批評家，都只不過把同是這些觀念用別種形式將牠改造或使牠復活而已。從彼時以降，經驗和直覺，信仰和理性，理論和實證，智識的實體和物質的實體——一言以蔽之，即人類的歷史和有機世界的歷史——恆在其理想探求中極密切的相伴着進步。德國會替牠自己開列一種高尙的方案，對於一切現象不僅從抽象方面研究，並須從具體方面研究；宗教的感情須尋之於教義以外的地方，詩的美須尋之於神話以外

的地方。還不僅止此；牠又主張凡人研究歷史應該用一種方法，使得裏面的明白可見的定律易於尋出；主張人應該研究生物中的奇蹟而了解其中最秘密的原則；最後又主張人應該利用潛伏的能力去探索關於古代遺蹟中文字學和考古學正在合力求解決的種種神祕。故德國的智識史上，十八世紀末葉和十九世紀初年兩個時代，都是絕無倫比的。腓烈特倭爾夫 (Frederick Wolf) 以緒論 (Prolegomena) 一書曾將文字學完全改造，康德 因認人類心理的批評為一切學問的唯一基礎，故實為笛卡兒和培根的時代以來哲學上最完全的進化的原動力。同樣，亞歷山大·洪保德 (Alexander Humboldt) 曾倡一種重要的科學運動，其弟威廉曾建設言語學的法則；薩侯宜 (Savigny) 曾在法學範圍開拓新境界；尼布爾 (Niebuhr) 以一博學之士，曾為歷史學開闢新蹊徑，其他尚有許多人稱道的人物，則或為音樂名家，或為詩壇健將。所以無怪此時的德國要被牠的子孫當做全世界的精神和思想所薈萃的地方，因為德國智識上的偉大向來沒有像這個時代的。

德國思想家所探索的境地至為深遠；他們不絕地向抽象的境界進身，終至覺得自己已在十八個世紀以來人聲所從未波及的深處。但是他們終於把捉不住什麼明確的觀念，因遂厭倦，失望，放棄了他們的探索事業。

於是便發現了一種所謂「世紀病」(mal de siècle)，這便是維特 (Werther) 和浮士德 (Faust) 中的「不滿」，牠的症候很像第一世紀中塔西佗所謂 Tertium viae (生之厭倦)，克立索斯吞則謂之 *typhus*，十二世紀中一般幽居寺院中的僧侶則又謂之 *acedia* (悲哀)。我們於此時的德國也可以看見同樣的病症，

牠的病狀大概是一種熱病式的怠惰，對於未發見的事物存好奇心，對於現實的狀況存厭惡的心理，又一種隱約的對於較高的理想和較久的幸福的願望，種種對於無限境界的不能壓足的渴望。當時的一切文學無不帶着這種病症的跡象，且其流布極速，只不多功夫而全歐洲的哲學和詩便都不免悲哀和懷疑的色彩了。

這種苦痛而難治的懷疑，曾經在人心中心代替了強固的信仰，高尚的情感，以及偉大的熱情；從此人都不復相信從前行動的種種原動力了。當這萬有虛空的當中和戰爭及革命造成的廢墟當中，擺倫的詩放出響亮，嚴肅，激烈的聲音；這樣的詩是和當時萬有荒廢的時代最相協調的。謝多勃良 (Chateaubriand) 是最初介紹這種悲哀的作家之一，這是十九世紀初年最特徵的標誌之一，那時正是法蘭西第一帝國時代，文學產品異常荒蕪。差不多同時出現的，有謝多勃良 (Rene)，曾充滿世界以悲哀的冤苦聲，有擺倫的勒拉 (Lara) 和曼弗雷特 (Manfred)，有塞農庫耳 (Sannecour) 的奧柏曼 (Obermann) ——是混合維特和勒拉而成的一部著作——還有著名的法可波奧替斯之書牘 (Letters of Fausto and Maria)，這是烏哥·福斯科羅 (Ugo Foscolo) 著的，是一種真理和侈言的奇異的混合物，脩辭的巧辯和真正的雄辯的混合物，牠的名聲是全歐洲都傳到的。

前世紀的詩人會見得很是平淡無味，原因在他們描寫事物過分平穩；他們的後繼人則反是，他們竭力要尋一種黑暗的顏色以配他們的苦悶的心境。一般「維特派」的作家都喜把自己實際的或想像的苦悶盡情描寫出來以博人人的同情。他們因一切煩悶引起的奔放的情緒，表現出來時，往往如約瑟·德洛姆 (Joseph De-

Jorne)之例，呈一種不可思議的混沌狀態，若把他們的作品分析開來時，便可見誇大的思想，奮爭的追憶，高尚思想的見端，對神的敬仰心，和曠神的呼聲等等元素，一切混亂揉雜，映現在一個所謂「失望」的背景上。

所謂浪漫運動，是一種已成事實的事實，其在法國，曾作長足的進步，但與從前所謂浪漫運動性質截然不同，浪漫運動的名稱和觀念起自德國。當十八世紀的末葉和十九世紀的初期，提克 (Tieck) 和希勒格 (Schlegel) 兄弟首倡一種運動，方針在恢復中古時代的藝術和詩，即起源於用俗語做的所謂「羅曼司」(Romanee) 的詩，因此這種新運動名叫「浪漫主義」(Romanticism)，宗旨與哥德，席勒，薇蘭，勒新等名字所代表的主義有些相反。斯塔厄爾夫人 (Marie de Staël) 最先將這主義介紹到法國，而謝多勃良 最先顯明牠的特徵，即主張對於國家藝術的賞識和愛好是也。法國自查理士 的時代以降，向來以希臘 和拉丁 的藝術為模範，自謝多勃良 的提倡，對於國民藝術纔曉得賞識愛好。這個主義自入法國後，也仍舊沿用原來的名稱，惟意義與原來不同，且因提倡的人不同，意義頗不能確定。但若大致將牠分析出來，則可見其中除別種元素外尚含再扎克，盧梭 之抒情的個人主義，這是擺倫，哥德，席勒，拉馬丁，及維克多，露俄 等人所共同的一種主義，不期而復活的神祕主義，以及國民文學的提倡，外國文學的流傳等。

第十八章

浪漫運動之開始其影響遍及於全歐——各種思想之振奮範圍——學問之改組——純想像方面之修養——純粹哲學——浪漫派的詩——浪漫主義在法英意大利西班牙俄羅斯波蘭斯干的那維亞等處的變相

第一節

法國的浪漫運動比德國遲一時代出現。德國是這種運動最初發起的地方，當時發起人有阿爾民（Arnim）印麥曼（Immermann）提克，布梭他諾（Bruno），沙米洛（Chamisso），諾伐利斯（Novalis）等，可以代表這種運動中的主要元素——即熱情，對於美的酷愛，對於非常的事態的極力追求，內中又雜以一種深入的感受性。

法國西帝國的革命的騷亂和屠殺會爲智識上交通的最可怕之障礙物。照彼時的狀況，決不能有從事於思想的閒暇，亦決不容有藝術發展的機會。既沒有餘暇，又不能有自由，所以這因戰勝，征服而墮落的法蘭西，雖欲恢復文學上的光榮和舊日的勝利也有所不能。

我們須得先看一看這世紀開始時的情形。當這世紀黎明時法國的狀況很少希望，文學因受革命的摧殘，現

出薄弱力乏的狀態，只掙扎着要重新振作牠的氣力。當時雖經政府與以鼓勵和幫助，卻也灌輸不進一點新生命。從外國介紹進去的偉大作品，如哥德的浮士德之類，雖亦流行，但不被重視，且亦僅僅能解而已。文學上當這樣的荒蕪當中，思想漸漸枯萎，以至於死滅。悲劇和短歌都祇剩一個無生氣的形式。這雖是一個英雄時代，卻並不出產英雄的歌；有的祇是些極拙劣的贊揚權力的頌歌，平淡無味的詩集，無足輕重的翻譯。喜劇則不能免於鄙俗，已不能真實的刻畫人情和風俗。一般的散文，因常受取締和恫嚇，都已退化或竟消滅。演說祇為一般雄辯學家做應聲，而一切新聞雜誌，除阿諛外都絕對不敢說話。實則在拿破倫這樣一個嫉惡自由的君主底下，原不能希望有一個智識上的偉大時代的。而且在這種時代，以文學為職業也是極不適宜的，因為彼時迥地都是戰爭，軍號聲和軍器相擊聲已將其他一切聲音都掩蓋了，人人的感情都集中在那些從事戰爭的人和那些因戰爭而喪命的人身上。法國的青年從小便在武備學校的戰鼓聲中受教育，所以早就知道自己的運命無非在戰場上過日。就是對於那些可以免得投身戰役的，文學的生活也除智識的滿足外別的更不能供給什麼，決不能從中求得物質上的利益，也不能從中希望和平。除開一點智識上的滿足外，若還更有所希望那簡直是幻想了。

思想高遠的人物如謝多勃蘭及斯塔厄爾夫人之流，雖曾為當時文學運動的領袖，但他們的地位是特別的；他們自己已有私產，地位又高，名聲又大，又得居住外國，所以他們의 思想和行動比較的可以獨立。至於其餘的人那祇有三條路可由他們走——對於當時的偶像燒香膜拜；自動的禁止自己不發表思想，以待時機；犧牲自己替

專制的君主做器械，且假借文學的名義以做非文學所應做的事情。謝多勃良管說：『有些時候，我們就是罵人也須經濟，因為該罵的事情實在太多。』當時如特維利尼 (D'Avenny)，厄斯瑞那 (Esméard)，勒克里泰 (Lacroix)，勒蒙堆 (Lamotte) 之流，都是替自己的必要做奴隸的；在這個「必要」的關口冊子裏，我們可以看見許多人的名字，若在新政府的底下，必盡是衛護自由最出力的人物。

彼時法國對於出版物的取締，因不能尋出更好的方法，故遂採用嚴厲的檢查法。當時那種檢查法非常可恨而又極其荒謬，對於報紙不但可以封禁，且往往指定題目叫牠們做新聞，因而常常鬧出笑話，又凡見書上所援引的話有於政府不利的地方，則無論其為新書為古書，一概都須遭割裂。拉辛便曾受過這種檢查的教訓，柯奈耶也曾因這種檢查而刪書；摩里爾的書則因這種檢查而被禁。所以法國的第一帝國確乎是一個恐怖時代，不但是文學須受這樣的檢查，便是一切學科也無不如此。

但未幾這個高壓的專制政府終於傾覆，而波旁王族 (Bourbon) 和一個向來尊重、愛護、提倡文學的貴族階級復政，更後則因歐洲一般影響之波及與外國元素之流入國民生活中，遂使已死的思想界漸漸有復活之勢。

第二節

法國當這幾年中，全部的活動都在從事政爭或在戰場上，以致消磨了牠的精力和財源；及這幾年過去之後，

便終於有和平的希望了。世界重又得自由呼吸了。從來適宜於思想醒覺的時會再莫過於此時；從來社會輿論和高遠的思想相協調，也莫過於此時。古典派的作家和作品，已經過時了。「替現在的人著書」這句話，十七世紀時的提阿非爾·特威森（Theophile de Viau）曾以教誨他的當代人，如今實行這個教訓的時候已經到了。要把新的理想陳訴於人，便須有一種新的文字和新的思想。

各方面的範圍都推廣了。哲學，政治學，歷史，文學，以及戲劇，無論外面的形式和內裏的思想，都可見有一種發達的必要，而這種發達的成功也可以預先料到，單以歷史一端而論，牠的學說上和取材上的大進步，已經值得用一章書來專論牠。在英國，亨利·哈蘭（Henry Hallam）的綜合的著作曾使歐洲一般的文學生輝，因這方法是從來不會有人研究過的。稍後，謝多勃良提倡歷史學的根本改革，其說一出，全歐洲都受影響。這種根本改革運動，大概起源於一般人對於中古時代的好奇心理，其後繼續努力於這種改革運動者有令加德（Lansard）而尤力者為英國的馬可梨（Macaulay），他嘗在一八二八年的愛丁堡雜誌（Edinburgh Review）建立一種新紀事法的基礎，目的在把實例和原則，模型和理論合併在一起。他這種方法，效法者為德國的蘭克（Ranke），意大利的坎圖（Cantù），西班牙的拉富恩脫（Lafuente）；在俄國及斯干的那維亞文學則為卡藍普（Karamzine），鳩爾（Goulet），及阿倫（Allen），在法國則為奧古斯丁退里（Augustine Thierry），基佐（Gizot），及其他多數之弟子，——無論那個民族都想改造牠的歷史。此時以前，所謂歷史者無非把一件一件的事實堆砌而成，無非把戰

爭和約，王族的傳統，各族的婚媾等事，充實篇幅，直至離開那時不久還是如此的。這一方面的歷史已經是過於發達。至此，大家纔覺得事實的紀載中必須加以社會狀況的描寫，又覺得過去的許多世紀必須各各給牠一個地位，必須各各指明牠的道德的意味，和各各的特徵。

因為史學有這樣的發達，文學的歷史也就受益不少。十七十八兩世紀中，文學批評大都不能周到而且多屬浮淺，這都因為牠們要想用種種不易的規則來測量作家的感興之故。最初，批評家對於古代的文學和傳說的趣尚抱一種狹窄的崇拜心理，而演說學頗盛。彼時思想的進化方面，環境之美的價值，地方色，以及文學上之作者的個性關係等等，都是他們所注意不到的。歷史的批評時代，是前一世紀中德國開始的，此派批評曾為斯塔厄爾夫（Stauff）和卡雅明·空斯通（Benjamin Constant）介紹到法國，為哈蘭介紹到英國，及至一八三〇年左右，此時代乃告終止。當此派批評流行的時代，批評家如微爾芒（Villemain）、聖柏甫（Saint-Berve）一流人才，曾經給牠以一種意料之外的力量，光輝，和擴充。但當德國正以勒新和溫克爾曼自豪的時候，法國則認自己的拉阿普（L'abbé Haurio）為世界第一批評家。彼時法國對於莎士比亞久已忽視，誤解，而輕蔑，及拉阿普出，此種錯誤始得矯正。蓋舊日古典派的作家恆喜限制人類思想的進步，便就自己的範圍，以故發生這種錯誤。如今一旦把既往的陳蹟重用，燦爛的光明照耀，使幾百年的死灰重又復活，而人們終於曉得賞識他國的東西並知利用他種觀察點了。

第三節

學問之無邊的境域裏有一種性質全新的智識勃興。一八二〇至一八四〇年之間，替英國赫伯特·斯賓塞爾 (Herbert Spencer) 學派預爲地步的奧古斯德·孔德 (August Comte) 方在孜孜矻矻的畫社會學的輪廓，且從事於歷史的時代的區分。因前乎歷史的人類的發見而自然科學進步。因尼波利 (Napoli) 人佐凡尼·巴帕替斯多·韋科 (Giovane Battista Vico) 的一部歷史哲學以一八二七年經米綢勒 (Michalet) 以法文刊行之，遂引起許多有思想的人士研究人類進步之聯續的時代和糾紛的線索。

在德國則法蘭西斯·波普 (Francis Bopp) 方創比較文字學。同時他又用同樣程序使科學完全改換一副面目。他將言語學完全改組，將人種學和歷史學澈底改革，而注射一種意外的光明在人類過去的历史上。於是種種已經死滅亡的語言和文學，差不多立刻都重新尋出一個梗概。從此一切考據的著作都能具備一種哲學的和歷史的價值。而西方人對於東方的宗教和語言遂發生一種極大的研究興味。

自從具有神聖天才的善坡力溫 (Champlian) 發見象形文字的端倪，此後便會發現多數的文籍，可以追尋古代埃及的習慣、風俗、和思想。而不可思議的神祕的印度更比埃及還惹人注意。從前人都以爲希臘和猶太是近世諸民族之智識的和宗教的原產地，如今在亞克羅坡利 (Acropolis) 雅典的堡塞和柵翁山 (Mt. Stoa) 的

後面，埃及金字塔的後面，忽然現出一座印度的浮圖，裏面滿載着詩和神祕，遂使一般曾受教育的人士都不勝其驚異。於是法、德、英等國的人士，大家都非常熱心起來，有的要把印度的古碑重新豎起，或搜集牠們的斷片，有的要把這個當亞歷山大的軍隊到時即已很古的文明的廢墟重新建起。當文藝復興時代，歐洲的學者曾發過一種狂熱，夢想要把希臘羅馬的文明恢復，如今同是這種狂熱似乎又回來了。近代思想因研究鑿羅門文學而得的經驗，正猶從前人因研究古代文學而得的經驗一般。結果使從前已經得到的結論範圍推廣了許多。因此時以波普（Bopp）及其後的許多學者的指引，我們已經能假把語言的歷史差不多字字都尋得出來。學者覺得單單把希臘語和梵語的密切關係尋出來還不能滿足；還要更進一步，將這兩個姊妹種族——雅利安人和希臘人——思想上和思想方法上相同的地方也證明出來。因若把古代印度英雄歌裏的神祕思想和希臘史詩裏的神話來比較，便可見有許多顯著的相似點。

還有一種研究的熱心，則見於純粹的考古學上。所謂純粹的考古學，便是說，一種不在文字問題範圍以內的考古學。因有這種研究的熱心，而後古代物質上及智識上一切的生活狀況都得了解。就中所謂碑銘學（Epigraphy），是一種新興的學問，對於古代社會的組織頗有所發明。牠所發明的大都書上所不載的東西，例如民衆的日常生活，他們的服裝，風俗，禮儀，信仰等等，而同時對於歷史上的事實又能供給有價值的證據。所以當時人於解釋古代刻文上的字眼，搜集雕像的斷片，考據碑版的時代等事，都要費極大的功夫。

同時藝術的歷史也成爲一種真正的科學，所以然者，因從前研究藝術史的大都祇研究一件件的作品以及藝術家的傳記，至此則注重研究藝術作風的進化了。

十六世紀的學者以及十七八兩世紀的學者的一部分，大都讀書極博；他們常取希臘羅馬時代的生活爲自己生活的模範，他們都精通希臘羅馬的語言，而且詳知這些文字的內容（但語源問題除外）；他們的智識是極可佩服的。但是他們的這種研究卻只收得一種皮相的結果。他們的功夫雖廣大，而對於事實的精確程度卻從未超過一種限制，對於藝術作品或文學作品的批評也從未超過一種固定的理想，至關於一件作品的淵源，原因，環境等等的真正研究，差不多是向來沒有的。他們因不曉得各大民族的歷史，所以不曉得這些民族的影響的範圍，而於歷史上或文學上的種種問題，但能領會牠們的一個方面。他們又缺乏種種比較的方法，所以一切較廣闊的見解，較可信的原則，較不偏頗且較確實的賞鑒，都無從得到了。及後近代學者如德國的倭爾夫，柏克，奧脫弗利特·米勒一派，法國的勒脫龍納（Lévesque）一派，曾把文字學的觀念開拓得很廣。他們把一切學問的資料都應用在政治史，碑銘考據學，以及言語，神話，宗教等等的研究上，因使人對於古代的思想 and 事實完全改變了一種觀念。這種批評的研究法是天才宏偉的來布尼茲發明的，而德國最先採用之。文字學當前此幾年中，如猶在古代，和純粹的文法研究直是一件東西，牠的職務祇限於解釋古書的文義；從此以後，牠的目的大得多了，牠要把古代思想——希臘的或東方的——的全部，無論關於哲學的，文學的，及藝術的進化，以至關於信仰，思辨，感情，想像的著作，

一律包入牠的研究範圍。文字學以比較神話學的幫助，又欲從宗教思想最初無意識形成的時候去研究，而構成一種實證的學說。於是一切神學遂根本動搖，且經發見了種種古代的事實足以說明宇宙開闢論的起源之後，牠們的地位便非常危險了。從來神話學上的原理是不明瞭的，不能解釋的。牠們對於所由託生的社會狀況並不能發見一種真正的關係。至此，因吠陀及印度神話的研究，而神話學的本質大變了。因為雅利安人種的神話自成一個性質純一的組織，也猶之這個人種的語言一般。自有這種比較的研究，而後原始神話形成的原因不復是一件神祕了；各種神話的陸續出現，也不復是一種似乎不合論理且若人任意所為的事情了。我們若把兩種極端反對的宗教——卽如雅利安人種的汎神論和聖經上的一神論——比較起來看，若把爲諸神之王，爲雷霆風雨的英雄，爲生命製造者和保存者的印陀羅神 (Indra) 與爲唯一的真神的耶和華 (Yehovah) 比較起來看，而發見其間有許多類似的地方，那末我們必定覺得駭異。殊不知這種比較的研究最能發見古代自然崇拜的淵源和變遷，並可曉得當極古極古的時代自然崇拜是印度·歐羅巴人種中一切支派所公同的。如是，此後的文字學業已參加宗教上最激烈的問題的辯論，業已因其最近的種種發見又曾把牠當應用於希臘及印度傳說上的那種方法應用於基督教而更換了哲學辯論上所用的名詞。

第四節

我們的話題太遠了，現在言歸正傳，再論浪漫運動的發達。

大凡熱心的青年，都喜探究未知的境界，所以純粹的想像之域和無限的詩之國土，特別能够吸引他們。如上文所述，謝多勃良曾把法國的詩的藝術和想像完全改變了一種樣子，他的影響曾經普及全歐。文學上自由的觀念因他而恢復。在法國，突然問出了許多有力量的作家，亞勒弗烈·特焚宜是他們的領袖。因他的伊洛阿（Eloua）的聲音的激盪，一代的青年都傾向於一種比十八世紀更道地更深微的藝術。拉馬丁（Lamarquin）的歌聲一經傳出之後，社會對於默想（Meditations）的第一冊便發生一種熱烈的歡迎，牠的聲調是世界從來沒有聽見過的。拉馬丁是輓歌之王，是一個真正受靈感的詩人，他能聽見人心中最精微的悲歡的情緒，並能用最好的聲調表現牠們，所以人對於他是不能不充分的讚美的。

維克多·羅俄差不多也是同時出現的，他是一個有力量的，可奇的，非凡的，宏富的作家。他曾在克倫威爾（ Cromwell）的序裏把革命思想貢獻給世界，這序遂成爲一般文學革命家的感興的源泉。這書的性質是用近代戲劇代替悲劇，用血肉做成的人代替戲劇中的「人物」；「容藝術從理想的境域降於實在的境域，牠的風格具備史詩，抒情詩，莊嚴，滑稽等元素的一切優點。羅俄爲其時代之智識的領袖，先後差不多七十年。他陸續的產出詩，戲劇，和小說，無論實在的理想的，現在的，過去的，以至將來的一切事情，莫不從他那偉大的腦海裏反映出精力充旺的作品來。及後，拉馬丁的天才已失其初年的鮮澤，維克多·羅俄的作品也漸流於謾罵一派，於是薩舍（Thersat）

出現了。那時他年紀還很輕，但已對於當時爲社會毒害的所謂智慧和理性流露出一種浪漫的悲哀並表示反叛。當時人因研究羅拉馬丁和陸舍的作品而人人熱中。在青年一輩裏，則有一種強固的信仰在那裏激盪。一般人的天才都大奔放；各人所受的靈感因思想的交換而彼此互相傳達。許多的創新家彼此很密切的連結着，努力於藝術的創作，而求壓足發抒情感的興味，這真是一種稀有的奇觀。以這樣熱心的一班新文人，雖有波爾·羅門 (Baur-Lormain)，維也內 (Viennet) 一班不識時宜的守舊詩人出來反對，還有什麼用呢？此後的一段，乃是等候結果的時期。再過些時，他們這種熱心嘗試的結果便有一部分明顯了。一般學步莎士比亞，加爾德倫，和羅俄的作家都成爲戲劇家和小說家的領袖。許多有特權和天才的人物都得收穫一時代勞力的成績。

浪漫運動的開始，在宣告藝術上的自由。於是一般小說家和詩人，都得無忌憚的發抒感情，任意的遣詞覓句。從前的時代會許人類以思想自由；十九世紀則於思想自由而外更加上一種戀愛自由。對於戀愛的讚美，從來沒有像此時熱烈。所以亨利·貝倫伽 (Henry Baugier) 在他的時代的精神 (Ume d'un siècle) 裏嘗說：『唯情的浪漫主義會給人類的心靈以一種無限的天堂，使牠在裏面可以展翼，可以飛翔。』

其他各國凡具同樣狀況的，也都曾有一種與此類似的靈魂和知識的暫時醒覺，彼時歐洲諸民族方因革命的怒潮沉淪在深底，元氣未曾回復，故都渴望一時的寧息與和平，也是自然的一種反動。當後來社會競爭和實業競爭將要繼續流血的戰爭而起之先，他們必須有一段期間可以估量估量自己的力量並且恢復自己的氣力和

財源。故從此便有二十餘年的休戰。當這二十餘年的期間，歐洲所呼吸的空氣，祇有理想，愛情，與和諧，是將來決不會忘記的一個時代。此時的歐洲，到處都可看見一種高尚的競賽，德國有之，法國亦有之，英國有之，意大利亦有之，以至於西班牙，及斯拉窩尼亞和斯干的那維亞諸國莫不有之。

第五節

浪漫運動，雖則許多年前法國的作家如冉·扎克盧梭及柏那當·得聖佩耳等已經爲之先河，但如上文所述，啓這主義樹立原則並與這種運動以力量的，仍舊應該歸功德國。當一七九七年時，奧古斯脫·威廉·希勒格（August Wilhelm Schlegel）以提克的合作，即已創辦著名的雅典寧（Athenaeum），將這運動的大綱提出，後來經歌德之文學的世界主義，其性質略有變化，範圍也推廣了。希勒格的治事才差不多是無限的；他是一個詩人，翻譯家，批評家，東方學者，並哲學家，對於國家思想和外國思想曾有極大的影響。他又是著名的加爾德倫和莎士比亞的解釋者，曾把莎士比亞詩中的美發明了不少，即使英國人自己看見也覺得很詫異，英國人因爲感激他的發明，曾經賜他一個「極端莎士比亞派」（Ultra-Shakespearean）的徽號。希勒格因有許多極好的翻譯而成爲一個偉大的文學改革家。他的翻譯和服斯（Voss）的翻譯，向來人都承認牠是對於一切時代和一切國家的作品的一種貢獻。同時以文章而論，也已成爲德國的模範。他又以思想之精闢著，他的獨創的觀念非常豐富，因

致喜歡涉獵而無恆心，他的許多思想，猶如許多光線射在一切的題目上。

關於浪漫派的其他健將的活動，可論的也很多。威廉·希勒格的兄弟腓烈特·希勒格 (Frederick Schlegel) 也是一個奇才；他的思想豐富而宏大，學問也極博。約翰·保羅·利希脫 (John Paul Richter) 有文壇「獨步」之稱，因為他的天才裏面能把各色各樣的元素熔為一爐而又能收驚人的效果，這確乎是別人及不到的。其他如沙米索 (Chamisso) 及奇才的小說家賀弗曼 (Hoffmann) 也是浪漫派的傑出人物。至於首先脫離浪漫派而自成家的則為斯瓦比亞派 (Swabian School) 的路易·烏蘭 (Ludwig Uhland) 及浪漫派改革之後，乃更名為少年德國派 (Young German) 後來此派有部恩 (Boerne)、亨利海涅 (Heinrich Heine)、勞伯 (Larbe)、夫賴替格勒茲 (Freitag) 及佐治·赫味喜 (George Herwegh) 等人物，歷一八三〇至一八四八等紛亂的年間而猶存在。惟其宗旨已非復提倡藝術而在傳播社會教育和政治教育了。

約在一八三〇年的時候，奧地利亞派 (Austrian School) 正發達。此派中有格林 (Grün) 及尼古拉·雷瑞 (Nicholas Lenau) 等人物，而雷瑞的絕妙抒情詩亦以此時出現。雷瑞富於熱烈的感受性而又具一種懷疑的性情，他的一生都消磨在兩者不絕的衝突中。他迷戀着一種理想的境界，良心常籠罩在一種極苦的疑慮和一種無所寄託的信仰之間，因而不絕的受着苦痛。但是他這種已損傷的心的冤苦聲，和這種震撼着他的理性致使瀕於瘋狂的情潮，卻用一種纏綿悱惻的文詞表達出來，能使讀者留着永遠的印象。

這樣作風的文章會替德國文學史添上許多佳妙的材料。

第六節

浪漫主義之流傳於英國，並不具備一種強力運動的形式。當最初的時候，牠的進步和計畫都很有節度。彼時威廉·顧伯（William Gougeon）看見十八世紀末葉的詩過於雕琢而中虛無物，覺得可厭，因對無謂的脩辭派大聲反對，以響應蓋蘭和哥德所倡的反叛聲。此後浪漫主義的進步可分為兩期，第一期在一八一二年之前，其時威至威士（Wordsworth）和哥爾利治（Coleridge）兩人的嘗試，祇不過排斥因襲的雕琢，而一般「羅曼司」的作者仍都泥守舊程和嚴謹的道德律，不肯越出純粹藝術志趣的範圍；至於第二期的情形便不同了，那時文學思想大起翻騰，且因擺倫出世而起的道德上的危機，既發生於英國之後，便如傳染病一般蔓延到大陸。當這種狂飈勃起的時代當中，擺倫便是一個主腦人物；他的運動，歐洲各國莫不響應。擺倫的趣向是古典的，他的氣質卻是浪漫的，他是十八世紀的嗣子，他的態度徘徊於熱情所構成的理想境界和靜中所結構的藝術作品之間。他頌揚頗普（Pope），排斥悲劇的「三一律」以及排稱整齊的句法，但他自己的文章始終是和諧工整的。然而他的思想中的暴烈分子是決不能讓他受古典派的束縛的。他的最先問世的作品是一部魔力極大的哈洛德（*Harold*）（1812），此詩一出，他的名字便震動全歐，並引起許多嫉妬者的指摘。單只這一下運動，而歐洲各國的文壇便無不

景從擺倫了。

窩爾忒·司各脫 (Walter Scott) 是擺倫的同代人之一。他本是當時一個風行的詩人，卻成爲一個既往社會的超絕的描寫者。他不但是英國近代小說的鼻祖，並且也是法國近代小說的鼻祖，同時又是史體文的改革家之一。司各脫以前，歷史向來缺乏戲劇的元素和美的元素。他曾感發法國的奧古斯丁·退里和巴蘭德 (Barthelemy) 給他們一種對於色彩的趣味，和對於人生的熱情。他的勢力遍及歐洲，而所發生的影響不一，曾經感受他的影響的，在意大利則爲曼澤尼 (Manzoni)，在德國則爲傅禮 (Fouquet)，在法國則爲維克多·聶俄，亞歷山大·仲馬，特萊宜 (De Vigny)，美里美 (Merimee)，巴爾扎克 (Balzac) 和他的繼人。

英國的浪漫運動，因這前後兩重連續的表示，所以於鼓盪人心差不多具有一種魔力。這是一種很可注意的復活運動，當擺倫和塞理 (Shelley) 還未受牠的感發之先，牠已流露在威至威士，哥爾利治，騷狄 (Southey) 等人的詩裏，而且社會的思想已經大受牠的激盪。

上述這幾個詩人都值得我們注意。威至威士能够在日常所見的實際當中窺見理想的反映，而恆用一種簡淨的文字以寓寄他的見解；哥爾利治則具有一種雄健的抒情力量和高遠的哲學見解；騷狄則幻想力極強，往往有拔俗超塵之概；擺倫則具有一種不可羈勒的偉力和燦爛的詩的性情；塞理則天才醇厚而屈折善順物情。就中塞理不幸纔享壽二十九歲，他的多事的一生便到牠的悲劇的終點了。他是一個燦爛的天才，曾做許多空前的極

有靈感的詩。他的詩變幻有如海波，時而渺遠不可捉摸，時而親切浪漫有如攝倫的哈洛德。他死後的葬禮是很古風的；他的遺尸飄到岸上之後使用柴火焚化，他的心拿到羅馬埋葬，墓上的銘語是 *Cor Cordium*，意思是「心之心。」

第七節

現在我們該注意意大利了。當浪漫運動的號筒吹起而到處都響應的時候，意大利也並不落歐洲其他各國之後。

意大利從十九世紀的開始以後便有一種熱烈的愛國思想溶漾在他的詩裏。我們附錄提起的那個羅斯科和朱斯提 (*Giusti*)，雷奧巴底 (*Leopardi*) 等詩人，都做一種富於感情和力量的詩，意在發覺當時的國民。就雷奧巴底的詩，雄健而嚴肅，令人想見古拉丁詩的作風。但是他的詩含有一種悲哀的情調，這便是近代詩的特徵。他這種悲哀，比叔本華的理想主義還要絕望而無可感解。他的一生學業很是奇異。十六歲便成文字學家，二十歲成哲學家，二十五歲為詩人，不幸早死，但聲名已極高。當別人都還未曾開始做人的年齡，雷奧巴底已經獲得兩重的榮譽。他具有一種驚人的夙慧，但不幸青年時代便一逕被兩種致命的疾病糾纏，彷彿是負奇才者應得的刑罰，再加上他的生性容易受激刺，因而愈加覺得苦痛。於是這種抑鬱煩悶的心境發而為許多對於人類運

命和對於時代的怨聲，如以耳·巴利尼 (E. Parini) 及利考當思 (Ricciardino) 兩詩所代表。雷奧巴底 的作品，的唯一感興便是悲哀，這也是他的特徵之一。他的悲哀是到處可以遇見的，無論在現在，在既往，在自然界，在人類；所以無論在他的哲學論文裏或詩裏，到處都流露出悲哀的情調。他的作品又常常涉及「死」的問題，因而優美之中往往帶着慘痛。

同時其他著名詩人可注意的還有維多雷理 (Vittorelli)，利細亞提 (Ricciardi) 及恩爾維阿·貝利柯 (Silvio Pellico) 等。貝利柯 的名譽，一半固由他的著作，一半也由他的不幸運得來的。這一班詩人大都才力不相上下，而且大家都從事於「復興」的事業；他們用讚美，教訓，以及念舊的詩激動國人，大家都抱着一種高尚的希望，希望利用文學來重建他們的國家。最後便是曼蘇尼了。他是浪漫運動的倡首者，他不待新法蘭西 的七人詩派 便已自命為文學復興的使徒。當維克多·羅俄 還未把克倫威爾 的序文貢獻給世界的時候，他充分的在致佛 (Chauvet) 的信裏已經提出戲劇改良的計畫。他是意大利 所謂「色彩派」(Coloristes) 的主要人物，此派的主要目的在利用影像和色彩以求文詞的瑰爛。

此時意大利 人才輩出，大家都很熱心的希望激起國民的愛國心，並方與一般實行家協力，替將來的復興時代預備一切。

第八節

至此時西班牙的詩人則尤其熱心；彷彿曾有一種新的血液滲入他們的血管裏。擺倫、司各脫、露俄、拉馬丁等人的作品到處都有人讀。一般青年的熱心家無不竭力的想追隨他們。當時如文圖拉·未加（Ventura de la Vega）、布勒通·厄察洛（Breton de las Herrenas）、琴塔那（Quintana）等，都是藝術改革家的領袖。值當時國內政治上和社會上也經過極大的改革，因而這班人愈加覺得興奮。

斐迪南（Ferdinand）王朝晚年的政治已不似從前專制，且因基利斯當（Christine）派和憲政黨實行搵手，人人心中都起了許多的希望，又彼時西班牙人民對於王子伊薩伯拉（Isabella）的希望極大，以為國家將因他身上從此漸入佳境——凡此種種，盡是使彼時民心悅樂的原因。故當時的人會將這種悅樂的感情用各種形式表現出來。

彼時守舊派如李斯特（Lusia）、暱摩栖略（Hermosilla）、馬提涅司·謝·拉洛薩（Martinez de la Rosa）等，雖竭力想扼阻這種牢籠一切人心的新潮流，卻都祇是白費氣力。他們對於新派之解放的願望，謂之為虛偽，以為他們無非是縱慾敗度，然而誰也不去注意他們這些話。他們只能發空議論，而一般未來的詩人則方實行用他們的詩大大的激起社會的熱情。新派的詩，對於一個充滿着希望和快樂的民衆，無不大受歡迎；無論街道上，咖啡

館裏，會客室裏，都可聽見背誦新詩的聲音。當時每有一種政治的事件發生，無不立刻被採爲文學作品的題目。當繼續七年的內亂當中，和厄斯帕退洛（Espano）第一攝政時代，社會狀況經過極大的變化，這些變化，常常供給一般作家做活動的激勵。總之彼時的西班牙，一面對於傳統的東西雖也愛好，而同時有種種新的觀念和新的見解陸續出來，新的人物和新的模型也陸續出現。這種新觀念和新人物，便是一般作家的感興的源泉；一般作家從這裏面得着感興，藉以發抒他們的煩悶和向上的志趣，——而尤以後者爲多。

彼時義斯德勒馬都拉（Estramadura）和安達盧梭亞（Andalusia）兩地的浪漫派作家，都繼續能够得着熱烈的感興。這些作家的一生，例如大抒情詩人厄斯普倫退達（Espano）和諷刺家約瑟·勒拉（Jose de Larra）等，大都不絕的爲自由思想和道德的及智識的解放戰爭。因爲彼時西班牙正在努力求掙脫專制政府和教堂的束縛，然而西班牙浪漫主義的特徵，就在促進這種力求自由的熱情。厄斯普倫退達，安澤爾·薩阿未司刺（Angel de Saavedra），里瓦斯侯爵（Duke of Rivas），及琴塔那等作家，當索利勒（Zorrilla）還未出現之前，便已有全歐洲的名譽。

葡萄牙無論來源上氣質上，都和牠那勁敵的隣國判然不同——這點事實爲向來人所不注意——所以牠的文學的發展，也比西班牙較爲遲晚。當十九世紀初期，牠還未曾恢復幾年來被內憂外患斃喪的元氣。因這些內憂外患的自然結果，牠的物質的和道德的能力都已消耗無餘。這個輕快而機智的民族，雖也曾看見一點暗澹的

光明，但因缺乏一種堅強的能力，所以暫時警覺之後，便又回復牠那永久雌伏的狀態。人人都祇以歌唱吟哦爲消遣，所以詩道異常不振。便是從前那些不朽的牧歌也都淡忘了。所以當亞爾美達·伽拉脫 (Alameda Garrett) 和他的浪漫派出現的時候，智識的地平線裏似乎是空無一物的。但這不過是一時的現象，若論牠的生產力，當然不是絕對沒有的。

當浪漫運動初起的時候，牠的特色便是回顧中古的陳績，這是全歐洲的浪漫運動都如此的。凡是參加這種運動的國家，大都從自己本國過去的歷史裏去尋取感興，以期重振起新的力量，這種傾向是到處都有的，所以葡萄牙也不能獨外。葡萄牙雖日處於不安的狀況之中，但是這種傾向仍舊存在，因爲牠看見前途沒有回復過去的光榮的希望，所以對於過去的光榮愈加仰慕。而浪漫運動的首領伽拉脫對於他自己的民族的運命應該用如何原素然後能永久紀載一層，眼便看明白了。他出身於一個由亞速爾羣島 (Azores) 遷來的家族，而他的始祖是從愛爾蘭搬來的，所以他一身兼具兩重的品性，一是布勒通人種的傷感性和理想主義，一是南方和東方的激烈性，兩者雜揉在一個葡萄牙的心靈裏。他所最精的是本國歷史的智識。他從古代韻文的傳說裏發見了古代地方色的表現，這便是構成一個民族的真正生活的東西，經他收入他的精絕的作品裏面，因得永遠不朽。伽拉脫的影響是極大的，不但及到他的直接承繼人如詩人兼歷史家的赫邱蘭諾 (Herculano) 之流，又不但及到後來的一班所謂「極端浪漫派」而並且及到十九世紀末葉的「象徵派」。

第九節

俄國智識生活的醒覺，比歐洲其他各國都遲。但終於也輪到牠了。從牠的野蠻時代的文學到近代文學的發軔，從著名的伊哥兒隊之歌 (Song of the Band of Igor) 所由產生的英雄歌時代到近世創作的宏富的作品使這種和諧的語言得着生機的時代，其間有一段很長的間隙；在這段間隙裏，牠彷彿會做一場大夢。如今此夢既覺，便見精神蓬勃，彷彿祇是幾天功夫，便把這段大間隙彌補起來了。

神祕主義和浪漫主義的時代是俄國文學的第三期。當這時代的最初幾年中，神祕的情感主義特盛。革命之後，則自由思想發達極速，大都用秘密結社的方法輸入，因使喀德隣女帝 (Catherine) 異常吃驚，急欲設法遏止，蓋彼時這種趨勢，雖還不會危及她的威權，卻總有思想解放的危險。但她再傳之後，到亞歷山大第一手裏，這種壓制的手段就不用不着了。彼時諾維科夫 (Novikov) 的敬神主義，因帝室通信員克律得涅夫人 (Mme. de Krudener) 的獎勵及自由黨閣員斯撥蘭斯基 (Speransky) 信奉的結果，勢力漸漸膨脹。於是一陣迷信之風瀰漫在最高級的社會裏，人人都迷戀着一種依稀恍惚的形而上學。『彼時最受社會歡迎的唯有聖經會，馬丁派 (Martinists) (原註法國一種空想家的信徒自命能與精靈交接。)] 『薔薇十字派』 (Rosicrucians) 及『斯威敏堡教派』 (Swedenborg) 等 (原註見 Malclair de Nogué, The Russian Novel, p. 31) 浪

漫主義之興，曾經介紹進一種新的有力的元素，但這種宗教運動已經很是顯著，故已不能不發生結果，而許多人的心理便都染着一種悲哀的色彩，即一般大作家如杜思拖夫斯基（Daskiewicz），格雷布·烏茲奔斯基（Grab Ouspensky），托爾斯泰（Tolstoj），索格考夫（Salghekov）及晚近學步他們的作家，也都無不染着這種色彩。

俄國浪漫主義的開創者是鐘考夫斯基（Jankovskij），而其主動者是普式金（Ponshin）。前者於其模倣席勒、哥德、烏爾、諾伐利斯等人的許多作品中，創建一種新學說；後者以其充分的才氣和同化力，取鐘考夫斯基的學說為己有。當普式金還在大學做學生的時候，鐘考夫斯基便已採用德國的作風和德國的題材。普式金並不是浪漫主義的曙光，卻是浪漫主義的旭日；他纔一出現，他的勁敵達爾維格（Dalrif），巴拉丁斯基（Barninski），耶齊考夫（Jazikoff）等，便認他為自己的先生。服羅耶（Vogel）嘗說，俄國可譬春日野花鋪滿的田野，牠國內裝點着許多熱情洋溢的詩人，大家成爲一個光輝的團體，圍繞着一個青年的先生。普式金的第一部詩羅斯奔和路特米勒（Rosban und Ludmila）出世後，因牠的性質是創見的，所以備受社會的歡迎，大似舞臺上名角出場的神氣。

突然間，俄國一般懷疑派的青年作家——尤是一班熱心於藝術的——莫不皈依擁倫之教，就中尤以富於雄偉的才氣和想像力的勒夢托夫（Lermontoff）為最傑出。

但是過了些時，他們的熱度減退了，人人發抒情感的衝動也平了，當初那種如狂的激動也定了。於是散文恢復了牠應得的地位，司各脫將摺倫擠下去了，就是普式金自己到天才成熟的時候，也專致力於小說，且還感發了許多作家如紫哥斯琴 (Zagoskin)，達爾 (Dahl)，佛爾脫曼 (Valmann)，波勒伏衣 (Polevoi)，及馬丁斯基 (Martynski) 等也都從事於小說。此時普式金的作品個人色彩較濃，尤是他那些描寫俄皇治下的生活的作品——這是一種比什麼地方都可憐的生活，是絕少娛樂但有苦痛的生活，是一種充滿着刻薄和艱難的生活。他在這種工作裏，是近代寫實主義的領袖之一，又是實行農奴的國中能够了解人民的心理的第一人。

此時波蘭則有三個天才的詩人：密次黎維喜 (Mickiewicz)，朱理士·斯洛潘基 (Jules Slowacki)，及西謨門·克利辛斯歧 (Siesmund Krashinski)。他們所受的感覺來源雖不同，而同時都用一種絕好的詩句，表示他們對於既往的光榮的感慨，以及對於祖國的憂患的同情。波蘭因被他們的詩所感動，故有一八三〇年的事件，又因不忘他們這些動人的聖詩，故又有一八六三年的可怕的暴動。密次黎維喜的巡禮者之書 (Pilgrim's Book) 是描寫波蘭亡民的狀況的，康拉德·瓦倫羅德 (Konrad Wallenrod) 的殉爛的詩，是竭力讚美愛國並痛誣專制的；此外還有那非得超自然的靈感做不出來的劇本祖先 (Ancestry)——這幾種作品的價值，都不是言語能够形容得出來的。

第十節

斯干的那維亞的諸國也未嘗和這種智識復活的大運動沒有關係。

彼時瑞典文壇上的新舊之爭，並不單是一種遠處風濤的響應，卻是一種真正的熱烈的角鬪。法國趣尚和德國趣尚的衝突久久不決，先則法國的勢力甚盛，新近則受支配於哥德及克洛卜斯托克兩人的勢力之下，及吉威爾 (Geier) (Tuna 的創辦者) 腓內耳 (Fegner) 杜恩 (Dyng) 等人出現，纔把瑞典文壇從德國人手裏奪了回來，因為他們主張用自己本國舊日的光榮做文壇模範，號稱「斯干的那維亞詩人之王」的著名丹麥作家厄楞士雷革 (Mihenschlaeger) 嘗欲把古詩厄達 (Edta) 中的瑰爛的光彩和偉大獨創的意匠復現於將來的詩裏。蒙胡 (O. Hanel) 嘗說：「丹麥人譬如一班人喝醉了迷人的蒙藥，業已忘記了少時所唱的歌。厄楞士雷革替他們解了迷藥，使古時斯干的那維亞的英雄重復出現。」但是厄楞士雷革的事業並不止此。他又想把一種不隨時代變化的感情表達出來，又對於自己內在的人格悲喜之情加以一種深澈的研究——因為這種內在的人格便是供給無盡藏的抒情的感興的題目。這種愛好幻想，冥想，以至虛玄，空妄的風氣，一時頗會盛行。於是乎詩和哲學遂佔據平等的地位。

當羅倫逝世至哥德逝世的一段期間，那威民族一切自然的個性的特徵都表現出來。自從一八一及一八

一四兩年——這兩年是挪威獲得政治自由和自治權的紀念日——以降，挪威會有一個新時代。這個人家久已淡忘的冰天雪海中的北方的國度，至此表示一種願望，要想在歐洲其他諸民族中佔有一個地位。此時之前，挪威並無歷史家，學者，或戲劇家。牠的文學的遺產，惟有古時的「傳說」(Sagas)，所述的無非古時兇狂的戰士渡海去驚擾歐洲的故事，有的甚至將拉丁，日耳曼等民族的戰掠品帶到德倫的英(Trondhem)去。這個小小的民族本是深於感情的，但是有許多東西阻礙着牠的智識的進展：一來牠受着清教主義的強力的支配；二來牠的生活異常艱難，和所處的氣候一般蕭殺，黯淡；三來環境中的自然景物永遠變遷無生氣，雖也不乏雄壯的地方，但往往為狹窄的地平線所限制。此外還有一種智識的障礙物，就是多年來政治上的不能獨立，致使牠彷彿是屬省一般，須與丹麥和瑞典同休戚。及至此時，因約翰·瑟罷士梯安·衛爾海文(Johann Sebastian Welhaven)與亨利·味格蘭(Henrik Wergeland)兩人的勢力，挪威的詩神終於有生命了。這個新生的詩神，元氣充沛，不能為羅倫的傷感性所左右，也不肯高飛於德國大沈神論者所開關的那個清幽皎潔的天空。衛爾海文為卑爾根(Bergen)產，是丁尼生一流的浪漫詩人，其詩得古典的工整處；味格蘭也是天才，作品中充滿着麗詞名句，他的意志和人格，曾使挪威其餘的文人都黯然無光。

第十九章

浪漫主義已使一切想像和幻想的泉源枯竭——傾向現實的反動——當時社會政治生活及道德的狀況——法國四等二帝國——文學之寫實主義——寫實主義在歐洲之各種形式——法國之自然主義——其他各國之模倣自然主義——新派之興

第一節

惟情的浪漫運動已如野火燎原逼及全歐了。

然而浪漫主義的特徵，無非是純粹的愛美，熱奮的感情，激烈的詞句，以至過度的不安狀態等等——凡此種種，都是跟一個漸趨實驗方面和科學方面的時代不能同調的。

於是近世社會的趨向，無論好的方面，壞的方面，都依一種確定的徵象顯露在文學作品裏。於是人們對於自己本能的情慾以至人類所以活動的一切高尚的非高尚的嗜慾和原動力，都急急的要明白牠們的真相，急急

要將牠們仔細的檢查一下。

法國的浪漫派作家，以維克多·聶俄及亨利第三 (Houn III) 的作者一流人爲領袖，曾經解脫了狹窄的公式的束縛，因而把詩的範圍推廣，並使詩的形式得着自由。這種解放文學和思想的榮譽，確乎該歸他們得的，但是他們在勝利的快樂當中，曾經逃免了大半勝利者所不能免的那種暫時的自覺喪失。

他們的原來計畫本是按照他們自己的天才而定的；後來他們的天才逐漸發展，於是他們便越出了原來的計畫。既超出原來計畫之後，他們便覺得思想絕對獨立和想像不受約束的權利是不難替人人都宣佈的。他們那種野心的願望是不限於那一個時代的；無論什麼題目，無論題目的什麼方面，都可給他們以感興。他們要求有一種權利，可以處理和細慮一切的題目，而不受規矩和習慣的阻礙。

據他們自己的宣言說：『我們要使我們的力量和自由以及我們的夢想和詩得以充分奔放，我們只聽我們自己心裏的聲音；我們並不專屬什麼世紀，也不專屬什麼派別。藝術和人類的社會，和哲學，和政治或道德，都沒有共同的特色。藝術祇是藝術，不能再是別的東西。』

然而想像的翅膀，也和鳥的翅膀一樣，若是常常用牠，是要疲倦的；到幻想的境界裏去飛的回數太多了，不免對於人間世和牠的居民，以至日常生活的需要，要發生一種無力領會的病症。這種事實終至大家都明白了。於是批評家以爲最美的心的能力——想像——便是最危險的心的能力，因而對於牠的濫用提出抗議。社會對於無

矯飾的想像的產物漸漸生厭，而要求一種較近實際的人生的表現。

當一八二〇至三〇年之間，這種趨向實際的反動，便是浪漫派作家自己的作品裏也已不乏，因為當中流社會的地位漸見重要，致使金錢成爲「最後武器」(ultima ratio mundi)的時代，榮虛的報酬便覺得有些不能滿意。在亞歷山大·仲馬和尤奎·緒(Lucien Sue)一班著作宏富的作家手裏，文學的工作已漸漸成爲一種商業。金錢在社會上本已是一種神道，如今在文學上也漸漸要成爲第一要件了。

如此，思想漸漸失其坦率自然的性質。新近以熱情和「自己表現」爲特徵的詩，至此成爲淡漠和浮誇的詩。當初描寫人生悲劇和表示關於人類運命的嚴重觀念的作品，至此退化而有似乎滑稽文章了。此時新聞紙非常發達，往往激起思想界的震動，也猶之牠們激起交易所的震動一般。又有一種下等的小說也非常發達，無論材料作法都極拙劣的。凡此種種，都是不利於高等文學的進步的。

這種爲金錢起見而將真正藝術犧牲了作爲商品的趨勢，逐漸明顯起來。於是不久便到了一個不堪的時代，一切藝術都用以挑撥下劣的感情，或用以蠱惑一般缺乏氣骨的讀者，引他們漸漸陷入夢境。概括說起來，這個時代中的作家，除想多分得一份社會的幸福——尤其是金錢和名譽——外，更沒有別的高遠的志趣。

這樣的作家實在多不勝計，其結果便是第二帝國初年路易·腓力(Louis Philippe)末季的那種萎靡不振的產物。

第二節

但是文學中雖有這種商業的元素在那裏作祟，卻難死滅的境界還是很遠。實則這個似乎專講物質的利益

的時代，正是十九世紀文學成績最優良的時代。法國路易·腓力之朝便是如此的。

此時謝多勃良已在衰暮之年，卻還在口授他的他界之回憶 (*Mémoires d'outre-tombe*)，拉梅內 (*Lamennais*) 也已年邁，則正作思辨家之談論 (*Parole d'un Croquant*)，以及抗羅馬教權，貝倫伽則用顛弱的聲音唱他的最後的詩句；拉馬丁則以對基督教潛思默究之餘出爲諧聲 (*Harmonies*) 一作；維克多·聶俄則因受時代的感觸，正有秋葉 (*Feuilles d'automne*) 之作，用以寄其憂思，在他那風濤澎湃的一生中，似乎惟有作此書時會暫得一時的寧息。其他如米細勒 (*Michélet*) 是歷史家，他曾把浪漫的熱情的元素輸進歷史裏去，而注重刻實的作家如基佐 (*Gizot*)，退耳 (*Thiers*)，托克維爾 (*Toqueville*) 等，則出其較少浪漫性的作品求抵制他。提阿非爾·戈替耶 (*Thiophile Gautier*) 繼續取一種鎮靜從容的態度以發揮他的珣炯的天才；佐治·桑德 (*George Sand*) 則採取聖西門的空幻思想而用她的收情傳奇小說和愛情小說寄之。最雄健的作家巴爾扎克則方着手做他的人曲 (*Comédie Humaine*)，而以深刻之筆描寫近代社會的狀況。仲馬做了許多小說和戲劇。他的戲劇，雖不免有因想像損及真理的地方，而其價值猶之斯通達爾 (*Stendhal*)，巴爾扎克

(Balzac) 福羅貝爾 (Flaubert) 之於小說，聖柏甫及泰普之於批評，奧古斯丁·退里，浮士脫·特庫龍耶 (F. de Coulanges) 米細勒之於詩；他是最初將實驗心理學應用在戲劇上的人。

據這樣看來，可見此時的法國，雖沒高遠的志趣，智識上卻極發達；政治上雖沒有什麼著名的進步，文學上努力的成績卻是極可注意的。

第三節

然而理想主義以及抒情的熱奮都已逐漸銷沉了；其理由便是我們方纔所說的。

巴爾扎克是前輩小說家之最偉大者，他的作品裏已經流露出新時代的氣息。巴爾扎克以後，文學的作風大變，漸漸接近人事，與自然——這是浪漫派所曠棄的——的實際。

但法國因歐洲不安的景象，浪漫主義曾有一次最後的復活，不過已屬一種社會的，人道的，和政治的性質了。這種最後的復活，是一八四八至一八五二年間之事。彼時法國人的政治觀念異常發達；關於社會問題的著作，絕對沒有人理。及國會的行動，和街上叫賣的新聞，竟將社會的全副注意都吸收去。於是戲館也關門了，書店的生意非常清淡。彼時惟有一班有口才的人還有些大事業可做。因為彼時言論的力量非常偉大，每有一個演說家登臺演說，底下聽的人，無論是反對的贊成的，人人都異常興奮。彼時人所最信仰的是國民代表，良心，以及同胞之誼。因

大家都熱心於現實的事情——如王政之推翻，寡頭政治之撲滅，普通選舉權，國民之權利等等——所以想像不容有存在的餘地。因此拉馬丁一流人的口才，大足以鼓舞社會。他們只須用感情作工具，便能把自己的辯才在人心中留着永久的印象。

於是乎抒情的詩重又可在勒德律洛郎 (Ledric Rollin)，米雪爾·特部耳日 (Michel de Bourgea)，馬耶·特蒙答 (Mather de Montan) 等人的作品裏看見了。他們的作品苟非描寫現實的狀況，便是描寫將來夢想中的烏托邦。他們的文章大都喜歡誇大，揚厲，確切的形容詞。

第二帝國的日子並不很長，但其間即有多量的活動和輿論的表示。當時一般人希望政治改組之心甚熱，大似英國王政復興時代因過分的感情主義和熱烈的戀愛詩而產生的情形。又似十八世紀，彼時因大倡權利之說，因夢想產業均分，因種種空想的哲學的思想，也曾激盪了許多人的心。

彼時無論演說家和新聞家，治人者及受治者，既為這許多新思想所激動，便都不能不容他們的社會學說採取浪漫的形式和調子。然而歷史的進步並不被這種突起的異軍所阻止。

路易·拿破崙 (Louis Napoleon) 處這種無謂的騷動中間，被人民的幻想和虛偽的希望所引誘，便做起共和國的總統來了，實則彼時離開帝國的成立祇是一轉瞬的時間呢！他一拿任政柄，便下了一個決心，不等武力來強逼時決不放手。自共和成立，法國暫得一時的休養生息，至少從形式看去說得已是一種很有規律的組織。商

業的復興已可爲物質的興盛的充分證據。文學的態度總是隨着時代的趨勢變的，所以這個新時代的文學頗有歌舞昇平的氣象。演劇的事業，從來沒有像這個時代發達，小品的文學，從來沒有像這個時代多。最可注意的是這樞時代的詩，因受着這種社會的影響，所以不復單單是一種靈魂的憂鬱的表現，也不復是一種與現實絕不相干的幻想的表現。一般作家因關心時事的结果，故所取的題材多近實際，而其宗旨也只在娛人。

論起當時的文人，實並不乏具高尚的天才的，藝術原也可望更遠的進步；然而作家受着環境的壓迫，勢不得不俯就當時人的程度，否則他們的作品就沒有人能懂。當時造成社會風氣的人物，無非是次之各種：碰運氣的軍人，政治界的冒險家，專講娛樂和金錢的富人，時髦的婦女，以及金錢主義的新聞記者。當時的文學反映着這些人物組成的社會，正如池水反映岸上的樹木一般，這也是必然的事理。

然而這種現狀終於要引起反動，反動的最初表現便是諷諷。於是乎便有美雅克（Mathae）和阿雷微（Illevy）等人的遊戲詩和小歌劇，對於一切舊觀念無不加以訕笑，又有歐芬巴克（Offenbach）的諧調的詩歌，也借委婉的諷諷以傳佈真理。戲劇方面則有愛彌爾·奧計亞（Emile Augier），狄奧多·巴利亞耳（Theodore Barriere），以及小仲馬的社會劇，將個人的私德問題大膽的提出聽衆的面前，並爲後來的「自然派」開其先路。

從此一般小說家採取人類和他的環境來做小說的題材時，都曉得從實地觀察人生入手，方求他們所描寫

的人物和事情，不失常態。

作者因為要實地描寫，所以不能不用觀察功夫，因為要觀察而且精密正確的觀察，所以必須撇開主觀的元素，必須從客觀方面研究他們的材料，又必須推廣他們的觀察範圍，因而他們的作法，與從前的作法完全不同。

於是藝術的目的，在求一種社會的真正反映。即是維克多·聶俄，當他的哀史 (Alissa Lisa) 出版前數年，在致寫實派作家香弗呂梁 (Champfleury) 的信裏，也會公然說道：

『十九世紀的文學，只可以有一個形容詞；牠將稱為「平民的」文學。』

如上所述，此時的戲劇和喜劇，因受愛彌爾·奧計亞和小仲馬的提倡，都用直接觀察的方法做出，從此續繼如此，絕未變化。但是這種做法在戲劇方面力量很薄弱，並不見什麼功效。

至於小說便不同了；小說自採用寫實方法之後，遂成社會問題最精密的研究，發達得異常迅速。只有一忽功夫，寫實主義便傳遍歐洲了。其在法國，則帶一種激烈的傷感的氣息，在西班牙則地方色彩非常濃厚，成為地方明白的寫真；他如英國，美國，斯拉夫，斯干的那維亞的作家，則常把高尚的理想混入實際的寫真裏。

第四節

從情況迷離的理想主義，到精密刻畫的寫實主義，從社會的風尚的研究，到社會本身的研究，這其間的轉

變，因當時事勢的督促，進步得非異迅速，歐洲各國的文學，差不多同時都發生這種變化。

一八五〇年時，美國的女作家哈力·俾拆·斯陀 (Harriet Beecher Stowe)，因受基督教慈愛主義的激動，會做一部黑奴籲天錄 (Uncle Tom's Cabin)，因使舊世界和新世界都受感動，立刻廢除奴制。牠這部書便是寫實主義成功的一個例，她祇將農奴種種可慘的事實如實描寫出來，以陳訴於讀者的感情，更以一種希望心和想像力潤色其間，遂成爲一部魔力極大的著作。同時英國 迭更斯 (Dickens) 的創見的作品也開始出現。迭更斯從一八三八年起，便對於社會問題和一大民族的心理，加以一種深徹的研究。

此時俄國文學還未曾流露出牠的人道主義的趨勢。法國此時也祇有佐治·桑德和佩耳·勒魯 (Pierre Leroux) 的作品，稍稍流露一點描寫實際社會的傾向。社會的文學是英國最先發軔的。

英國當一八三〇年至一八六〇年之間，發生了一種經濟上極大的危機，結果將舊時的社會制度完全推翻，而各階級間起了一種激烈的衝突。因實業的發達，而中流社會得着經濟的勢力，同時勞動階級則陷於赤貧的境地，於是國會中遂提出這個問題，一經研究之後，纔覺得形勢異常嚴重，階級的差別實在不平太甚。因此當時人士頗有一種改善社會的嘗試，而迭更斯的作品，便是這種改善運動之見於文學者。同時事實方面別有「憲章黨」(Chartists) 之暴動及一八四二年之同盟罷工。關於此，當時保皇黨領袖並封建的社會主義創建者之利 (Disraeli) 曾有一種極明著的紀載。迭更斯充滿着平民的心理，對於貴族階級的自利主義和中流階級的

缺乏同情心，深痛而疾惡之，因利用小說的體裁，規畫起一種新社會哲學的綱領。

和迭更斯同時的作家還有卡羅德·布倫威 (Charlotte Brontë) 是約克州 (Yorkshire) 一個窮牧師的三個女兒之一，她的作品，流露着自然的風調和天才，她的兩個妹子安妮 (Anne) 和愛爾麗 (Emily) 也都是有血性的人物，還有依利薩伯·加斯刻爾 (Elizabeth Gaskell) 具有一種嚴肅而沉着的宗教的性情，作品多含道德的意味；最後還有那種可注意的佐治·愛略脫 (George Eliot) 價值尤在佐治桑德之上，因他書中的人物都描寫得非常忠實。這幾個作家所描寫的，無非是當時社會生活中種種可悲的情事，而描寫工廠生活的尤多，例如失業，同盟罷工，兒童的過度工作，女子的墮落，人類對於他的同類的嫉妬憎惡，以及大城市中工廠生活之種種困苦等等，無一不刻畫得哀婉動人。愛略脫的作品能夠利用一切工具——描寫，敘事，對話——來描寫人類的行動，研究人類的良心，其心理的觀察非常細密瑣屑，卻又不致損及全幅如實的精神。

英國當這段永遠不能忘記的期間，浪漫文學又顯出一種驚人的生氣，實則不但浪漫文學如此，其他各種文學也莫不如此。因為英國近代許多第一流的文人都巧會於此時。所謂「英國浪漫作家之最古典的」亞勒弗烈丁尼生 (Alfred Tennyson) 以一八四二年左右，天才——一種許久保持弗墜的天才——達於極頂，依利薩伯·勃勞寧 (Elizabeth Browning) 和羅伯·勃勞寧 (Robert Browning) 夫婦之文名，則以一八四四與一八四六年之間達於極頂，前者從一八二九年起便成名，彼時她還是依利薩伯·巴勒特 (Elizabeth Barrett)。

如生的刻畫功夫，以至其他許多特色，凡是見過他的作品的人無不傾倒。他的天才，時而流露出一種深情，時而流露出滑稽的態度，因得燭照廣遠，而仍不失其光輝。他的文章有時流於冗長，卻又絕不致令人生厭。他的筆底常常流出一種不及預料的東西，以與一種極可異的，極滑稽的——即不說大膽的——人生描寫相糅雜。

這種以細密描寫和真正感情相融和的作法，是英國作家的一種特長。這種作法，我們可以從塔刻利 (Thackeray) 的作品裏見着牠；塔刻利書中的人物都是用一枝有力而又謹慎的筆刻畫出來的，所以牠們的影子永遠不會磨滅。又可以從安忒尼·特洛拉普 (Anthony Trollope) 的作品裏見着牠；他於心理的研究，功夫在塔刻利之上，而對於人類的一般直覺，幾可以與巴爾扎克相提並論。上述這幾個小說大家，雖則性質和個性彼此不同，但同具一種英國人所特有的長處，即對於「實際」都能完全曉得怎樣去細述牠和領會牠。

第五節

近代斯拉夫作家的作品，也大半有這種深刻描寫的特色。他們的活動和影響，曾為十九世紀智識的進步開一個新紀元。

當初俄國的浪漫運動也未始沒有功績，牠的功績便在替將來預為地步，並且替作家宣言個人發表意見的權利。如今的寫實派作家，第一是哥哥爾 (Gogol)，他會有許多人物的精美的描寫，他的最初的小說產出的時候，

正是勒麥托夫做他的最後幾首詩的時候。他的思想和藝術都是俄國向來不曾見過的。同時別林斯基（Belin-
sky）則方在編製近世批評的法則，又宣言藝術當爲人生忠實的寫真。文學因爲要描寫實際，已開始從高遠的
境界降下，漸漸喪失牠的個人的和貴族的性質，漸漸成爲民衆的，社會的，獨立的，國民的。但是當時正值俄皇尼古
拉（Nicar Nicholas）當位，他是一個過去時代的征服者和立法者，是「時代錯誤」的現身，是貴族政治一切危
險的特色的代表，他的政治的野心足爲這種純粹的國民運動的重大障礙。究竟他的帝政的方針是什麼，我們也
不得而知。大概是他立意要建設一種舊式的文明，務求多具亞洲的性質，少具歐洲的性質，而且務求牠完全由國
內發達，決不容納外國的影響。及至塞巴斯拖堡（Sebastopol）的城牆傾覆，他的政治的迷夢也就消滅了。當初他
手拿著刀，要想抵禦西方平民觀念的侵入，至此這把刀寸斷在他手中了。然而在他那種殘酷的政治底下，斯拉夫
民族的天才，雖被束縛在本國的國境裏面，雖常須感觸農奴制度種種傷心怵目的景象，雖覺得自己的前途很是
悲觀，而隱隱之中，卻正在預備着一種迅速而偉大的發展。及亞歷山大（Alexander）第二手裏，斯潑蘭斯基（Speransky）所提
議的種種進步的賢明的方案逐漸實行，農奴實行解放，又以一八六一年年的改革，使二千萬人民都得自由，而造成
另外一個社會。——凡此種種，都足以使俄國人產生新的需要，新的感情，以至新的風俗，習慣。於是乎當初別林斯
奇所宣布的理想將要實現了。從此不久，俄國教育普及的時候要到了，民族的智識的面目便分明了，藝術和作家
便都把俄國特殊的國民性印在他們一切的作品上了。當初俄國的文學，祇是反映拉丁民族和日耳曼民族的思

想，至此反成他們的先導了，而且此時一般傑出的作家，已都採用一種和近代歐洲社會狀況最相宜的文體——即寫實主義。所謂「自然派」的方案，此時早經制定。此派的目的，在於研究現時的社會；此派的動機，一由作家覺得有直接描寫人生的必要，一由大學中黑智爾思想的盛行，一由當時之道德的需要，一由社會擾亂的反響和國家觀念的發展。於是向來為社會所輕視的作家團體，至此勢力漸漸擴張，而他們的啓悟者和先導者，便是屠格涅夫（Turgeneff）、嬰察洛夫（Gontcharoff）、比森姆斯基（Pisunski）、赫爾岑（Herzen）、杜思拖夫斯基、虛無黨詩人耐克拉莎夫（Nekrasoff），以及世界知名的托爾斯泰。其中有的依道德和社會變化的見解，證明由一八四〇年的思想孕育出來的一輩人之無能力；有的對於當時那個日就頹敗的社會與以最後的攻擊，大膽地描寫出牠的種種罪惡和牠所以薄弱的原因；更有用的用着宏富的想像和觀察，單單描寫人民生活的無窮期的困苦。於是乎歐洲遂引起一種深刻而濃烈的感情，未幾而這種感情（因繙譯和批評，）便遠近都傳到了。

就是北方，那威的寒嚴區域，我們也看見有一班作家，雖不免誇飾矯情之弊，卻能代表對於近代生活的最徹底的研究。這班作家中，最傑出的，是易卜生（Ibsen）和邊孫（Strindberg）。易卜生生成一種憂鬱而懷疑的性情，他要從疑慮的黑暗裏替自己的良心尋出一種新的引導，希望對於人類和社會得着一種更高尚的觀念。邊孫則是一個樂觀派，他的見解不如易卜生新奇，也不如易卜生富於革命性質，卻比他更忠實於人生；他想在無能力的神祕主義和科學中間，以至一部分人的迷信心理和當時的實證學說中間，替牠們尋出一個關鍵。

第六節

在法國，則巴爾扎克已與一切研究人和社會的作品以一種極大的推動力，上文已經說過了。無論當時或後起的小說家，沒有一個不模倣巴爾扎克，或多少受他的影響的。

模倣的東西往往越出被模倣的東西的範圍，這是常有的事情。所以後來一般模倣巴爾扎克的作家，往往以推廣範圍為藉口，將一切能行動，能思想，能感覺，能生長，能爬行的東西，無不取為精密研究的對象，因致流於極端。

一八五七年，著名的純客觀的小說波佛利夫人 (Madame Bovary) 出現，其描寫和分析的方法極端用寫實主義。數月之後，厄涅斯忒·費多 (Ermest Feydeau) 以其奇異的變態心理學的觀念，又與佐治·桑德 (那時她還繼續著書) 的理想派小說和奧大夫·斐耶 (Octave Feuillet) 的幻想作品以一打聲。

福羅貝爾之後，有葉枯爾兄弟 (De Goncourt's)，作品中含有極多量的描寫；但是他們的寫實主義已非復香弗呂梁那種輕淡的寫實主義，更不是查理士·特柏拿爾 (Charles de Bernard) 那種委婉的冷諷了。及愛彌爾·佐拉 (Emile Zola) 出現，則又更進一層，覺得要描寫人生，以前人所用的題目和色彩還是不夠用，還須再尋另外的題目和色彩。佐拉和迷信凡近代的東西至於極端的葉枯爾兄弟走的是一條路；不過他更把自己天生的癖性加在裏面。從此實證的觀念在一般作家心裏越發根深蒂固；及至一八七〇年戰事以後的一輩裏，作者的

唯一問題，便祇有實業的興旺，和基於理性的道德了。佐拉是法國文學上一個新派——自然主義——的開創者，彼時正當英國勃勞寧夫婦拿他們的美麗的詩貢獻給世界的時候。佐拉自命為自然派的領袖，曾經造了許多實例原理和規法，以撐持他的學說。他對於自然之力有一種帖然的信心，因而應用他那非凡的天才和力量，以描寫種種所以促成人為社會的動物的原動力和種種因不可遏制的情欲而生的效果，彷彿把這些東西當做一種病理的現象，取到小說家的手術室裏來研究一般。

第七節

文學上的自然主義是間接受哲學上一種大運動的影響而起的；同時凡是智識範圍以內之事，沒有一樣不受着這種哲學大運動的影響。當一八二九年時，世界最大思想家之一查理士·達爾文 (Charles Darwin) 的著名的物種由來 (Origin of Species) 出現，立即引起熱烈的批評。達爾文的著作在英、德、法三國的聲名最大，遂使生物的科學代替數學為一切科學的標準。他的學說的基本觀念——即自然淘汰的觀念——影響極廣，並不限於人類學的範圍。藝術和文學都受牠的影響，且因此而引起一般人的好奇心，對於個人及社會的生命問題都要加以研究和解釋。於是感情的地位遂為理性和經驗所排擠。一切理想的假說和幻想的臆說都無復可容納之餘地。小說是一個時代的科學進化的一種產物，所以不得不根據牠的科學性質以為「存在的理由」(raison

而定其道德的價值，又不得不同受支配於物理化學的法則的自然人以代替從前人所研究的那種抽象的形而上的人，因以充足生理學的知識。一言以蔽之，這種科學的時代便配有這種科學性質的小說，猶之乎當初煩瑣主義和神學盛行的時代配有古典的文學一般。而事實上也已證明其為如此。這種觀念已經充分的實行。所謂實驗小說，已經是很普通的了。

其結果使一種所謂「醫學小說」非常發達，就中以神經病為根據的多至不可勝數。此外則或以感情的研究應用在風俗的歷史上，或對於健康的狀態與其及於道德的影響加以細密的研究，因而關於多數人所患的精神迷惘症往往寫得非常周密。

當此之時，大家都還不曉得另外還有一種寫實主義的存在。所謂另外一種寫實主義，便是杜思拖夫斯基和託爾斯泰曾經供給過許多傑作的，也便是那種描寫事情之後，便緊接着一種判斷，且使讀者可以從中取得一種教訓的。原來所謂寫實主義，祇叫人注意外面的東西，使人除直接目見的實際外，別的什麼都不管。故當基·特莫泊三（Gay de Maupassant）和龔枯爾兄弟，佐拉，以至亞豐斯·多德（Alphonse Daudet）還未分離之先，他們的——莫泊三自己的也在內——作品裏實在是很少實際的。這不但他們自己如此，就是國內外一般模倣他們的，無論是巴黎人，比利時人，德國人，斯干的那維亞人，也都無不如此。

德國哲學上，戲劇上，小說上，詩上之採用自然主義，實也不乏法國的影響。牠的一部分青年作家，如卡爾·蕭

萊布脫倫 (Karl Bleibren)、貝爾 (Bahr) 及海茲·托伏脫 (Heiz Toyote) 等，都曾模倣法國的自然派，此處不必細述。霍卜特曼 (Hauptmann) 在他初年的作品裏，曾經自命爲「近代人」，但他至少曾經流露出他的觀察「實際」的能力和表現「實際」的本領。此時英國則安忒尼·特洛拉普 (Anthony Trollope) 文章的極盛時代已過，但仍繼續著書，他的態度適爲前譯作家那種明確的寫實主義和查理士·里德 (Charles Reade) 那種較雄健較無束縛的寫實主義之間做一種鏈節。

至當時意大利爲智識的流行病的所謂 "Verism" (真實主義)，我們也只能略略提一提。意大利人本是一個充滿生氣和愛情的民族，如今這種真實主義，把兩種相矛盾的東西——自然和風尚——併爲一談，因致一種悲觀主義和病的戀情流布全國。

北歐各國的文學，此時進步非常迅速，差不多開花結子同在一個時間；當時一般作家，也不免隨順文學的普通潮流，從事於小說和實驗戲劇。

丹麥因受實證派批評家佐治·白蘭德斯 (George Brandes) ——他是學步泰音和斯圖亞特·穆勒 (Stuart Mill) 的——的影響，對於浪漫主義和最後的浪漫派竭力攻擊。作家最著名的爲雅科布森 (Jacobson)，曾以馬利格魯伯 (Marie Grubbe) 一作餉其哥本哈根的同胞。其次爲和爾格 (Holger)、德拉哈曼 (Drachman)、皮達·南森 (Peder Nansen) 又有瑞典人斯脫靈堡 (Strindberg)，用自然派的方法而流於過火；他那部非常

刻薄的侍女的兒子（The Maid-servant's Son）會使當時人大吃一驚。

但是斯干的那維亞人的這種嘗試，為時並不很久，施用的範圍也很狹窄。他們不久便拋棄寫實主義而從事於充滿神祕的地方色之描寫，或不朽的情操之表現。同時因受英德兩國的影響，一般作家對於個人生活的研究漸漸趨重藝術的價值，未幾，這種觀念便流露於到處的心理小說中了。

第二十章

文學上之大分派——法國及他處之新却脫主義——新基督教與神祕的讚頌詩——象徵派——一般文學之世界的性質——世界性在法英美西、亞牙意、大列之最近的表現——文化之新中心——二十世紀之曙光

第一節

此時法國，雖處於悲觀主義和批評兩重勢力底下，我們卻可看見有一種堅固的浪漫主義，預備要左右最近人的心理的趨向。這種浪漫主義雖已陳舊失時，勢力卻很猖獗；牠的方法和作風各各不同，卻已成爲一種唯情的公式，變幻雕琢至於極度，又往往雜以一種矯作和誇飾的氣息，卻又常取一種研究和批評的態度。當時的保羅·都耳熱（Paul Bourget），便是這種作風的代表，他是一個富於熱情的小說家，也是一個講究博雅而耽世俗之樂的小說家，他所貢獻的思想，大都直接受之於泰音、芮農（Romain Rolland），或英國的心理學者。

至於佐拉一派的作品，大都形式上很粗糲，描寫亦不充分，其所以還能維持牠的地位而得社會的注意者，祇

因這派的領袖（佐拉自己）具有極大的生產力。他的小說逐年有所產出，好像貢獻了許多這社會學的時代之風俗史，雖則描寫上帶着很濃厚的浪漫色彩，論調上也有些欠謹慎，而以作者的偉力和他的傷感的暗示，已經足以懺服讀者。

這一派的小說，當一八八二年時，曾有人叫他做「人生的切片」。這些所謂「人生的切片」，大都充滿着瑣屑的描寫，而專致力於下級社會和日常事件之客觀的研究，但因變化太少，滋味太薄，所以究竟不能滿足人人的胃口。

因此許多年來，一個雖小而有力的「少數」已經另從別的來源去尋知識的滋養料。

這個「少數」或則從斯騰達爾（Stendhal）的作品裏發見了一種細密的描寫，及一種由心理的想像和行動及意志力融合而成的精緻的文心（斯騰達爾曾作 *La Chartreuse de Parme*，當時人大都不懂他的作品）；或則從學步斯騰達爾的美里美（*Mérimée*）的作品裏，發見了一種理想的質樸的作風，可稱藝術上最圓滿的成績；又或則從蒂特雷（*Baudelaire*）的作品裏發見了一種從苦痛的靈魂裏發出來的傷感的詩，和一種對於「非常」的趣味。於是人人對於泰音，則欲聽其為一般自然派所盛稱的關於遺傳與環境的真學說；對於芮農，則欲識其與想像融合之科學，其對於人類性靈之精細的分析，其異常豐富之思想，以及其曲折如意之文心；對於保羅·特·聖微克忒（*Paul de Saint Victor*）則取其詞句之絢爛優美；對於奧勒維利之巴卑（*Barbey of*

Aurevilly，則取其浪漫的想像與博雅的风度；對於英國的「前普拉斐爾派」(Pre-Raphaelite)，無論其爲詩人，爲畫家，則取其純美之精細的表現；又或對於勢力已開始波及全歐的瓦格納(Wagner)，則取其由一切藝術互相爲用而發生的一種複雜的印象。

至於當時法國及其他各國，一般描寫人生過分求忠實的作品，以及藝術上的寫實派和印象派，頗惹起一種顯明的反動，這種反動的趨向，便是復古。所以當時雖有許多作家，小說家，戲劇家，很熱心地把周圍的人生用極端的寫實方法複寫在書裏，同時卻有一種反動的趨勢，希望希臘和拉丁的寓言復活。

還在十九世紀初期的時候，利韓德(Leigh Hunt)和歧次(Keats)已把神話學看得很是鄭重。德國也會有許多異教的作家，從赫爾德林(Hölderlin)包括亥因斯(Heine)、哥德、席勒、海涅，及其他許多作家在內。

於是乎古代的藝術作品和古代的文學，重新又得社會愛重了。即使撇開那一些研究文化歷史的學者而言，已有三派「藝術家」幫助着這種復古的事業。一派是荷馬和索福克儂的私淑者，一派是專門研究古代神話學的，還有一派是新異教主義的熱心信徒。

這三派中的第一派，或則由天性所驅使，或則受教育的影響，都想開拓自己的思想的境界，因而專力研究異教文學的傑作，因爲他們從這些傑作裏，曾經發見一種理想的美及和諧。

第二派則或因厭惡當時的腐俗，或因受幻想的驅使，重又把古代不朽的說部研究起來，希望使一種已爲人所淡忘的東西重新復活。因爲當時人的思想和眼目，對於一般描寫人類醜惡方面的作品已經覺得厭倦，所以一部分作家都逃遁在希臘美麗的玄話裏去，藉免與醜惡的現象接觸，而作法上也就重新捧出古代的範型。這派作家對於形式方面大都竭力講究雕琢，彷彿是要雕成一個美麗的杯，藉以傾注他們心中的酒。簡括說起來，這派作家的宗旨，便在傳承古代的大作，在把希臘的玄話換了一套新衣服，再貢獻給人。他們在心的深奧處將主張外觀的美的宗教復活；換言之，即在心的深奧處彈着那郡克里溫的琴，以歌頌維那（Venus）過了些時，他們又發生一種更高的志趣，結果遂有帕那薩斯派（School of Parnassus）的領袖勒空得利爾（Loconte de Lisle）使品得的宗教詩重新復活於一種燦爛的形式底下。

第三派則覺得單做一個藝術觀點底下的異教徒，無論如何，不能滿足，務須要做一個徹底的異教徒——不是想像上的異教徒，並須是情操上的異教徒，不但是文學趣味上的異教徒，並且是哲學思想上的異教徒。他們於是製成許多規則，教人依從。他們和當初的安德烈·社內、哥德、曼蘇尼、焚尼、拉馬丁這班人一樣，不但參與古人敬神的心理，並且能感着古人敬神的情操。他們都愛好物質的美，都能了解神話學的象徵主義。——這幾層便是他們所以自豪的。他們毫無猶豫地宣言，在純美的境界裏，應推古代希臘做永久的盟主。他們也把近代思想和神話雜糅在一起，但是另外有一種目的，不僅是模倣希臘的藝術家 and 詩人而已。他們的真正目的，便是要重與古代

的多神主義，斯文本（Swinhurne）便是從事這種運動的一個例。但是他們所要求的，並不是如今希臘偏僻的城巿裏還殘存的那種近乎迷信的頹廢多神主義，也並非一般戀愛詩人所常徵引的那種幼稚的幻想的神話學，卻是原始希臘的眞正思想，是雅利安人的思想所由脫胎的那種偉大的自然象徵論。

第一節

跟這種新異教徒同時並起的，還有一種所謂新基督教徒。新基督教徒和新異教徒有一種共同的態度，便是對於流行的文學，同抱一種強烈的厭惡心理，所謂流行的文學，即是穢褻，哀調，並且反對「藝術爲藝術」的文學。新基督教徒和新異教徒不同的地方，在前者主張信仰有道德的價值，又主張觀念者教義高尚。

但是這種實踐的「尚農主義」（Renouisme），有人會大大的越出範圍。詩人和小說家都把想像自由開放，以至於無止境。

當初哥勒斯（Goeres），萊卡賴阿斯（Zacharias），偉爾納（Werner），諾伐利斯（Novalis），鄂斯加·特曼德術茲（Oscar de Redwitz）等人，曾以一種新羅馬教的抒情詩貢獻給世界，期有以安慰他們的憔悴的靈魂，如今雖他們的日子已經是很遠了。他們當初那種嘗試，至此被應用在別種文學上，被一班劣等資質的作家重新試起，遂致在法國和比利時成爲一種似乎新奇的東西。但有三個人應該剔出所謂劣等資質之列：一個是將來之

夜 (Future Eye) 和脫利布拉波荷麥 (Tribulat Bonhomme) 的著名作者韋勒爾·特哀爾·亞當 (Villiers de Vile Adam) 一個是盧斯芒 (Huysmans) 還有一個是梅脫靈 (Maeterlinck)。我們從這三人的作品總見得諺所謂「極端必遇極端」一句話確乎有理，因為他們這種極端的不健全的神祕主義正和一種極端的寫實主義碰在一起。他們這種主義是間接受俄國和那威文學的影響而來的，故此時這兩國作品的繙譯業已逐漸流行。於是乎天下又有奇蹟的製造者了。於是乎「通神家」(Theosophists) 也出來了。他們這一派作家，可以說是一種新式的「光明派」(Illuminati)。他們的目的是在把人類的能力推廣到超自然的極深的境界裏去；他們主張此說頗力，終於使別人也相信他們。從此數年間，曾有一種神祕小說的流行病，加以同時女性的作品異常盛行，遂成十九世紀末葉最顯著的迷妄現狀之一。物理的科學已將陸上，海上，和空中許多似乎不可能的事情一一都實現，於是人們要想從精神的科學裏去尋求意外的東西，要想到渺茫的超自然的境界裏去探險了。關於精神治療術的著作，從前人向來不會費過這許多的筆墨。一時關於所謂「玄秘之學」(occult sciences) 的著述，報紙，以及研究會，全世界都非常盛行，法國有之，而英國，美國，德國，俄國尤盛。

第三節

當一部分的作家這樣的包圍在雲霧裏都從虛幻的境界尋求他們的感興的時候，另有一部分同樣大膽的

詩人，則正從夢境裏試用一種三稜玻璃照觀世界，或試用一種奇詭而複雜的聲律，想在讀者身上引起一種新奇的感覺。這派詩人本沒有明確的志趣，所以於當時流行的一切影響沒有一樣不感受，例如瓦格涅的影響，英國的「前乎拉斐爾派」的影響，印象主義的影響，德國哲學的影響，或後來的那威哲學的影響，無不兼收而並蓄之。他們因求文章上的變化起見，盲目地要想發見一種新哲學，希望將圖畫、音樂、文學的一切調子，一切深義，雜糅在一起。這派作家尋常稱為「頹廢派」(Decadents)，而他們自命則為「象徵派」(Symbolists)。

此派遙尊蒲特萊為祖師，而其當時之領袖，則其一為史梯芬·馬勒梅(Stephane Mallarme)。他有一種特異的天才，論者都說他的文章從來沒有被人預料得到的。他的作品都根據美學的基礎，這是他研究黑智爾和瓦格涅的結果。又其一為魏倫(Verlain)；他一生潦倒，不能替自己引導，卻見人家都把他當作導師，不覺駭異之至。當象徵主義盛行的初期，蒲特萊的勢力最大；他以惡之華(Fleurs du Mal)一作最先把印象主義介紹到文學裏。他的意見，以為應該用感官觸動悟性，不應該用悟性觸動感官；又因他的推理力有一種特異的品性，所以事物與事物之間有許多為別人眼睛所看不見的密切的關係，他獨能把捉得住。他又以為整個的觀念是由許多聯屬的感覺造成的。他借着一件東西的名義，可以發見許多元素，足以引起變化無窮的觀念，彷彿祇是些由聲音、顏色，或類似點發生的效果。後來他的一班弟子把他的這種學說演繹起來，甚至於說單是一個字的聲音傳到我們的感官上，便能引起一種特殊的感覺，而這種感覺傳到心上，便可以產生思想。這種學說的善用或濫用，將引

我們到什麼地方去，我們雖然不知，卻也可以猜得到。卽其結果必使我們把作者之人的差別完全撇開；思想不復能支配想像，祇能收受由顏色或聲音傳進來的印象，其實顏色和聲音是另外有一種意義的，價值也是預先定了的。於是無論什麼作家，既都可以標新立異，既都可以不受文法，語法，以至作文法的束縛，便都又把文中的句子高與怎樣排列就怎樣排列，以期收得奇詭的效果。便是此派中第一流的詩人，也都潛身於渺茫抽象的境界，而當作一種艱晦難解的文字。此派自始卽迷信塞理，歧次，和斯文本等人的形而上的唯情主義和他們的字法，他們有一種隱約的自由藝術的觀念，內容充滿着抽象的觀念和渺遠的類例。他們的野心很大，但是他們留給後人的東西，除這種願望的表示和他們的思想的一些糺纏而外，別的什麼都沒有。又此派的分子中，各人思想的態度大不相同，惟大家都向一種渺茫的無邊際的境界去探索，這就算是他們真正協調的地方了。分子的團結力既如此其薄弱，所以此派終於破裂。破裂之後，有的繼續做詩，其他許多則改作簡樸而流利的散文了。但其中有一部分人還仍舊有種種奇異的嘗試，最著者卽關於狄奧多·特塞徹爾 (Micodore de Barville) 所最喜愛的所謂複式短歌的試驗，還有一種是要使塑型藝術收精美的效果的試驗，更有一種是音律改革運動，結果造成一種行數不規則的詩體。

第四節

雖然這許多各異的潮流，以如此繁瑣而變幻的流別，其對於一般文學的進步和性質，實並未發生怎樣顯著的影響。在一般文學批評家的眼睛裏，這個新興的極端纖巧的詩派，其視為無足輕重，正無異於十六世紀中悲觀詩人摩里斯·塞孚（Maurice Sceve）的作品，或一部分模倣龍沙者之誇飾的作風。至於一般淺薄的讀者，則對於這班人的詩是向來不讀的。在詩人自己的各派中間，雖常有許多問題，大家為着牠爭得非常激烈，例如重音在詩句中的關係問題，腰韻和腳韻的優劣問題，十七音節行是否得體的問題，以及默音 e 的利弊問題等等，往往大家筆戰不已。然而一般社會卻都從來不理他們。因為這些問題若拿來和一般關於世界大勢的問題權衡輕重，便覺得實在無關緊要——世界還是按着牠的路徑進行，無待乎夢想家來與聞牠的事。政治的情形變化得非常快。經濟上的原則，自古以來都認為可適用的，至此都顯然經過一種巨大的變化。歐洲最古的帝國相繼覆亡，而新國代興於既往文明的廢墟裏，或崛起於遼遠的未經開闢的地方。在這種種巨大的事件底下，區區幾個小文派的黨爭當然是無人注意的。社會的注意已被許多別的和他們更關切的事情所吸收：政治上各大黨派的爭鬪，報紙上熱烈的筆戰，世界工商業市場上的國際競爭，物質科學和自然科學上影響足以改變社會狀況的種種新發明，以至那驟然而起的女性解放的現象等等。人們無日不討論這些問題，間或有疲倦的時候，則取當時充斥坊間的種種適合一般不經意的讀者的胃口的作品讀之，藉資消遣。

當過去的二十餘年中，法國文學上有許多互相衝突的派別。「帕那薩斯派」和「自然派」之後，有「頹廢

派」及「象徵派」，其後又有「新基督教派」，即「基督教頹廢派」，在他們的心目中，神祕主義只不過是肉感主義之一種，此外更有「玄秘派」及真的或偽的「易卜生派」(Ibsenists)；最後還有一派，以為那威的神祕思想支配人心已經許久，主張此時應該回返到法國從前那種明快的作風的。然而以這樣許多的趨勢，這樣許多的變化，卻沒有一種能得社會的一致承認，也終不能替社會造成一種很明確的趣味。文學上這樣的變心力，不但法國有之，同時的其他各國也都可以看見，而德國和意大利尤其顯明。在這兩國的無數作品和作家當中，我們很不容易尋出各派的共同起源和他們彼此間的關係，也很難認定那一派值得做一切派別的領袖。

自來文藝界的紛亂無紀律，鮮有比這個時候更厲害的。藝術上和文學上除有一種普通的無政府狀態外，各個作家和藝術家自己對自己也似乎繼續在那裏交戰。事實上，各個作家只是隨順自己的傾向，追求自己的理想，或單被一種好奇心所驅使；有的態度始終不變，其他則隨心所向，而不受陳見的束縛。

我們現在且把這班作家略舉幾人來論列一下——無論是早已成名的，或新近成名的，請先論二十世紀開幕時的法國。安德烈·忒里亞(André Thauriet)是一八六〇年左右成立的一種「唯情派」的忠心弟子，他繼續對於自然的美抱有一種熱烈而堅固的愛慕心理。朱理士·克拉提(Jules Claretie)想像極豐富，他把無數的題目取作嘗試的資料。弗朗沙·科佩(François Coppée)已在垂暮之年，似乎無意中受着德國人的感發，而專致力於食人的研究。在普羅溫斯的磯地，楓樹和柏樹的叢中，則有腓特烈·米斯特拿爾(Friedrich Mis-

Paul) 他在差不多半世紀以前的一部作品裏已經隱約流露出一種新文字和新詩的跡象，如今他可代表恢復古代浪漫詩人作風運動的中心人物。約瑟·馬利亞·特愛雷雷亞 (José Maria de Heredia) 從前是個浪漫派，新近改歸帕那薩斯派，他不過偶爾做做詩，而極喜雕琢，絕不問自己的作風是否隨順當時的趨勢。蘇利普律頓 (Sully-Prudhomme) 嘗一九〇一年時，嘗把他的詩的思想寄之於一種雄健的散文，彷彿以為他那形而上的理想的大著作已臻完備。皮耳·洛蒂 (Pierre Loti) 工於描寫一種渺茫的異域的印象，繼續用他的優美的作品引起讀者的新情緒。阿那托·法蘭士 (Anatole France) 合先天的資質和後天的力量，博雅的學殖和嫵媚的幻想而有之，因成當時造詣最高的作家之一。朱理士·勒美脫爾 (Jules Lemaitre) 天才極高，作戲劇及文學批評，可惜後來墮入政治界無窮競爭的漩渦，文學生涯因遂弗繼，與勒美脫爾同派的有摩里斯·巴累 (Maurice Barres)，少時叔淑斯騰達爾，能在當時一般狂熱的狀況當中產出觀察精密持論坦率的作品。「文藝院派」(Academiens) 的索勒爾 (Sorel)，布翰退耳 (Brunetière) 及法給 (Faguet) 等，則以一種以推理和觀念為基礎的深到的知識及一種堅固的信心應用在普通的歷史或文學產物的歷史上面。保羅·都耳熱一派的心理研究者，則探索人心的狀況至於極深的深底。最後，當保羅·亞丹 (Paul Adam) 正在嘗試詩的小說，絡斯尼 (Rostand) 兄弟正在做科學小說的時候，馬拆爾·普累服 (Marcel Prévoist)，保羅·馬貴里 (Paul Marguerite)，及朱理士·波雅 (Julien Bois) 等人，則忙着研究一種新式的戀愛，希望作為一種理想的戀愛，但大概不過是將

來人類的夢想罷了。

戲劇方面，愛德曼·曷斯當 (Edmund Rostand) 把浪漫派當初被帕那薩斯派推倒的旗幟重新又豎起來，成績很可驚異。亨利·貝克 (Henri Beque) 一派的健將如保羅·厄尼 (Paul Hervieu) 特庫累 (F. de Curel) 梅脫靈 疏細恩·笛卡維 (Jancion Dossaves) 及屋塔夫·米耳波 (Oscar Mirabeau) 等，則取一種窮詰的態度，而深入社會的和人類的戲劇的範圍，使我們瞥見近世悲劇的端倪。一面，一般字德維爾派 (Vaudeville) 一種曲白雜用的喜劇的作者，賓行斯克里布 (Scribe) 和薩都 (Sardou) 的戲劇學說，正享着金錢上的成功，同時比較莊嚴的作家，則以關於種種良心問題的戲劇表演在古典派的舞臺上。

小說和戲劇之外，還有許多外國著名作品的模倣，繙譯，及改譯。這些模倣家和繙譯家，有的採取那威人的深奧的作風，也有的模倣俄國人的唯情的作派，而托爾斯泰的風格模倣者尤多；此外模倣波蘭的，英國的，意大利的，德國的，也不一而足。其志趣較卑的作家，大多數只求能投當時社會之所好，便算滿足。總之，法國文學在這段時期裏，已經流於一種頹廢的奢侈了。

第五節

我們在上面已把法國文學從十九世紀初期到末葉的情形特別注意的敘述一過了。我們看見這一期中的

法國文學，最初有帝國時代的大荒年，其次有王政復興時代之詩的大爆發，復次是一八三〇至一八六〇年間之豐富而複雜的收穫；於是寫實主義佔勝利了，其時適值知識主義和實利主義盛行，因使詩和自然及人生隔離得很遠，又值人人都以享樂爲人生的唯一目的。最後便是易卜生主義的反動了。

說至此，我們所應該注意的，祇是次列的幾點：法國文學流傳外國的勢力漸衰，無論歐洲及美洲，對於一般描寫巴黎和巴黎生活的小說要求漸減；一般人對於詩的意識漸就消滅，人才日漸凋零，而文學上的努力也日見其薄弱了。但同時又有一種反對的趨勢，我們不能不注意，便是一般青年學生對於文學都有極大的興味，這是數年前所沒有的現象。

第六節

當現在這種智識大發展的時代，我們要說那一國的文學最優勝，是很難的，便是現在最流行的俄國文學和挪威文學，也豈能自命爲勝過其他一切國家的文學？

大概各國的文學，雖在宇宙真理的大道上不無彼此相接觸的地方，但各個的努力都只求發展自己的特性，各個都依從自己的習慣，或夢想要獨立生存，並爲自己生存。

所以英國路特耶得·吉卜寧 (Rudyard Kipling) 最是風行，祇因他能替民族的自大心理和自信心理

竭力鼓吹。這種自大心理，他名之曰『帝國主義』，已成爲大不列顛人民的普遍心理。他是盎格羅·薩克森民族大膨脹的鼓吹者。他不像同時的威廉·瓦特孫 (William Watson) (他是一個文學批評家和詩的批評家，主張維持傳統，爲守舊派的有力分子)；他曾經把一種新的元素輸進文學裏，力量和精神都跟舊的完全不同，遂成爲當時文學的特色。自從有這個叢林集 (Jungle Book) 的作者，英國的詩便不復是英吉利的，而成爲不列顛的了。當時的路特耶得·吉卜寧和外國色彩很濃厚的史蒂芬森 (Stevenson) 以及來特·哈革德 (Rider Haggard) 等，大家都鼓吹帝國主義，因而影響及一般國民的心理。因他們的著作，而一般人民開拓屬地的野心遂被引起，希望把不列顛的民族和民族性推廣到全世界。英國除有許多小說家外，還把許多大哲學家（他們的著作各國都有譯本），歷史家，批評家，及學者貢獻給世界，以助成世界知識的進步。此外還有一批藝術的愛好者，例如威廉·莫里斯 (William Morris) 曾著無何有鄉之消息 (News from Nowhere) 一書，爲裝飾藝術復興的大功臣，爲稀見之多才多藝者；又有博學的納斯欽 (Nashe) 是精神界的英雄，靈魂的教育者，英國人對他非常迷信。更有一層應該注意的，英國的詩，從掛冠詩人丁尼生到繼任的亞勒弗烈·奧斯丁 (Alfred Austin) 手裏，似乎已比較的衰落，卻無論如何不能說已經絕滅。

當距今不遠的一段時間，若有人問小說的真正產地是那裏，人家必毫無猶衷的說是大不列顛。大不列顛自從菲爾丁·窩爾忒·司各脫，迭更斯，塔刻立，佐治·愛略脫，以至現在的梅列笛斯 (Melville)，小說的人才非

常發達。梅列宙斯是個極精細的人生分析家，他的作品反映着當時的一切問題。

再說到美國，則郎匪羅 (Longfellow)、愛默生 (Emerson)、溫德兒、和謨茲 (Wendell Holmes)、喜替尼 (Whittier)、阿御西 (Agassiz)、及羅厄爾 (Lowell) 等人所常居的波士頓 (Boston) 已成為文學的中心點。這裏出來的許多著作，差不多同時可以出現於倫敦和愛丁堡。我們從這些著作上看去，可以說英國已式微的小說已經流轉到北美合衆國去了。合衆國的國民還未失青年的春夏氣，所以小說漸漸復活而取得種種的新品性。牠在十九世紀一世紀的中間，曾經出產這許多的作家和這許多的作品，這是牠確乎可以自豪的。我們現在可把牠主要的幾個作家列舉一下。最初有芬尼摩庫拍 (Fenimore Cooper) 的印度史詩；其次有華盛頓·伊爾文 (Washington Irving) 優美的描寫，以得加·愛倫坡 (Edgar Allan Poe) 非常的想像，俾折·斯陀夫人 (Mrs. Beecher Stowe) 及卡明夫人 (Mrs. Cunningham) 有道德上和政治上極大價值的作品，哈力柏吞 (Haliburton) 活潑而滑稽的描寫，和謨茲絕妙的諷刺和活潑的人物描寫，以及馬克吐溫 (Mark Twain) 諷刺的滑稽文。此外還有魯桑 (Hawthorne) 分析人生的作品，布勒·哈脫 (Bret Harte) 描寫加利福尼亞 (California) 生活的作品，佐治·梭布爾 (George Cable) 描寫美洲·西班牙人生活的作品，及窩威·惠特曼 (Walt Whitman) 極富想像的作品。新世紀開幕時，則有威廉·豪厄爾茲 (William Dean Howells) 及亨利·詹姆斯 (Henry James) 兩人，他們是十九二十兩世紀交界時英語小說的最好作者。同時英國也有

好幾個著名的小說家，一個是在治·梅列笛斯，是女性的深微的描寫者，還有一個是托馬斯·哈第（Thomas Hardy），是天才極高的人生分析家，作品兼屬浪漫和近世兩派。

以上所述，便是合衆國的新社會對各方面異常膨脹的情形。牠是一個精力富足的國家，無論那一方面的進步都是可驚人的。牠以區區一百年的功夫，曾經歷過文明進步的一切階級，所以牠的野心是不可限量的。牠在經濟上，實業上，商業上，已經佔得世界第一一個地位，實用科學上也已佔得非常優越的地位，如今更以同樣的熱心和毅力，預備做全世界智識事業的盟主。

第七節

至於德國，則因從事於一種比較積極的事業，所以純思想和純感情方面的事業必因之而逐漸減退，這是毫無疑義的。

從前的德國，因為國內分裂，以致國力薄弱，至此遂專致力於道德的教育，而謀人民的進步。

牠既發達到最高的程度之後，便以維持和增進政治的權力為牠的最大目的了。當牠國內還未統一而方在力求統一的時代，牠在思想，想像，哲學，和詩的範圍裏，曾經有過異常豐富的出產，及其成熟，則語言上，歷史上，和文學上，都顯得非常光榮。但到牠既用武力造成統一之後，從前人心目中的那種理想，便突然間覺得遠不可即，而成

爲烏託邦的了。從此德國便不像從前提倡理想的美和道德的光榮了。牠從此便祇關心目前的問題。怎樣可以伸張牠的權力？怎樣可以實行牠的軍國主義？但到後來，這種軍國主義也像從前的哲學思想一般被放棄，於是牠就投身於世界工商業的競爭場，將大部分的精神耗費在裏面。與地利有個大臣嘗說：『十六十七兩世紀一切活動的原動力爲宗教，十八世紀爲爭自由，十九世紀爲種族爭優勢的競爭，二十世紀則將爲工商業的競爭。』如今看德國這種變遷的情形，彷彿是替這段議論做證據了。然而德國並不會容牠的智識的價值和品性減少。牠的哲學的勢力，在國內外都有一種衰落的現象，詩界雖不乏幾個出色的人才，但也日就衰落，至於創作的戲劇作品，則已衰到極點，所有的祇是法國作品的絕對奴隸的模倣。除開少數幾個小說家還能作逼真的人物描寫外，德國文學的泉源似乎已經枯竭。然而牠的智識專業卻並不是一種卑劣的無足輕重的努力；卽當「普法戰爭」剛了的時候，——那時英國和俄國文學的勢力是絕對不成問題的，——牠已對法國思想發生一種真正的影響。後來牠的智識的努力曾經顯然的改變方向。牠對科學非常努力，因使半世紀前形而上學和哲學所佔的地位改爲科學所得。德國本來是一個好學不倦求智無厭的國家，因爲一般的程度都很高，所以個人的努力很不容易出色，此時牠的最高志趣和最大願望是在造成一種世界性質的文化。牠的思想是一種極駁雜的混合體，內中有斯干的那維亞的元素，法國的元素，英國的元素，俄國的元素，也有本地的元素，所以和瓦格涅的理想最不相合的，當莫過於此時的思想了。外國的潮流，從各方面都有得流入；大家都有一種很顯明的欲望或無窮的好奇心，要想曉得，取得，

並採用歐洲其他各國，美國，以至遠東的智識生活的特色。現代的德國文化目的在取得一種世界的性質，頗與十八世紀時法國的志趣相似。這種志趣的結果，使牠達到一種很高的文化程度；即單以牠的科學方法而論，縱不說是絕對的優勝，也已頗能在歐洲保持牠的威權。又以牠的高等教育的組織而論，雖則法，英，美等國的大學業已成為牠的勁敵，卻始終還維持着牠的優越的地位。德國人對於近世語言的研究興味，以及對於一切實際學問的研究興味，都進步得極快；一言以蔽之，如今的一切學問，無論是自然科學，歷史，地理，法律，哲學，言語，沒有一種不會受德國的影響，也沒有一種沒有德國人的著作，德國人的著作已是一切學問的源泉了。

從現代的德國會經流出下列種種知識上的潮流：因柏克 (Boeckh) 和蒙森 (Mommsen) 兩派的影響而起的對於古學的新態度，畢希勒 (Bachner) 的科學的唯物論，赫克爾 (Haeckel) 的系統的進化學說，叔本華 (Schopenhauer) 的悲觀主義，尼采 (Nietzsche) 的學說，杜林格 (Dühring) 的哲學，司特老司 (Stauss) 和寶厄 (Bauer) 的文學理論，蘇德曼 (Sudermann) 和霍卜特曼 (Hauptmann) 的戲劇，此外還有瓦格涅的美學的革新，也是不能遺漏的。

第八節

意大利自從突然患了「誇大狂」(Megalomania) 的時候起，牠的藝術的星便漸漸的黯淡下去；牠從此

便拋棄純知識的事業，而從事於物質優裕的競爭和社會思想的戰鬥。但是這種熱烈的騷動並不會妨礙一部分高才的作家，也不足以窒塞牠那種不竭的想像力。牠的詩以朱塞比·卡杜契 (Giuseppe Carducci) 而發出最後的聲調，雖顯覺比從前薄弱些，卻還是雄健的。小說當由薄伽邱到曼蘇尼的一段期間，本只有一種形式，只是一種簡單的故事，並沒有表示個人或一般情操的地方，至此，羅格查洛 (Pogorzaro)、迦伯列·鄧南遮 (Gabriele d'Annunzio)、馬泰特·塞勒阿 (Matilde Serao) 等人之手，纔成一種重要而多變化的文體。戲劇家也會發見一種新方法，使戲劇復活於自然主義的新潮流中。朱塞比·查科薩 (Giuseppe Giacosa) 曾用這種方法做他的愛之悲哀 (Sonnets of Love, 1885)，還有一部著作，則學步保羅·菲刺里 (Paolo Ferrari) 的純浪漫的作風，頗會激起讀者的感動。馬利奧·普刺加 (Mario Praga) 的 Moglie ideale (1880) 和給洛勒摩·羅維塔 (Gerolamo Rovetta) 的 Dionesti 也採用自然主義。於是意大利戲劇的復興已經很有希望了。不幸這些描寫社會生活的寫實的戲劇，表演在舞臺的時候，頗覺缺乏審美的價值，因此牠們的勢力不能持久。其能彌補這種缺憾的，則有鄧南遮，他是一個漂亮的，複雜的，反覆而多變化的藝術家。

如上所述，現代的意大利對於世界文學榮譽的競爭場會經貢獻羅格查洛和鄧南遮兩人的作品。至於西班牙，則不但有斐得祿·安多泥與·阿拉昆 (Pardo Antonio Alarcon)、甘保莫 (Campanor)、敏耶司·對阿涅 (Nunez de Arce)、佩累達 (Pareda) 及帕拉達、發爾得 (Palacio Valdes) 這些已經有些過時的作家，

並且還有厄啓格雷 (Echegaray)、基美拉 (Gimerán)、帕累司·嘉多斯 (Perez Galdos) 及培那文德 (Benavente) 等一班名字很響的作家。但我們從他最近的情形看去，卻覺得他的想像力並不見得強旺。晚近西班牙的空氣頗不適於思想的發達。國民的精神只不過是皮毛上有一點活動。從一八八五年到新世紀開幕的一段期間，除開極少的幾個例外，一般狀況實在悲觀得很。國家不幸而有許多的患難；在外則東西兩方面的殖民地先後分裂，在內則因非常的增稅，以致國力單薄，令人想見查理士第四時代的弊政。他被壓迫於牧師制度和軍國主義兩重壓力底下。在旁觀的人看來，大家都覺得這個查理士的古國似乎並不會改變中古時代的狀況，還是一般的守舊，一般的保存着封建時代的習慣。然而天下事決沒有一成不變的；以絕對專制的俄羅斯尚且有思想革命的一日，所以西班牙也終必有此一日。一九〇一年時，伊勒克特刺 (Elleorra) 一劇表演於馬德里 (Madrid)，這便是將來對於僭侶專制大反動的初兆。而且西班牙一般人的氣質，雖仍很殘忍，卻已略近人道，而憐憫，團結，進步等觀念，也漸漸的發生了。其所以有這種的變化，大概受北歐的影響最多。我們看帕累司·嘉多斯晚年所作的戲劇，便覺與西班牙舊時的作品相去甚遠，彷彿是那威人所作的戲劇，不似出於洛普·特味加的後代人之手。

第九節

易卜生的影響簡直是不可限量的；無論是羅馬系語言，條頓語言，及斯拉夫語言的文學，無不感受他的影響。

所謂「易卜生主義」曾把許多種類的特質輸進歐洲，即遠如西班牙也會受着，又曾傳播了一種智識上的流行病，彷彿十六世紀末葉和十七世紀初期文學上矯飾風氣盛行的情形一般。這種主義的顯著特色，一是濫用譬喻，一是曲解自然現象，一是矛盾，一是對於婦女的奇論和崇拜，正好替理查·瓦格涅的過度的婦女崇拜論做一個副本。但我們若用一種健全的合法的批評眼光去研究易卜生的戲劇，便可見他所描寫的一部分的人物確是近代男子和婦女的絕好模型，又可見他戲劇中如娜拉 (Nora)，索爾納斯 (Solness)，海達·該伯拉 (Hedda Gabler)，奧斯華特 (Oswald)，勃蘭特 (Brand)，及斯托克曼 (Stockman) 等人物，將來一定可以代表不知足的個人主義，代表無限制的自由主義，代表種種神祕的現象，並代表道德的神經病，而供一般作家做「帖子」——這一層是我們必不能忘記的。

戲劇的改革是北歐最先發軔的；這種改革的要求，是在把日常生活最平常的事情表演在舞臺上。將來也許有人要非難這種改革，說他缺乏動作，缺乏動機，並缺乏戲的效力；果有這種非難，也是牠所應得的。戲劇之外，同時還有許多小說和詩，大都反映一種不安的悲哀，因這是挪威詩人和瑞典詩人的特色。至於現時的那維亞，即使開易卜生，邊孫奧拉·韓森 (Ola Hanson)，以至斯脫令堡而言，其文學的發達，也已有文學史上少見的盛況。

第十節

我們面前可做文學史的材料如此豐富，究竟那樣該說，那樣該不說，確乎是很不容易決定。但是我們曉得，第一，俄國文學非常發達的情形是我們應該比較注重的（我們在上文只不過說了一個大概，）因為俄國的文學是純粹由本國發達起來的；第二，托爾斯泰主義的勢力，也應該特別注重，因為牠的勢力也如別派文學裏的達爾文主義一般，對於近代思想曾經發生極大的影響。復次，我們對於阿思忒羅夫斯奇（А. С. Герасимов）及亞歷西斯·波騰金（Alexis Poteikine）一派的戲劇改革也應該注意；而於一般為將來作預言的小說家的材料尤其該注意。所謂預言小說家的材料，便是俄國現在種種嚴重的難題，牠的渴望自由和正義的心理，牠的為後來種種衝突種種戰亂作先兆的潛伏的騷動等。凡此種種的現象，都是一個大民族因無能力而必至的結果，更因一九〇四年的日俄戰爭，所以實現得愈快了。

然而當時俄國的小說家並不等這種現象的實現，便已預先加以一種深澈的研究，這樣的遠見，當然是我們所該注意的了。

俄國的奴制廢除，已是一種大進步，從此一般小說家的努力都按着一種確定的程序用去，以期繼續這種大進步，使勿停頓。他們都已採用了一種深可信用的學說，而承認半世紀以來為一般批評家所稱許的原則為自己

努力的方針；這裏所應該特別提及的有四人，即拆泥瑟夫斯歧（Therichlevsky）、多布洛甫利奧博夫（Dobrovoulov）、匹薩拉夫（Pisanev）及密拆拉夫斯基（Mitolalevsky）；他們都極力主張用「爲人生的藝術」之說代替「爲藝術的藝術」之說。

其後也有少數作家始終沒有受一般思想進步的影響，其中有的專心研究文藝復興時代或古代異教的文藝，如梅列朱斯基（Merejovskiy）有的喜歡研究新的音律，如柏爾蒙特（Balmont）；有的努力於傳承塞理的衣鉢；更有主張深微的新希臘主義，如伊凡諾夫（Ivanov）的。

凡是此等作家，都是捨大道不走而走旁路的。他們並不曉得所謂國民教育，非如柴霍甫（Chekhov）、佛勒細衣夫（Vershirov）、赤爾科夫（Tolstoy）、哥爾該（Gorki）、科羅倫科（Korolenko）以及安特列夫（Androlev）之能了解且能促進國民教育。

一般自然派的最後代表，都用一種極親切的態度在那裏研究周圍的悲觀的環境。他們所產出的文學，是他們以前的人所未會見識過的，更不是托爾斯泰以前的人所會見識過的——即所謂「賤民文學」；又如哥爾該，則描寫更下一層的社會，而成所謂「流浪者的文學」，所謂「流浪者」，便是社會上一種奇異的，駁雜的，自由的階級，他們因爲找不到地方發洩他們的能力，所以已被一般社會所棄，描寫這種階級的文學，法國從前也曾有過。

我們從他們這種平民的、不朽的新小說裏，可以把俄國從奴制廢除以來智識進步的程序一步一步都看得出來。我們可以看出這個大民族自農奴解放以後，因未知自己的能力究竟如何，所以繼續的做種種的試驗，又因要謀得生活上最大的利益，所以不絕的在選擇方法。

我們在這些小說裏，看見有許多隱約不分明的影像浮現到我們眼前，彷彿是許多陰影映在一幅幅的圖畫上。在一般向來喜歡「明白」的法國人，看見這些古怪的罕見的「謎」，都覺得很不痛快。我們所看見的，是種種良心紊亂狀態的描寫，無非是精神上的苦痛，心理上的煎熬，以及種種困人的無謂的悲哀。這種神祕的騷動狀況，正符俄國社會漸漸進步中那種動搖不定的情形，祇給我們一種暗示，而不能明白覺察。但是這種描寫，實祇不過是一種半透明的霧，我們從裏面看進去，可以明白看見一種生活的狀況，充滿着困難和貧窮，充滿着新愁和舊恨，足以窒塞一切希望，足以撲滅一個簡單而愚昧的大民衆的志氣。

至於捷克 (Czech) 民族思想上的不及料的進化，雖則不如俄國深有人道的意味，卻也值得我們特別注意。我們最可注意的，便是波希米亞 (Bohemia) 新近的大覺悟。波希米亞因一般文人的鼓吹，牠的語言和國家精神業已漸漸恢復獨立。當十七十八兩世紀中，牠受舊教抵制改革運動的壓迫，及十九世紀的前半，纔因科勒 (Jean Kollar)、拉第斯勞 (Ladislav)、拆拉科甫斯歧 (Calakovsky)、溫策爾·韓卡 (Wenzel Hanke) 及學者薩弗列 (Sarfatic) 的著作而回復昔時的自由狀況。一八四八年以後，捷克第二次復興運動的領袖約

瑟·弗利克 (Joseph) 和納魯達·維忒斯拉夫·哈雷克 (Neruda Vítěslav Halek) 提倡浪漫主義，彼時攏倫普式金·密次擊維喜等人之名業已大震於佛勒塔佛河 (Vltava) 沿岸。從此便逐漸向前進步，約翰·胡司 (John Hus) 和帕拉次歧 (Palacky) 兩人的文學已經完全擺脫奧德管理時代的一切束縛。布拉格 (Prague) 重又成爲獨立智識活動的中心了。牠的國家作者，特長於史詩的，有如才那 (Zeyer)，多產而不倦的有如耶洛斯拉夫·佛克利基 (Jaroslav Vrchlický)，斯拉夫種特性最顯明的，有如撒克·斯佛篤普魯克 (Ozeck Svatopluk)，都能和西歐最傑出的文人並列，小說家則有喀羅林·斯維愛脫拉 (Caroline Světlá) 卽讓薩可佛夫人 (Madame Muszkova)，不愧當「波希米亞之佐治·桑德」的徽號。

我們如今所討論的，既已到了「大露西亞」精神所滂薄的地面，所以對於塞爾維亞人 (Serbians) 和布加利亞人 (Bulgarians) 的事業也當然不能不注意。因爲近年以來，這兩個民族的進步非常迅速；學校，報紙，以及一切科學上的工具，都增加得很快。在七八十年以前，柏爾格來得 (Bajardo)，索斐亞 (Sofia)，和菲利波波利 (Philippolis) 這些地方，只都還不過是幾個野蠻的村落，如今都一躍而成學術的眞正中心了。再如柏爾格來得，薩拉 (Zara) 拆廷耶 (Catinje) 等處的語言，本來是極其混沌，且毫無歷史的統屬的，如今卻有一種明確的語言，便是當初曾用牠造成豐富的國民詩的，並會按着國民的風俗，傳說，信仰，繼續維持了許多世紀的。如今這種語言重又復活，而成爲一種公共語言了。又因塞爾維亞和蒙特尼格羅 (Montenegro) 宣布獨立，這種語言已

不但成爲東歐政治的語言之一，並已成爲東歐文學復興以及塞爾維亞詩人的一種成功的工具。

復次，我們對於十九世紀末葉希臘作家的努力也不能不注意，因爲近世的希臘人一經自覺他們的力量和自由之後，便已開始承續他們那最古並最光榮的遺業。他們自己當中，對於國語的攻擊的和護衛的兩派雖經不絕的戰鬥，而結果適足以促國語的進步，使臻於完美。如今希臘的一班詩人，批評家，小說家，及新聞記者，都用荷普的底斯和色諾芬的文字，以論述近代的問題，這是何等可以自豪的事情！

最後，我們將世界各國文壇總括起來看時，覺得還遺漏了一國，便是匈牙利，因爲十九世紀中匈牙利的智識復活，也是極可注意的。牠的古時文人惠雷斯馬爾的（Vörösmarty）及配托愛非（Petőfi）等人的名譽，今得捷基（Gall），篤齊（Dozy），愛厄脫孚斯（Gajdos），約開（Tokai）等作家，已頗可以承襲弗失。至於亞洲人的文學，我們大概不會拿來和歐洲及美國的偉大產品比較的，然而其中的日本，近來書籍的出產極旺，不但是國內風行，並還流傳到歐洲，如今牠的傑作，法，德，意，大，利等國都有譯本。

第十一節

近年以來，智識的範圍以內，差不多沒有一年沒有新開闢的境界。歐亞兩洲新民族繼續興起，同時新的文學也繼續出現。又因各國的思想彼此接觸交換，因而文學上顯出一種國際的精神。

上文說過，有好幾國的文學都是依靠着過去的歷史爲生命的，所以對於世界主義的潮流竭力抵制着，不使侵入。然而牠們彼此間有許多接觸的地方，而且不知不覺之間互相發生影響。牠們對於文學上這種國際自由交換的趨勢，無論怎樣的竭力遏制，無論怎樣的採用保護政策，卻因政治上繼續要發生關係，所以免不了有許多不能不接觸的地方。

我們上面已經說過好幾次，世界文學上有三個人是到處都會受影響的：一個是托爾斯泰，無論那一國，也無論那一種小說，都會染着他的道德的見解和藝術的觀念；一個是易卜生，他主張近代戲劇必須以個人良心的作用爲動機，這種印象，是無論國內外的戲劇家都帶着的；還有一個是瓦格涅，凡是愛音樂的人，誰都會受他的藝術的催眠。這三個人都已經是過去的人物了。離開我們現在更近的，則有鄧南遮、吉卜寧、阿來夫、士賴涅（Oliver Schreier）、顯克微支（Sienkiewicz），以及成功較小的愛德曼、曷斯當，影響也都普遍全世界的。此外還有蘇德曼，雖則充滿着近代德國的精神，流露着現時德國最內在的靈魂，而他所描寫的人物，卻無不具有人類的普遍性，無論置諸何國，穿如何的服飾，用如何的語言，都仍不失其人生的真實。

是故歐洲的文學和美國的文學相協力，目的都在產生一種普遍於世界人類類的文學。各國雖以氣候和氣質之不同，絕對合不做一起，而一種共同的觀念卻可以通行於其間。所以同一「個人主義」，無論在德國或別處，說牠是尼采的學說也可以，說牠是易卜生的學說也可以，並沒有什麼分別的。其在意大利，則鄧南遮名之謂「生存

的真正意識，瑞典的高才女作家愛倫凱 (Ellen Key) 則以為個人主義便是一種受神所選者的道路，由此可以走到較好的境地，可以使人生較寬大，較幸福，較有結果。此外我們也常可以看見這種主義的表現，有當牠做一種優越的能力的，有當牠做一種堅強的意志的，同樣，托爾斯泰的人道主義和贖罪主義也已傳遍北歐和南歐，即使那些物質觀念最深的人，也無不受牠的影響。昨日的格言所謂『非理想化的正確知識』，到今日便已變為一種熱情的同情心的主調；雖冷酷的心理，也都感着憐憫，人道，以至世界同胞等等的觀念。這所謂個人主義和人道主義的兩種大潮流，已經構成小說和戲劇的原動力。在這兩種大潮流的中間，還有許多有世界關係的問題，也都因書籍和報紙的傳佈，而引起全世界人的注意。其一是社會主義，是馬克斯 (Mark)，拉薩爾 (Lassalle)，和亨利·佐治 (Henry George) 等人提出來的；其二是無政府主義，是巴苦寧 (Bakunine) 和斯忒納 (Stirner) 發起的；其三是婦女解放，是由許多方面發動的；此外如殖民戰爭問題，移民問題，廢止軍備問題，愛金問題等等，也都是如今全世界所注意的。

所以文學的外形無論如何變化，作品的種類無論如何繁多，我們總可把牠們歸入「世界文學」的總體裏去。我們現在的時候，文學正和現代文化紛亂的狀況同時並進，所以牠的種種特徵還許看不大清楚，但到將來，一定可以看得更明瞭。以將來人回看現在的文學，當可發見牠的特徵是：(一) 歷史的和批評的知識大增進；(二) 藝術上注重科學方面；(三) 詩因法，美俄，那威等國小說勢力的壓襲而致衰替；且此等小說當見其由自我主義

漸漸發達，而終具寬仁的他愛的情操。又無論戲劇上，書本上，當可見其由對於一人一事的注意，而變為對於人類普通行動及情緒的注意。此外更有一種特徵，即無論戲劇上，或小說上，都漸漸趨重社會問題，使文學成為社會化。最後，如美國作家大衛·托洛 (David T. Thorau) 及亨利·佐治，以至納斯欵、尼采、托爾斯泰、哥爾該等人作品中所表現之道德上的不安心理，即在高等的文明底下所經驗着的一種不舒服的心理，也將見為現代文學的特徵之一。

結論

一——吾人涉獵各國文學史以後之第一感想——作家與作品之命運不齊——文學之殘蹟——最顯明之結論。

二——歷來智識界大運動之共同特徵——各時代文學之類似處。

三——文學家所得感興之共同源泉與歷來人最初之根本觀念。

四——各民族共同造成世界文學之總體而彼此無分軒輊。

五至七——古今來各民族競爭優勝權利而多有垂久之絕對特權——嘗估優勢諸文學之消

長——其比較上之功能及優劣——東方文學之魔力及其比較的缺點——希臘思想及其弱點

——法國之思想——意大利與西班牙之思想——德國之思想——俄國文學之特質。

八至九——各國文學之相互關係，繼續交換，與相互影響。

十至十一——溯源與性質各別之文學往往有合為一體者——現代文學之集中與範圍縮小——
文字與文學之將來。

(11)

文學的統計——古書之傳於現代者

我們現在已在一切時代和一切緯度的思想的世界裏做了一次辛苦的長旅行了。當這段旅行將近終了的時候，我們大家都感着一種很深的——即不說是傷感的——印象。

我們看見有許多著作，當牠們初產出來的時候，都似乎是可以流傳不朽的，誰知不久便已消滅，便已大家都忘記了，那末所謂大文名，是何等虛空的東西啊！自來許多文人和他們的作品都先後的走入被人淡忘的境界了！假如有個史家要把這種文學的殘蹟一一紀述起來，那末他的工作正不知該怎樣的費時，怎樣的辛苦！

書籍的命運是很不齊的。有的初出現的時候很是黑暗而艱難，但經許多年數之後，便不知不覺之間漸漸得勢，而對於將來發生很大的影響。屬於這一類的，例如丹第，密爾頓，喀摩英，塞凡提的作品，在當時被人鄙棄，卻實在

是當時的光榮。還有的一躍便享大名，卻不知不覺之間已在衆人稱頌聲中流於無足重輕之列。從此牠們便一些都不留痕跡，只除非一班熱心的學者容或希望牠們死灰復燃而已。文學史上充滿着這種可悲的事蹟，滿載着這種已經亡失，或雖未亡失而已無人賞識或竟淡忘的書。當初所羅門會作喻言一千種，歌曲五百種，又相傳他有關於各種動植物的論著，相傳他也曾說「做書是沒有目的的。」如今他的書果然都亡失了，也和埃及人，敘利亞人，及其他東方民族的書一樣的無影蹤了。我們試想古代的泥土裏，也不知埋沒着多少文學的灰燼呢！也不知有多少才華被埋沒了！二千年前的普羅斯便已有這樣的感慨。我們試問，當初希臘荷馬以後推爲第一流詩人的潘尼愛雪斯 (Panyasis)，還記得他嗎？當初提奧克立塔認爲獨一無二的詩人科斯之費勒塔斯 (Phileas of Cos)，還記得他嗎？又或味吉爾所傾倒的尤福利翁 (Euphorion)，還記得他嗎？自從安多尼古到賀拉西的一段期間，羅馬人所不絕稱道讚美的，論學問總算帕邱維阿斯 (Pacuvius)，論能力總算阿克細阿斯 (Accius)，論滑稽天才總算阿夫累泥阿 (Afranius)，論文章的雄健豐富總算塞息利阿斯 (Cecilius)。當時這班人的名字都是跟普羅斯塔斯及忒稜斯並列的；當時羅馬人除他們之外，更不曉得有別的詩人。於是乎同時的塞流斯·巴塞斯 (Sallustius Bassus)，忒倫細安納斯·毛路斯 (Terentianus Maurus) 等人的名字，又安得不埋沒呢？又相傳發祿的著作是無所不備的，如今卻是連他的東西傳的也很少了。至於第二帝國時代，文人本也極多，卻只有馬細阿爾 (Martius) 和柏特洛尼阿 (Petronius) 留名，其餘被埋沒的正不知有多少呢！

但是閒話休題了。我們若是要免除這樣無窮舉例的厭煩，便須把話兒縮短。我們可以跳過一大段的時間，直到十五世紀伊拉斯莫斯獨支配思想界的時代。伊拉斯莫斯的同時人曾給他一個極大的名譽，但是他的著作已經亡失了不止一半，都已經是絕無尋獲的希望了。人家對於他的辯論的著作的興味已經不復存在；他的教育的論著，也早已被人看作不合時宜。近代歐洲無論那一國，都沒有注意牠的了；便是他作品中最文學的一部分，也已非翻字典不能懂，因為他當時所用的文字早已不是活的文字了。此外如曾經當時人目為神聖的沙隆（Charon）以及曾與古聖人並列的波當（Bodin），也都早已被人淡忘了。

誰還記得麥地倫（Madalent）那個絕妙的拉丁詩作者，諾對（Naudé）嘗稱他為「我們的賀拉西」的那個蘇格蘭的人文學者，人家嘗以薩拉斯特和味吉爾比他的佐治·布卡爾（George Buchanan）。我們還想起他那優美的拉丁文著作嗎？羅羅柏脫（Boisrobert）和瑟發雷·特角拉（Chevalier de Mézières）是法國路易十四時代的大名士，當時人誰都當他們是名譽的給與者。但是現在還有誰知道他們一個是詩人，一個是滑稽文人？更有誰讀過亞伯蘭枯爾（Abiancourt），帕脫盧（Patury），或者是亞諾爾（Arnault）的書？大哲學時代的詩人和思想家如琴戴·柏爾那（Gentil Bernard），科勒多（Colardan），波孚魯爾（Bonheurs），特阿根（TArgens），特阿爾巴哈（d'Holbaech），拉·莫對·摩達（La Motte-Hondard）等，後代人誰也不會紀念他們的死，更近的如舍內多雷（Chénedolle），封騰納（Fontanes），亞諾爾，都克洛（Duclos），特愛倫勃（d'Alen-

bert) 馬蒙堪耳 (Marmontel) 等人的名字也已將近消滅。因為這班人的名字並非就是「偉大」或「天才」的同義語。普累服的著作比福耳特耳多；然而讀他的人比讀勒薩日的還少。當時的出版者都要求小說家採用普累服的作風，猶之他們從前要求人模倣聖亞甫勒孟 (Saint-Evremont) 的作品一樣。然而在我們現在，他的作品已並不覺得新鮮，也並不見得能吸引人。若不是他那愛情小說 Marion Lescaut 裏有一段文章得着非常的成功，那末除開他的名字之外，什麼也傳不到後代。亞歷山大·仲馬生平著書有六百卷之多。這些著作裏面雖都有才情和思想充滿其間，而「淡忘」猶之一片大沙堆模樣，幾乎把這個書籍的金字塔埋沒了。至於一般用詐術詭巧博得一時的小名而不久便被人遺忘的文人，那更是不勝枚舉。有許多文人，當他們的作品初出現的時候，自己頗覺得可以不朽，可是過了些時，莫說是別人，便連他自己也忘記牠了。

至於我們現在，要想把作家、作品和學說，拿來分類一下，最大的障礙，便是因為分量太多，而又增加無已。要想把全世界的文學家做一種公允的分類，再沒有比現在這時代更困難的了。批評，也因日報上載得太多，已流於一種說帖的資格，所以已經失了牠的真正的權威。一般讀者社會，在無數的作品當中，究竟不知選擇那一種好，所以漸漸趨於冷淡。他方面，則雜誌的發達也與書籍以一下很重的打擊。牠已成爲小說和詩集的成功勁敵；這是英、法、德、美所同有的情形。到處地方都有輪轉式的印刷機，廉價本非常發達；到處地方都有報紙上的新聞和文學，已經儘夠人讀的了。

然而因有一個營業的萬國市場，所以書的出數並不減少；不但不減少，且還如潮水一般的漲。如今世界所出的一切書，我們豈但不能將牠們統統涉獵一遍，就是數也數不清呢；而其出產率卻仍舊有增無已。一般作家都各人做各人的事；詩人做詩，小說家做小說，哲學家把關於「理想」關於真美善的新學說貢獻給人。考古學家潛心於語言、神話和宗教的研究；批評家忙着盡一種無報酬的職務，分析、判斷、援引、解釋別人的作品；新聞記者把當時的言論意見統盤收集起來，又把他們工作的結果不絕地供給公共圖書館做材料。

作家到處都可以看見；文人和文學作品從地球的這一極端湧到那一極端。單以日本一國而論，每年出書要有兩萬五千本之多。德國出書數目也不差什麼；英國和法國居其次；荷蘭與丹麥第三；波蘭瑞典第四；意大利第五；俄國最少。要是全盤統計起來，真可使人驚駭。

這樣無限度的出書，從前實已不乏其例。狄狄馬斯 (Dionysius) 有論著六十種，亞歷山大·哈第 (Alexandre Hardy) 有悲劇的喜劇六百種，洛帕·特味加有詩劇一千八百種，貝勒·福拉斯脫 (Belliforeat) 自己說家裏有一副著書的機器，此外如科齊波 (Kozelne)，喀拉齊烏斯基 (Krawewski)，葛來喜 (Glach)，騰斯帝夫 (Besitz)，特·拉·布雷通 (de la Bretonne)，畢力斯夫人 (Madame de Genlis) 等人著作之多，是一般學者大家都曉得的。福特拉斯侯爵 (Marquis de Fondras) 是十九世紀一個平常的小說家，他一年之中著書多至三十幾種。反之，當古典時代，則有許多作家反以著書不多自豪。十七世紀是一個太平時代，有天才的可以有

慢慢發展的餘暇，文人可以好整以暇的構思，並慢慢的雕琢他們的詞句。即以勒卜魯耶（Da Bruyère）而論，他青年時代只專心讀書，未嘗率爾著述，及其成熟時代，也一共只做了一部書，卻便已替他博得個不朽的名字。又如希臘拉丁的作家，有的祇有幾頁之書留給後代，卻能至今不朽。如今的作家便不同了，他們簡直把著書當做一種職業，靠着牠維持生活，所以出書之快，已是極尋常的現象。自從巴爾扎克，仲馬，尤金·緒——即不說邦根·屠·忒累爾（Poussin du Ternil）——的時候起，單是法國小說家的作品已經可以堆一座很大的金字塔了。近代的作家平均每年出書兩本，有的還要多些。他們不必等第一本書末了一頁的墨水乾了便着手做第二本，且也不必等有了新的觀念再做。他們的著書和官吏到衙門辦事一般的有規律。

除這些文學的作品外，還有因政治問題及社會問題而產生的書籍，也有專為揚名而做的書籍，更是不計其數。由此，我們對於書籍的過度增加，也總可以得着一點觀念了。至於將來這許多的印刷品究竟要遭如何的運命，那是我們確乎不能不懷疑的。

智識的世界確乎是過分的充塞了。世界的檔案室中已經要容納不下這許多的案卷。人類的腦筋也要應接不了這許多的印象，因為腦的發送不能和書籍產出的增加率做比例，歷史已經是只剩一種提綱，而新的史料兀是日增無已，牠將不復有這許多時間和地位來紀載所有應該紀載的事實。所以將來的歷史必祇能做一種極簡略的綱要，祇能擇幾點最要緊的地方和幾個最重要的名字來紀載，而將其餘比較不重要的一律刪除。

然而這種辦法實也並非將關於各個人的事實減少，因為上文已經說過，各個人所做的事業只不過是合成一件總事業的分子，也許只是一件事實或一種思想的表現。是故文學史的職務，是在尋溯種種智識運動的潮流，說明種種潮流的影響，並譯述種種努力的形勢，備作彼此比較的單位或資料而已。許多作家的名譽或僅能延續一生，許多民族或已在周圍的思想潮流中消滅無跡，但以文學的全體而論，則繼續綿延，未嘗斷絕，亦未嘗消滅，牠是一個變化而複雜的大總體，所有各作家和各民族的努力，都無非助成這個大總體而已。在這個文學的大總體裏面，譬有千百種音聲齊鳴，個人的努力譬如一種單獨的聲浪，雖則微弱，而亦混入這千百種聲音與之共鳴。一時代有一時代的特別潮流，特別趨向，並有一種特別標誌，使後代人可以識別，而各個作家的努力，即所以助成這種潮流，趨向和標誌的。

(11)

二 普通的事實——文學上一切時代所共見之類似的現象

文學上的各個時代都有牠自己的面目。泰晉說：『有時出現一種創見的思想，因而產生一種新哲學，新文學，新藝術，新科學，而思想既已更新之後，於是人類的一切活動也就慢慢的都起變化。』他又說，及至這種新藝術業已完全呈現牠的寶藏，新哲學完全呈現牠的學說，新科學完全呈現牠的發明之後，於是牠們停止進行，而另一種

新的精神起來代替了。

我們又可以看見，有時「模倣」也成爲潮流，這大都由一時的風氣造成的。是故十七世紀的法國詩，一律都奴隸的模倣古典範作，及後西班牙和意大利的作風傳入，牠的性質便更複雜了。十八世紀中，則歐洲所有的文學無不染着新哲學的氣味；詩人，戲劇家，以至歷史家，文字學家，脩辭學家，無不附和當時所盛行的風調，似乎他們的作品都是同一模型裏鑄出來的。

我們若是一時代一時代的歷數下來，那末無詭是神祕觀念盛行的亞歷山大里亞時代，是基督敎時代，是印度，希臘，或德國歷史開幕時的神話時代，是自然創作的文藝復興時代，是古典時代，是浪漫運動以後的智識大活動時代——我們總都可以看見一種極普遍的思想爲一切的主宰，而這種思想的種種變態都映照在當時人和本作品的歷史上。

我們把中古時代拿來做個例罷。彼時法國，西，意大利，西班牙，德意志，英格蘭，有無數的“Chansons de geste”，“fabliaux”，及“lais”，續續出來，形式上差不多彼此都一樣的，由此可見當時西歐諸民族深底裏實有一種大家一致的地方。

當文藝復興時代，我們看見意大利的藝術天才和詩的天才勃發，從此傳入西班牙，更以種種各別的特徵而入英國及法國，因使思想獨立，並播下學問的種子。就馬雷布和德來登兩人而論，我們看見十七世紀的雄辯精神

一直傳衍到十八世紀的哲學精神來承接的時候爲止。兩世紀之後，這種精神既把牠的葉都結了，既已影響及全歐洲了，也既已偶然俱爲造成法國革命的工具了，於是便衰歇了。同樣，德國的哲學精神，自從十八世紀末葉出現以後，也會在思想界引出一種新的腔調，產生一種新的神學，形而上學，文學，言語學，會使近世的思想得着新生命，並使牠的強大勢力在科學境界裏無處不感着。最後，我們又看見十九世紀的種種複雜的變化；從古典主義變到浪漫主義，從浪漫派變到帕那羅斯派和「塑型派」(plastic school)，從「爲藝術而藝術」的信徒變到寫實主義和印象主義的熱心弟子，從古人的宗教變到近代的學風，從希臘人變到德國人，更從德國人變到斯干的那維亞人。

然而這種種千差萬別的作品攙混在一起時，總有幾個要點是彼此可以符合的，這便是人心經驗的會合點。因有這幾個會合點，結果遂得勒爲若干事實的集蘊和若干思想的組合，以爲人類共同的遺產；而這些作品所依據的心理的元素也即所以構成智識活動的普通原因，並無時代和地域的分別。

人類都有兩重天性，精神和物質，靈魂和軀體，所以文學，歷史，哲學，也都有兩種——物質事實的歷史，文學，和哲學，智識的歷史，文學，和哲學，這是隱微的。

文學上無論那個時代，都有兩大派——其一顯然是智識的，其他則以感覺和自然爲本質。我們從古以來，看見這兩派的勢力不絕的一消一長，又見其彼此互冠的原因，由於社會趣味和意見之變動者居多，由於各派作品

之優劣者居少。

文明進程的總和，無非是一種永久的力的結果，這種永久的力，性質始終不變，卻時時變換牠的工作，變換周圍的情景，而又常常回返到牠自己的本範圍。我們若把古代的民族和近代的民族比較，初看似乎有極相似的地方，卻實在相去甚遠。例如印度和埃及，雖都會有極偉大的歷史，曾經歷過極綿長的朝代，會有許多的宗教和語言，但若用我們的標準判斷起來，卻只呈現一種不諧和的渾沌狀態。然而晚近人曾經窺入牠們的深處，覺得這個遠古的時代和我們自己的時代中間有許多密切關聯的地方。我們以文字學的幫助，從有歷史的時代一直追溯到上去，便可以證明從古到今如有一條長鏡緊相銜接，未嘗或斷。以道德的原則而論，以家族的組織而論，以人心的感情而論，以關於工作，正義，和權利的根本觀念而論，雖則世異時遷，卻都只大同小異罷了。

有一種思想和結論，似乎是從事實的境界自然產生出來的，這種思想便是各時代所公有的東西。芬乃龍之前，西塞祿已經利用自然的證據以演繹哲學的真理，其在今日，猶若可以置信，與當時無異。而西塞祿之前又早已有個亞里斯多德，也利用宇宙間的大原則以為立論的基礎。諸如此類的類似例，是文學史上到處可以發見的。例如一切歷史和一切詩的基本觀念，如戀愛，死，和戰爭等，請問那個作家離得了牠們？

一切時代和一切民族所同有的高遠志趣

又有一種思想和感情，也是一切詩和小說所同具的，不論其淵源和時代怎樣不同。我們可以舉例的有如下：實與理想的衝突，對於惡命運的反抗心理，願望變更現狀的心理，追求更好的境遇的心理，對於幸運的不公平和社會的不美滿渴望矯正彌補的心理。

我們若想把這種種的心理當做那一個國度所獨有的特權，那我們不免畛域之見太深了。這樣的畛域之見，其竟謬無理，正無異於想把天上吹來的風關在那一個國度裏再不讓飄到別處去。無論那一國的作家，決不是國界可以關得住的；他們實在都是全世的公產。上文已經說過多次了，例如伊士奇，莎士比亞，哥德，塞凡提這班人，都可以認為同鄉，並不限於那一個國籍的。他們既把時間和空間的觀念都打破了，所以思想界裏的畛域也消滅了。

思想上的這種世界性，也和人類的大團體一般，是因感情的團結而後發生的；從來這種世界性，沒有比現在再見得明白的了。這是由於現代各國的文明比從前益發增進，而且其間相互的影響也愈加密切，所以褊狹的見解，已決不是時代的精神所能相容。如今這種廣大的見地，已經是差不多人人有之，不但是幾個知名全世界的人士，就是一般的詩人和藝術家，無論國籍怎樣不同，也無不同具這種精神。

上文已經說過，有許多古代民族和近代民族，初看似乎很不相同，而精神上卻有一種真正的相似點；兩者所

經驗的所發抒的都是同樣的感情，所嚮的所渴望的都是同樣的理想。世間只有極有限的幾種戲劇的情境和浪漫的經驗；這話是一種文學上的真事實，也已成爲一條文學上的定理，從來可以證明這條定理的例已經不知有過多少了。是故古今來各民族所發抒的共同思想，儘可以總括在很小的一個範圍裏，而從來一切的文學作品無不以摹倣人生爲起點，因爲文學無非是人生的反映而已。

惟是文學的形式，則自來變化無窮，所以然者，無非由作家才情氣質不齊的緣故。

就此談而言，我們可以說藝術作品的千差萬別，正無異於各地帶植物和文化之品類不齊，蓋所稟於天者異，故結果亦異也。

但在這樣的千差萬別之中，我們該認定那一種應得錦標呢？這樣千差萬別的文學，誰都努力競爭一個卓異的地位，那末這個卓異的地位應該給誰呢？這是一個難問題，也是值得我們注意的。

(四)

各民族協力襄成世界文學的公產——誰也不能佔卓異的地位

自愛，是人生一切活動的根本動機，這不但個人有之，即由許多個人集合而成的大團體亦有之。這種自愛心理漸漸發達推廣，便成爲全民族的虛榮心。

無論那個民族，都有牠的一部分虛榮，這一部分的虛榮，即自誇其所以構成那個民族的特性，以別於其他民族的。無論那個城市，那個區域，都有牠自己一種可以自豪的東西；無論那個國民，都以一般人所自豪的東西自豪，個人如此，所以由個人組成的民族也如此。無論那個民族，惟有一種愛國的自大心理不能讓人，惟有一種求勝的熱心不能撲滅。

當中古時代和文藝復興時代，不列顛人的自大心理正和他們現在的民族自信心理一般堅強。彼時英吉利人毫無猶夷地自命爲人類的君主，對於海外的諸民族都懷一種憐憫的心理，目之爲一種劣等的動物，不能自治，更不能治地方。蘇格蘭人則以門閥尊高自傲，又自以爲是最精細的辯論家。法蘭西人則於風俗之優美，文章之卓越，至今自負。德國人則以對玄學有深澈研究自豪。威尼斯則一提起牠的名字便可想見一種高貴的風度，所以丹第在他的地獄裏會說：『還有那個民族比因那的居民更自負的嗎？就是法蘭西人也未必罷。』羅馬人因他們的祖宗已有這許多的光榮，所以已覺得很可滿意。希臘雖已成一單弱的國家，卻因古昔曾有無數名人，所以仍自命爲文學之母。意大利自從西塞祿與龐細奧的時代起便自命爲操雄辯學的霸權，至今也依然這樣自命，並繼續把歐洲其他民族當作蠻夷看待。土耳其人自命爲「唯一的真正信仰者」，其對於基督教徒，全體都被他們詆辱。其在極東，則中國人繼續的超然於其餘的人類之上。據說他們有一種地圖把自己的國度作爲天國，畫在中心，如一大洲，其餘的世界附屬在四面，都不甚明瞭，猶之歐洲有個繪刻匠畫非洲或巴芬海灣（Baffin's Bay）的情

形一般。人類的氣質是不大變的，雖則他們對於各民族文明的各個價值見解漸漸擴大，而畛域之見也漸漸消滅。所以法國人至今還保存着一部分自尊自大的癖性。至今法國人猶以為機智之才是高盧民族的特性，又以為巴黎是世界唯一的城市，是世界的眼，是一切進步的聖地，是一切光明和感興的源泉，彷彿以為倫敦，羅馬，柏林，維也納，斯德哥爾摩等處，誰也夠不上說這個。意大利人向來所發揮的莫非是自己的民族精神，從來沒個夠的時候，也從來沒個變化窮了的時候，即使他們所討論的是別種題目，也經於歸根在替自己的民族表揚。德國人因為軍事上的成功所驅使，也只不絕的鼓吹自己的偉大。

人若因研究一種學問，一種藝術，或一個民族，便彷彿不能不把別種學問，別種藝術，別個民族排斥，這就是一種可憐的褊狹心理的表見；又若有人以為自己生身之國便是世界的中心，這人便是迷妄。老實說，無論那個民族，即使一時間道德上有優越過人的地方，這也決不是能夠遺傳的。向來所稱為文化中心的地方，確也不無一時的光耀，而其光耀也確乎能夠延續些時，確乎有些特異之處。此如伯里克理斯時代的雅典，與古斯都時代的羅馬，確乎是有些不可及的地方。又如阿拔斯朝的巴格達，也確曾成為科學的中樞。文藝復興的光榮時代，顯然曾有一種驚人的萌芽作用，意大利當這段和平進步的期間，確乎曾操智識界的霸權。那時牠在文字上，科學上，藝術上，在都估勝利；牠的威權，無論是實業界，財政界，外交界，以至於政治界的智識方面，無不一樣波及。從英格蘭到莫斯科，從法蘭德斯到埃及，那一國不奉牠為盟主。蓋意大利從羅馬帝國的時代以降，從未曾發生過這樣深而且遠的影

響。在另一方面，則英國也曾有牠的大依利薩伯時代。彼時無論出產之繁富，人才之昌盛，都是獨一無二的，就是柏里克理斯時代，與古斯都時代，利與第十時代，路易十四時代，也都不及牠。德國則自十八世紀末葉到一八二〇年左右一段期間，因有哥德，席勒，赫特爾，費希特這班人，所以成爲歐洲智識界的領袖。法國則爲歐洲領袖者不止一次，如十二世紀，十三世紀，十七世紀，十八世紀，就不說王政復興的燦爛時代罷。

那末我們要問：人類思想最高尙最完備的表現我們該從何處去尋呢？該從古希臘去尋嗎？因爲牠是一個活潑的民族，天賦以一種勇敢的詩的想像力，無論那一行都來得，和平也好，戰爭也好，哲學也好，藝術也好；又因爲牠是一千年來世界文明的領袖。還是從法國文化最燦爛的時代，就是牠將一切本能都受支配於理性的那個時代去尋呢？又爲什麼不從英國去尋，因爲牠的文學會有一連五個世紀的發達，而且曾出了這許多著名的思想家，歷史家，哲學家，戲劇家以及小說家的？又如塞凡提和加爾德倫時代的西班牙和思想驟然大發達時代的德國，難道不也都跟其餘各國有同等競爭的權利嗎？然而正惟因大家都有同等的競爭權利，所以誰也不配居絕對卓異的地位。

若要將古人和今人的優劣問題提出討論，那我們便將落入佩洛和拉摩特兩人的前車之軛，無非把一場無謂的辯論重新翻案而已。卽如方今的歐洲諸民族，雖則大家都曾有過一段極得勢的時間，大家都曾有幾個著名的文人，都曾有幾段文學上極燦爛的時代，但若我們一定要推那一國爲文壇的盟主，那也多見其爲輕舉妄動而

已。

我們至多也不過能這樣說；假如有一個民族，其文學在國外曾有一種繼續的勢力，那末這個民族似乎該是法蘭西民族（至少指過去而言）；又可說法蘭西文學勢力之及於國外，時間最長，回數最多，範圍最廣。但若我們要根據事實來證明諸如此類的話，也是極不容易的。

至以語言而論，大家都都各爭各的長處，而其實也一樣不能有所軒輊。你若去問一個法國人，他必定與高采烈的對你說，蒙且，巴斯噶，摩利爾，以及福耳特耳等人的語言是世界無匹的，因為這種語言曾經表示過許多優美而又深微的東西，牠又自然，又有趣，又靈巧，既可以教人文雅，又可以與人常識。再若去問一個德國人，他只須把他的許多合查字鋪排給你，便可證明他那種發表思想和感情的工具是最完備的，最健全的，而且最有彈性的。又若再去問一個俄國人，他必定對你說，俄語是歐洲最豐富的語言，既非常的精確，而同時又多變化，明瞭，而有力。我們只聽十八世紀時洛莫諾索夫一段很有趣的話，便可見俄國人對於自己的語言怎樣自負，其實當時人還未曾曉得有托爾斯泰和屠格涅夫呢。他說：「德國皇帝查理十第五常說，他禮拜上帝時用西班牙語，對朋友用法國語，對仇敵用德語，對女子用意大利語。但若他當時已經曉得俄語，他必定要加上一句，說俄語對人人都能用。因為他一定覺得俄語兼有西班牙語之高尚，法語之活潑，德語之雄勁，意大利語之柔婉，而又并有希臘語及拉丁語之豐富明澈。」

就事實上論起來，人類的思想是到處都可以存在的；決不是北方的特產，也決不是南方的特產。便是那些還未有「語言」資格的方言，也未嘗不可以寄托思想。而且各種語言各有牠的長處，也各有牠的短處。英語的長處在文法簡單，語法明確，而短處則即不論缺乏體式，也覺得有許多地方欠脩飾。德語的辭可以變化無窮而且造字亦非常便捷，然而太欠定性，種種倒裝和曲折的用法太多，因而阻止牠的進步。意大利語含有一種音樂的聲韻，只可惜這種聲韻業已流於萎靡。西班牙語有濃厚的色彩和鏗鏘的聲音，也可惜因其過度發達致使其字彷彿空有音而無義。

法語的內容不如斯拉夫族語和條頓族語豐富。但是牠能代表一切的聲音。無諱將牠衍為委迤的長辭，或縮為簡捷的短句，總都不失其為柔婉而明澈，這是全世界都承認的。

德語過於蔓衍，且含字太多，因不如法語之暢順明麗。用德語發表思想，往往有若紆迴不決之態，但又最宜於表達抽象觀念，最適於討論哲學問題，往往即使所代表的是極純粹的理想，亦能使人窺見其中極細微的奧義。德語又最宜翻譯外國書，這一來由於牠的長處，一來也由於牠的短處，因為德語中一字可分為若干成分，也可由若干成分拼成無數的合字，故以之翻譯，決不致感缺字之苦。

(五)

東方思想和希臘思想

我們若想把各國文學各自的功績，加以一種徹底的研究，那我們須有一個重要的條件，即我們對於那一國的教育，語言，以及國性的影響須先完全明白。我們若斷定各民族對於世界文學的全體確實有多少貢獻，確實佔得多少的成分，那我們必於那一個民族的特徵，牠的感興的泉源，牠的種族性上以及傳統上的長處和短處，牠的天性上的傾向，以及由各個作家集合而成的思想的總和等等，先有一種研究。唯其如此，然後可稱是一種憑良心的，無成見的研究法，也就是我們所應該採用的研究法。但是這種事業非常複雜，而且叫我們負完全的責任也很危險的。所以我們這裏單把古代和近代最主要的幾國文學的性質概括的論列一下。

我們若先以東方文學的全體和西方文學的全體比較，我們立刻可以看出來的，便是東方諸民族對於詩的趣味其發生比西方諸民族來得自然。所以然者，不但因亞洲各種語言諧和豐富宜於做詩，並因東方諸民族大都和偉大的自然美相接觸，故比較容易得着詩的感興。在東方諸國天然景物極豐富繁稠的地方，做描寫文章的但須求一個精確便可以顯出極濃厚的色彩。但因溫度的勢力過於強盛，致使思想往往流於衰弱，不能如歐洲諸國文學之氣魄雄勁而緊湊。這種雄勁的氣魄是北歐文學和西歐文學的特徵，其在波斯文學，除少數史詩的斷片和英雄詩外，絕少概見。間有具備這種性質的，則其文心必異常精細。

至於古代希臘，是我們向來所最欣賞的地方。世界精神的遺產中之最高遠的觀念和最重要的原理都是由

牠那裏傳下來的。自有希臘而後有所謂理性，有所謂自由。牠又根據這種理性，參之以一般公民之自然的和社會的目的，以構成一種道德的法典和永久真理的觀念。所謂學問，所謂真正哲學，都是由亞里斯多德和柏拉圖所產生的地方最先出現的。就藝術而論，雖則牠所發明的範圍非常有限，而後世卻不斷地有熱心摹倣牠的人。

這便是希臘最燦爛的功績，也便是我們後世人空牠的一筆大債。

後世人瞻仰古代的光榮，往往不免因年代湮遠而發生錯覺。所以我們對於古代希臘文明儘管歎賞，卻萬不可爲牠的光華所眩惑。我們須曉得古時人的情操和感興，論其範圍和種類，以與現時人比較，實在是非常有限的。卽以其表見於戲劇者而論，試看希臘三大悲劇家的作品，翻來覆去總離不了「運命」一件東西，以爲人類受運命的支配，萬難幸免，因而不絕的替他痛哭。至於近世的戲劇，便不如是狹窄；凡人類的一切情欲和一切狀況都是無不包羅的。而且氣質不同的民族增加無已，所以思想的來源也就增加無已。而且實際上，近世人的運命確比古代人的運命好得多，而後世人所以多覺得古代的生活可羨者，祇因古代人留給後世的藝術和詩，祇能代表他們的好的方面，致使後世人看古代就無異於看歷樓海市了。若要證明這話，只須看當時的社會道德何等不完備，法律何等不公平，宗教何等時變，物質上和實業上的智識又何等鄙陋，也就可見什麼都不如現代了。

(六)

現代主要諸民族之智識上的特徵與民族氣質

法蘭西民族是以能賞識高尚的文辭之美擅長的。原來高盧人對於戰爭和文字是有特別趣味的，這話未理亞·禮撒早就說過了。就民族的全體而論，法蘭西人於修辭學及散文最擅長，所謂「文字上的雄辯」是法蘭西文學的主要特色。法國的散文，一因作者對於「理性」、「明暢」等觀念天生具備，二因作者恆必力求文章上的優美，所以似乎已經達到最美備的境域，這是一般第一流的批評家所公認的。英、德、意大利、西班牙諸國有詩人，可與法國的詩人並肩，而且勝之，因頗自豪。然而英、德、意大利、西班牙諸國不能像法蘭西有如許第一流的散文家。英國的第一流散文家祇有法蘭西斯·培根、愛迭孫、斯耐夫特、馬可梨、愛德曼·柏克及紐盟幾人；意大利祇有馬基雅弗利；西班牙祇有塞凡提；德國祇有勒新、席勒爾、哥德以及同時的古典派作家如費希特及雅科俾其人。至於法國，則如微克忒·庫爭 (Victor Cousin) 所說，要見高才的散文家，隨便可以舉出二十個——夫曼沙特、拉布勒蒙旦、笛卡兒、巴斯噶、摩利爾、洛士佛科、卡第納、特累茲、布律耶耳、麥爾伯蘭基、波緒亞、芬乃龍、部耳達盧、舍焚耶夫、人聖西門、孟德斯鳩、福耳特耳、冉·扎克、盧梭、蒲豐、及謝多勃良，此外還有許多，假如生身他國，也都可以做第一流散文家的，如科民 (Commines)、阿米奧 (Amyot)、喀爾文、弗郎沙、特薩爾、華茲、特巴爾、扎克、阿努 (Arnaut)、尼科爾 (Nicole)、夫雷社、馬栖永、夫勒里、芒特農 (Maignan)、聖退甫耳蒙 (Saint Evremont)、封特涅爾、服甫那格 (Van verhaeghe)、狄德羅、勒薩日、拉梅內、奧古斯丁·退里、佐治·桑德、普洛斯特、美里美，以及

萬處。說了半天，仍舊還漏了一派的散文家，便是和諾拉·特巴爾扎克和他的弟子福羅貝爾和裴枯爾兄弟；牠們的文字都是富於深義及個性的。牠們的精神頗與俄國一般學步杜思拖夫斯基和托爾斯泰的小說家相似。牠們是高手，卻不是模範。總而言之，法國古典時代的散文，即使不論牠那完全和諧的風調，單論牠的數量和種類，也已除希臘黃金時代的作品如狄摩西尼和希羅多德者外，更沒有能跟牠比擬的了。

法國語言和文學的最顯著特徵，在於牠們的膨脹力和牠們的廣大的影響。有許多思想從巴黎產生的，曾經周遊全世界。法國人往往以社交的天才和宣傳的天才自負。牠們的文學從前曾一度為歐洲的領袖，所以牠們雖在現代，也仍以這種古昔的光榮自豪，以為這是牠們的一種不可侵犯的特權。

法國文學所缺乏的，是北歐文學中所常見的那種創意的能力和如畫的美。牠往往也用幻想，期與德國人的「誇大」和英國人的「乖僻」競爭，然而幻想，終究不是法國文學的特性。

對於藝術的「趣味」，是法國人特長的，但是所謂趣味，並不是一種創造的能力。法國人的感興的泉源也不如其他民族暢旺。牠們以外在的世界為發洩思想感情的地方，所以於純理想的藝術，便是第二等的地位也佔不着。以繪畫而論，牠的近代派中確也不乏高才，但總不如文藝復興時代的大名手。音樂則不如德國和意大利，而高遠的哲學思想也不如德國。且若牠不會有十九世紀的維克多·羅俄，那末就是抒情的作品也并不如英國了。

總之，我們若說法國的藝術為意大利所勝，那末我們也可說牠的政治制度為英國所勝，牠的歷史智識和批

評爲德國所勝。此外還有許多地方，也許別的國家暫時都勝過牠。然而牠有一種特別長處，便是牠對外國會發生重要的影響；這是牠過去的歷史上歷歷可見的。而且我們從牠文學上最發達的幾個時代看去，也可見牠的內容確乎豐富；牠那種兼理性與藝術而併有的文字，確乎是文學上最好的楷模。

尤其是十七世紀的法國作家，大都能把一切心的能力調配得非常均勻；別國文學雖許有別種優點，而唯這種作風實在不可多見？

法國和德國，雖因政治上的衝突彼此極力反對，實際卻是互相結合互相補助的，因爲兩國的文明都很關係重要，都有很大的影響，所以彼此間不期然而然的發生互助的關係。

德國人最願意容納外國的思想，和外國的影響，所以他們對於外國的重要事件，無論是社會性質的或智識性質的，決不會茫然無所和；他們天性中生就一種極顯明的國際興味。「祖國」的觀念是他們人人有的，但是他們很容易容納其他民族的思想，很願意採取其他民族的好的東西和有用的東西以補自己的不足；他們常把外國人的長處當做自己所研究，所欣賞，所借益的東西。所以翻譯外國作品和摹倣外國作品是德國人一種特徵的癖性。

法國人反之，他們對於外國人知識上的功績很不容易賞識，尤其是對於德國的文字和思想。岱斯塔厄爾夫人未把德國最光明時代的思想介紹給法國之先，法國的批評家常常要發生一種疑問，究不知一個有識見的人

該不該會說德語。他們因有這樣淺薄的見解，所以將德國人叫做「文學的搬運夫」，因為德國所出產的以批評的及考據的作品爲最多。然而德國的作品所以多屬批評和考據性質者，實並不是「搬運」的結果，乃是由於他們有一種堅忍性，力求明徹的觀念，編書的能力很發達，並且學問很深的結果；他們除純粹愛好真理外別無其他目的。

以倭爾夫，尼布爾，蒙森等人所代表之歷史的批評法及科學的批評法，確乎是德國一件光榮的東西，並且在一段很長的期間，曾經差不多是牠的一種專利。是故，如厄涅斯忒·芮農之言，所以明科學與哲學，美學，宗教之關係之方法，精覈言之，實並非法國人思想之產物。而且法國人之視哲學，往往當做一種事實和歷史的抽象研究；其於學問，目爲閒暇階級的一種消遣；其於宗教，目爲教堂所信奉的教義，而以爲與個人的良心若無甚關係者。所以關於人類之較高生活，關於一切需要之宗教的價值等等問題，德國人比法國人都更了解，都更研究的深到。所以德國不僅是各種歷史的產地，並且是哲學思想的產地，這是我們應當承認的。當牠這種思想的熱心還未被軍事的野心掩沒之先，我們可以說牠是個歐洲的印度，因為牠的思想涉遠無際，而且方面極多，正如印度的多神主義一般。

十九世紀中德國有一部分作家頗想否認從來人給自己的所謂「哲學的民族」這個徽號。這班作家中有一個便是路易·納帕（Louis Knappe），他曾欲證明德國人對於實際的觀念並不比對於抽象的觀念薄弱。但

是這種否認自己爲極端理想主義的論調，實有許多證據可以提出來推翻牠。我們只須想一想，德國在極短一段期間所造出的形而上學的概念和神學的概念，其數已可與其他一切諸國所造的概念相抵，也是一個很有力的徵據了。牠有一個哲學家，便有一種學說，所以有萊布尼茲、康德、費希特、謝林、黑智爾、雅利俾、弗黎斯（Brue）、赫爾巴特、索草爾（Solger）、瑪克斯·斯替納（Max Stirner）、費兒巴黑（Foerbach）、叔本華、克里格（Krieg）及其他許多的名字，同時便有這許多派別的學說。以萊布尼茲而論，假如他的學說的確是以笛卡兒爲根據的，但是他從此滋衍出來的那止一百培呢？他是十七世紀一切學術的綱領，從他手裏播種下來的各色種子，已經繁殖而成無數門類的知識，其他如康德，單以一人的著作，已經引出成千種替他作註解的文章；又如謝林、黑智爾、叔本華，也已經沒有一個思想家不會讀他們的書。德國所產生及所「消費」——假如我們可以用這個字眼——的思想，確乎是宏富得很。牠的真理追求者曾經深入極其玄奧的問題，又會飛舉於不可窮極的高處。牠的一班不知倦怠的思想家，無論是雲煙深蔽的峯巒，也不足以阻其探險的勇氣。是故德意志民族的根基本質，便是一種深思默案的精神。至少當牠的軍國主義未昌盛以前，這種精神是極其強旺的。

就全體而論，德國的學者是歐洲最好學深思的學者，這是可無疑義的。深思和博學，差不多是德國學者所不能離的品性。他們對於人類心理的研究，常居其他各國之前列，而且關於東方的學問也非其他各國所能及；其著名學者如波普、洪保德（Humboldt）、拉森（Lassen）、首創比較文字學的格黎敏兄弟（Brothers Grimm）及羅

馬系文字學的先鋒腓特烈·第次 (Frederick Dien) 等，都是精於東方學問的。所以有人曾發一種奇論，說若把近世德國所有的東方學者列在一邊，把歐洲其他諸國以至印度及美國的所有東方學者也列在一邊，比較看時，結果必還是德國方面的人數多。但以事實論，現代法國對於東方學問，也已不肯讓德國佔優勝了。法國最先派傳教士到中國，而波斯教的書籍也是法國人翁克提爾·度拍龍 (Anquetil-Duperron) 最先拼着性命得來的。十九世紀初葉，一般研究塞姆族語言的，都以巴黎為中心點，其領袖人物有昔爾維斯德·特麼栢 (Silvestre de Sacy) 和卡塔梅爾 (Chambré)，同時亞伯·特裏薩黎 (Abel de Rémusat) 則正在建設比較土耳其語學的基礎。又如善波力溫 (Champollion) 及步耳努夫 (Barrout)，不僅是學者而已，並且都是文字學上的發明家。近世東方學上許多重要的發見都是法德人的功績。波斯、印度、埃及、亞述、東滿泰的古代文明是法國人首先披露給世界看的。印度的文明，雖說是英人瓊斯 (Jones) 和科爾魯布克 (Colebrook) 首先發見，但是續成其業的卻是法人步耳努夫。據此看來，可見德國人對於東方學問的貢獻，既不過因其著述之多，用功之堅忍，以及研究之精細，至以所表見的成績而論，實並算不得第一。德國學者所以得做考據學的先鋒，一來是因其好學，二來是因其專精；他們覺得學問實有專攻的必要，以為能專攻然後能深造。他們對於古代稿本的研究，極其耐煩；往往一件無足輕重的東西，他們卻對牠用極大的功夫，例如考定一件古物的年代，解釋一段古文，尋釋一段古代阿述的標記文字，解決一個關於古代屋銘的問題等，往往犧牲了一切事情來研究牠，也往往得着極好的成績。他們這種功

夫的價值可從個人所得的成績看出來。這種個人所得的成績雖則細微，卻以大家合作互助的結果，漸漸遂能蔚成極燦爛的學術了。

德國人的學問又不僅能專精，並且能用歸納的功夫，能把一個題目底下的種種元素使統屬於一個基本觀念，能明白覺察言語、觀念、及宗教所以形成的基本原因，這也是別的民族所難及的。德國人因能將這種哲學的方法應用到一切知識上去，所以無論怎樣抽象枯索的學問都使學者覺得活潑有興味。

德國人又是比較文法學的創造者。他們把這種學問當做自己的專利者甚久，又把其中所包涵的各種細目都各成獨立的專科。一般用羅馬系語和克勒特族語的民族，苟欲知自己的語言的歷史，都須仰給於德人所著之書；而比較文字學之渡來因河入法國，也是由波普和第次的弟子介紹的。以研究學問的事業而言，德國已成爲歐洲的第一實驗室，這個一來由於牠的高等教育和大學教育組織完善，二來由於社會對於學者有極大的同情，因爲這個社會是會經受過充分的教育的，他們能充分明白歷史的科學在一國的知識生活裏是跟所謂純正科學有一樣價值的。

愛默生嘗說，「心的唯物主義」是英國人的思想的特徵，他這話的意思，就是說，英國人若不用事實或實例的幫助是不能思想不能推理的。例如威至威士和浪漫派詩人拉馬丁，人家雖都說是很相似，其實是絕對不同的。常識是英國文學之特徵的標誌，無論牠是怎樣個人抒情的文學，怎樣由自然界感發而成的文學，同時英國人缺

乏概括的觀念，缺乏理論上的高遠見解。據歷史家說，無論從什麼地方看起來——尤其從政治的科學看——總覺得純粹的學說和哲理在大陸比在英國發達，至於論理學和道德——尤其是後者——則英國的成功較大。英國的第一流思想家，造詣雖不如柏拉圖或康德高遠，我們卻須承認他們是超絕的道德家，因為他們對於人類有精確的知識，對於本務有明瞭的觀念，對於意志能夠自由指導。就此層而論，他們對於心理以及道德和社會的學說之歷史，曾經發生很久的影響。即以哲學而論，他們的活動也未始毫無結果；我們只須提起陸克，柏克，休謨等人的名字也就可見得了。

英國人於政治上的雄辯應居第一等，他們的辯才，歷來成功之例甚多，且能歷久而不衰落。只看二百年來，已不知有多少高尚的呼聲為人民宣布權利，為個人宣布尊嚴了。英國國會的壯嚴有如雅典的 Plaza（市民會集之所）和羅馬之 Forum（公所）。這是英國歷史和法律所由締造的廟宇；這是辯士逞能和人民爭自由的公開講壇。演說家會把最高尚的問題在這裏面討論。柏克和庇得會於此替人道辯護，威伯福士（Wilberforce）會於此鼓吹奴制的廢除，鄂康尼（O'Connell），犀爾（Shiel），斯戴脫，克拉夫脫（Clatcraft），葛拉德士（Gladsone）會於此為不幸的愛爾蘭呼籲。庇爾（Peel）則會於此為勞動者及貧民辯護，因得稍戢一般資產階級的野心。

總之，英國人之特徵在其思想之暢旺，文詞之雄勁，以及作品之濃厚而多變化（材質意匠兩方面都如此）

——這是牠的一般文學的特徵，尤其是詩的特徵。

意大利思想的先天的傾向，在把物質世界當做一種根本要義，又因環境和氣候的影響，而傾向於一種本能的肉感主義。此外，牠的思想又具有屈折性，柔順性，和膨脹性。但以明白，條理，精密等品性而言，則不能與法蘭西的思想並等，間或有之，便是最傑出的作品了。意大利和法國文學上有密切的接觸和繼續的交換，因而論者往往以爲意大利模倣法國，或法國模倣意大利，實則這兩個姊妹民族並沒有什麼相似的地方。意大利思想富於浮動性，往往突如其來的從一個題目跳到另外一個題目，魄力非常偉大，這是與法國思想那種有法則的態度絕不相侔的；前者氣魄鼓旺，後者進行較慢卻較穩。

意大利思想曾有人比作火山，祇有爆發的時候纔有能力的；當牠爆發時，火簇上沖，氣象很是雄壯，但至火熄煙消之際，則所剩的祇有一堆鎔石，燃屑，碎灰，與琉璃而已。意大利人即使在純粹論理的作品也無不逞其熱情和想像。他的氣質祇有從感情方面看得最明白；若在冷漠的境地，便覺衰弱無力且消失其特色了。意大利人因有這種熱烈的天性，所以對於演繹的推理不感興趣，且其思想恆缺乏次序和精密。但是這句話似乎太一筆抹殺了，因爲如我們上文所述，意大利人也未嘗不喜歡觀察，未嘗不喜歡比較，而且對於凡有實用的東西，都具有一種深刻的賞識力，這是我們不能否認的。近代哲學家亞勒弗烈·菲葉（Alfred Fomllee）嘗說：「意大利人是一種實驗派的哲學家，而其民族的獨創性也就在乎此。」

意大利並不乏學者，也並不乏哲學家。然而嚴重的考慮和深刻的思想往往是意大利作家最不發達的品性。他們往往爲着「局部」而犧牲「全體」，爲着可悅人的而犧牲所必要的，爲着文章的脩飾而犧牲全書的布局，又其發抒思想，目的不在感動人或使人信，而在用一種狂肆的形式衝放之，其文章則有如無數光芒閃爍搖曳而出。約言之，意大利人之思想，可以炫人，可以惑人，浮華而不實，恰如其民族之特性。意大利人除一部分特出之例外，深微一方面的性情是他們所缺乏的；他們對於人類也沒有深關真確的見解。

西班牙文學頗見創作性；牠的詩富於燦爛的影像，充滿着英雄氣概和向上心理，足以激發人的作爲，足以驅使人爲國家和宗教犧牲。然而這個民族的文學卻有許多重大的缺點和毛病。因爲西班牙作家久已屈服於宗教裁判的威懾之下，拘束於國民排外心理之中，所以翻來覆去，祇逃不了這幾個花樣。十七世紀的法國戲劇，常有人罵她犯了時代錯誤，並缺乏地方色彩，但若與西班牙的戲劇比較，纔覺得牠的毛病還是輕微的。洛柏·特味加和加爾德倫嘗爲希勒格和一般浪漫派過分的稱譽，實則比莎士比亞程度差得很遠。西班牙的戲劇是很特別的；其中罕見有哲學的和人道的作品。蓋南歐諸民族的氣質大都不宜於冥想，所以西班牙只有歷史的編纂家而無真正的歷史家；其在科學，則祇容有發揮想像的餘地的幾門稍見出色，例如考古學及政治經濟學。概括言之，西班牙文學的特徵便是側重抒情和想像而斷理性。此外則對於自然美和家庭生活的娛樂的賞識也是西班牙文學所完全缺乏的，有之，亦自最近之小說家始。

斯拉夫民族的特徵在對於歷史有一種濃厚的興味，此與一種愛種族的心理並存，又在其想像力具有非常的感受性，無論是暫時的或恆久的印象都能容受。此外還有一種心理上的特徵也很重要，即他們無論對於何事無不心裏先存一個很濃烈的道德問題。凡是有思想的人，從最卑微的到最偉大的，無論是小說中的人物或是真正的人，其於「一個人對於人類全體應該處何態度」一個問題，莫不感着很深的興味。人們對於他的同村人，同城人，同國人，以至國境以外和他們一樣能感快樂和苦痛的一切人類應該有一種什麼義務？這是他們常常要問的一個問題。一般新聞記者，批評家，和對於斯拉夫思想深有研究的人曾經告訴我們，說世界文學中能把一切關於個人，社會，以及政治的觀念都像這樣統屬於一個根本觀念之下者，唯有俄國文學而已。俄國雖沒有大哲學家或傑出的形上學家，卻會由牠的小說家和戲劇家產出許多複雜心理的寫照，使全世界人都嘆賞不置。例如托爾斯泰和杜思拖夫斯處，曾把人類極細微的經驗分析到極細微的地步。

照上述的方法，我們原可把各國文學所表現的不同的特性儘管一層層的分析比較下去，然而此事的範圍極廣，而我們所能利用的工具又極不完備，所以祇得暫時收束了。

(七)

各民族間相互的影響和反應

如上所述，差不多無論那一民族，我們都可以從牠的主要特徵和特殊品性多少料定牠將來在世界歷史上的地位。因為無論那一民族，總因種性和氣候的關係而有一種先天的傾向，這種先天傾向的結果便是那個民族的特色。

意大利以有詩和藝術的天才著名。法蘭西的聲名在曾創造許多偉大的學說並以有極精的貴識力為各國冠。英國則以其常識及實用主義知名於世。德國則以學術之精博著。荷蘭向稱哲學家的產地，堪為智識界的盟主。牠雖缺乏法國人的文雅，英國人的精明，和意大利人的活潑，卻具有一種明開的識力和公平的意識，這是從牠的歷史上及著作上都顯然看得出來的。而且荷蘭初等教育的程度也是無論那一國都及不來的。荷蘭人於其國民的理想，國民的宗教，和民族的獨立，都能保守勿失；而同時以心地坦率的結果，又最富於世界觀念，極肯容納外國的思想。所以英國思想盛行於鹿特丹（Rotterdam）。阿姆斯特丹也實際上已經是德國化。他們那種恬淡的天性，能把三大隣國的長處和短處輕減而兼收之。

一民族猶之一人，其種種特殊的偏性都是在最初發達期內養成的。無論那個民族都會表現一種野心，要想替自己的民族或全世界做一點事業。當初希伯來人嘗自命為一個天選的民族，該負有改革世界的責任，並該將一個救世主貢獻給世界。其實這樣自命不凡的心理不僅是希伯來人有之，其他民族也無不有之。希臘人自命為人類的教育者，而以為自己的責任在以藝術和學問的勝利分給人類。東方人則以自己的文化極古，故自命為一

切文化的泉源。舍易斯 (S. S. S. S.) 的一個祭司對梭倫 (Solon) 道：「你們雅典人都還是小孩子呢；」也可見他們很自負的神氣了。羅馬人則居然毫不客氣的自命爲「至尊的民族」，決不肯受別人支配，也決不容別人分他們的榮譽。當他們被蠻族侵入時，他們還不會放棄王位，及到後來帝國瓦解，他們勢不得不把統治權放棄，於是便又利用宗教勢力建設教王國以統治精神的世界。英吉利民族則以海上征服和遠地殖民爲自己的特權，決不願他人來分享。美國則用其廣漠之諸州爲舞臺，以表演文明進步與思想界實業界之種種發展。牠的一般著作家和政治家，無日不獎勵人民從事奮鬥的生活，因他們自己以爲已達到最高的文化程度，並已組成世界最大的民族。一個哲學家嘗說，美國人差不多沒有一個心目中不存這種無限制的個人主義和無窮極的膨脹的理想。至於現代的德國人，則頗自信自己對於科學上和政治上負有一種使命，並不亞於路德時代改革宗教的使命。當牠還未用鐵血政略擄得王冠之前，牠已經是握著智識上的霸權；牠蒙著牠的學者和哲學家的聲威雄長全世。最後，論到現代的法國，則雖因勁敵崛起致各方面都覺薄弱委頓，但因牠的思想，牠的文學，牠的藝術，以及牠的普及世界的影響，所以仍得佔據最前列的地位。

而究其實，則無論何國都不得操智識界絕對的大權。有許多民族的文明原先本很燦爛的，已經一步步墮落下來而終於滅跡。雅典，羅馬，亞歷山大里亞，君士坦丁堡，巴格達，利奧第十時代的意大利，查理士第五時代的西班牙，都已先後從地球的面上隱跡了。這些都是過去的榜樣，至於將來，我們又怎能曉得要發生如何神祕的變化呢？

綜觀世界各國的文學，有的是師，有的是弟，有的是君，有的是臣，彼此間不絕的影響，不絕的反應，紛紛的交換，紛紛的通借，以致龐雜渾沌，究不知那一部分是那一個民族真正自己創造的。我們若從最善於模倣的希臘人起將各作家各民族彼此通借的賬目都記下來，那是非有許多本賬簿記不清的。

(八)

各民族互相模倣的結果

若想從各國文學史上仔細去考查牠們彼此通借的地方，這當是一件無窮期的事業。我們若把東方諸國的文明瀏覽一下，便可見到印度的童話曾經供給世界以無數的故事和無數的民間歌謠，不過牠們流傳到外面時，隨路都會發生變化而已。我們若再往上追溯一步而着眼於藝術的全體，那末我們將見腓尼基人，波斯人，以及赫族人 (Hittite) 的文明差不多無論什麼東西都是從埃及和亞西里亞假借來的，至於比較近代的諸民族，則大部分都仰希臘爲其文化的淵源。羅馬文明的發達，則無論那個時代都以模倣希臘爲唯一的原则。據拉摩特 (Motte) 的話說，飛德刺斯的志願無非想做羅馬的伊索，味吉爾志在做羅馬的荷馬，忒稜斯則學麥喃得，賀拉西則學品得。所以實際上，羅馬人祇有一體文學——即諷刺文——不是模倣別人的。中古時則法國的“Chansons de geste” (這是一般“jongleurs”和“trouvères”仰給材料的共同泉源) 差不多全歐洲人都模倣，從埃

斯蘭的士著一直到君士坦丁堡的希臘人，沒有不受牠們的影響。從此許多年間，歐洲大多數的第一流詩人如佩脫拉克、克立斯丹·特比桑、綽塞、克雷蒙、馬魯叢，無一不仰玫瑰傳奇為感興的泉源，而一般“chivalric”的作者則都模倣由阿剌伯人及猶太人介紹過來的東方傳記。至於南法的浪遊詩人則不但把他們的題材和詩體傳給西班牙和意大利的詩，且并把詩的感興也傳給牠們，這是我們上文已經提及過的。從此意大利人繼續依賴這些法國詩和普羅溫斯的詩為生命，一直到牠自己出來做詩壇盟主的時候為止。

文藝復興時代則各國都對古人作奴隸的模倣。彼時人人都以為古人的造詣已到極點，所以除模倣他們之外更無別的事情可做了。龍沙、巴爾夫、約阿喜謨、都貝雷及其他七人詩派中的詩人，以至後來的白耳固（Ugo）和對坡特（Desportes）輩，無一不服膺意大利的人文主義。西班牙本嘗把許多題材供給其他拉丁民族，但至路易十四之世，忽覺其文學上和政治上的勢力一起都停頓了。牠當十五世紀時，因為缺乏勇氣和自信心，勢不得不仰給於其他民族，至此牠重又做其他民族的抄襲人了。牠此時的戲劇，除翻譯的作品外一無所有。至於英國文學，我們看見有兩派，其一純屬盎格羅·薩克森人性質，盡由創作，富於自然風調及精神；又其一則受十七世紀法國文學的影響甚深。兩派中後者之作風比較雅馴精細，往往冷淡缺少創作性，而詞章之優美過之，我們簡直可以說牠是盎格羅·法蘭西派。

至於坡普和德來登也祇不過反映十八世紀的法國文學，這是泥紫已經說過的。再往下看十九世紀，則德

國，俄國，那威的文學也都充斥着模倣的作品和改作的作品。尤其是俄國，牠會給我們一種印象，覺得牠於一切心的能力無不具備，獨缺乏最重要的一種——即創造力。斐迪南·布輪退耳嘗說：『最近的兩三百年中，歐洲各大民族的文學繼續發生思想的交換，我們可以說，這是一種物質的變態，這物質有進展性，能夠接受各種的印象和各種的形式，視各民族的特質為易於轉變，最先由西班牙或意大利傳到法國，再由法國傳到英國，由英國又傳到法國，其後則由英國傳到德國，又由德國傳到法國。』

(九)

充斥世界的無數思想——這是將來繼續進步的預兆嗎？

如上所述，可見世界的無數文學，雖則淵源不同，性質不同，而彼此都發生密切關係，以成一個總體。近世的歐洲，若就全體而論，便須看做一個極複雜的有機組織。這個有機組織是由無數不同的元素互相調和而成的。這個組織的靈魂和生命，並不在那一個特殊的區域，而在各種元素大家相調和相湊合之中。

各民族間的關係愈加密切則愈似合成一個整體，而相似之點也愈多。這種似點的增多，於各民族的實際生活甚有利益，而同時各民族的創作性必漸漸消滅。

如上文所述，當初的世界文學，彷彿可以分爲若干地帶，各地帶各有牠的特殊產物，而其產物也必與當地自

然界的狀況相符。至於現代，我們人已方彙足以打破時間和空間的限制，所以所謂國界，祇不過是一種徵收關稅的界限，完全出於人爲，並無真正區別文化的作用，而散布於地球上的各民族，以有海洋上的商務交通和智識交換故，大家不絕的發生接觸，所以從前人的種種區別至此都覺得無謂了。各民族的特徵漸漸歸於消滅了；近代思想的潮流不絕的向各方面盪漾，因而將各種族原始的品性都淹沒了。

人類是按着一條規律的線進步的。我們要曉得人類所以進步的原因，便須曉得人類歷史上情形的改變。人類被捲入一種繼續的進化潮流，其進步也必有因緣，決非盲目。人類進化的各階級，必都會發生環境上的變化，這種環境上的變化便是人類活動的方針也便是人類進步各階級間所以相銜接的鏈節。然而人類進步的速度並不是均勻的；有時進步得極速，那便是民族史上的光榮時代，有時非常遲慢，那便是文明衰落的時代，由光榮到衰落，或由衰落到光榮，其間並無一定的次序。人類又並不作螺旋形的進步，如斯塔厄爾夫人所說；卻曾經歷過許多連續的轉機，每渡過一個轉機，便算是前進一步。

古時人大都不相信人類是進步的。我們曉得賈拉西對羅馬人說的話，以爲人類日漸墮落，無可挽救。這是一種異教思想，大都對於現代看得太好，對於將來太覺絕望。近代哲學業已排斥這種學說，牠覺得依理性看去，人類絕不必替自己絕望，替後代絕望，或替國家絕望。但是一般樂觀主義的思想家則又未免過於虛妄。他們和古代人的態度適相反對，以爲人類的進步是受一種無可抵抗的法則支配的，以爲這種進步一定往前，不容人類意志的

干涉，又以爲人類的進步始終不斷，最後出來的因所得的經驗最富，所以一定是最好的。這種論調實在是太樂觀了。由科學上說，人類確乎從未停止進步，——這是一種日常經驗上的真理——因爲人類對於自然和物質的力量支配方法，確乎是逐日增進的。實業一天天的發達，智識一天天的增進，美術也一天天的進步。然而從道德上和智識上言之，人類的腦筋始終如此，所以我們現代人究竟是否比我們的祖先優勝，確乎還是一個困難的問題；因爲我們祖先所犯的錯誤，過失，以至於罪惡，我們也都重犯，我們也未嘗高過他們的志趣，並未嘗絲毫勝過他們的識力。那末，我們現代勝過古人的地方究竟在那里呢？文明原是長足進步的，但是我們現代的生活是不是真個比從前人的生活好呢？

我們在科學上確乎比古人進步得多，物質上的生活也確乎比古人便利得多，但是我們對於人生的見解，是否能比我們的祖先更明瞭呢？拉馬丁有一次曾問道，我們的思想能比約伯更深到嗎？能比孔子更有理性嗎？能比柏拉圖更高尚而有詩趣嗎？我們的詩人能比儼馬和咪吉爾更多神聖的思想嗎？我們的演說家能比狄摩西尼，荷普的底斯，或西塞祿更雄辯嗎？

我們祇須把前世紀末葉的情形觀察一下。彼時人人都已倦於物質上的努力，所以道德上的精神已近枯竭，人人都抱一種不安的枯燥的懷疑主義，對於將來的希望覺得很是渺茫。就不說別人，單把斯賓塞爾拿來做例，也已可見一斑了。斯賓塞爾一生的學業爛然，到晚年時卻也很表示悲觀和失望，嘗說：『我的功夫都是白用的，我的

氣力是白費了的。」因為他當時眼睛所接觸的無一不是悲觀的現象，思想走錯了路徑，報紙濫用其職權，社會的進步是假的，大多數的人格是不堪的，真美的東西沒有人知道賞識，藝術祇在娛人而不在教人，因而品格日趨卑下，加以軍國主義使社會流於僥荒，「假愛國主義無異於惡魔的舉動，」帝國主義常常引起可鄙的戰爭，而政治教育，實業，無一不趨向專制而漠視民衆——凡此種種，無一不足以激起他的失望心。所以他便斷定我們這個世界業已漸漸回復到野蠻和奴隸的態度了。

據這樣看來，可見近世惟有科學上的成績可以說是真正的進步。因有這些科學，所以人類智識的狀況漸漸可以改變。因為智識狀況的改變，所以人類道德的程度也終於可以提高。而且將來的科學進步必能更速，所以各民族的语言，思想，與夫一切利害關係，也必因之而漸漸接近。

一時代有一時代的理想。這些理想業已表現於從古以來的許多作品裏。我們從這些理想遷變的狀況，可以推測將來的局面。將來的局面也必不外向來所經過的步驟，也必須受着環境的支配。將來也必一時代有一時代的理想，也必須時時和自然界衝突，時時要努力去征服自然界。將來的智識歷史也必不免有一盛一衰之勢。

凡此都是一種原則上的推測。至於具體的事實將有如何變遷，那不是我們的眼光所能看到。然而也有幾件事實，業已漸露動機，所以也不難預先料到。其一即東西兩方的文化將來必互相吸引，互相接近。又其一現在所通行的語言之中必有一兩種將來勢力能夠無限的膨脹。這兩件事實，都與現在業已發動的種種重要事件有聯

帶關係的，也是凡稍有限力的人都看得出來的。

此外還有一件可以預料的，即將來必有一部分民族漸漸發達，終至力量和人數都足以壓倒其他一切民族。而這少數的幾個民族，也必努力競爭，各期其政治，其特性，其語言文字，能夠支配全世界。

(十)

各民族力求擴充其語言和文學通行的範圍

在歐洲各民族爭霸的奮鬥中，其主要的特徵便是大家都用語言文字為競爭的利器，至其成功的程度則頗不等。若由數量的觀點而論，英語及西班牙語通行的範圍比法語或德語的範圍都廣，比意大利語，希臘語，瑞典語，那威語及其他歐洲語言則更廣。

英語的勢力業已遍及五大洲，包北美合衆國在內，單以合衆國的居民而論已經將達二萬萬人了。現今世界差不多到處都可以通行英語，至於各海的海岸則更無處不可通行了。

西班牙語通行的地域，除現今歐洲西班牙本地有限之面積外，並有古巴，北美的墨西哥，南美全部（基阿那除外），以及巴西，總計用此語者將達八千萬至一萬萬人，但若論面積之廣大，則英語和西班牙語又都不能跟中國語及俄語（包括歐俄及亞俄）比了。

十八十九兩世紀歷史上最重要的事實莫過於俄羅斯勢力之大膨脹及其大進步。牠的政治家如彼得多諾夫 (Peter Donostoff) 之流，皆有將全世界都俄化的洞嚇，牠的著作家和新聞記者勢力又都極大，所以在最近的將來，牠必能在歐洲諸民族的進化上發生一種極重要的事件。又俄國人口的繁殖也很厲害；只看最近半世紀中的增加，已經可以驚人，現在俄語通行的地面已佔全地球的七分之二。

法語至今仍保存牠向來所處的地位；其在文學上，藝術上，及外交上的勢力仍舊很大。從地理上說，即使除開比利時，瑞士，及加拿大而論，其在撒哈拉區域，中央亞非利加，亞細亞，以及印度支那等處的勢力也必漸漸可以開拓。現今法語在西歐一帶很通行；瑪摩拉海 (Sea of Marmora) 及博斯福魯 (Bosphorus) 一帶的居民都以法語為主要語言，而許多國的學校課程單上法語都佔最重要的地位。

德國當一八八〇年之前，在歐洲以外僅有些須的屬地。但從此二十年後，牠的國旗已可該管一五〇〇〇〇〇方哩的地面，共有居民一六〇〇〇〇〇〇人，而巴西和巴力斯坦等處的殖民還不算在內。近世以來，牠的國勢日增，殖民地日益推廣，所以牠的語言進步很大。但若跟俄語及英語比，範圍便差得多了。至於意大利語，則其勢力似乎未必能超出國界之外。

就世界的全體而言，國家有興必有亡，列國間權力平衡的形勢時時要發生變動。其結果將使無數第二流的語言被範圍較廣大的語言所併吞。例如土耳其人，當初原曾有一時的極盛，威力已曾迫及維也納城下，但今後要

叫他恢復原來的。何況大概是辦不到了。如今構成歐洲土耳其的諸小國大概都將俄國化或希臘化。又如阿剌伯人，其中，古時的帝國自巴格達直至庇里尼斯山脈，今則除阿剌伯本部外，尙包含敘利亞、埃及之重要區域的黎坡里 (Tripoli)、突尼斯 (Tunis) 及阿爾及利亞 (Algeria) 之大部分，以至蘇丹 (Soudan) 等處。但是他們的文明大概無論如何不能再恢復當初的盛況了。波斯也再不能回復阿契米尼 (Achemenides) 或沙浦耳 (Sapor) 的時代了。

現在的波斯已成英俄兩國相衝突的目的物，北方則俄國人漸漸蠶食而進，南方則英國人進逼海邊，大概不久便將傾覆在這兩重壓力底下了。於是有多種亞洲的語言也必將跟着牠消滅了。

同時以英、俄、法、德、西班牙、荷蘭等國的勢力逐漸膨脹，故西方的學術業已普及世界的各部分，並已促進世界一般的進步。

美國與澳大利亞早已與歐洲立於同等地位。方今兩地對於文化事業非常努力，志在凌駕歐洲而上之。巴拿馬運河之開鑿，耗資原不在少數，然因是而交通上之便利確乎大增，美國受賜尤巨，其近年來進步之速誠可驚人。故微爾芒嘗云：『今沙士比亞之文字乃得流行於如此廣漠之地面，真始料所不及也！』又若東方的印度，歐洲思想潮流亦已不絕的侵入。一八七一年時本地報紙有名 (Arkar-i-Arjunan-i-Panjah) 的已經否認自己爲「半開化」的民族，而宣言印度斯坦的文明且在中國與波斯之上。

歐洲值各新興民族忙着在舊世界的廢墟裏從事於建設事業。故回教國崛起於亞洲，而侵入歐洲，致西方基督教的文化異常退步。迨查理曼至十字軍成立的一段時間，歐洲乃又重振精神，驅逐阿剌伯人，解放普羅溫斯與郎基多克，重建西班牙，光復西西利，摩爾太，希臘，以及意大利沿岸，各地重又將歐洲的軍隊，歐洲的思想，以至歐洲的風俗語言輸入亞洲腹地。——這是世界歷史上歐亞兩洲勢力互相消長的大概。

至於近世，則西方智識上，道德上，及實業上的勢力業已遍及全世界。東部亞細亞除極少數山僻的區域外業已無不開放。即使那極端守舊的地方也已漸漸容納歐洲的風氣。如是，歐亞兩洲文化之漸趨一致，已屬意中之事了。

(十一)

最後的幾句話

我們現在已將近思想上世界大同的時候了，因為現在無論何事已都有這樣的趨勢。世界各民族都將不復能抵制這種趨勢，而不得不大家涵入同一生活的潮流。未幾而巴黎，倫敦，聖彼得堡，北京，新金山，橫濱，舊金山，紐約，都將成爲一個全體的各部分，即經濟學家所謂「世界市場」於此，世界各部分的需要和供給將無論何時都能維持平衡的形勢。

從此世界的全人類將由文學，藝術，商業，實業等等，表現出他們的大同精神，將不復為從前的國別所限制。蓋人類與自然界接觸的範圍既將不絕的擴大，所以環境也將不復能有從前那樣顯著。因各民族接觸愈密的結果，向來各個所具的特性必將漸漸消滅，這也是毫無疑義的。因為這是自然進化的一種公例，是一種無可逃避的公例。從此智識上的世界主義將漸漸擴大，而民族間的差別將漸被剷除；文化將繼續牠的進程，而地方的特色將漸歸消滅。各種特殊的模型，各樣特殊的氣質，必將隨文化的進步而終至於絕跡；到處的居民，將不復有特異於其他人類之處；遊歷家將不復有殊風異俗可以訪尋。一切文學上之民族的特質也都將成為歷史上的東西了。

總之，世界主義和國際主義將成為世界思想的生命；各民族將不復維持他們的傳統，而從前一切種性上的差別必將消滅在一個大混合體之內——這就是今後文學的趨勢了。

商務印書館出版

歐洲文學入門

(文學叢書)

顧鍾序譯

一册

定價六

角

K. Nagels: Introduction into Literature

全書二十一章，分別敘論各時代各國文學之狀況，於史實之述，思慮之靈通，均有切當之見解。

歐洲文學史

(北京大學叢書)

周作人著

一册

定價六

角

本書分三卷討論：(一)希臘文學，(二)羅馬文學，(三)羅馬中古及十七十八兩世紀間之歐洲文學。自希臘之神話、史詩、頌歌起，至十八世紀末期之第一古典主義止，各就其源流派別，闡發歷史。

歐洲文藝復興史

(共學社叢書)

蔣方震著

一册

定價五角五分

角

是書述西洋近代文藝思想之來源，極簡要亦極精警，梁任公先生稱之為『求諸光之傑』。

歐洲文藝復興小史

陳銜哲著

一册

定價一

角

此書於十四、十五、十六世紀意大利文藝復興期間之種種重要事蹟，如古學的復興，方言文學的產生，藝術的興起，科學的興起，智識工具的進步等，皆鉤玄提要，分別敘述。

近代文學

日本伊藤原一著
張潤天汪觀泉合譯

一册

定價六角五分

角

書分十一章，詳述十八世紀末期至十九世紀初年的歐美各國文學界的概況，對於文學思想的源流派別，各國特殊的文學，名作家及其作品的特點，都極精詳剖析之能事，譯筆亦頗清潤條達。

文學研究會叢書
商務印書館出版

鄭振鐸編

文學大綱

道林紙印 四巨冊

定價 布面十元
紙面八元

這是一部近來出版的世界文學史，作者用了四年多的工夫寫成。行文活潑而頗有趣味，毫無一般文學史枯燥之病。有許多材料在同類書裏是不會見得到的。他所包括的時間自古埃及的文學至歐洲大戰後的作品，他所包括的地域自中國、日本、印度、至歐洲、美洲、阿拉伯、波斯。全書四大厚冊，篇幅在二千頁以上。第一冊自世界的古猶荷馬聖經的故事，希臘的神話，東方的聖經，印度的史詩，至詩經與楚辭，中國最初的歷史家與哲學家，希臘與羅馬，漢之賦家，歷史家與論文集，曹植與陶潛。凡十一章。第二冊自中世紀的歐洲文學，中世紀的中國詩人，中世紀的波斯詩人，中世紀的日本文學。凡八章。第三冊自歐洲文藝復興時代，十七世紀的英國文學，法國文學，中國小說戲曲的第二期，至十八世紀的英、法、德、國文學，十八世紀的南歐與北歐，十八世紀的中國文學。凡十章。第四冊是十九世紀的各國文學及新世紀的文學。凡十七章。每章之後各附有參考書目，每卷之後又各附有年表。

比較文學史

為奇著作編圖印必究

中華民國二十年四月初版

每册定價大洋壹元伍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原著者

法國洛里哀

譯述者

傅東華

發行人

王雲五

印刷所

上海寶山路五〇一號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上海及各埠
商務印書館

A HISTORY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BY FREDERIC LOLIÉE

TRANSLATED BY T. W. FU

PUBLISHED BY Y. W. WONG

1st ed., April, 1931

Price: \$1.50, postage extra

THE COMMERCIAL PRESS, LTD., SHANGHAI

All Rights Reserved

